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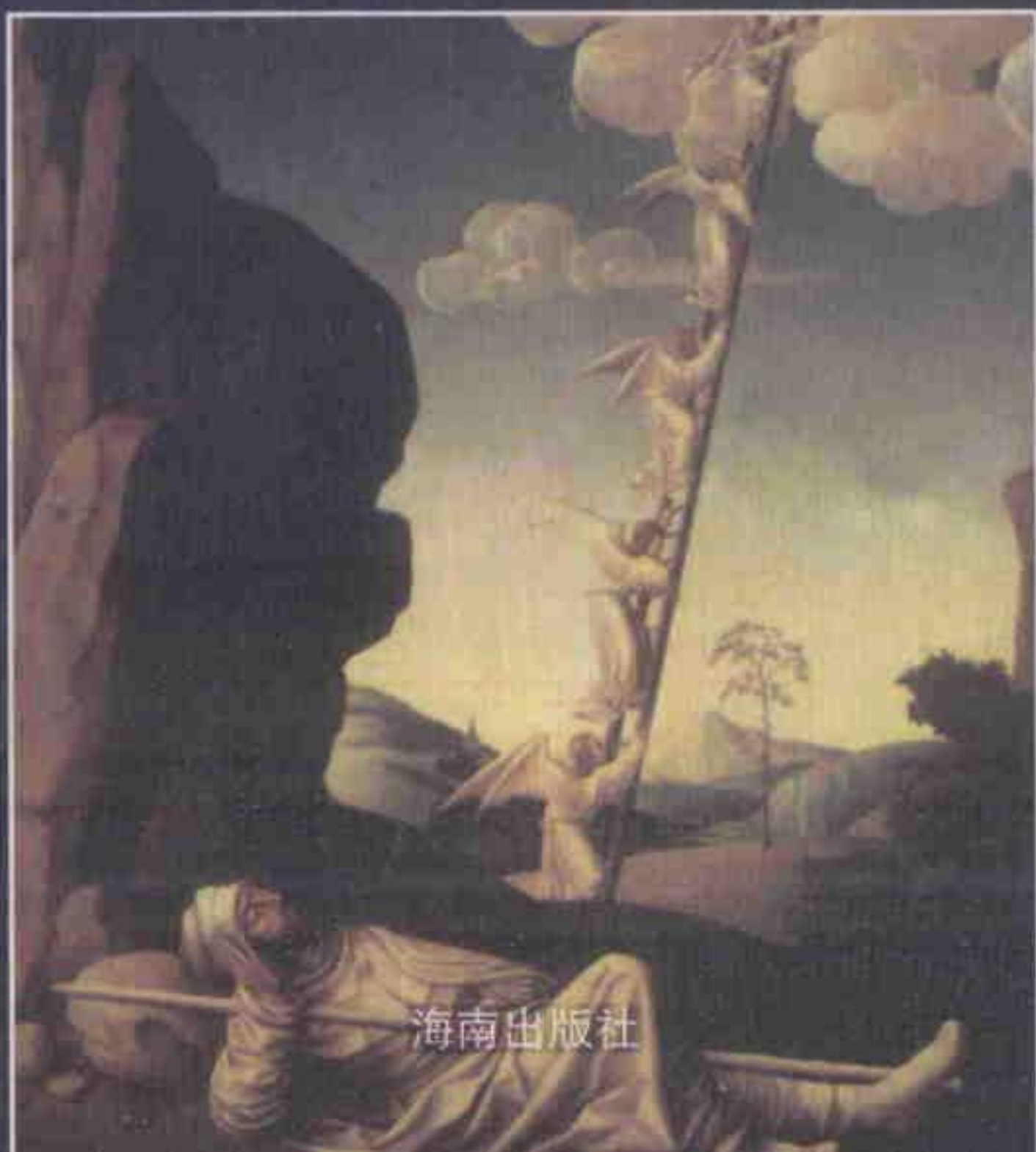


人文素质丛书

人类梦史

DREAMS AND DREAMING

[美] 安东尼·史蒂文斯/著
杨 晋/译



海南出版社

CHINA

2002
B845.1
55
2

人类梦史

(英)史蒂文斯 著
杨晋 译



海南出版社



3 0597 8658 6

“人文素质丛书”编者前言

隐约记得张爱玲曾说——一个时代需要的是升华而不是浮华(大意)。偶尔想起这句老话时,不免转顾一回我们当下身处的这个时代,竟往往觉得有些悚然,甚或生出些许寒意。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呢?我们该如何描述它并借以解析我们日渐苍白的心灵生活?

当我在周末傍晚之时,随着拥挤的人流步入这座名城的超市时,我被扑面而至的鲜衣美食和车马冠盖所震惊,内心的感觉忽然找到了最形象的象征——这就是我们的时代。一个庞大无比的超市,久贫乍富后的物质过剩支撑着我们的趾高气扬,使我们在笙歌阑珊之际迷失于灯火装点的盛世繁华之中;而在褪尽铅华的夜深,虚弱的心身却止不住卧成了一缕浮云……

常常在想,我们是否应该再次质问目下的教育——是一种怎样的设计贻误了一代代人的成长?

恰好在上个世纪的此刻,一代先贤们通过种种努力,废除了千年未替的科举,引进了美雨欧风,始建成新式教育;使国人初闻试帖辞章之外,尚有物理几何化学地理;更使得一时俊彦倍出,通才博识,打造出一个全新的时代。而今,斗转星移,当一种新的秋闱大比正在局限子弟们的学习时,我们又当如何努力,来提升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人文素质?

这显然已非危言耸听!

当我一次次面对大学出炉的侄辈,仅知所学专业课程,熟稔托福电脑,而对人类其他文化学科一无所知时,我常常想起二十几年前我在遥远山村所结识的一个农民——那是一个因取消高考而回乡务农的老高中生。当他潇洒地坐在田埂边两只粪桶之间的扁担上,不紧不慢地卷烟而后旁若无人地谈古说今时,少年的我注意到

他深邃的目光仿佛洞穿尘寰。他依约置身于世界的边缘，隔岸观火似地评弹着身外的鸡虫万事，他几乎无所不知的学问使我混沌初开。若干年后，当我把记忆调向那一画面时，我仍有一种无法言喻的悲欣——时移世易的今天我们究竟怎么啦？何以我们仅仅只学会了暂求衣食的生计，就不再关注满目疮痍的人间，就无心再去寻求认识这个世界的其他门径？

因着这样一些杂感，于是有了编辑这样一套“人文素质丛书”的初衷——我们试图为今天的年轻人准备这样一份消夜的食单——让他们在各自的专业生计之余，尚能对构成我们人类文化的其他学科皆有所了解，让他们在单调的精神配餐外，尚能另摄一分可资壮大的营养。如是，不仅我们的知识结构将变得丰富，重要的是人生也必将添出一些精彩。

人选本丛书的都将是一些非专业人士用书，但又将涉及众多的专业学科，不过皆为门外汉亦可一窥堂奥的指引性书籍，我们姑且概之为“泛文化，次学术”。这些书每种皆谈一门学问，都由该学科的大匠学者深入浅出地为大家指点方略。所用语言皆求生动有趣，叙说方式皆求新颖灵活。一卷在握，务使读者不忍释手；再三翻过，有望诸君对该学科的由来、发展、流变及现状有一个基本认识，并藉此加深对内外世界的理解。

最初，我们曾试图聘请国内各学科名流分撰本丛书，很遗憾，我们似乎历来缺少这样的人物——既能高屋建瓴又乐于指点津渡。因此，我们只好全部引进海外佳构。尽管这样的做法远为繁复，但初辑完成，我们竟更觉欣慰，因为这样一批大腕作者，所著的这样一批普及读物，同样也远非时下的一般俗流可比。我们深信，在这样一个印刷垃圾成堆的时代，这批书将深获众多求知求智者的心灵。似乎这样，我们才能略生慰藉。记得少时传抄过马克思和其女儿的一段对话——问：你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是什么？答曰：这个世界的一切知识于我都不陌生。

善哉斯言！但愿因这套丛书，更多的人都能自豪地同诵这句古老格言。

目
录

- 1 做诗机器/1
- 2 从吉尔加梅什到弗洛伊德/9
 - 梦的理论/11
 - 原始社会/13
 - 早期文明/15
 - 古典解梦学/19
 - 预言之梦/22
 - 宗教之梦/25
 - 梦的解化和治疗/26
 - 早期梦研究/28
 - 解梦先驱/30
 - 潜意识/32

3 弗洛伊德、荣格和以后/38

- 自由联系/39
- 梦的本性和用途/40
- 梦工作/42
- 艾玛的注射之梦/46
- 对弗洛伊德的批判/50
- 荣格的历程/55
- 海关检查员和骑士/59
- 解释/60
- 弗洛伊德和荣格的评价/66
- 后来的发展/73
-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和威廉·施泰克/74
- 塞缪尔·洛伊/76
- 托马斯·弗伦奇和埃里卡·弗洛姆/77
- 蒙塔古·厄尔曼/78
- 弗里兹·佩里斯/79
- 梅达德·博斯/80
- 查尔斯·基考罗夫特/81
- 詹姆斯·希尔曼/82
- 结论/85

4 梦科学/87

- 做梦的状态/92
- 梦生物学/95
- 梦境健忘症/101
- 大脑原型优先权/102
- 梦中的原型优先权/106
- 两个基本的典型模式：对天使微笑和皱眉头/107
- 童年早期典型的梦/109
- 原型和神经科学/110

○记住现在：巴特利特和艾德曼/111

○从梦境到意识/114

○摘要和结论/115

5 有意识和潜意识,集体和个人/118

○原型假设的出现/128

○原型和生物学/130

○原型的相似物/132

○心理学的“量子论”/134

○生命的原初阶段/135

○从原型到复合体：“范例的出现”/137

○原型、综合症和梦/139

○梦的目标、有机个体和意识/141

6 梦工作/148

○灵魂的两重性：梦和语言/149

○梦和诗：造梦/159

○梦和故事/161

○梦和记忆/169

○梦和玩乐/172

○梦和精神病/174

○魔力、仪式和转变/177

7 符号论/182

○生存还是死亡的符号/184

○符号的起源/186

○典型的符号/188

○典型的毒蛇/190

8 梦与治疗/196

- 精神防御/199
- 梦的报道与接收/200
- 复合体及其转变/204
- 个体神话/208
- 灵魂,客体和主体/210
- 幽灵/215
- 角色/218
- 性别矛盾复合体/220
- 自我/223
- 转移和反转移/226
- 意识的道德规范/230

9 现实的梦/233

- 要记住并记录梦/233
- 联想与扩展/236
- 解释/238
- 想像仪式/242

10 普通的梦/253

- 痛苦和快乐的梦/255
- 焦虑担忧的梦和可怕恐怖的噩梦/259
- 儿童的梦(孩子的梦)/264
- 诊断性和预测性的梦/267
- 坠落和飞翔的梦/272
- 山水风景的梦/273
- 神志清醒的梦/276
- 憧憬未来的梦/280
- 性梦/282

11 梦和创造性/285

12 著名的梦/299

○希特勒的梦和视觉/300

○雷内·代萨泰斯的“大梦”/304

13 做梦和知觉的艺术/324

○伊卡洛斯的堕落/326

○进步和堕落/327

○现代的伊卡洛斯/330

○大自然的思想/331

○世界的锁链/334

○意识的本质/336

○无论灵魂变成何物?/340

○制造灵魂/342

○对全部的欲望和追求/345

○神圣的根基/347

14 科学和灵魂/351

○梦生态学/357

CHINA

1 做诗机器

大多数人在到死时只能认识到自己很少一部分潜能。他们出生时是百万富翁，却在贫困中死去。

A. R. 奥雷芝

在策划这本书的最后阶段，我做了一个梦，梦境中看到自己与卡罗勒斯·奥德费尔德、约翰·包尔比，以及一个穿白大褂的人（我想他是一位科学家或技术人员）一起就一台仪器进行争论。以我的经验来看，它肯定是一台脑电图仪，因为这东西表面插着电极，并且引出一根导线，连接到笔上，使之能在卷纸上画出许多胡乱而尖利的线条。但是卡罗勒斯却把它称为“做诗机器”。在隔壁房间里，一个年轻的女人正在歌唱，我在欣赏她甜美的歌声时却惊醒了。这个梦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这些情境就是我开篇要写的东西？为什么与我争论的人会把这台电子脑波仪称为“做诗机器”？你对这些人中的谁感到最不可理解？

当我上大学时，卡罗勒斯·奥德费尔德就先后在雷丁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心理学系任教。他是一个心地善良、为人慷慨的教授，他教了我许多有用的科学方法和研究心理学现象的知识。后来，当我完成医学课程时，他又鼓励我到雅典迈特拉婴儿中心继续进行博士深造(MD)，并邀请约翰·包尔比教授担任我的导师，从事婴儿行为学方面的研究。使我感到最

大满足的是,包尔比教授欣然同意了,这使我感到最大限度的满足。

之后,我作为一名婴儿发育方面的专家,好运气接踵而来,在学术方面也不断有所突破。约翰·包尔比教授则凭借他在母婴研究领域的国际声誉,在心理分析学界掀起了一场革命,并且成为我一生中一位极佳的良师益友。在我的眼中,约翰最主要的成就是雄心勃勃地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带入生物科学的主流。但不幸的是,并非分析家不关注实例研究,而是他们继续把信仰建立在大师们有瑕疵的、空洞的说教之中。结果就是精神分析学更像一个门派而不是科学。

虽然我与约翰教授对荣格分析论的看法不同(他本人的理论基础属于精神分析学派),他还是支持我努力把荣格的理论与他自己的“附属理论”结合起来,并且在此基础上加上动物行为学(研究野生动物行为的一个生物学分支)的一些最新发现;他还对我的《自我自然史》的草稿中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热情的回应,这本书出版于1982年,对我来说意义非常。

当我考虑到这个梦的时候,我认识到它正是唤起我准备写这本书的理由。这个梦透露的信息是什么?我感到它告诉我自己需要继承卡罗勒斯·奥德费尔德和约翰·包尔比所宣示的科学传统,但是同时它也提醒我梦的创造者是个诗人。隔壁房间里的年轻女人则是所有男性荣格分析家熟知的——混合在自我灵魂中的女性因素,作为仲裁者评判他的行为,并以爱神、音乐、诗和生命等面目与他进行交流。荣格曾经观察到的“灵魂”,是生命的本原。而她的歌唱则强调了卡罗勒斯给我提供的信息。

在我梦中出现的那个穿白大褂的人操作“做诗机器”并且保证它有正确的记录。过去40年许多在梦境方面的科学研究都依赖于脑电图仪的使用,正如我们将在第四章看到的那样,

它所获得的信息对于我们来说具有重大意义。但不幸的是,很少有著作涉及到梦的解析,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不重视,对梦进行科学研究的大部分书中都把神经生理学作为讨论的重点,而几乎不提及心理学的内容,这样由于神经生理学本身的缺陷,研究往往浅尝辄止而变得毫无意义。这种短视是无法接受的。

我们在梦学(梦的研究)方面已经达到一个历史转折点,已经不能简单地把梦作为纯心理学或完全神经生理学现象来进行讨论。很清楚,它具有双重性。任何对于解梦有所助益的研究方向都必须把心理学和神经学的观点结合起来。梦是一种心理生物学现象,正如我希望展示的那样,它们拥有自己的本源,在物种进化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与我们个人的成长息息相关。

梦本身应该成为系统研究的焦点,这在目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精神分析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根基正在遭到撼动。弗洛伊德学说的声誉在最近几年里不断下降,各种心理疗法学派的贬抑之辞不绝于耳,在公众的头脑里,这个门派的所有创造力都被弗洛伊德定型了。结果对于我们中间那些立志在未来成为心理医生的人来说,实践变得可有可无,他们最迫切需要的是在内心形成一系列假设,然后根据实际病例进行描述,就可以为大家所接受。同时我们在科学领域也不能忘记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即,做梦的大脑远非一个电子化学系统来对梦境进行“信息加工”,它更像是一架“做诗机器”,如卡罗勒斯所说的那样,在梦中产生“电子大脑X光片”。心理疗法和梦的解析是,而且总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我们需要实践出真知,需要以毫不妥协的态度对待自己长期以来所体验到的见解、感情和智慧。

在我的整个专业生涯中,都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即希

望能为人性的发展提供一个持久的理论。在包尔比的影响下，我看到了对比方式的运用——根据心理学、生物演化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规律把各种数据收集到，进行比较和分析，这种思维方式对于阐述一种理论是不可或缺的。梦的比较研究对于达成这个目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正如我们所昭示的那样，梦的内容直接与年龄有关。在心理学、分析学、特性论和神经科学的发现并不能足够有效的证明将会产生一个新的起点，来开启梦学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刻。在 20 世纪后半期的所有发展中，人种学的革命与脑电图研究相结合导致了对梦的本质和功能理解方面的转变。在 20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的这段漫长的时间里，逐步证实了 C. G. 荣格的临床实践，即我们物种的根本亲缘关系不仅存在于自己的身体和基因里，而且存在于我们的幻想、梦境、精神状态以及文化艺术方面。人类发展的过程是建立在一定的基本结构之上的——荣格把它叫做原始集体无意识——这在很多方面都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儿童的语言学习能力，为各个文化群体所喜闻乐见的故事和叙事诗，人类总是希望去表现的礼仪活动、歌曲、圣歌以及舞蹈等。人类学、精神病学、神经病学以及深层心理学都为我们窥视人的本质提供了途径，使我们得以了解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内心深处的深层本体的影响。荣格把这个深层本体称为“200 万岁的自我”，它暗含在我们的一言一行中。没有什么地方比梦境更能表现出这种残存的原初物的存在了，在梦中，正如神经学家所揭示的那样，表现了我们大脑中最原始的构造。每个晚上我们都进入一个虚构的现实，一个黑暗的、充满原始气息的迷宫，里面居住着众神和我们祖先的鬼魂，聚集着来自我们人类的古老的智慧。一些梦境通常会带有当代的伪装，但是我们梦中的这些披着现代外衣的奇思怪想往往源于古代人类的神话。这种原初的自我是做梦的基础，

它非常形象地体现出我们在进化中对过去遗产的继承。在我梦境中的三个人中，我可以辨认出两个人（卡罗勒斯和约翰），他们作为我的导师，实际上代表了荣格所说的“智慧老人”。那么第三个人，即穿白大褂的男子又代表了什么呢？从我与他的关系出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是一位现代“英雄”人物——一位真正的科学家，他能够一心一意的始终站在知识的前沿，通过一系列的可证明的事实和逻辑推理来进行探索。体现这一点的很好的例子就是在梦中遇到一个陌生人并与之进行想像中的交谈。当我这样做时，我了解到这位科学家认为梦是一种无意义的字谜游戏，完全由神经化学反应支配。我对他说：你之所以有这个观点是因为你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梦境看做是一种心理事件，你从来没有把个人与梦境联系到一起。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不久就会发现梦境是多么的有意义。但是他却非常粗暴的答复说，他没有时间做这样的事情。

对于那些关注梦境的神经生理学研究人员来说，他们否认做梦的心理意义并不是非同寻常的事。他们就像电器工程师一样，由于只关注电视机技术本身，而忽略了正在播出的节目。我猜想，很少有专业人士会像这个例子一样一叶障目，但是许多人可能会把他们的梦境看做是电视机，他们只是把机器打开，任由它在屋角自由播放，而电视播放的节目对他们几乎毫无影响，他们只是在无意识层面会得到一些零星的信息。既然他们并没有清醒地理解这些节目到底是什么，他们也就不会自取麻烦地去关注和找寻有价值的东西。像我们的科学家一样，他们感到自己一生中还有更好的事情值得去做。但是这样一来他们丢掉了一份珍贵的财产，即我们经常忽略的个人经验和教训。通过进入人类体验的最深处，梦能够对我们的健康和个人发展产生影响，同时还可以使我们更加准确地

把握生命的意义。梦并不是什么深奥的现象,并不是需要高级专家进行分析才能够理解。正如我试图揭示的那样,梦的解析是一项艺术性的工作,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得到好处,人人都可以从了解到自己想做某事的真实意愿。

由于梦的状态涉及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本书涉及的范围必须特别宽广。本书开始于对早期历史上著名的梦境案例进行介绍,而第二章和第三章将讨论梦的理论的发展过程,以及从远古时代到现在为了发现梦境的秘密而采用的各种技巧。第四章考察了梦科学的各项研究成果,它们支持了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精神分析理论,保罗·麦克莱恩的三位一体大脑神经学模型,以及埃德尔曼关于记忆和知觉的“神经达尔文主义”理论。第五章简要描述了荣格“原型”的概念以及相关的复杂理论,并根据生物学的理论提出他们在构成梦境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梦的真正形成进程在第六章中将得到阐述;在这一章里,“梦的工作”将会与其他创造性的行为进行比较,比如语言、诗歌、讲故事、记忆,玩耍,预兆,魔力和仪式等。人类灵魂所拥有的天才集中表现在构建具有特定意义的图象上,本书的第七章将对象征主义进行考察。第八章将通过解析疗法描述“梦工作”的实际运用;而第九章则提供详细的建议来指导如何使某人的“梦工作”为己所用。一系列的梦境将被作为典型案例在第十章中被解析。在第十一章中,将会研究梦对于艺术和科学发展的重大贡献,而在第十二章中则讨论梦境改变整个历史的情况。最后部分将讲述梦在个人意识发展中的作用,这对于物种的生存(第十三章)和人类心灵的健康(第十四章)都有重要意义。

在撰写这本无所不包的书的过程中,我认识到自己有可能被指控为钻出自己的犹太人区,剽窃了我的前辈们毕生心血才研究出的精华;但是我准备冒那样的风险,因为我感到现

在正是写作这样一本书的最佳时间。梦境对于我们每个人,甚至对于我们文明的未来发展都具有深远意义。因此我想借助于这几页纸所表达的东西能够使信奉不同世界观的人士和专家都感兴趣。使梦的解析法则被科学家所理解,使梦科学的发现能够到达实际分析人员的手中,这些原理和发现经过两大阵营专业人士的介绍将会使任何对梦的研究感兴趣的人受益匪浅。

我写这部书的中心指导思想是使我的读者能够感受梦境,引领他们进入由梦的语言所描述的神秘世界,欣赏自己所发出的信息,体味自己的心声。而其他对于历史、典故和科学信息的讲解,尽管重要,则只是对这个目的的辅助。

对一个梦的完全解析需要时间和空间。在文章中出现过的许多例子都是言简意赅和一针见血的。然而,为了能把梦中世界里千奇百怪的意义符号和“心灵之书”中的话题充分展现给读者,我将在这部书中花费更多的篇幅来解读和分析某些关键的梦境。如果一个人想要欣赏自我梦境中表现出的难以置信的微妙情感和创造性,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一个典型的冗长的梦境作为标本进行分析,然后加上这个人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有关情境。出于上述便于解释的目的,我选择既能在精神分析历史上占有关键位置的实例,又注意保持了我们自己的文化特征,比如弗洛伊德关于艾玛的注射的梦、荣格的关于海关检查员的梦、希特勒关于自己被活埋之梦以及雷内·笛卡儿伟大的梦。

所有这些例子都在公众中广为流传,而且做梦的人现在都已经不在人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如果与大家一起分析那些现在仍然活着的人的梦境会涉及到个人隐私和职业道德问题。梦是所有的事情中最具有隐私性的东西,即便在书中通常隐去了做梦者的真实身份,但作为外人的读者看到别人的

隐私时也会感到不安，因此在出版时必须要让相关人员过目并征得他们的完全同意。为此，我想要对本书涉及的所有人士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因为没有他们的同意与合作，本书就不可能面世。

另外，我还根据弗洛伊德和荣格所举的例子，把我自己有关的梦境展示出来，这完全是为了说明和支持我自己的观点。当一个人写作一本书时不可避免的会梦想到自己工作的进展。事实上，这些有写作的梦是如此典型，以至于它们已经成为本书文字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被列入书中的个人梦境不是出于我自我炫耀的目的，我之所以用它们举例是因为它们比较新颖，且具有启发性，能够表现出一种无意识的想法是如何被自我意识所支配的，特别是在面临一项超越自己能力的任务的挑战时。

2 从吉尔加梅什到弗洛伊德

对于兰巴蒂德·厄鲁克国王来说，
他改变了不可改变的方式，
滥用和改变了惯例。

《吉尔加梅什史诗》

人类看起来从刚刚出现“文学的艺术”时，就有了对梦境的记录。在公元2世纪，一位名叫阿特米多罗斯的罗马占卜师周游世界，为他的一本巨著《梦的解析》收集资料。在尼尼微的阿休尔班尼鲍国王的书房里，他发现了刻写在粘土板上的梦的记录，在后面还注明了日期，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甚至更早。阿休尔班尼鲍的书房遗物在19世纪中叶被挖掘。人们看到许多记述梦境的粘土碎片，其中还包含了古巴比伦厄鲁克国王时期的《吉尔加梅什史诗》。后来人们又在一座神庙里发现了另外一些雕刻着相同楔形文字的泥板，这座神庙就是著名的纳布神庙，供奉着闪族人的智慧之神。把这些资料进行细心的加工和整理，我们就会了解到吉尔加梅什史诗的大致面貌。在史诗的开篇就记叙了这位国王被噩梦所困扰。于是他把自己的梦讲给母亲宁逊听。他的母亲则告诉他说，这些噩梦意味着有一个能力不在吉尔加梅什之下的人将要闯入他的生活。吉尔加梅什将与这个新来者进行斗争，争夺对王国的支配权。斗争中吉尔加梅什终将失败，但是这也会使两位强者化干戈为玉帛，携手创建一番霸业。

这是历史上第一个解梦的实例，而且它是以预言的形式出现的。但是从后世的观点来看，吉尔加梅什的梦不过是他心理烦躁症的一种表现。对于这一点宁逊是再清楚不过了：吉尔加梅什的权力已经岌岌可危，因为他聚敛了太多的财富，强迫太多的人为自己建造厄鲁克高高的壁垒，并且抢夺王国中的每个处女。而在这个预言中出现的吉尔加梅什的新对手则担负着彻底改变吉尔加梅什的责任。他就是恩齐多，他是一位“野人”，出生于自然，在森林中的野兽群中长大。他认为自己就是动物中的一员。他是人类史前自我意识的化身，吉尔加梅什需要这样一个人把自己无限膨胀的欲望击落到地面。只有射猎采集时期人类原初的谦逊本性才能使这位帝王发热的头脑恢复到自然状态之中。只有这样做，他才会“改变了不可改变的方式，滥用、改变了惯例”。在吉尔加梅什的梦中，以及他后来与恩齐多的关系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我们脑中两种观念的冲突，这就是文明和“野蛮”意识的碰撞。荣格把这种原始意识称为在我们体内存在的“200万岁的人”。正如宁逊劝喻吉尔加梅什那样，荣格预言我们每个人必须与我们身体内这个强有力的人格做斗争，并且将化敌为友使其成为自己的同伴。荣格写道：“我与病人都在和自己体内的‘200万岁人’对话。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的困难大多来自于与自己的本能失去接触，这种本能从远古时代起就蕴藏在我们身体里，为我们提供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那么我们如何与自己身体里的老人进行联络呢？在我们的梦中！”（杰考比，1953）

根据人类学，任何社会都有关于做梦的理论和解释它们的技巧。我们不知道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做梦的概念，但是我们能肯定那是一个很古老的时期，比史前时期还要早。宁逊向吉尔加梅什说梦的故事在世界上许多文献中广为记载，这不仅说明了人类对于梦境的强烈痴迷，而且一

直以来特别注重于对梦的解释。

梦的理论

没有理论支持的事实是苍白的。

哈耶克爵士

广义来说,我们能够辨识出三种理论:

(1) 梦是由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例如上帝或魔鬼所引起的。它们可以被认为是传达某种信息。上帝引起的梦是“好”梦,可以指引我们上天堂;而魔鬼引起的梦则是“坏”梦,会引导我们下地狱。这样解梦的关键就是区分“好”梦和“坏”梦,“真”梦和“假”梦。有意思的是,梦来自于“外界”或来自于“上帝”的想法仍然被我们的小孩子所尊崇——直到他们被教导别去信它。

(2) 梦是自己在睡眠期间灵魂出窍漫游外部世界的真实体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种外部世界之旅具有潜在危险性,可能对做梦者的命运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一方面它们可以使梦寐者看到和从事超出他们能力之外的工作;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是危险的,因为如果一个人在梦境结束之前就被唤醒,那么他的灵魂就不能及时返回身体,结果这个人的心智就会不健全。根据这种理论,解梦的全部功能就是了解灵魂在梦中的经历,如果有必要,就要及时恢复由于惊醒而失去的那部分。尽管这样的解释在西方经常是牵强附会的,但那种我们在梦中灵魂脱离身体的感觉是真实的。许多现代做梦者都会报告自己“灵魂出窍”的经历:他们有时还遇到不能让灵魂“返回”身体的麻烦,或者自己的灵魂不愿意回去。

(3) 梦是自然现象,是睡眠中正常精神活动的结果。支持

这种理论的人都否认梦是有意义的，认为梦是不可以被解释的。

在这三种理论中，前两个很古老，并且具有神话色彩。只有两种文明在两段很短的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第三种理念。它们是：公元前3至1世纪的古希腊以及公元19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老百姓的梦中通常个人利益色彩很明显，并且常常与妖术联结在一起，而从罗马时代起的西方知识分子们则试图与常人的观点保持距离；当18和19世纪的学者郑重其事地研究“野人”时，往往会对梦境起因的说法不屑一顾，认为释梦都是骗人的把戏。尽管这种对做梦的蔑视由来已久，并一直持续到现在，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在美国，特别是在本世纪前叶仍然很盛行。这就导致了基于民族志学研究的原始解梦学的复活——尽管这些研究成果经过心理分析变得有些扭曲，并且深受当时世俗偏见的影响。到了50年代，对梦加以民族志学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成了一种“文化和个性化”产业。而弗洛伊德学说则一蹶不振，因为精神分析学派舍弃了跨文化的研究，把自己定位于近距离审视个体，认为个体是独特而分散的。结果，学术界越来越局限于基于民族文化学对梦作出解释。同时，由于环境决定论和空洞的行为主义盛行，使社会科学面临毁灭的境地。这是普遍现象，在整个20世纪很少能找到特例。

要想在一章中就把复杂的解梦学讲解清楚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必要从远古时期讲解到现代维也纳，而是选取历史上解梦学变革的几个关键时刻进行分析。这些例子将按照时间先后排列。

原始社会

人类头脑中的想法不论在何地总是趋于相似的。

林肯

尽管人类学家小心翼翼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反复强调文化间的差别，但是他们还是继承了解梦学中一个基本的概念，即“文化的普遍性”。即便是最彻底的文化相对主义者也不能否认在所有社会中都存在着一种关于梦的学问（解梦学），对于梦的一套假设（解梦），以及利用它们的实际方法（圆梦）。

对于普遍性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各种文化都认为梦是在夜间人的灵魂出窍到处游荡所引起的。所有未开化的民族都相信梦是“重要的”，对于那些经常做梦的人来说具有特殊的价值，因为他们可以从天赐的梦境中得到启迪。人类学家也毫无质疑地认为做梦可以保持文化的稳定性和帮助原始社会的人进行创新。J. S. 林肯于 1935 年出版了他的《原始社会之梦》一书，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书中他下结论说原始人与现代西方人在做梦方面遵循同样的规则。

根据来自人类学的数据，梦总的来说有 4 种类型：(1) 可以上升到文化层面的“大”梦；(2) 对于未来事件进行预告的“预言梦”；(3) 促进身体健康的“医疗梦”；(4) 纯粹是做梦者个人体验的“小梦”，等。

尽管原始人珍视所有的梦，但他们最珍视的还是“大”梦。这些强有力的梦，人类学家把它们叫做“文化模式梦”（林肯）或“正式的梦”（马林诺夫斯基）。荣格把它看做是典型的人

类集体潜意识的表现，而且，他还注意到，这些梦通常与一些占据压倒地位的主观感受相一致，比如恐惧、迷惑和神奇等。奥托把它们描述为超自然力——是真正的宗教体验的核心（1950）。这种超自然的梦之所以广泛地被人们所尊崇，不仅是因为它们具有震撼性的影响，而且因为这些梦体现了一种普世的信仰，即人类可以被赋予一种神奇的智慧来指导他们前进。出于这个原因，梦不可避免的被巫师和医生所利用，以此证明自己具有治愈疾病、预见未来和拯救灵魂的能力。神秘的梦也会被认为是适合担当某一职位或角色的表现，这往往是年轻人成为战士或巫医的开始，这种决定个人职业的“梦中启示”在北美的印第安部落之中非常流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现代研究人员和心理分析学者对梦的探索过于琐碎，与原始人相比，看起来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发现各种不同的文化中却有相同的典型“大”梦确实令我们震惊，因为这种情况现在在我们的社会中非常稀少而且常常被误解。看起来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经过游牧、农耕和早期城市等各种社会形态，最后才发展成为现代的复杂社会。在此期间，典型“大”梦的影响范围和力量都在不断下降，并逐渐被个人的“小”梦所取代。这一真相被荣格于1920年代中期所发现，当时他正在肯尼亚的埃尔戈尼人中间考察。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与一位埃尔戈尼药师的对话，后者告诉他说他的人总是对他们的“大”梦给予特别关注，因为这些梦可以指引他们对自己生命中的重大问题作出决定。但是现在，这位老人却悲伤地补充说，他的埃尔戈尼同胞不再需要他们的梦了，因为统治地球的白人知道一切“大”梦丧失了存在的价值。

为什么射猎采集社会的人会对典型梦境特别感兴趣？这是建立在他们与众神接近的基础上的。他们的一生都在专心致志地体验灵魂，而且在射猎采集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自然

现象帮助他们建立了万物有灵的信仰。我们共享着一个世界，即便在高度文明的社会中也是如此。当我们还是小孩子时，就富于想像力地把自己认为是鸟、兽、风、火、土和水的化身——浪漫诗人则把这些幻想带入成人世界，并且把它冠以“自然神秘主义”的头衔。然而，孩子们像史前人类一样，经常相信他们的梦是真实的体验，相信梦中事件实际上已经发生。这些童年时代的倾向和信仰无疑会遭到父母的反对，后者会告诉他们的孩子说这些睡眠中的冒险“不过是梦而已”。但是如果我们撕裂文明的伪装，就会看到原初的体验事实上仍然存在于每个人心中。

早期文明

女神伊师塔在梦中告诫每一个人
说：“我要带领我创造的阿休尔班尼鲍
国王出征。”

阿休尔班尼鲍的大军

在早期文明中原始梦学理论的主要发展和实践包括：(1) 把梦的解析作为宗教体系的一部分；(2) 认为做梦是构造神圣的活动，并把故意创造梦境（梦的孵化）作为康复治疗的一种手段加以利用；(3) 梦的描述和解释被铭刻在泥板和记录在草纸上；(4) 发展出一套规则来区别梦的“吉”“凶”，以及解释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于梦的最早记载来自于亚述和巴比伦的“梦书”。它们是在尼尼微的阿休尔班尼鲍国王的书房里被发现的，这位国王曾经在公元前 669 年至 626 年统治亚述。书中的许多内容都与梦里的危险人物有关，里面记载了许多梦中出现的魔鬼与死魂灵。为了防止这些恶魔到世间捣

乱,巴比伦人建造了供奉梦之女神的马努神庙,并以马努女神的名义祭祀鬼魂,保佑平安。当时梦的主要价值看起来就是向人们预告未来。许多解梦记录都使我们震惊,因为里面充斥了弗洛伊德所称的离奇怪异的“野性分析”成分。但是它们中的一部分仍然具有意义,如关于喝水的梦,意味着长寿,而喝酒则意味着短命——也许这是对于酒精危害健康的早期预警。梦到飞翔则是对迫在眉睫的灾难的警报——飞得越高摔得越狠,这正是伊卡洛斯给希腊人的教训。

至于埃及人,则像亚述人和巴比伦人一样,也认为做梦是一种警告,尽管他们相信这种预言直接来自于神而不是魔鬼。虽然诸神要求人们通过苦行和牺牲来避免灾难,但是他们也有责任借助梦境来回答做梦者提出的疑问。总之,从整体上讲,埃及人把梦看做是有益的东西,尽管它们也可能是含有恶意的。对于这批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人来说,梦是可以通过孕育形成的,于是故意做梦可以与某种需要联系在一起,比如让某人生病或是痊愈。埃及的梦之神是塞拉皮斯,他在整个埃及有数量众多的神庙,最著名的一座在孟菲斯,建造于公元前3000年前。对于埃及解梦的最古老记录保存于大英博物馆,被称为“切斯特·贝蒂纸草”。这份文献形成于公元前1350年,来自上埃及的底比斯,上面记载了大约200个梦,其中许多梦标注的日期更早。这里面用来解梦的模式引起了我们特别的兴趣,因为它运用了弗洛伊德的三个理论,即:找到视觉上或口头上的双关语,判明隐藏的联系,以及逆向思维的使用——一个梦往往会和它要表达的本意相反(例如,一个病人梦到死时,就意味着他将变好)。

来自埃及和其他远古文明的解梦者喜欢把梦描述成为双关语。尽管这些双关语的解释在当时会很有意义,但是后代却很少能够解读出它们。当然,一再重复的梦境元素会在后人编

的解梦字典中出现,从而为我们所用。例如在切斯特·贝蒂纸草上,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梦见暴露了藏在自己身后的人就意味着失去父母。这其实是很难理解的,除非有人知道在埃及词语中屁股与孤儿非常相似。许多看起来很随意并且显然是荒谬的解释都在梦书中列出。这其实起源于现在已经消亡了的古埃及文中生动的双关语。关于现在仍然起作用的双关语将在以后的章节中列出。

尽管在巴比伦、波斯、埃及、希腊等地有各自不同的解梦传统,但是由于近东和中东地区不断的迁移、征服和贸易,产生了许多通用的解梦方式。在埃及,梦的孵化实践在治疗之神因霍特普的名义下得到发展,后来又被希腊占领者所沿革,并在阿斯克雷皮奥斯的军中得到实行。但是,在所有的可能性中,埃及人自己所借鉴的成分更多,因为他们总是从别的不那么复杂的文明中吸收精华为自己所用。这一点对于古代中国人也适用,他们一样也发展出了一套翔实的解梦和育梦的传统。

当近东和中东的人把做梦归因于外部神、鬼等的推动作用时,东方人则坚持自己最初的信条,即做梦来自于自己本身——做梦者体内游动的灵魂。对于中国人来说,世上存在着两种灵魂:一种是物质灵魂,称为“魄”,另一种是精神灵魂,称为“魂”,后者可以在每天晚上睡觉时离开人体游荡,而两者在人死亡的那一刻与身体彻底分离。正如无数前人所告诫的那样,中国人相信唤醒一个熟睡的人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因为这样做会使人丢了魂,并使睡觉者被剥夺了思考的能力。这一古老的信仰在1960年代又被提了出来(现在多数人都不同意)。研究发现,当一个人在睡眠中发生快速眼球转动时,一旦被从梦中唤醒,人的主观意念就会产生幻觉,感到迷惑。

“魂”与身体的分离不仅发生在做梦和精神失常的情况

下,而且还会表现为幻觉、恍惚和痉挛。根据西伯利亚巫师的说法,魂一旦离开身体就可以与亡灵和神鬼进行交流。因此这种体验会得到很高的尊重。毫无疑问,这就是中国人与埃及和希腊人在梦的培育方法上保持一致的原因。

人类自我无处不在,它们在斗争中生存,并借助令人惊畏的梦的力量获得某种启迪。当人类自我面对复杂的现象时,通常会把各种情况分门别类,归纳到不同的组别里去。把现象进行分类的最基本方法之一就是把它们归入相反的类别: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区分好梦和坏梦,真梦和假梦,正梦和邪梦,大梦和小梦等。在印度,梦的分类可以从各种《吠陀经》中找到答案。这些神圣的书写于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1000年之间,里面把梦按照吉凶编排,论述的重点则放在各种梦的预兆性力量上。关于梦的最诡异的想法见于《阿萨瓦吠陀经》中,它通过举出一系列最新的梦例向做梦者介绍其中的伟大意义,并宣称,在深夜梦来得越晚越有可能成为现实。这部经书还把梦的内容与梦想家的气质联系到一起。通过我自己的临床观察,意志消沉的人通常会有消极的梦,而狂躁的人则会有狂躁的梦。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这与荣格“补偿理论”有很大不同(即梦会有意识地改变失衡状态,寻求心理平衡)。

《吠陀经》还揭示出一个想法,就是梦出自不同感觉层次之间的有限区域。《奥义书》中则声明天地万物都有两种形态:一种存在于目前的世界里,另一种存在于另一个世界。还有第三种形态,则是介于二者之间,是睡觉的状态。然后就可以推导出一个关键的论点:处于中介状态的人有能力同时察觉处于另外两种状态的事物,即“在目前世界里的一个和在另外世界里的一个”。这与荣格的理论如出一辙。后者认为梦是一种中介的产物,是做梦者在个人清醒世界(“这个世界”)和集体潜意识的原初世界(“另一个世界”)中穿梭所经历的事件

的见证。清醒状态被认为是比做梦状态更不“真实”，这是因为后者可以从两个领域全面地触摸知识和实践的真谛。而最高级的状态则是无梦的睡眠阶段。一个人一旦调整到这个状态，他就可以摆脱所有世俗偏见的困扰，把时间和空间合而为一。东方人就发明了各种催眠术（例如瑜伽功）来诱导人进入这种极乐状态。

《吠陀经》把人梦、梦境和梦想理解为一种介于有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中介状态，反映了古印度人高深的心理学思辨能力。这一点西方人在 20 世纪之前根本无法匹敌。直到后来荣格才发现活跃的想像力发生在梦醒期（即睡眠结束时进入的类似做梦的状态）——这种状况与服用了迷幻药非常相像——这时一个人既可以有意识地进行思考，又可以同时接触到通常状态下无法获得的各种潜意识的形象、幻想和情感。

古典解梦学

当不切实际的幻想来到我们身边时，通常会经过两道门，一道是牛角之门，另一道是象牙之门。从象牙门进来的梦想往往是欺骗我们的空头许诺，永远无法实现；而来自牛角门的梦想则告诉做梦者有什么事情确实要发生。

荷马《奥德赛》

正如他们在生活的其他领域所做的那样，希腊人对于梦有极为复杂的一套理论，尽管这些主张直到几个世纪后才显现出来。在荷马时代，希腊人确信神性起源于超自然的梦，而他们自己则并不怎么在意梦究竟是真是假的。

荷马自己对梦的真假的区分是基于一句希腊的双关语，即真梦来自“牛角之门”而假梦来自“象牙之门”。在当时人们

心中,这种区分实际表示生死。如果把假梦当做真梦去对待往往会导致不可抵御的灾难,例如薛西斯就由于得到错误的梦的启示,相信进攻希腊会取得胜利,从而把自己的军队引向毁灭。

有据可查的第一个能对梦进行理性解释的是赫拉克利特斯(公元前450—375年)。他观察到,当我们睡觉时,我们就会住进一个完全为自己定制的古怪的私人世界。为此,赫拉克利特斯解释说,这远远不是什么与神交流,而是一种与睡眠状态相伴的很普通的心态。根据他的观点,做梦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它只不过是分享清醒时与别人交流的感觉而已。赫拉克利特斯在基督诞生400年前所持的这种观点,被当今西方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所接受。

其他几个对现代梦学有深远影响的古希腊学者是伟大的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年—377年)、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322年)和柏拉图(426—348年)。希波克拉底与亚述人和埃及人一样,从小就对梦的预言感兴趣。他后来就把自己对梦的科学研究成果转化到诊断疾病上。预言之梦在医学上被称为“前驱性”现象(来自于希腊语“前面跑”一词)。梦中象征性的符号和图景可以表示病人患有精神或身体疾病,如果此时医生和病人还没有发现明显的症状,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下去以引起患者的注意。希波克拉底举例说,如果梦见泉水或河,那么发生泌尿生殖器官疾病的可能性就会大增,而洪水和水灾则是血量过多的符号,预示着需要为病人放血。

与古代中国人一样,希波克拉底也强调了占星术对于梦的内容的重要影响。那么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是如何把他的梦与天象联系在一起呢?为了理解这种神奇的内在联系,一个人必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在手表、指南针、便携式的六分仪、可

靠的地图以及天气预报的时代来临之前，就能够准确把握未来的状况。掌握这门技能的人通过观测天象，可以指导船舶航行，穿越草原和沙漠，通报时刻、判断一年的节气、最适合种庄稼和收获的时机等等。因此，我们有理由假设，梦中的天气变化不仅仅是一种表现，而且是可以把梦中之物变成现实的创造性力量。此外，在上帝被认为是万物主宰的年代里，由于他无所不能，这种力量也自然会渗透到梦中。因此，尽管希波克拉底坚持药物治疗，他也接受梦具有神奇的鼓舞力量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则否认占星术的神奇和梦是神的起源的说法。因为他观察动物，发现它们也做梦。这个观察结果非常关键，因为它使许多关于梦的理论成为胡说八道，其中包括弗洛伊德的关于梦来源于人的性欲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梦论》、《睡与醒》和《睡眠的预言》里阐述了自己的理论。这些观点比他之前的学者甚至他身后的多数学者更接近现时的看法。亚里士多德同意希波克拉底的观点，即梦反映了身体的变化。他认为人在睡眠时主观感受最为强烈，因为所有外界的刺激都减小或不存在了。但是，他也继续坚持梦中的景象对醒来后人的行为有一定影响，因为人醒来后，梦中思维状态还会继续保持一段时间，这可以作为有意识思考的起点。结果就是人们错误地相信梦具有预见性，而事实上这些预见不是上天带来的，而是他们自己带来的。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作品在西方文明史上具有最大的影响力，然而他关于梦的大部分看法在过去 2000 年中却得不到重视。他最非凡的预见之一就是荣格后来所发现的集体潜意识。因为像荣格一样，亚里士多德观察了普通人的精神幻觉世界，他们所幻想的内容，以及大量最常见的梦例，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人类的梦具有普遍的起源。

柏拉图的观点也是非常现代的,事实上,他在这方面的大多数论断都与后世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英雄所见略同。柏拉图阐述说,既然当我们睡着时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我们在梦中所做就会是我们在现实中耻于去做的:“善良的人会对他们在梦中成为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而感到满足。”(引自弗洛伊德,1900)欲望、愤怒、亵渎神灵,都能在我们睡觉时通过做梦得到完整表达,尽管它们在现实中被隐藏得很深。“在我们所有人中,”他写道,“甚至在好男人中,也有不法的野兽天性存在,它一等我们睡下就会向外窥视。”这是历史上第一段对心理恶魔的描述,弗洛伊德把它称为“本能冲动”,而荣格则称之为“影子”——这段论述还暗示存在一种心理动力机制,即弗洛伊德所称的“压抑”。

预言之梦

陪伴她。

威廉·莎士比亚《裘利斯·恺撒》

她晚上做梦看见了
我的塑像,像一个喷泉
有上百根喷管喷发,
喷出纯洁的鲜血;
许多健壮的罗马人走来
面带微笑,在里面洗手。
这是她得到的预兆和警告,
因为魔鬼就要来到;
她双膝跪倒,乞求我今天呆在家中

尽管受到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影响,人们仍然坚信梦里具有预知未来的力量。罗马人就特别着迷于这种现象,并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保留了许多典型的例子。尽管卡普尼娅的梦警告裘利斯·恺撒说他要被人

暗杀,但恺撒并没有引起注意,而他的继承人奥古斯都则接受了他一个朋友的噩梦的警告,从而保全了生命。结果,奥古斯

都把梦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他颁布法令说任何公民只要梦到有关共和国的任何事情都必须在市场上向他报告。他经常不问因由就依照自己的梦行事：苏托纽斯·特兰屈勒斯在他的《恺撒传》（公元2世纪）中记述道，奥古斯都总是冒很大的风险去做自欺欺人的事，例如他曾经绕着罗马城乞讨，因为在一个梦中要求他这样做。

在所有的预警的梦中，最普通的似乎是预知做梦者本人或他所知的某个人的死亡，并且类似这样的证明在现代也不断被重复。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在1701年，一位法国演员钱普麦塞尔之死。在他死亡的两天前，他的母亲和妻子（都去世了）就出现在梦中向他招手。在梦中确信自己生命即将结束，他就召集了自己所有的朋友，花钱雇了一个葬诗班，聆听他们的歌唱，然后他离开教堂，立刻就断了气。当然，钱普麦塞尔也很有可能是自己潜意识地得到患上绝症的信号，而不是得到梦的启示。

然而，没有比卡普尼娅梦见布鲁特斯暗杀他的主人或亚伯拉罕·林肯在被谋杀前几天告诉他的妻子的梦更贴切的例子了。在林肯的梦中，他看见在白宫前有一具由士兵看守的棺材，当他询问死者是谁时，被告知“是总统，被人暗杀了”。同样的，希波克拉底所说的“前驱性预言之梦”也非常适用于约瑟夫·拉尼主教的例子，他是弗朗兹·裴迪南的教师，他在1914年6月萨拉热窝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梦见大公被人刺杀。这位主教深受梦中情景所困，就把梦见的暗杀经过写下来，甚至还想及时警告大公予以防范。当得知消息没能传给大公时，拉尼只好为他做祷告。但随后他就听说这个梦灵验了。

这样的事例即便在当代人听来也是触目惊心，更不用说当年我们轻信的祖先了，所以他们对于各种推测不可避免地

产生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在《不速之客》一书中，亨利·德·马特林克揭示说，任何事件，不论发生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不论发生在空间的任何点上，都能在现在某地找到它的踪迹，因为它们是永恒的。对于这种存在，我们可以在某种状态下感知出来，这样只要我们抓住未发生事件在时空之旅中的轨迹，就有可能预知未来。他由此得出结论说：“根据这个理论，每个梦可以部分地感受到事物永恒的状态，梦中景物既有过去又有现在，还会有将来。”J. W. 邓恩在他的《时间的试验》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这本书于1927年出版，当时荣格也提出了他的“同步性”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

亚里士多德的解释则更为脚踏实地：他不仅反对梦可以使人预感未来，认为这种预言根本不可能在人醒来之后继续起支配作用，而且他还进一步质疑说，既然人做了这么多梦，为什么绝大多数梦都不灵验？为此，亚氏认为梦的预言不过是一种信仰疗法而已：就是让人们相信一千个人中只有一个成功者，而其他人注定要失败。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得到西塞罗的赞同，他说：“什么人才会得到灵验的梦？难道是那些整天做白日梦的人吗？我们每天晚上都睡觉，每次都做了好多梦，那么我们如何能够记住哪些梦自己做过哪没做？”（《论占卜》）

宗教之梦

我要说，我的床铺躺上去非常舒服，我的睡椅使我安心；然而你就用梦来吓唬我，在梦境中使我感到恐怖；这样一来我的灵魂遭到扼杀，生不如死。

《约伯书》第七章

对于理性主义者来说，预言性的梦不可避免地使做梦者的准确性受到质疑，而且对于不相信这些说法的人也没有大量“很好的例子”来证明他们遭到报应。然而，这种怀疑论使传统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陷入难堪境地。因为这些世界范围的宗教，再加上佛教和印度教，在他们的神圣经文中都充斥着梦和幻境，而且人们广泛接受的经验是，

神灵会借助梦境自己显现出来。在《圣经》中，就有超过 70 个这样的例子；在写于公元前 600 至 200 年期间的《巴比伦法典》中，第四章就专门讨论了梦；而《可兰经》的大部分内容涉及了穆罕默德在梦中的神谕。充斥了预言的梦在《旧约》和《新约》中随处可见。例如，进埃及的决定就是借助三个梦做出的：第一个梦中，智者被警告说不要回到希律王那里去；在第二个梦中，一个天使警告圣家族必须逃到埃及才能躲过“对无辜人的大屠杀”；而在第三个梦中，约瑟夫梦见希律王的死亡，并得到启示说如果他返回以色列那么大家都会过得很好。

犹太学者在梦的翻译方面享有很高的声誉，当埃及法老有什么重要的梦时就把梦的内容告诉他们，让他们解释梦的含义。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法老梦见七头肥牛和七头瘦牛，约瑟夫把它解释成为七年丰收和七年饥荒。犹太人在解梦术中的造诣还表现在丹尼尔判断尼布甲尼撒二世的梦为即将精

神崩溃的征兆。《塔木德经》中记载的最著名的解梦者是拉比·希斯达，他声称“一场没有解释的梦就是一封没有阅读的信”。他还注意到了梦的警告和变革功能，相信混乱不堪的梦比平和的梦更有意义，因为乱梦可以使我们警醒，激励我们做一些事情使自己功德圆满和防微杜渐。另一个重要人物拉比·比兹那则认识到在一个梦或梦里影像中都可以蕴藏不同层次的丰富内容。有一次他把自己的一个梦告诉了耶路撒冷20多位解梦家：每个人都给了他不同的答案，最后他不无挖苦地说，他们都是对的！这可以被认为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浓缩”现象的早期研究，即梦中景象可以有多重含义。

伊斯兰的解梦者更是人数众多，并且他们的分析方法比犹太人系统得多，这大概是因为穆罕默德本人就对梦高度重视吧。他经常要求自己的门徒重述他们的梦，并解释那些“他认为是重要的”部分。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真实地重述梦中见闻，因此最关键的规则就是梦者刚一醒来就要回顾自己的梦，而分析家则会很快把自己的建议告诉询问者。此外，梦者的个人性格也被小心地记录下来加以考虑。

梦的孵化和治疗

（伽林）两次在睡眠中得到警告，要他把自己的拇指和食指之间的动脉切断，他照此做了后，每日不断折磨他的疼痛减轻了，肝似乎也回到原来隔膜内侧的位置。

克劳迪阿斯·伽林

在古希腊时代，人们对梦治愈疾病的力量崇拜达到了顶峰，当时供奉阿斯克来比斯（健康之神）的神庙数目超过了300个。这些圣殿外表富丽堂皇，通常建筑在海边的山丘上，周围由森林和“神溪”所环抱。

疾病的治疗仪式和梦的孵化仪式都在这里举行。病人坐船和驴子远道而来,在完成了一次长途而且危险的旅行后,他们又要经历一次净化仪式:除去身上的衣服,喝圣水并在里面洗澡,然后换上干净的长袍。之后,他要到祭坛进行祭祀,向阿斯克来比斯表达崇拜之情,这样才被允许进入养着许多条蛇的神的住所。在那里,有一个专门睡觉的地方,最初病人只能躺在地上(孵化的意思就是“躺在地上”),后来又改在躺椅上——这是诊疗椅的先驱,用于进行医疗检查。阿斯克来比斯通常会到病人的梦中去看他,向病人传达治病的信息。不必解释,事实上做梦本身也是治疗手段。

很少有人怀疑这些做法会取得神奇的疗效。在供奉因霍特普和阿斯克来比斯的神庙里,仪式、建筑、声音、信号和神圣的气氛无疑会使病人在梦中受到深刻的影响。而现代梦研究人员由于在实验室工作,感受不到这种气氛,因此对这种行为缺乏了解。

尽管超自然的梦都是一样的,但是由于梦者的信仰和文化背景各异,他们在梦中所见到的神的形象也有所不同。例如,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不大可能梦见七日服丧期的跳舞,一个哈西德派的犹太人也不会面对处女玛利亚的访问。这个规律总是灵验的。因此,埃及人梦到因霍特普,希腊人梦到阿斯克来比斯,而基督徒则梦到天使;同样,弗洛伊德的病人会做“弗洛伊德式”的梦,而荣格的病人则会做“荣格式”的梦,等等。所有的梦都受到暗示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不仅在“孵化的梦”中是这样,而且在人类的整个历史阶段,各类人群都可以感受到这种具有延续性的神奇力量,这种影响不论发生在何处,都具有同样的功效。然而在罗马时代之前,没有人全身心地投入到有系统的梦的研究之中。

早期梦研究

一个人梦见自己像蛇蜕皮一样从肉体里滑出。他第二天就死了。因为他的灵魂即将脱离他的身体，所以才给他提供了这些印象。

阿特米多罗斯

最早做这件事的是阿特米多罗斯，他历经多年辛勤工作，足迹遍及整个意大利、希腊和近东，查阅了各大图书馆和治疗中心的资料，访问了许多解梦人，收集了大量旧手稿和纸草，才完成了自己的巨著《梦的解析》，而此时他已对解梦学非常熟悉，知道当时所有梦学的发展状况。

对于他对单个梦的解释方法是非常医学性的，或者可以说是“科学”的。首先，他要求把梦的详细情况写出来。然后，需要找到六条关键信息，他称之为自然、法律、习惯、时段、职业和名字（即梦中的事件是否自然，合法，并且符合习惯，梦在什么时间发生，梦者的职业和姓名）。根据建立的这些事实，阿特米多罗斯继续像后来的弗洛伊德那样进行分析，考虑梦的每一个细节，对它们进行想像和联系，之后再把这些部件构筑成一个解释梦的整体。

尽管他的许多解释看起来都很离奇，深受当时人们迷信的影响（比如梦见蛇，就意味着长期生病；梦见大茶壶意味着做梦者可以长寿；如果一个水手梦见自己的头发被剃光，则是警告他的船要遇到海难，等等），但是他也一直强调不要光从梦书上寻找答案，因为某个符号的意思可能随着时间而改变，而且文化不同做梦者的真实想法也不同。做梦者的个人情况也是很重要的，此外，一个人也总是试图通过双关语来表达自

己的意图。阿特米多罗斯是第一位通过实验研究梦的学者，他按照自己的理解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并且跟踪调查了至少3000个梦，以确定自己分析的准确性。

因此，在阿特米多罗斯身上，我们发现了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先驱。不仅仅是因为他倡导以严肃和周密的态度去分析每一个梦，而且是因为他强调需要把梦中形象所代表的特别意义结合起来分析。弗洛伊德相信关联性是打开梦的解析之门的钥匙。但是弗洛伊德与阿特米多罗斯也有所不同，前者注重使做梦者自己把各种零散的梦中图象拼成完整的故事，而后者则主要依赖解梦者把获得的梦的信息拼接起来。至于荣格则是二者的综合，他主张把做梦者和解梦者头脑中对梦的想像结合起来分析，并把这一方法实际应用于“梦的扩展”中。此外，阿特米多罗斯把梦分为两类：(1)失眠型梦，即梦来源于目前的思想和身体状态，并与日常生活经历有关；(2)催眠型梦，它总是带有虚构的和更深入的讽喻成分，能够预知未来的重大事件。这显然与史前社会把梦分为“小梦”与“大梦”和荣格把梦区分为私人梦和集体梦很相似，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阿特米多罗斯是把梦的解析从传统探索引入现代研究的一个突出人物。尽管他的理论还很幼稚，但是他最早提出了解梦学应该通过实验的方法来检验。此外他还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一方面对每个梦都具体分析，找出其特质，另一方面则归纳出梦的基本类型和梦中的典型标志。弗洛伊德宣称自己的研究借鉴了阿特米多罗斯的成果，因此他给自己的大作取了和阿特米多罗斯作品一样的名字——《梦的解析》。

解梦先驱

在梦中，干渴的人似乎总是在泉边，需要食物的人总是在宴席旁，而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则总是被情欲所困扰。

尼撒的格雷戈里

早期解梦的作品并不值得我们去期待，他们在古典哲学家和医学家的基础上很少加上自己的东西，但是还是有四个人例外。即特图连、圣奥古斯丁、尼撒的格雷戈里和赛伦的希尼希斯。

特图连于公元 203 年左右出版了他的《灵魂论》一书，书中把睡觉等同于在灵魂深处一种自我限制的死亡体验，一旦人的生命结束，灵魂

就会离开身体。正如他所描述的那样，“灵魂总是不满意非自然的归宿，因此永不会停歇。”特图连关于灵魂永不停歇的想法与现代解梦学不谋而合。在荣格的理论体系中，我们一生中醒着的时候都“通过意识的漏洞继续做梦”(CW16)。然而，特图连的观点并不是说做梦是由于人的灵魂导致的：不论是上帝、魔鬼还是人性本身都有责任。灵魂就像是在马戏场或罗马圆形剧场的一名观众，一旦梦开始，他们就无法进行干预。这种看法在现代也不乏支持者，他们把梦看做是一种自发创建的行为，可以独立于做梦者的意愿之外而发展变化。正如荣格所说的那样，“我不做梦；我被梦见。”

还有一位认为在人的心灵深处肯定有一部分“潜意识”空间的是圣奥古斯丁(公元 354—430 年)。“我无法完全控制我自己”，他坦白说。这使他非常担心，因为上帝可能拥有了他的一部分梦，并且他知道自己无力控制它。

最具有古典作家和现代精神分析家双重气质的人是尼撒的格雷戈里。他认为梦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它很容易受到纯粹心理作用的影响。作为一名基督徒,他接受了上帝挑选一些特别有价值的人,然后利用自己的力量进入他们的梦中,赋予他们智慧和预言的说法,但是他认为这些梦无法用平常的言语表达,因为这是梦的奇迹。在他的论文《关于造人》(公元380年)中,格雷戈里认为做梦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睡觉时感觉和智力器官都在休息,这样就会导致许多可笑的梦发生。梦的实际内容由某人的日常活动和做梦时的生理状况决定。在这一点上他与弗洛伊德的关于做梦是愿望的达成的观点非常接近:因为以格雷戈里的观点来看,梦最常见的动机是欲望;而在欲望中最强有力的是性。激情是人的“野兽天性”的表现,因此它时刻处于理智的检验当中,如果他不愿意掉进邪恶的话。在睡眠中,才智会停止警觉,这样我们的情欲可以在梦中得到完整表示。这种精神分析学的理论非常令人震惊。

大约在尼撒的格雷戈里著书立说的同时,赛伦的希尼希斯也描述了一种有趣的心灵类型,即幻想(Fantasy),它与头脑(Mind)和灵魂(Soul)都有所不同,但是具有沟通二者的作用。头脑有意识地思考现实世界的东西,关注事物的本来面目,而灵魂则关联到即将发生的事物,幻想则提供了一种手段,使灵魂可以有意识的把不可感知的未来变成人的真实感觉。这与荣格的观点很接近,即做梦和幻想揭示了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的一些新特性,越是性格成熟的个体,越能够把它们变成真正的知觉。

这样,尼撒的格雷戈里就阐述了一种有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味道的理论,它强调人的基本动机,特别是性动机,试图在梦中得到满足;而赛伦的希尼希斯则与荣格更加接近,强调心灵具有创造性,具有目的倾向。

潜意识

要想揭示心灵与意识的本来面目，关键是要摸清「潜意识」这个领域。因此心灵科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探索出人的精神世界究竟有多深。

卡尔·格斯塔夫·坎姆斯

潜意识并不是流行说法中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发现的新东西，而是在17至19世纪出现的一个古怪的假设。早在很古老的时期，埃及人和印度人就认为他们能够感知精神世界的不同的维度（“今生”和“来世”），而圣奥古斯丁也担心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梦。第一个明确定义出我们心灵中无法被认知部分的学者是高特弗雷德·扬·雷布尼茨

茨（1646—1716）。雷布尼茨把这种潜意识比做我们体内的血液循环，虽然这种循环一直在进行但我们却一无所知。这就像是常年生活在水磨坊边而感知不到它的噪音一样。（《人类理解新论》）还有一个人甚至比雷布尼茨更早就提出了这个观点，他是一个英国柏拉图主义者，名叫约翰·纳里斯（1632—1704），他认为“我们脑中有无穷多个想法是我们无法觉察到的”。

从那时起，持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多，后来随着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深入开展和谢林（1775—1854）自然哲学的流行而为公众所知晓。这段理论发展沿革的历史已经由L. L. 怀特编写进《弗洛伊德前的潜意识》一书中（1979），在亨利·艾伦伯格令人称奇的论文《潜意识的发现》中（1970）也有论述。正如这些无价的研究成果所揭示的那样，第一个把潜意识行为与做梦联系起来的是一位物理学家，名叫G. C. 利希滕伯格

(1742—1799),他很关注自己的梦,因为他发现通过做梦能够体会到自己灵魂里还有如此多新奇有趣的想法。当18世纪快结束时,一个现代流行的想法出现了,这就是潜意识是人性的表现方式,它是人类所有想像力和创造力的神秘源泉。像弗雷德里希·希勒一样的诗人(1759—1805)不仅提出“诗来自潜意识”的观点,而且真正开始鼓吹文学应该从种种限制下解放出来,使用更为自由的方式来表达作者的意图;同时约翰·沃尔夫冈·冯·高斯(1749—1832)也把想像看做是“纯天性”的东西,宣称他写的书“实际出自于潜意识”。在那时,浪漫主义运动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了。谢林的自然哲学是浪漫主义的一个分支,它坚持本性和灵魂合二为一:本性是可见的灵魂,意识和物质都是由一个本原演变而来的——即“世界灵魂”。人与自然从根本上讲是通过潜意识沟通的,通过潜意识这个桥梁,我们对自然的关注转变为“通用感受”——这本身就是艺术和诗所要追求的东西,这种感觉具有神奇的魅力,充满了狂躁和迷幻,并且时常在梦中出现。谢林的主张后来被荣格所沿用,创建了“集体潜意识”的学说;而另一个浪漫哲学的概念“原初现象”也来源于此。从某些角度来看,自然哲学的教父高斯也相信,存在着一种原初植物,所有现代植物都是这个母体的变种。人们还可以从荣格的原初理论和拉波特·谢德拉克的“变异中介”理论后面找到这种想法的影子。在原初现象中,阴阳人也是一个例子,这种带有浪漫色彩的双性人被认为是具备了人类原始本性的范例,早在19世纪末,威廉·弗莱斯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就提出了这个想法,并且在20世纪初,被卡尔·格斯塔夫·荣格在他原初主义著作的《灵魂和意图》中得到阐述。

更具体地说,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梦学理论被高逖夫·海因里希·冯·舒伯特(1780—1860)所预见。他在《梦的符号》

一书中把梦中的图形语言与人们醒来时的口头语言进行对比,认为梦的语言是一种“象形文字”,试图把许多意思包括在一个图象里(这一现象在弗洛伊德看来是“梦工作”的主要功能,他把它叫做“浓缩”),舒伯特宣称梦使用一种通用的符号语言来说话,整个世界的所有民族都通用,这是人类天赐的礼物。这里我们已经对荣格的原初符号来源于集体潜意识的观点有了清楚的认识。舒伯特相信在夜间人的头脑有时可能借助于梦察觉到一些事件的来临,但是梦更多的具有超道德的邪恶的特征,因为人性中被忽视和压抑的那部分在睡眠中会跑到前台。在这里,就像以前介绍柏拉图和尼撒的格雷戈里等人学说那样,我们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对梦的解释又预先介绍了一遍。

19世纪的作家中,受荣格影响最大的也许就是卡尔·格斯塔夫·坎姆斯(1789—1869)了。在他的书《灵魂》里,他把心理学定义为研究灵魂从潜意识到有意识的发展状况;他还把潜意识描述为不知疲倦的(因此它不需要像意识那样要求有休息的时期),本质是健康的(它充满了“自然”愈合的力量),并且拥有它自己天生的智慧。坎姆斯认为通过潜意识我们才能与另外的世界进行沟通。他还认为潜意识具有弥补意识的特性——即荣格在他的梦理论中所发展出来的“原初”概念。

弗洛伊德和荣格学说的另一个理论来源是弗雷德里希·尼采的哲学(1844—1900);而另一位起先在学界领先,后来又落后于弗洛伊德的阿尔弗雷德·阿德勒(1870—1937)也是如此。尼采除了确立了情欲和本能的地位外,还认为潜意识可以协调社会单个成员之间个性的发展。尼采认为梦在个人进化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梦是在个人和集体层面对人生的设定。尼采相信人的基本动机就是获得权力,这一点被阿德勒利用并在自己的心理学理论中进一步发展, he 把自己的理

论称为“个体心理学”，用以区分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阿德勒在权力的原初补偿问题上坚持尼采主义的观点，这就导致了他与弗洛伊德的决裂。

尼采的理论也导致弗洛伊德和荣格从不同角度提出“大脑动态能量”理论——这个想法指的是人的大脑中存在着能量元素，它既可以被压制和禁止使用，也可以通过某种渠道转变成另一种形式，如从本能形式转变为精神状态而显露出来。尼采把这种“本能能源”叫做“*als Es*”，弗洛伊德则听取了他的异国朋友乔治·格罗德克的建议，在英语本中把这个词汇翻译为“本能冲动”（《完全沸腾的大锅》，弗洛伊德，1933）。

“心灵能量”这个心理学概念，大部分来自于尼采，但它最初则来源于维也纳医生夫兰兹·安东·梅斯默（1734—1815）。梅斯默成功地通过“催眠术”治愈过各种神经疾病，这为他迎来了极大的声誉，但是梅斯默却把这种疗法定义为“动物磁力”。梅斯默宣称自己的理论基础是牛顿物理学（但是他完全误解了它），他宣称“动物磁力”实际上是一种“物质流”，弥漫于整个宇宙。健康和疾病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患者体内和外部世界“磁力”分配的平衡与不均。梅斯默相信他和他的助手有能力提取人身上的“微妙的液体”，并把它储存下来，然后通过某种方法把它灌注到病人体内，以维护他的“磁性”平衡。从许多角度来看，梅斯默的“磁性流”想法类似于波利尼西亚的“超自然力”的概念，后者存在于人、物体和所有能够存储、检测和发挥它魔力的地方。

在19世纪的催眠大师的代表人物中，最著名的要数让-马丁·查库克（1825—1893）和他的学生皮埃尔·詹埃特（1859—1947）了，他们的工作对20世纪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或缺贡献。弗洛伊德曾于1885年从师查库克，而荣格则在1902—1903年冬季学期当上詹埃特的学生。这些法国的

神经学家找到了有力的实验证据证明潜意识的想法是存在的。被催眠的患者的情绪变化对于他的行为有深远的影响。在巴黎某医院的公开演示中,他们把有歇斯底里症状的患者(比如麻痹、盲目、耳聋等等)施行催眠术,然后再让他们醒来。查库克和詹埃特对于多重人格的现象特别感兴趣,即在同一个人身体里两个或三个明显不同的人格同时存在。通过实验,他们相信这种情况的存在,随着患者进入潜意识状态,其身体里全部的个性碎片都分离出来,并且在临床催眠状态下自发的被揭示。

弗洛伊德加入查库克的研究,满心希望能成为一名临床神经学家,但是在法国人的影响下,他成了一个动态心理学家;1886年他回到维也纳,开始与约瑟夫·布留埃尔(1842—1925)共同展开临床实践,后者由于发明了一种自称为“创造”的技术来治愈病人而名声远播。在催眠状态下面,布留埃尔鼓励他的病人重新体验那段使他们遭受精神创伤的经历,直到他们的神经变得坚强,可以把那段记忆中的感情色彩抹去或者忘记(即去掉“潜意识的联系”)。布留埃尔所取得的成果给弗洛伊德以极大的震撼,而他创立精神分析学的最初想法则起源于布留埃尔给一位他们称为安妮·O的病人的病例。当布留埃尔精心布置周围环境,唤醒了她深藏已久的特别记忆时,“这个人身体里所有的歇斯底里症状都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在这个病例里,布留埃尔使病人记起自己吞咽食物困难的原因就是一条狗曾经舔了她的水杯从而使她总是觉得恶心,这样,病人压抑的感觉终于得到宣泄。

因此,当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实习时,在潜意识状态下心理动力的重要性就已经深深刻在他的脑海里了。但是弗洛伊德对于上一代理论家把潜意识仅仅作为知觉的一个对应物的说法表示怀疑,他开始认识到潜意识才是构成灵魂的基础。所有

的心理现象,从说话时舌尖的运动到最精妙的精神病症状,都是由知觉后面的某个东西控制的,而再没有比梦境更能够说明这个现象的了,因为人能够自由创造梦的内容!这样,当他把注意力转移到梦的研究中时(他在 1890 年代把全部身心都投入了进去),他把这种研究看做是“通往人类潜意识天国的黄金大道”。(弗洛伊德,1890)

3 弗洛伊德、荣格和以后

理论是魔鬼。

C. G. 荣格

1895年7月24日凌晨，弗洛伊德做了一个历史上著名的梦，梦见“艾玛的注射”。当他那天晚些时候回忆起那个梦时，一个念头突然浮现在脑海里，就是这个梦暴露了他要实现某个隐蔽愿望的企图。灵光一闪使他确信已经找到通向潜意识之门的钥匙。“这样的洞察力，”他后来声称，“可能在一生中只有一次。”近千年来，许多梦学家都在探寻梦的奥秘，可是这一次，却在很短一段时间被揭穿了。他的发现无疑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他完全可以设想将来在他度假的贝尔维尤别墅门前会挂上一块大理石牌子，上面镌刻着这样的文字：1895年7月4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医生在此揭示了梦的秘密——一个梦想终于成为现实。

在这个绝对信仰的支持下，他于1899年完成了自己的划时代的作品《梦的解析》。这本非凡的书，一直统治了整个20世纪的梦学界，在书的开篇，就吹响了新思维的号角：“在本书随后的内容中，”弗洛伊德声明说，“我将向读者证明在梦的分析中存在一种技术使梦成为可以解释的东西，而且如果这个方法得到应用，那么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自己做梦时的心理

结构,还可以解释清醒时我们的各种脑力活动。”那么这个引起奇迹的技术到底是什么呢?弗洛伊德把它称为“自由联系”——这个方法实际来源于约瑟夫·布留埃尔,他已经成功地在临床上应用,而弗洛伊德则保持了下来。布留埃尔的一个病例是对安妮·O的治疗。通过给患者自由思考的空间,安妮塔可以放开记忆力的缰绳自由驰骋,唤起自己每一个恐惧的记忆,这样布留埃尔不仅可以认识到她症状的来源,而且可以把症状消灭。我们现在知道这样的做法并不很实际,而且取得的结果也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但是这并没有使弗洛伊德放弃采用布留埃尔的技术,而这最终为梦的解释学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

自由联系

梦中事物意味着大脑的回忆。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一旦获得诀窍,自由联系其实很容易。那就是摒弃他们惯用的思维方式,允许他们游离思路,任意联想,并且不论患者的想法多么怪诞、荒唐,或者多么淫秽、离题,也不要去打搅他。为了能够获得足够的数据来解释一个梦,就要把每个梦中形象联系起来,把相关的想法组成一个网络,这样从某人目前梦中的环境出发,来重新建构过去的记忆。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把搜集到的所有信息分类整理,就能分析出梦的意思。

我们梦醒来时的最初反应通常是困惑(“多么神奇的梦呀!我梦见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因为此时我们并不能马上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不明白究竟是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

周。因此为了要弄明白一个梦的意思,我们必须设法加强醒来和睡觉之间的联系。弗洛伊德发现他的自由联系恰恰可以使这个成为可能,能够把已经过去的梦再一次重现。弗洛伊德评价说我们在破解梦的密码时,惟一需要的字典不在我们的书架上,而在我们的头脑里。自由联系把以前巫师和占卜者的解梦巫术真正变成了一门科学。我们将看看弗洛伊德怎样使用这门技术来分析梦见“艾玛的注射”的。

在弗洛伊德时代,其他的科学家对待梦的看法与弗洛伊德完全不同,他们认为梦是精神病人的欺骗和幻觉——根本就是毫无意义的赝品。弗洛伊德和荣格都花了毕生时间来扭转这种武断的看法。

梦的本性和用途

请求。

每个梦的意思都是对实现愿望的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尽管他把自己的书称为《梦的解析》,但弗洛伊德真正涉及到解梦的空间却很少,他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对梦的检验(描述)以及为什么它们采取这种形式(解释)。他在巴黎与查克特合作,在维也纳则与布留埃尔一起工作,这些经历使他确信精神病症状是病人由于无法忍受自己的情感而作出的一种心理防卫。弗洛伊德的直觉还告诉他做梦也一定以同样的方式产生。患者总是把自认为是具有潜在威胁

的感情和被埋葬的经历排除在知觉之外,以此来进行自我保护。病人的这种自我防卫是在潜意识状态下发生的,这常常会使他们感到压抑。弗洛伊德把这种压制感情的人格称为“检察

官”，后来又叫它“超我”。然而，这种被压制的感情并不会就此消失或离开：它们会在潜意识中爆发潜能，绕开“检察官”显示自己的存在——这种情况，弗洛伊德现在认识到了，就发生在梦中。弗洛伊德通过分析“艾玛的注射”的梦例，再加上他与布留埃尔一起工作时的经历，终于得出结论，梦在实质上是被压制的欲望的虚幻的满足。因为欲望被“检察官”认为是不能接受的或是危险的，所以在梦中它们也被改头换面或表现为象征符号。这就像是一位战士，他在进入战场之前很恐惧，但是他又不能表现得像个懦夫，因此他就可能潜意识在梦中把这种痛苦的感情发展成为腿部歇斯底里的麻痹，这样他就可以在战斗开始前就把自己归入伤亡之列；同样，一个办公室经理如果希望与自己已婚的女秘书性交，那么他就可能会梦见不断的推进和拉开她的办公桌抽屉，而这样他就不会受到传统道德的谴责了。

在睡觉期间“检察官”有足够的警觉可以把潜意识地暴露出来的罪恶欲望拒绝掉，但是如果这种潜意识的欲望加上了伪装，那么“检察官”就侦察不出来了。这种造梦的机能（弗洛伊德把它称为梦工作）就是编造足够的伪装来欺骗“检查官”的审查。由于有了这种伪装，被禁止的欲望会以某种象征符号的形式在梦中出现。换句话说，梦的符号被加了密码，这样可以有足够的灵活性绕过审查。另一方面，梦的解释的功能是译解代码，而这就需要通过自由联系来完成。

为什么这种颠来倒去的繁琐过程是梦者所必需的呢？弗洛伊德的答案非常简单，这个过程是必需的，因为这样可以使做梦者继续睡下去。“所有的梦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有用的，”他写道，“他们的目的就是延长睡眠时间以避免过早醒来，梦是睡眠的保护者而不是破坏者。”（弗洛伊德，1976）被禁止欲望形成了梦的潜在内容：梦工作可以把被禁止的念头偷偷地塞

进梦中而不会扰乱做梦者的自我意识或把他弄醒。

梦工作

一个梦如果没有被浓缩、歪曲、改编，以至最重要的——实现欲望，那么肯定就不值得叫这个名字了。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为了能够伪装隐藏的内容，梦工作使用大量的技巧，弗洛伊德把它们描述为“置换”（这种方式可以“把一个想法转换成有关联但又被打乱的图象”）、浓缩（把许多单个想法变成一个图象）、象征（由一个中性的图象来代表一个能引起潜在不安的想法，通常是性）和表现（把梦中的想法转化为可视的形象），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使一个很明白的梦变得光怪离奇。弗洛伊德

甚至更进一步推断说梦的古怪特性本身就是“检察官”的功能存在的证据，因为“检察官”也在伪装梦的真实意思。然而，很明显的是，如果这些隐蔽的想法在梦中被别的东西所代表，那么它们必须要变成某种图象，或是变成“一个能够被代表的东西”。这种转换，弗洛伊德接着说，与在梦中找到代表物“同样困难”，这就像漫画家要把报纸头条的政治文章转变成漫画一样。然而这并非仅仅是代表、浓缩和审查（这就像在非民主政体下那样）这么简单。

弗洛伊德给这种代表举了许多例子。其中之一就是他后来在书中经常引用并加了图解的一位法国保姆的梦（尽管她的梦似乎更像是忽略外界的扰乱和刺激而不是伪装自己的欲望）。

“第一张图片（图1）描绘了应该引起睡眠者醒来的刺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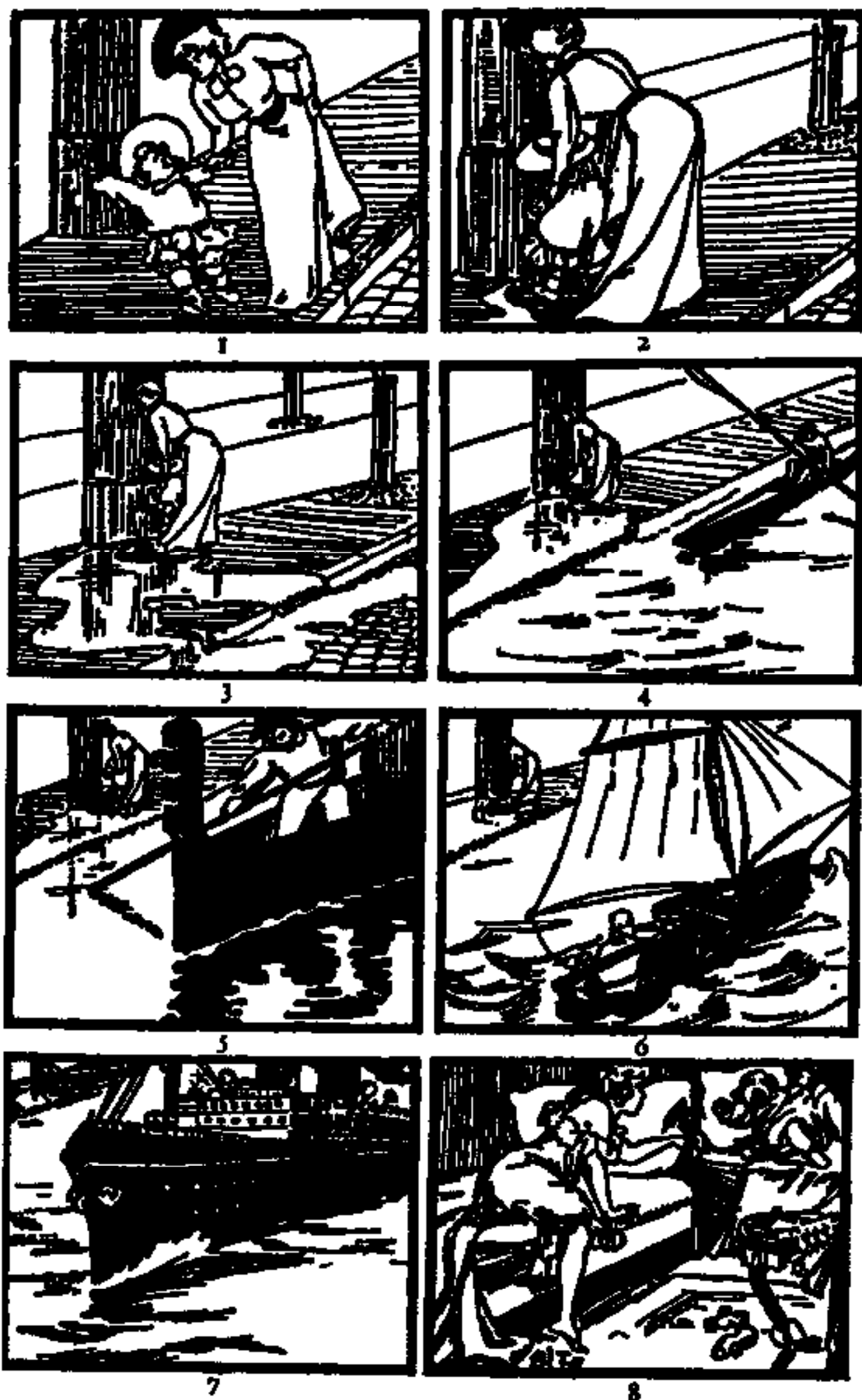


图 1:一个法国保姆的梦

小男孩有某种需要,要求别人来帮助处理。但是在做梦者的梦中,这件事没有发生在卧房,而替代的场所是她正和孩子散步。在第二张图片里,她把孩子带到街上一个可以小便的地方——这样她就能继续睡觉。但是这种刺激继续被唤起,而且事实上越来越强大了。在现实里这个没有被照顾到的小男孩,发出越来越大的哭叫。但是他越想要她的保姆醒来,在梦中的保姆越认为自己做得正确,不需要醒来去改变什么。在同一时间,梦把这种不断增加的刺激翻译成一种标志性事物尺寸的增加。男孩的尿汇成溪流,并越聚越多。在第四幅图片中,小便已经变成洪水,先是足够漂泊起一只独木舟,后来又变成平底快船,接着是帆船,最后变成巨大的班轮。这位艺术家通过这种方式很巧妙地把保姆的思想斗争展示出来,一方面做梦者极力想保持睡眠的状态,但另一方面,无穷无尽的刺激又使她一步一步醒来。”

弗洛伊德还在以后编辑的书中引用了赫伯特·希尔伯尔(1909)的实验,这个实验测试了把想法转变为图象的过程,从而揭示出在梦工作中的这种转变因人而异。

“如果,当他处于疲劳或瞌睡的状况时,他就会给自己一些动脑筋的任务,他发现经常发生的情况就是思维从他身上逃离,然后在原来的位置出现一幅图画,这样就使他能够把这幅图景作为思维的替代物。”例如,在某些场合,希尔伯尔必须集中意念来修改一篇蹩脚的短文,然而疲劳的他看到的是自己正在刨一根木头。弗洛伊德对梦中出现格言或警句极感兴趣,例如亚历山大大帝梦见萨梯(satyr)。当时亚历山大包围了苔尔(Tyre)城(在希腊语中称为 Tyros),但是他对于久围不下耿耿于怀。然后他就梦见萨梯(希腊语为 satyros)在盾牌上跳舞。他的顾问阿利斯坦德把萨梯(satyr)这个词拆成 Sa 和 Tyros,这样就是鼓励国王继续加强对城市的包围,他会成为它

的主人的,因为 Sa Tyros 意味着“苔尔(Tyre)是你的东西”。弗洛伊德赞同弗伦兹的观点,即每个人的嘴里都有自己的“梦语言”,而且并不总是能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因此,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许多梦字典的解释是模糊含混的。

这样的梦的一个有趣的实例是我在 1985 年在莫斯科所遇到的。我做梦看到我正在观察一只在一个树洞入口徘徊的蜜蜂。有时看起来它好像要进入洞口,但是随后它又再次撤退了。经过若干次重复,我终于醒来。关于这个梦,我经过反复思考,认为蜜蜂可能代表一种怀疑和“小心谨慎”的心态。然后我就明白了梦中景象的意思:这是一只谨小慎微的蜜蜂。我的房东,一位驻莫斯科的西方大使,就在他退休前一天的晚上,告诉我说他一直对自己的职员保持戒备,因为担心他们中可能有人被克格勃收买!因此这个梦代表了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不得不像一只“小心翼翼的蜜蜂”那样与周围的人打交道。口头重述自己在梦中见到的视觉形象可以被证明是非常有启发性的,这在解释梦境中经常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弗洛伊德坚持认为梦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以前日子的残余(Tagesreste),另一个来自童年。但是导致记忆转变为形象的更加基本的方式是扭曲:“我的梦理论的核心,”他写道,“在于我在梦中故意歪曲事实,编织谎言来逃避审查。”“梦的‘替代’和梦的‘浓缩’是确定梦的形式和内容的两个主导因素……”——毫无疑问替代和浓缩在梦中都会发生,例如前面提到的那位经理梦见自己操控着办公室秘书的办公桌抽屉。浓缩作用体现在对性的双关语暗示上,显然在这里指的是“抽屉”和“办公桌”等词——有韵律的抽拉运动本身就是性交的象征。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每一个梦中元素的内容都‘由多种因素决定’——它在梦中被反复替代。”

但问题是这些技术手段是否是建立在如弗洛伊德所坚称

的瞒骗“检查官”的基础之上的。弗洛伊德决心把他的梦理论与精神病理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但是坚持后者使他无法考虑歪曲和浓缩可以同象征和形象化一样更容易被理解为梦的通用语言——即大脑在睡梦中自然活动的方式。这正如荣格强调的那样，梦的内容其实是“直白的”，而所谓的“隐藏的内容”是不存在的，因为它们完全可以从梦的蛛丝马迹中找到答案。“隐藏的内容”不过是弗洛伊德所说的“自我”通过自己的智慧所建立的“超级结构”，而这种结构可以通过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解释”后还原成“直白的内容”。但是在我们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有效性辩论之前，还是先通过它解释一些“梦的秘密”的实例来进行检验吧。

艾玛的注射之梦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如果你仍然感到疼痛，那么就确实证明是你自己的错。”

1895年初夏，弗洛伊德用精神分析法治疗了艾玛，一个年轻的寡妇，但是这次治疗仅仅获得部分的成功：“病人的歇斯底里和焦虑症得到减轻，但是其他症状并没有完全消失。”为了能够成功治愈她，他提出了一个“看起来病人不愿意接受的治疗方案”。正当他们意见分歧时，他由于暑假结束而停止了治疗。

然后弗洛伊德接待了一位来访的同行和朋友，这个人名叫奥托，他最近与艾玛和她的家人一起呆在乡下。当弗洛伊德问起她的健康状况时，奥托答复说：“她现在好多了，但是还谈不上很好。”弗洛伊德听出奥托的声音中带着责备，这使他感到很难堪，于是他就

花了一晚上时间写出艾玛的病史,以便把它送交到“M 医生”,一位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医疗界认识的显赫人物手中。而“艾玛的注射”之梦就在第二天晚上出现了。

在梦中,艾玛是参加聚会的一名客人,弗洛伊德把她带到一旁,责备她不肯接受自己的治疗方案,并说:“如果你仍然感到疼痛,那么就确确实实证明是你自己的错。”艾玛回答说:“你知道我的喉咙、胃和肚子现在都在疼——我疼得喘不过气来。”在得知了这个情况后,弗洛伊德对她进行了检查,寻找以前在她身上没有发现的器质性疾病。于是他最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发现患者喉咙中有一大块灰色的溃疡,附着在一个显然是按照鼻梁骨形状构成的弯曲物上。他连忙请 M 医生进行复查,并让奥托和另外一个朋友和同事利奥波得也加入。M 医生诊断出患者得了传染病,并且他们一致认为得病时间就在不久以前,当艾玛感到不舒服的时候,奥托欠考虑地给她注射了一针“三甲胺”,那次注射很可能不干净而使她感染。

弗洛伊德为此列举出自己做梦的原因:“我不应该为艾玛的疼痛而遭受指责,因为她自己就应该为拒绝接受我的治疗方案而承担责任。我与艾玛的疼痛无关,因为那是先天性器官疾病,无法由我们这些心理医生进行治疗。艾玛的疼痛可以很令人满意地解释为是她守寡状况造成的……我没有办法改变它。艾玛的疼痛是由于奥托使用了不合适的药以及进行了一次不小心的注射造成的——我就从不干这种事。”艾玛的疼痛是用一根不洁净的针进行注射造成的结果……。

弗洛伊德由此得出结论:“梦所展示的是一种心想事成的特别状态。这样它的内容是对愿望的满足,而它的动机就是愿望。”因此,梦的秘密就是它们代表了某种愿望的达成,并且愿望的本来面目可以通过自由联想来发现。

对于一个认为神经病和做梦源于性冲动的学者来说，弗洛伊德在艾玛的梦中刻意隐瞒性欲成分是令人惊讶的。但是他还是据此分析了梦中奥托阴差阳错把“三甲胺”误当成注射液使用的情节。弗洛伊德回忆了自己与威廉·弗莱斯的一段对话。威廉是柏林的生物学家和鼻喉专家，他认为三甲胺是一种能够提高性能力的产品。而且弗莱斯还“以科学的态度注意到鼻骨与女性性器官之间非常显著的联系”。艾玛是一个年轻的寡妇，弗洛伊德反思道：“如果我想要找一个借口来解释自己对她治疗的失败，那么毫无疑问她的寡妇身份本身就是一个理由。”（意即她在性方面遭到挫折）

此外，弗洛伊德没有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他做梦时，他的妻子再次怀孕了。由于又要添丁进口，弗洛伊德很担心以自己的职业在经济上能否承担得起。他也没有讨论艾玛以前钟情于他的问题（艾玛在潜意识中强烈地感到与他的关系很亲密，就像她在过去生活中的经历，例如她的父亲）。艾玛拒绝接受弗洛伊德的“治疗方案”的原因会不会是因为他没有满足她渴望与他发展更亲密关系的愿望？弗洛伊德是否对她有性吸引力？他可能一直潜意识地寻求控制这段感情的方法，比如在梦中弗洛伊德为病人检查身体时，病人就穿着全套的衣服，弗洛伊德为此解释说：“坦率的讲，”他正言道，“我不想更深入地在这个问题上钻研下去。”这场梦可能激起了他占有艾玛的欲望与道德约束之间的心灵冲突，或者是他希望艾玛的治疗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与害怕艾玛因此不会再以病人的身份与弗洛伊德接触的思想斗争。

弗洛伊德并没有触及这些事情。他也没有去研究“奥托注射艾玛”这个明显的性象征成分（德语中注射 Spritze = 喷射）。至于肮脏的注射导致感染和在她鼻骨（=性器官）上的疤痕，可以被理解为导致性病。是否弗洛伊德对于奥托长时间在

乡村陪伴艾玛而感到嫉妒？他是否在潜意识中认为奥托可能给了艾玛一些比治疗失误更坏的东西？

关于这个梦的更多背景材料在弗洛伊德和威廉·弗莱斯之间的完整通信记录于1985出版后就真相大白了。看来艾玛事实上是弗洛伊德在潜意识中创造出的人物，她的原型是弗洛伊德的病人中两个年轻的寡妇：安妮塔·利克赫塞姆和艾玛·埃克斯泰恩。弗洛伊德的家人也都认识她们。1895年，应弗洛伊德的请求，弗莱斯为埃克斯泰恩的鼻部动了手术，以减轻她长期以来不断有脓血流出的痛苦。最初，弗洛伊德在诊断这些症状时认为是受心理作用影响，说她“是为爱而流血”。但是当症状不断持续时，他邀请弗莱斯为她作手术，担心这可能是由于鼻器官受伤所引起的。这个手术看起来不仅不成功，而且得到了误导，弗莱斯手术缝合得也不好，因为他不小心把一块纱布留在鼻洞中。当两星期以后这个异物被另一位外科医生发现并除掉时，埃克斯泰恩发生大出血，而这样的情况在缺乏临床经验的医生手中可能是致命的。这就是弗洛伊德在他公开出版的著作中所刻意隐瞒的他玩忽职守的证据。

在弗洛伊德写的很多分析文章中，他提出问题更是多于解决问题。然而，弗洛伊德的沉默是可以理解的，在那种环境里，在那个时代里，他无话可说。毫不奇怪，他在揭露如此之多的个人精神生活中的隐私时会感到一种“自然的犹豫”——因此他的勇敢行为在整个著作中都会大打折扣，而且他会主要通过解释自己的梦来演示梦的各种功能。弗洛伊德承认在分析艾玛的梦例时“没有能够更深入地”研究这个梦对自己的意义，他辩解说：“如果有人觉得有必要来批评我对这方面的缄默，我就会建议他做一个比我还坦白的试验。现在，我已经对目前所取得的一点成果而感到满意了。”但是由于弗洛伊德的“自然的犹豫”故意掩盖了一些暧昧关系，因此他所报告和分

析的这些梦的实况更具有学术性质而少了性生活的意味。

对弗洛伊德的批判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阻。迷途。如果我们坚持自己本性中矢志不渝的信念，就一定能战胜每一个艰难险阻。

我们不能由于最初的失败而走入迷途。如果我们坚持自己本性中矢志不渝的信念，就一定能战胜每一个艰难险阻。

要想接受弗洛伊德梦的理论，就必须认清事实上他的理论是建筑在几个不知是真理还是谬误的基本假设基础上的。这些假设如下：

(1)所有的梦都是欲望的满足。

(2)所有的梦都是对压抑的欲望的扭曲。

(3)所有被压抑的欲望都起源于婴儿期，并且通常在本质上是性欲。

(4)梦的明确内容总是与以前的

事件有关，特别是童年的记忆和愿望。

(5)性的想法、冲突或愿望通常会被伪装成象征符号在梦中表现出来。

(6)梦的功能是为了保持睡眠。

这些假设是真实的吗？我们有足够的相关证据可以明确地进行回答：在弗洛伊德阐述的范畴内，它们不是的。弗洛伊德作为一个理论家进行的判断是武断的和过分概括的。他的许多陈述都表明了这种趋势，并且使读者在头脑中产生矛盾的推测，即：“研究一个梦总是可以从以前的经历找到答案。”（弗洛伊德，1976。总是么？那么对于预知未来的梦又是如何解释呢？）“我们的梦的理论总是把幼年期的愿望作为不可或缺的形成梦的动因。”（SE5。不可缺少？难道不能有其他动机么？）梦是“婴儿时期的景象被转移到现在的经历中”。（1976。

偶尔也许。但是不会总是吧?)“每个梦总是把自己最浅显的内容与最近的经历联系在一起,而把最隐藏的内容留给最古老的体验。”(SE 4。所有的梦?那么关于梦见未来的呢?或是梦见一个人从来没有看见的风景呢?古老的体验究竟指的是谁?是个人还是整个人类?)“梦是睡眠的卫兵。”(1976。它们是否还有其他功能?)“公平地说没有一组念头不能被理解为代表性欲和其他愿望。”(没有任何例外?可能是这样。但是打算在这一点上走多远?)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在写作《梦的解析》期间,弗洛伊德就狡猾地预测到自己的理论中可能有的观点会遭到质疑,因此试图预先就防止这样的事发生,尽管这种措施并不总是有效。比如,他主张所有的梦都是愿望的达成,但是他意识到读者可能会反对这个观点,提出一些夜间体验,如焦虑之梦和噩梦作为反例。但是弗洛伊德认为对付它并不困难:讨厌的噩梦只是内容的表象;而通过分析潜在的内容就可以揭示出一个隐藏的愿望的实现。因为如果做梦者的愿望是被禁止的冲动,而“检察官”又不能完全控制或伪装这种愿望,那么他就会因担心而醒来。那么,弗洛伊德打算如何捍卫自己的理论,即:梦来自于性欲,因为大多数人的梦有性内容?其实很简单:“检察官”通过替代、浓缩和象征使隐藏性愿望变成非性成分表现出来。

弗洛伊德的麻烦与荣格发现的一样,就是如果你与他辩论,那么你肯定不会赢。如果你发现不是所有的梦都是他说的那样被扭曲,或者不是所有的梦都是欲望的达成,或者不是所有的符号都是性的象征,那么以弗洛伊德的观点来说你显然有“抗拒”罪过的想法。(即:你正在积极地逃避或者否认真实的想法,因为你发现它们是危险的和灾难性的。)

弗洛伊德这种论点无论怎样说都是正确的。甚至对于那些做了显然不合他理论的梦的人,也说得过去。比如,他在某

一天告诉我们,他已向一名女病人解释了梦是愿望的达成,但是这位患者却做了一个梦,她和自己的婆婆到乡下旅行,在那里,他们都度过了各自的假期。弗洛伊德继续说,“现在我知道她在早先的几天是极力反对夏天和婆婆在一起度假的,并且三天前,她还成功地在梦中避免了到遥远的度假胜地去订房。而如今的梦当然不是她所想要的,这样就与我的‘梦是愿望的达成’理论背道而驰,是不是这样呢?毫无疑问,我们必须跟随梦的逻辑对它进行解释。这个梦显然证明出我是错误的。但是这恰恰说明她有证明是错误的愿望。”(1976)

在这里,正如其他许多例子一样,弗洛伊德采取了“两头堵”的做法。如果人们不同意他的观点,那么他是不大可能说自己有错的。这是因为他的自尊和固执是建立在经常受到病人“抵抗性”质疑的情况下造成的。

“像上面那样的梦,”弗洛伊德说,“会经常出现在我对病人的治疗过程中,因为病人此时正处于一种对抗性状态之中。我几乎可以肯定,当我第一次向病人解释我的理论,即梦是愿望的达成时会激怒他。确实,这样的情况也会出现在正读这本书的读者身上:他们不同意我的观点,因此希望能有一个梦来挫败我的理论,一旦真的做了这样的梦,也就完成了他们希望证明我错的愿望。”(1976)1911年,在一个脚注中,他写道:“在过去的几年中,我经常可以遇到有‘逆反之梦’发生,这是因为那些听了我的课程的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想对这种‘愿望之梦’理论证伪。”而我们现在可以发现的荣格主义者则恰恰相反,把这种梦看做是自我反抗不必要的人为压力的自发反应。

虽然有时他是正确的,但是他当然不总是正确。然而,这就是弗洛伊德个性的力量,他加强了自己理论的传播,病人在这种解释下不得不遵照他的理论进行治疗。假如他们“对抗”

他的那些显然不真实的解释，那么这就会成为弗洛伊德中止治疗的借口。这个情况在下文中就有触及，弗洛伊德在描述自己的病人时写道：“诊断一个精神病人（并且能够解决每一个难题）确实是一种诱惑，也只有精神病人会倾注如此大的热情把自己过去的性经历和盘托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我就不会把他们归入病人，而只是认为他们神经过敏了。几天后我会通知他们，说我对他们无能为力，然后要他们寻找其他医生的建议。到了这个地步，使我感到强烈震惊的是，病人开始道歉，说对我说了谎话。他说，自己感到太难以启齿，所以刻意隐瞒了在性方面的问题，而这正是我在治疗前必须要了解的，没有这些东西，我无法把他们看做是精神病人。”这种治疗方法令人不快，病人的感觉好像进了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病人必须按照弗洛伊德要求的那样坦白自己才能够被允许接受治疗。但是还有一个弗洛伊德自己没有考虑到的可能性。就是他的武断态度甚至在自己的梦中也是明显的，因此他对待艾玛所采取的方式与对待其他“反抗”自己的病人相同。在梦中，人们可以记起他因为艾玛没有接受自己的“治疗方案”而责备她，并说“如果你仍然疼痛，那么只能证明是你自己的差错。”他自己专制主义的态度在一句令人不悦的格言中暴露无遗：“精神分析学是公平的怀疑。其中的一项规则就是无论以什么方式打断分析工作都是一种阻力。”（1976）确实，这个梦——在精神分析学史上占有关键的地位——是他通过指责别人来展示自己的正确。弗洛伊德对于不同意他的看法的同事也采取了同样的对策。“别背离我太远，”他在给荣格的一封信中写道，“你现在真的离我很近，但是一旦你想离开，我们就会反目为仇。”之后他又补充说：“我的倾向是对待那些有抵触情绪的同事与对待病人在态度上是一致的。”（弗洛伊德/荣格通信）。

这种以权力主义的方式强加自己的理论给别人的趋势不

但作用于弗洛伊德的同事和病人，而且作用于整个梦科学的发展。弗洛伊德理论的活力完全由他的个人力量所支撑，这就使它在萌芽期就落入了经验主义的传统中。事实上弗洛伊德非常喜爱他自己的理论，荣格早先与他保持友谊时，看到他几乎把自己的性理论提高到了神话的程度：“每当我们谈论到它时，他的音调就高了八度，”荣格记叙道，“一种奇怪的、深切激动的表情就占据了他的脸。”(MDR)看起来好像“性”对于无神论者弗洛伊德来说已经成为他的宗教。荣格感到他拒绝了上帝而把“性”放在原来上帝的地方。

他们的友谊开始于1907年，从那时起，荣格就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根基“性理论”表示怀疑。但是每当荣格提出保留意见时弗洛伊德就会以没有试验依据而拒绝：结果荣格就很老练地把自己的疑问埋藏在心底。当二人的友谊开始时，荣格刚刚超过30岁，弗洛伊德则已经年过半百，年轻人当然会对老人存有敬畏之情。在回忆这段决定他一生命运的经历时，荣格写道：“在弗洛伊德的光环的笼罩下，我尽可能小心翼翼地收藏着我的观点，压抑住我的批评。那是与他合作的前提条件。我告诉自己，‘弗洛伊德远远比自己更聪明，经验更丰富。现在你必须认认真真地听他所说，学他所做。’然后，使我自己感到吃惊的是，我发现自己在梦中把他当做是奥地利帝国王室的一位易怒的官员，一个已经死了却还在游荡的海关检查员！”(MDR)

荣格梦见海关检查员为他提供了一把钥匙去理解梦的真谛，这就像艾玛的注射为人们提供了线索去理解弗洛伊德一样。但是在我们做这个检验之前，还有另外一个荣格的梦等着我们去探索。我们必须首先关注一下荣格在和弗洛伊德合作期间的思想演变过程。

荣格的历程

我没有关于梦的理论。

荣格

在结成友谊的 16 年中（1907—1923），弗洛伊德和荣格都同意潜意识的活动在许多方面都起到基础性和起源性的作用，特别是在治疗精神病和梦的产生中。但是他们也出现了分歧，这不仅仅局限在荣格敢于表示出来的领域，如弗洛伊德所确定的性欲的核心地位等，而且也涉及到潜意识可能是人类进化的根源，人的梦中世界很可能就是进化的反映。在刚开始与弗洛伊德打交道的几年

中，荣格作为一名精神病专家和研究心理学的

学者已经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他在苏黎世的博格兹里医院工作，成为那里的二把手，地位仅次于“精神分裂症”的发明人尤根·布鲁勒。与以前和之后的主流精神病专家不同，荣格实际上很注意精神病人自己的说法。尤其使他感兴趣的是精神分裂症症状的相似性。不仅不同的病人可能有相似的分裂人格、幻觉和错觉，而且在世界上有不同神话幻想故事背景的不同民族的患者之中也存在着这一现象。这些观察使荣格肯定，有某些共同的构造存在于人的脑中，里面储存了所有的人类体验和行为。当他用“集体潜意识”这个概念来描述人类共同的思维基础时，就与纯粹精神分析学信徒所坚持的潜意识的私人性划清了界限。尽管弗洛伊德承认某些“古老的遗迹”会偶尔在梦中得到反映，但是他并不认为这有什么意义，他相信人脑中的思维结构是在成长过程中获得的。荣格在另一方面则断言人类所独有的思维特性都是与生俱来的。对于

这种典型的人类特性,他首先把他们称为“原初图象”,后来又叫做人的“原型”。

荣格把“原型”看做是人类现在所有行为的基础。它们从一开始就具有发起、控制和调和人类通常行为的能力,确立了世界各地人的共同特性和典型的体验。在合适的时机,原型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源泉,提供给不同阶级、信条、种族、地理位置或历史时期的人相似的想法、形象和感觉。荣格得以证实这些想法是在1909年夏的一个梦中,当时他与弗洛伊德正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克拉克大学做学术访问。

他梦见自己来到一幢旧房子的顶层,里面装修得很好,墙上挂着精致的油画。他对于自己能到这样的房间参观感到很惊讶,心想“还不坏!”然后他就有了一个念头,想看看下面的几层是什么样子。下面的东西看起来更古老。家具是中世纪的,颜色很暗淡。他想:“现在我必须探一探整所房子的真面目。”于是他仔细查看了一遍地板。地板是用石板铺成的,在其中一块板子下面他发现了一枚戒指。当他试图把石板拉开时,板子活动了,他可以看见一些窄窄的石阶通向深处。他走下去,进入了一个洞穴。里面散布着骨头和打破的陶器,上面覆满了尘土,这是一处人类原始文化的遗迹。他还发现了两个人的头盖骨,显然由于年代久远已经碎裂成两半。然后他就醒来了。(MDR)

当荣格把这个梦向他的旅伴报告时,他们感兴趣的焦点就是“颅骨”这个词可能代表的真正含义。弗洛伊德想要荣格说出这些颅骨是谁的,这样就可以判断出荣格一定是希望颅骨的主人死亡。荣格感到这实际上偏离了主题。但是,像往常一样,他坚持把疑问留给自己。而且,出于息事宁人的缘故,他提出了两个人的名字以使弗洛伊德欢喜。私下里,他一直在头脑中考虑这个梦,使他疑虑的是这个梦中的房子究竟代表着

什么：因为通常情况下这是心灵的符号。上层房间代表了他的个人意识。地面的一层表示个人潜意识，而最深的一层洞穴则是集体潜意识的表现。在那里他发现有一个原初的人类世界一直在他的体内存在。对于荣格来说，颅骨与死亡的愿望没有关系：他们属于我们的人类祖先，是我们大家所共有的精神遗产。

另一个被认为是与二人关系有重要意义的梦是弗洛伊德所做的。当荣格要求弗洛伊德提供更多信息，以便由荣格进行解释时，遭到弗洛伊德的怀疑和拒绝。他说：“我不能让我的权威受到质疑。”在那个时刻，荣格评价说，他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权威。“那个句子在我的脑海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预示着我们的友谊终于走到了尽头，因为弗洛伊德正在把自己的个人权威放在真理之上。”(MDR)

他们的友谊最终破裂是以两个男人之间的方式进行的。对于荣格来说，生活的用途是认识到自己的潜能，跟随自己的感觉寻找真相，这样他的人格才会健全。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这是一种个人目标。如果他对自己守信用，那么就要毫不动摇的以自己的方式行事。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弗洛伊德相信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这使他对于异议心存偏见，通常因为自己不喜欢而把它扼杀。

荣格和弗洛伊德不同的理论取向反映了他们做人的差别，以及他们不同的心理类型（荣格是一个内向的人，弗洛伊德则趋于外向），他们成长在不同的文化氛围、知识结构和宗教环境中。荣格是一位农村的新教徒，小时候母亲时常不在家，因此他总是心神不安和感到压抑，这个经历使他后来变成一个非常内向的人。这样使他的理论充满了浪漫理想主义的色彩，而弗洛伊德则是一个城市犹太人，他性格外向，从小就受到年轻漂亮的母亲的溺爱，后来又接受了传统的高等教育，

使他迈进了科学的殿堂。毫不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不但做的梦不同,而且对梦的解释也各自不同。弗洛伊德做的梦整体来说都是相对支离破碎的,而荣格的梦则更加连续,具有完整的象征意义并且有更为可信的叙事结构。弗洛伊德的梦最终需要经过自由联想才能够给出完整的解释,荣格则只要找到代表寓言或神话的象征符号就能够了解梦的意思。此外,弗洛伊德的“检察官”不仅会在梦中起作用,而且在人们完全清醒、进行自由联想时还会履行职责,因为“检察官”总是藏在读者身后——就像弗洛伊德本人所作的那样,他总是力量强大、野心勃勃、充满专业精神,把每个人的性欲都罩上一层铁的面纱。弗洛伊德曾经举行过一个讨论会,分析自己所做的关于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教授的梦,他在开场白中说道,“据我所知,我不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这个声明令人惊讶的背离了他的实际情况。

荣格的梦具有更大的连贯性。他更了解梦的叙事结构,这样就能使他对每一个梦都有清晰的了解;而弗洛伊德的梦则更具有阵发性的特征,这使他无法更流畅地进行他所称的“二次叙述”——即在自我醒来时重新组织和整理梦中的各种资料。

荣格很惊奇地看到了严谨的梦的自然结构与古希腊悲剧的相似之处。他把梦分为四个阶段:(1)开端。交代梦中场景的地点、时间以及剧中人;(2)阴谋的发展。在这个阶段情况变得复杂,并且“具有明确的紧张冲突,因为做梦人不知道将有什么事情发生”;(3)高潮和转折。“某一决定性的事件发生,或某事件完全发生变化”;(4)结局。答案或梦工作的成果。(CWS)

荣格梦见海关检查员的梦,正好发生在他与弗洛伊德断绝友谊的前夕,也是符合这一模式的。因此,可以根据此范式来分析这个梦。

海关检查员和骑士

在正午的报时声中侵袭开始了。

荣格

梦境如下：

“(我) 正处在瑞士—奥地利多山边界上。天色已经很晚了，我看见一个身穿奥地利帝国制服的海关官员出现在前面。(阶段 1: 开端) 他从我身旁走过去，背有点驼，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他的表情是愤怒的，而非忧郁和焦虑。(阶段 2: 发展) 当时在场的还有其他人，有人告诉我说这个老人并不是真的存在，他其实是一个多年前就已经死去的海关官员的鬼魂。(阶段 3: 突变) ‘他

是一个到现在还不能死得其所的孤魂野鬼。’”(阶段 4: 结局) 然而，这还不是梦的结束。荣格发现自己已经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类似的叙事结构又出现了：这次他发现自己站在一座城市里。

“这座城市是巴塞尔，但是它也像是一个意大利城市，例如贝加莫之类。现在是夏天，燃烧的太阳在头顶伫立，每件东西都沐浴在强烈的阳光下。(开端) 一群人向我涌来，我知道商店就要关门，人们正走在回家吃饭的路上。(发展) 在人流的中间走着一个人披着完整盔甲的骑士。他迈着正步朝我走来。他头上戴着一顶有钢制面罩的头盔，上面留着眼睛缝，身上披着链子甲。铠甲上面罩着一件白色的束腰外衣，外衣前后各有一个大大的红十字……(突变) 我问我自己的这个鬼怪意味着什么。之后似乎有人在回答我的问题——但是又没有人开口说话：‘是的，这是一个很寻常的鬼。骑士总是在 12 点到 1 点之间经

过这里,他这样做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判断是好几个世纪),每个人都知道有关他的故事。’”(结局)

解释

东西。

我用全部身心来寻求仍然未知的

荣格

荣格分析一个梦的起点并不是解释而是“放大”——即,进入梦的氛围,建立那里的形象、象征和细节,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把梦的体验本身进行放大。这时,潜意识的影响就会加强。

当我们看第七章时,就会知道荣格的象征符号的概念与弗洛伊德大相径庭。因为根据荣格的观点,每个符号所要表达的意义都超过了人们能够说出的范围。他坚持认为符号不会“减少”它的原来意义,但

是这也意味着它们的原初意义可以被检验。与把梦破裂为一系列有规律的意义符号不同,一个人应该绕开象征符号,允许它们揭示自己不同的方面的意识。个人联系肯定要被考虑到,但是一个完整的对于梦的意图的解释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如果一个人能够收到全部的信息的话。

这个梦作为整体留给人的第一印象应该就是它的情境和想像以及梦中人物的尖锐对比:一个是伤感、鬼一样的海关官员,另一位是非凡、超现实主义的中世纪骑士。这个梦的开端被放置在瑞士—奥地利边界一定有其特殊意义;海关官员的服饰、仪表和行为方式也耐人寻味。为什么他一开始没有出现,为什么他没有死得其所?为什么很久以前已经死了的骑士会在一座现代城市的大街上穿行?前者的图景陈旧不堪,死气

沉沉，代表过去发生的事；而后者则朝气蓬勃，引人入胜——骑士身披耀眼的盔甲。

在荣格的疗法中，解梦过程通常被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根据做梦者的生活经历建立某种联系，以便理解梦中纯粹的个人意义。接下来，必须确定梦的文化背景，因为梦的内容与周围的环境和做梦的时间有关。最后，寻找梦中典型的内容，并把它与人类的整个生活状况联系起来，因为梦的最深层的含义就是人类最古老的生存体验。

不过在实践中很少能够把这些阶段分开，这是因为，在梦中个人、文化、经验以及对意义的理解常常交织在一起。然而，为了能够清晰地进行解释，我们将在三个小标题下面分析这些梦的元素，当然，这会造成它们之间某些不可避免的重复。

个人语境

荣格关于梦的内在联系的描述简单明了、一针见血，因为他并没有拘泥于弗洛伊德所鼓吹的“自由联系”。对于荣格来说，联系只发生在梦中形象之间，仅仅是便于解释梦而已。而弗洛伊德的自由联系，在荣格看来，这种联想不过是把做梦者一遍接一遍地从梦中拉出，把他们带回自己的童年世界而已。这种行为与荣格的目标并不一致。

荣格在说“海关”这个词的时候就立刻把它与“检查”联系到了一起；而梦里面的“边界”则一方面指代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边界，另一方面也代表他与弗洛伊德在看法上的分歧。对于骑士，荣格说：“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想像到我当时的感觉：在一个现代的城市里，在日间上班高峰期，突然看见一位十字军骑士朝我走来。使我觉得特别奇怪的是当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好像除了我以外，其他人都看不见似的……即便在梦中，我也知道骑士属于12世纪。当时炼金术刚刚开始，人们正在到处寻找神秘的圣杯。圣杯的故事从我15岁一读到它

起就给我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我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悬念，把秘密隐藏在那些故事后面。对于我来说，这个梦很自然地把我召唤进圣杯骑士的世界中，他们所探寻的东西——归根溯源，就是我自己的内心世界，与弗洛伊德的想法无关。我的整个存在就是寻找某些未知的东西，为平淡无奇的生命添彩。”
(MDR)

文化语境

边界是得到双方同意的划分两国的地理界线：根据梦中的逻辑，它是代表国家边界还是思想疆界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不容忽视的是，弗洛伊德的国家是奥地利，而荣格的国家是瑞士；而且弗洛伊德扮演了一位“帝国”官员，正在两国边界间巡逻。在边境，一切个人财产都必须被审查，旅行箱必须要打开，看看有没有违禁品。旅客的护照也被仔细检验，以便确定它得到认证，而所有这些活动都由一个海关官员完成。这些状况可以被归结为精神分析学的实践活动吗？梦中的边界可以被认为是意识和潜意识的分野吗？是否可以认为弗洛伊德作为精神分析泰斗，在梦中既愤怒又焦虑，甚至还有些悲伤，怀疑别人脑中充斥了破坏性和令人讨厌的观点吗？从梦中反映的情况来看，荣格确实进行了这样的联系。他问自己，为什么会把弗洛伊德梦成海关检查员的鬼魂呢？“那会不会是弗洛伊德所宣示的我有希望他死的愿望呢？”他想不是的，因为他没有原因希望弗洛伊德死。他宁可把这场梦看做是一种补偿或是对弗洛伊德的主观意识的修正，因为他一直把弗洛伊德看做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人。这个梦则暗示他与弗洛伊德之间的一种更为批判和暗地里勾心斗角的交往方式。

在梦的第二部分对巴塞尔和意大利的混淆可能涉及到荣格的伙伴，巴塞尔人雅各布·伯克哈得，他把自己家乡的文明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联系在一起。意大利是但丁和比忒斯，彼

特拉克和劳拉的世界,充满了爱,人文精神和艺术的再生。梦中时刻正是中午,行人在街上汇成回家的人流,太阳在他们头顶闪耀,这实际上昭示了荣格人到中年的危机感,荣格是这样描述的:随着正午的钟声敲响,太阳已经开始下沉了。在这里下降意味着所有的理想和价值观都是在早上得到珍爱。前半生是“获得和消费”的生活,但是现在店铺关闭了,这一阶段也结束了。未来能够有什么希望呢?答案显然在那位非凡的骑士身上出现。他身穿盔甲,不是未来人,而是来自过去的基督教绅士和勇武的武士。他属于12世纪,即荣格把炼金术的开始和圣杯传说联系起来的世纪。

典型语境

在这个梦中具有最大意义的典型形象就是容器(圣杯)、骑士/武士和十字架。这些东西通过内在联系,很容易联想成要表达的主题:老而垂死的国王,疗伤医生,以及僧人/魔法师。

根据传说,圣杯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使用的容器,后来由基督的门徒所收藏,里面装着耶稣受难后流出的血。它可以说是基督徒最宝贵的圣物。然而,这个神奇的容器比基督教本身还要老。要是由弗洛伊德判断,他会首先认为圣杯或容器是妇女的符号,代表产生奇迹的子宫,孕育新生命的场所。荣格则认为这样的容器代表着12世纪的炼丹术,它最早发源于古代中国,后来传到了欧洲北部。在这个认知下,荣格相信最初上帝把双耳喷口杯作为一个礼物交给人类,在里面,人的灵魂可以得到洗礼。这个中世纪的神话把圣杯作为灵魂的象征,它总是满满的装着无尽的神的恩惠。

圣杯传说还与英格兰和阿瑟王的圆桌骑士联系起来,他们由一位伟大的魔术师、凯尔特传说中的僧人和诗人默林所召唤,来参加会议。默林出生于魔鬼和圣女的结合,因此,他对

于耶稣基督能产生一种抵消的力量。在他生涯的早期，默林主导了一场血腥的王位争夺战，衰老的篡位者维提格尔国王被尤特王所取代，对于后者，默林向他吐露了圣杯的秘密，指示尤特准备“第三张桌子”。第一张桌子是最后的晚餐中的饭桌；第二张是圣约瑟摆放圣杯的，它是方形的；而尤特王要准备的第三张桌子必须是圆形的。把方形变成圆形是整个事件的关键，它代表着任务的圆满完成和自我的充分实现。现在把荣格的上下文作为一个整体，对圣杯的需求就可以被理解为个人受到重压，要求解脱的愿望。

圣杯的传说使荣格着迷一生。早在孩提时代，他就阅读了马罗礼和弗洛伊萨特的著作，他喜爱各种音乐，特别是瓦格纳的《帕西发尔》。至于这个梦，除了圣杯本身以外，更有趣的是“老病的国王”安福塔斯的主题。像在希腊神话中的喀戎一样，安福塔斯承受着自己身上一处无法愈合的创伤；此处创伤的引人之处是它的位置：它在大腿内侧或生殖器的区域。安福塔斯的创伤是一处性创伤，他的问题是一个性问题。他希望放弃自己的王位，交给帕西发尔继承。这与弗洛伊德很相似，他声称荣格是他的“衣钵传人”，是“儿子和继承人”，并准备把自己的权力传给荣格，但是一直没有做到，就像帕西发尔询问关于圣杯的事一样。

荣格自己并没有把安福塔斯和弗洛伊德联系在一起，但是他把安福塔斯与自己的心理脆弱的父亲建立了联系。他的父亲是一位失去了信念的牧师，他在有生之年可以说是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先驱：“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遭受安福塔斯创伤的一名患者，他是个‘渔夫国王’，他身上的伤口将永远得不到愈合——虽然他是一个基督徒，但他一直在寻找炼丹家所创制的万灵药。我是一个‘无言’的帕西发尔，在我的整个童年时代，都像帕西发尔一样见证着这样的疾病，却无法说出口。

我只能进行暗示。”(MDR)

弗洛伊德可不是什么“渔夫国王”，并且当着他的面，荣格也不能自比帕西发尔，他还从来没有问过弗洛伊德关于他为性之神服务的事。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持续很久的原因。这个孤独的十字军战士是个基督徒，他正向战争迈进。这是一个他无法拒绝的使命，必须要义无反顾地完成。这就是荣格将要出现的面貌，不是作为基督徒，而是作为人。“如果一个人比其他人知道更多，他会变得孤独，”他在生命结束时写道，“我有一个心魔……它制服了我……我从来不能控制它。我不得不遵照它的指示去做，它占据了我的双眼。由于我的同辈人不能察觉我眼前的幻象，他们只看见一个笨蛋在向前冲……我对别人的兴趣越来越强烈，但是一旦我看穿了他们，魔力就走了。这样我树了许多敌人。

“一个具有创造力的人却很少有力量控制自己的生活。他并不是自由的。他是自己心魔的俘虏……自由的缺乏对我来说是一大悲伤。我经常感到自己好像置身于一个战场，别人说‘现在你掉队了，我的好同志，我们必须各就各位。’”(MDR)对于读者来说，能够有足够的耐心和理解力欣赏荣格所倡导的梦的解析方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读者既要有渊博的知识，又需要有对各种象征符号的理解，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仅仅分析基本的信息是远远不够的，人们对梦还必须有更深入的解释。例如梦见海关检查员，就可能很简单地理解为，“摒弃弗洛伊德和采用你自己的方式。”

骑士的世界、圣杯以及默林都不属于弗洛伊德的世界而是荣格的世界。现代社会的问题，像神经过敏的起源一样，并不是单纯由性压抑所带来的“灵魂缺失”，即缺乏神圣的感觉。弗洛伊德仅仅把我们遇到的复杂问题提升到文化的语境。他在一个基本的人类本能上找到了神圣，这就是“性”。骑

士的幻想代表着欧洲人对高贵的向往,它正在被逐渐忽视。骑士的探索,正好暗示了我们正在堕入后基督教文明的“荒漠”。

这个主题还出现在荣格的另一次梦中,在那里,他发现自己置身于梅罗文加王朝的时代。他经过了很多人8世纪的尸体,然后来到12世纪的墓穴前。他在一具死尸前停下来,尸体穿着铁索十字甲,他攥紧拳头躺在那里。他的形象看起来像是一具木雕,荣格仔细观察了一番,确认他已经死了。但是他突然看见了尸体的左手的一根手指开始轻轻地颤动。(MDR)

这位骑士在他的潜意识中仍然活着,他仍然按照自己的信仰一往无前,这就给梦者提供暗示,要求他离开弗洛伊德这个垂死的人物:即愤怒的海关官员。但是当时的情境是既有过去又有未来(十字军骑士的身子前后都有红十字),周围有代表着整体和赎罪的符号,处于一种与上帝同在的状态。他必须继续像那位骑士一样不断前进,尽管他的努力被周围人所忽视,而且他的所作所为也是以自己的“内部名义”进行的,他几乎无法召集足够的志同道合的人召开自己的“圆桌会议”。

弗洛伊德和荣格的评价

每一种心理——包括我自己
——都有主观承认的特点。

荣格

荣格和弗洛伊德的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主观烙印,它是建立在个人心理和创始人职业野心的基础上的。荣格比弗洛伊德更多地公开承认这一点:在1929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荣格描述了自己的理论与弗洛伊德的差别。在卷首语中,荣格写道:“甚至当我正在处理

实验的数据时,我也仍然在谈论着我自己。”(CW4)

在这两个心理学分支中,荣格事实上更具有经验主义倾向:“我不知道梦怎么产生,”他写道,“而且我不肯定我研究梦的方法有效,甚至这种做法是否值得被称为‘方法’。”但是这种谦逊表述并不影响他拒绝弗洛伊德的梦理论,以及建立自己关于梦理论的基本信条。事实上,弗洛伊德的假设的大多数根据梦的研究证明靠不住。而在当时,荣格的理论却可以通过试验的测试得到验证。例如,所有健康的哺乳动物都被观察到做梦。而人类婴儿也把他们大部分时间投入REM(快速眼球运动)的做梦睡眠状态中。他们在子宫内和刚出生后都是如此,由此看来,做梦似乎体现了人们原初的想保持睡眠的愿望。这样的实验证明做梦更可能是荣格所说的“灵魂的自然产品”。梦可以执行一些自我平衡或自我规范的功能,并且梦符合生物学的传统规律,符合个人调节、生长和生存的需要。

荣格的假设竟然比弗洛伊德最新的研究结果具有更大的兼容性。这对弗洛伊德原先在动物学和神经科学的理论的冲击是令人吃惊的。从1876年到1882年,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的欧内斯特·布鲁克(1819—1892)的生理研究所工作。布鲁克是弗洛伊德所崇拜的一位偶像,他相信所有重要的生理现象最后都可以通过物理和化学的方法进行解构,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排除“精神”、“生命力”、“灵魂”等术语了。这一教义对弗洛伊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他从始至终都成为坚定的决定论者。弗洛伊德确信所有的神奇现象,不论是想法、梦境、图象,还是幻想,一定遵循某种因果关系,可以从过去发生的事件中找到其发生的根源和内在规律。

弗洛伊德如此僵硬地坚持他的性理论,不仅是因为他相信人身体与头脑之间必然有某种联系,而且因为他一直信守在布鲁克的实验室中经过的训练。他认为精神病与梦一样,必

将最终证明二者有共同的物质基础（他希望把他的研究项目与科学心理学合并起来）。正如他在1908年4月写给荣格的信中所说的一样：“性行为是我们肌体里不可或缺的一个功能，一个医药工作者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就无法在处理精神病人时做到游刃有余。”（弗洛伊德/荣格通信）这是一个必须接受的明确观点。性不仅对人类物种的繁衍不可缺少，而且，在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弗洛伊德认识到，性的选择是人类进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他的性理论，是在生物学所说的健康器官的基础上进行的精神分析学。弗洛伊德的研究视角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狭窄。动物行为学作为生物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自然状态下的动物行为，然而它还没有成为一门科学。弗洛伊德并不知晓在自然界中动物本能行为的巨大差异，因为他所观察和研究的动物都是被处于限制自由状态的，这样他就很遗憾地无法真正体验动物的潜能。由于自身处于牢笼之中，没有领土和统治权可以去争夺，这些感到无聊的、养尊处优的动物们除了我们常说的“自虐”，终日无所事事。无论如何，性行为的重要性在弗洛伊德的临床实践中被明显夸大了，这是因为在19世纪资产阶级普遍感到性压抑。但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我们的同辈人在这方面的限制比较少一些，我们也并不能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与我们的文化无关。

后来弗洛伊德放弃了生理学研究，以便挣足够多的钱与马莎·伯内斯结婚。他并不希望成为一名医生：纯粹是生活的需要使他走到了医生的岗位。但是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他的首要动机是寻求实现阿德勒式的目标，达到自己的出人头地。当他成为一名医生后，由于个人性格的关系，弗洛伊德自己给自己制定了研究的核心领域和相应规则。他与查克特和布留埃尔的合作使他初步得到了一些灵感和来自布鲁克的部分生理学和心理学原则，这使他逐步发展了精神分析学的理

论和技术，并且不可避免地使他在生物学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亲爱的荣格，”他在一个很著名的场合中说，“请答应我永不放弃性理论。那是所有事情中最重要核心。你看，我们必须把它看做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基本教义。”(MDR)做梦、神经病的症状、误用、玩笑、口误以及其他所有行为都建立在“这个简单的不可缺少的功能的基础之上”(即：性)。

弗洛伊德相信精神生活的基本需要，是通过完全释放紧张的神经，实现一种宁静的状态。他后来把这称为涅槃原则。健康的人能够平静而梦，能够与异性正常结合并且过上满足的性生活。他或她可以舒缓性的紧张情绪，不断获得性高潮，并且可以享受毫无压力的周期性的涅槃状态。然而很少有足够的客观证据支持这种观点，而反驳它的占了绝大部分。但是弗洛伊德是一个施诡辩术的天才，他工作勤勉，具有政治才能，很少有人能够逃脱他的影响。J. 艾伦·霍布森(1988)评论说，“弗洛伊德的所有重要心理学理念的种子几乎都萌芽于1890年他的神经生物学研究的土壤。在那个时期，他钻研梦的理论是特别认真的。”尽管如此，弗洛伊德关于中央神经系统在工作方式的假说还是具有重大缺陷。因为他把中央神经看做是一个具有核心功能的被动组织，它只有在受到刺激时才会作出反应，它既没有自己的能量，也没有自己的情报来源。根据后面的50年研究，我们现在知道神经系统是有产生(或取消)新陈代谢能力的，能够自己为自己制造能量和提供信息。我们还知道睡觉时快速眼球运动是做梦的表现，这是由于中央神经系统自发产生的刺激行动。

然而，尽管受到布鲁克的影响，弗洛伊德最后还是否认了神经科学和他的梦理论之间的关系。结果他停止了科学心理学的项目。这是因为他认识到神经生物学仍然处在幼年期，如果现在尝试建立一门新的心理学分支还为时尚早。此外还因

为他希望自己的理论具有原创性，并在神经科学研究方面产生革命性的突破。但是，他的关于被压制的性欲能够通过梦、神经病症状、不正当的性行为，以及不经心的口误等情况释放出来的观点，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因此他必须在布鲁克的实验室继续进行研究。

心理动力理论的发展带来了可怕的后果。因为它是基于它的创始人的一个已经过时的假设之上，精神分析学缺少科学的实证，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生不逢时。而在同一时期，神经生物学和梦科学都有了显著发展，这样使精神分析学日渐衰落，甚至遭到了孤立和冷落。如果一个梦理论被证明有效，那么它必须要从神经科学和心理学中吸取营养，它们的研究数据必须能够共享和彼此整合。

与弗洛伊德的理论相比，荣格理论较少受到攻击。原因就是后者更专注于通过现代的视角观察人脑，把大脑看做一个自我激励的系统，在思维中自发寻求特定的生物-社会目标。这样，现代的梦学研究人员都倾向于排斥弗洛伊德的关于梦的简明扼要的观点，即“梦是被禁锢的欲望的伪装的满足”，而接受荣格的判断，即，梦是“透明”的自然现象，可以自发地独立于任何个人意愿延续。“梦是公正的。它是潜意识中灵魂的自发产品，不受愿望的控制，”荣格写道，“它们纯粹是天性；它们显示出我们质朴、自然的本相，是一种与我们的本性相协调的东西。而我们的意识现在看来已经偏离这种原初状态太远，太过迷离了。”(CW10)“它们不会欺骗；它们不会说谎；它们不会歪曲事实或假装……它们总是寻求我们自己不知道，甚至不想知道的一些东西。”(CW7)“梦是一种自发的、自我描述性的符号，它是潜意识的实际状况”(CW8)

弗洛伊德所称的梦的“显性内容”，或者说“梦的门面”，以荣格的观点来看，仅仅是梦的一种含混的表达。他评价这个概

念说：“这其实仅仅是我们自己缺乏理解的表现。”(CW16)我们的梦需要被解释，不是因为它们是一种伪装，而是因为它们的意思被放进“图象语言”中了。因此，我们必须逐字地把这些图片“语言”提炼出来。荣格同意梦可以表达愿望或者恐惧。但是他坚持认为大多数梦有更为宽广的内涵：“梦可以包含不可避免的真相、哲学的声明、幻想、白日梦、记忆、计划、预料、不合理的体验，甚至心灵感应术等，只有上帝才知道还有什么不能梦见。”(CW16)

而且，荣格认为梦实质上是一套灵魂平衡系统，它具有补偿的功能，可以使人已经被压缩到极限的心理意识重新得到平衡。梦的这种补偿作用，可以通过最新医学上的发现观察到。即快速眼球运动中的睡眠，与心理动态平衡在概念上是一致的。荣格把灵魂看做是一种维持平衡的自我调整系统。它一方面保持人类思想斗争时的心态平稳，同时，也寻求自身的成长和发展。“灵魂只是维持心理平衡的一个自我调整系统，这与我们的身体是一样的。每一个进程都不会很快地走得太远，任何消耗过度的情况都会得到补偿，如果没有平衡机制，我们就不会有正常的新陈代谢和正常的心灵。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把补偿理论看做是心理行为的基本法则。一方面过少必然导致另一方面过多。同样，意识和潜意识也是一对互补关系。”(CW16)这样，根据荣格的观点，梦就是“在我们有意识的知识里面添加一些东西”，而且“如果一个梦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就不会得到解释”。(CW16)“梦总是在强调在另外的方面维持心理平衡。”(CW7)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荣格的补偿理论可以被看做是在弗洛伊德的欲望实现理论基础上的扩展。两个理论都把梦看做是在潜意识里产生的某种东西，可以把意识与潜意识沟通起来。但是弗洛伊德认为梦的用途不过是欺骗的伎俩而已，它

使被压抑的内容经过伪装进入可以感知的领域。荣格则认为梦的功能是把潜意识中的有价值的因素提取出来，赋予整个人格个性。

此外，弗洛伊德在探讨梦起源时，采用了回溯的方法，认为解梦需要寻找梦者婴儿期的本能。荣格则与他有很大不同，他采取一种建设性的、前瞻性的研究方法，认为可以通过研究梦的内容来寻找打开大门的钥匙。因此，根据荣格的说法，梦的目的就是含蓄地构建一个完整的心灵，以便实现生命的真谛。

更进一步说，荣格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的糟粕进行了剥离。比如，弗洛伊德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拉马克生物学的一些想法，以及他单一地把梦与神经病的症状联系到一起，而否认梦可以内在地、有创造性的促进个性的发展。同样，在某些方面，精神分析阻碍了当代科学的发展。而 J. 艾伦·霍布森，当代领先的梦学研究权威之一，则认为梦的过程是“进步大于后退；积极大于消极；创造大于破坏。简言之，做梦比精神病健康得更多”。(1988)这是荣格在 1912 年就达到的高度！

经过一个世纪的研究和实践，我们现在可以很容易地在与弗洛伊德的争论中指出他的缺陷。但是我们在世纪之交也不应该忘掉他的巨大成就和深远的文化影响力。荣格能够更多地利用当代科学的手段发展出一套解释梦的理论，这应该归因于他虽然从师于弗洛伊德并不得不接受他的教导，但他并没有一味地追随，而是在弗氏基础上建立一套自己的心理学分析模型。因此，当我们庆幸荣格成功地把潜意识与梦的想像力相结合，创造出新的解梦理论时，也不能忘记荣格正站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肩膀之上。

后来的发展

「我跟随着你。」
「但我却什么也看不见。」
「这就是你要我跟随你的目的吗？」

夏洛克·福尔摩斯

在后弗洛伊德和后荣格时代,许多学者相继出版了梦学理论的文集和理论著作,他们都是在两位梦心理学巨人的基础上进行的扬弃、补充和发展。借助于前辈的资料库,每一位分析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来选定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在新生代学者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人物包括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威廉·施泰克、塞缪尔·洛伊、托马斯·弗伦奇、埃里卡·弗洛姆、蒙塔古·

厄尔曼、弗里兹·佩里斯、梅达德·博斯、查尔斯·基考罗夫特以及詹姆士·希尔曼等。

考虑到空间的局限,更不用说我的读者的忍耐力,我无法把这些理论家的每个想法都进行详细的解释。我能做的就是对它们进行更多的比较和总结,并希望在这本书中提出我的有争议的看法。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和威廉·施泰克

梦是生活的彩排。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阿德勒比弗洛伊德年轻 14 岁。他与威廉·施泰克一起在维也纳加入弗洛伊德的团队，并且在 1902—1911 年的精神分析学运动中一直有活跃的表现。但是弗洛伊德认为他的想法是“异端邪说”，从而把他驱逐出去。在排除了阿德勒后，弗洛伊德写信给荣格说，“我想从现在起，《森托布拉克》（阿德勒和施泰克共同主编的精神分析学刊物）上的异端邪说就不会浪费太多的空间了。”这一事件的起因是阿德勒和施泰克曾经于一段

段时间激怒了弗洛伊德。后者于 1910 年 11 月 25 日在写给荣格的信中提到：“我的神经被阿德勒和施泰克激怒和阻抑了，与他们在一起生活是很难持久的。你知道，施泰克经常处于躁狂状态，他正在破坏我所有的美好感情，并且使我感到绝望……阿德勒是个很体面和具有高度智慧的人，但是他是一个妄想狂。他在《森托布拉克》里面把自己的鬼话强加给读者，使读者几乎被他的灰色理论完全搞糊涂了。他总是自恃清高，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他总是抱怨在我的阴影下面没有出头之日，并且阻止年轻人的到来。在他眼里我已经成为冷酷而老迈的暴君角色。既然他们对我粗鲁，我也会很高兴地舍弃他们……我不会介意由于没有他们而毁了《森托布拉克》……”（弗洛伊德/荣格通信）——后来弗洛伊德的传记作家欧内斯特·琼斯证实了阿德勒当时的想法：“他显然很雄心勃勃，并且常常在学术观点谁优谁劣方面与其他人争吵。”

阿德勒事实上一直处于癫狂状态：他的一辈子都与阴谋打交道。他所关注的是“从乞丐到富翁”的故事；他把人的存在看做是一场斗争，以补偿自己内心的自卑，这种感情在童年就已获得，只有在日后取得支配地位才能予以弥补。阿尔德派把人为做事的动机看做是尼采的“权力欲望”，但是权力欲并不是阿德勒观点的全部：它仅代表一种希望获得补偿的努力。这种个人为了得到补偿而努力奋斗的模式被阿德勒称为他或她的“生活方式”。

这一点在他的著作中得到体现。阿德勒本人对于社会活动和私人社交比研究梦更感兴趣。他从来没有出版过一部关于梦学的详细著作。总体上来说，他对于梦的看法来源于他对生活方式的态度，他认为梦者在梦中传递的想法就是要努力实现超越他人的目标。“个人的成就与个人目标在梦者清醒状态下就已经确立，但是在梦中，这种感情力量继续推动他朝那个目标前进……在梦中，我们所观察到的图景将会充满感情色彩，我们需要有自己的目标，因此，我们必须在梦中面对这些问题，克服障碍，选择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安斯巴切尔，1956）

“梦者可以把自我在社会生活中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都带到梦中，通过梦境里一系列的奇遇，来达到解决在社会中被忽略的问题的目的……这种梦理论包含‘目标取向’和‘目的地’两大个人心理因素，与弗洛伊德的婴儿愿望的回归和满足婴儿欲望的心理学理论形成对比。这是一种进化的趋势，而且个人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这一理论把梦者的天性以及寻找生命的真谛放在突出地位。”

威廉·施泰克也站在阿德勒一边，拒绝接受弗洛伊德的宿命论，而赞同阿德勒关于梦的目的性的观点：“梦总是寻求探索未来，它们显示出我们对生活和生活方式的态度和目

标。”(艾伦伯格)

这样,尽管阿德勒和施泰克没有为自己的梦学理论起一个完整的名字,他们的创见仍然具有重要价值。他们把梦看做是在潜意识中进行的自我调整和激励,以及对未来目标的设定。

塞缪尔·洛伊

东西。

洛伊弥补了我们意识中所忽视的

洛伊的梦理论在相似性方面更接近荣格和阿德勒,而不是弗洛伊德。像荣格一样,洛伊认为灵魂是一个自我调整系统,并且认为梦是通过心理影响对这个机能进行维护,以便保持人体不可缺少的动态平衡。他相信梦的记忆深受“感情因素的影响”,在梦中,梦者可以补充由于人格缺陷而失去的一些精神力量,使梦者对于今后他要面对的境况有一个心理准备:“例如,我们有时无法面对现实困境和棘手的情况,总是有意识地把这些

些想法予以回避和摒弃,但是这些真实情景将会出现在我们的梦中,可能不再是劝喻或是警告,而是变成我们潜意识中的一个象征符号,变成一个问题,需要梦者动脑筋去对付。这样,由于梦中作了准备,我们的潜意识里就会留下对可能发生的危机的‘抗体’,这样的过程就是一种对意识的补充,使我们对意识中刻意回避的东西有了思想准备。如果,真实的困难后来确实发生了,人的心灵和神经系统就不会孤立无助,有了‘抗毒素’,就不会精神崩溃……”(洛伊,1942)

尽管我们会在清醒时忘掉大多数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忘记的梦不会对自己的心理产生影响，因为一个人即使在睡梦中本身的意识也起作用。事实上，潜意识支配着梦中的自我，而人的意识也担当着同样的功能。当我们清醒时，我们会忽视梦中知觉：“为什么我们假定并理所当然的认为梦中世界愿意与现实世界和现实事物发生关系呢？二者对比会使人疑窦丛生。显然梦中世界成为了一个被分割的世界。”（同上）梦的体验的重要性在于梦本身。如果我们碰巧能够在清醒状态中回忆起梦的内容，那么这是一笔奖金，是“双重所得”，因为这样做加强了对梦者的心理影响。

洛伊接下来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即过去和现在被同步压缩在梦的象征符号之中，这在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和不同语言背景的人群中都是一样的。这与荣格的原初刺激论不谋而合。

托马斯·弗伦奇和埃里卡·弗洛姆

的东西。

私人关系曾经是也永远是最重要

福斯特

在1964年托马斯·弗伦奇和埃里卡·弗洛姆联合出版了他们的书《梦的解释》，在书中他们对梦理论进行了修订，强调了他们对人际关系的兴趣。他们的核心假设是，梦的首要功能是探询梦者私人生活中的人际关系问题，以及帮助找到解决这些困难的答案。这样，梦者在家庭生活或在工作环境中发生的最新冲突将在梦中出现，并由此唤起梦者过去尝试处理类似的问题的回忆。这些相关联的记忆就构成了

“梦的历史背景”。在显梦中出现的“认知结构”就揭示了历史

背景、冲突焦点,以及当前状况之间的联系。根据他们的观点,梦的解释的目的就是:找到存在于人的意识中的梦的“认知结构”,以便帮助梦者在真实生活中更加高效地找到解决人际关系问题的答案。这种在梦中找到途径的方法被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

蒙塔古·厄尔曼

也许我们在做梦时所保留的意识是人类得以生存的本能,它仅次于个人的人性居于第二位。

蒙塔古·厄尔曼是最初从阿瑟林斯基的理论中找到灵感的梦学家之一。后者发现迅速眼球运动的睡眠状态与做梦有必然联系,这一发现对于梦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革命性的贡献。他列举了弗洛伊德的关于做梦的两个基本假设,并把它们倒置:(1)梦的功能不是保护睡眠而是加强警戒;(2)梦并不是修订真实,把真实事件作细节描述,而是把自我意识中的真实场景变得更模糊。“梦在情感暗示方面的影

响是直接的,尽管非常微妙,它能把客观真相蒙上一层很难辨清的模糊因素。如果有什么东西起作用的话,梦更多是自我欺骗,而不是唤醒人生。这是因为,个人必须对威胁和困扰他的东西的本质有一个深入的解释,但这种解释通常与流行的和历史上的观点相混淆。”(1962)

与弗伦奇和弗洛姆相似,厄尔曼也强调梦的作用是把现时问题与过去的类似经验相联系:“梦内容的显著特征在于梦者能够把符号或表示隐喻的术语与现在的问题和过去的经验相联系,并调动所有的个人经历去解决它。在梦中人们能够更

准确地觉察到面临的问题以及自己的健康状况，并且立刻作出防御性的反应，而自己的知觉也可以被很快地唤起。”(1962)“在睡眠中，我们可以把自己看做是人类的一员，并把注意力转移到与群体的其他成员进行互相联络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我们发生人群成员间互相联络的问题时，我们就会做梦……如果这样的判断是真实的话，那么对于梦的必要性必然会产生激烈的争论。那样的话，对于梦的研究将会在我们文明进程中占据优先的地位，远远超过我们现在对梦的态度。”(泰勒引用，1992)厄尔曼走得比弗伦奇和弗洛姆更远，他比当时任何一位梦理论家都要超前。他把生物学的自适应功能与梦联系在一起考虑，寻找神经生理学证据支持他的论点。

弗里兹·佩里斯

物，每一个个体，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有一个惟一的与生俱来的目标，那就是实现自我价值。

弗里兹·佩里斯是葛施陶特医疗学校的创始人。他对梦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他强调在梦境中直接描述的所有人物和符号都是梦者个人精神状态的直接表达，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个观点被认为已经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弗洛伊德的本能还原理论，得到人们的广泛赞誉，但是它还是沿用了荣格所提出的主观解梦技术。佩里斯个人才能的充分发挥是建立在荣格和亚伯拉罕·马斯洛所进行的基础性工作之上的。

佩里斯所作的贡献在于，他采用角色扮演技术使梦中的

情形更多地被意识所感知。例如,如果你梦见自己驾驶一辆坏了的汽车爬坡,而坐在后座位上的一个女人不断地嘀嘀咕咕提出批评,佩里斯就会让你谈一谈你的想法,不仅从司机的角度,而且从乘客角度来说——这样你就能看到自己的各个方面。通过扮演这些角色,你就可以理解到底有什么东西影响你的生活。这其实是荣格的“活跃想像力”理论的另一种改编版本,但是它提供各种选项以便我们更容易利用和接受。当我们定期练习时,梦者就会不断加深对他们梦的理解,而没有必要花费很多来让分析专家解梦了。

梅达德·博斯

我能找到最有效的证据来证明梦者在梦中所遇到的动物、人和事完全是一种相互关系的模式,只有建立了这些关系梦者才能在梦中活动。一旦这些关系离开他,梦者就会惊醒。

像弗里兹·佩里斯一样,梅达德·博斯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他对于梦理论的原创贡献很少。他的主要成就是在解梦专家接受和分析梦的方式上。像荣格一样,他强调所有的心灵体验都是客观实在物,其中就包括做梦。他坚持认为意识参与到梦中去是这种体验的核心。因此,博斯坚持认为,心灵体验比单纯的解梦要重要得多。尽管很少有人同意他的

观点,博斯还是认为他的立场是必要的和正确的,这一点尤其适用于那些把梦的解释当做智力测验的分析家。如果梦有治疗作用,那么梦者就应该“拥有”他的梦,并且有必要把梦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心灵体验来接受它。这样的观点已经在荣格那里得到阐述,但是博斯更有力地促进了它的传播。

查尔斯·基考罗夫特

梦的清白。

许多精神分析学家都受过正宗的弗洛伊德式的训练,并以弗洛伊德的方式进行工作。他们还希望能够修正弗氏梦理论的不足。例如,艾里克·埃里克森(1954)就一直致力于这样做。他强调应该接受阿德勒的想法,把梦的显性内容定义为梦者生活方式的反映:“梦是梦者自我独特的时空观的反映,它体现了自我所蕴含的所有防卫、妥协和成就。”埃里卡·弗洛姆(1951)就更加同意梦具有创造象征符号的能力。为此他又引用了荣格的几乎被人们忘却的话:“我相信符号语言是我们每个人必须学习的一门外语。它能够帮助我们接触到智慧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我们的神话;它还能够帮助我们触摸自己个性更深层的东西。事实上,它还能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特有的体验,因为这一层面,无论从内容还是从风格来说,对于所有人都是共通的。”

根据我的观点,精神分析学的信徒们做了最多把梦从弗洛伊德还原主义教条中解放出来的工作。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就是查尔斯·基考罗夫特(1979)。下面是哲学家苏珊纳·朗格的实例。他的初始立场是“象征符号是人的头脑中一个自然的状态,而不是故意隐蔽含义进行自我防卫的手段”。在他的书《无辜的梦》中,他进一步把梦定义为睡眠期间具有想像力的活动——“想像力使我们记得过去发生过的事,正视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猜测可能或永远不可能发生的事,以及用一系列形象来描述任何别的东西,即:隐喻的运用。”

基考罗夫特与弗洛伊德学派的其他创新者进行了合作。这使他深受荣格的影响,有证据表明他接受了“梦显示了某些精神实体的存在”的观点,他认为这些精神实体更专注于整个人生和命运的发展,而不是自我意识中过一天算一天的短视想法。而自我意识也会偶然感到自我的存在是不完美的,甚至是错误的。

对于基考罗夫特来说,梦是无辜的,因为它们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事件的性质”。梦的思维本身无法对梦的内容进行评判,它们对于自我意识中的欲望是没有抵御能力的。梦可以被看做是“一个自我向另一个自我传递的隐喻,或者说是一个智慧的我向一个意识的自我传递消息”。解释梦的艺术实质上在于对比喻的想像力:“释梦无非是采用某种方法找出两种看似无关的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基考罗夫特的主要论点就是,把梦中情境看做是细碎之物的组合,但是通过梦者在片刻之间的想像,可以把这些破碎的东西再编织起来,并在织物中混进自己的记忆、展望、心愿和恐惧。这个判断与现代神经科学的理解完全一致。因此这是一个心理学的卓见与科学的证据完美结合的例子,它与没有根据的凭空猜测完全不同。

詹姆斯·希尔曼

「灵魂之谷」。

告诉世界你想要进入

约翰·基茨

基考罗夫特的关于梦是清白的概念(即:梦是自主行为,没有罪恶感,不受个人欲望的玷污)从1920年起,就在荣格学派里得到广泛认同,而且没有一个学者能比詹姆斯·希尔曼(1975)更清晰的对此进行全面阐述。他把梦看做是心灵的实体

模型：“梦把灵魂从生命中剥离开来，并反映给梦者，但是梦者却很少对梦本身予以关注。因为他们主要关注的不是生活而是想像。”

希尔曼借鉴了列维-施特劳斯关于“生的和煮过的”的说法——“生的”意味着纯天然，“煮过的”意味着人（以及他的文化）为加工过的事物。对于希尔曼来说，梦不是纯天然的东西，但它详细地描述了自然。梦的作用就是把白天接受到的信息片段进行摘要和归类（弗洛伊德所说的“目标化”）并且把它们改编成图象。梦还对白天世界的东西进行分解、消化和吸收：梦工作通过想像的方式（如象征、浓缩、构建等）把生活中的事件转变为心灵物质。“这个工作就是提取出生命物质并把它们变成灵魂，然后晚上又用新的物质哺育他。”（希尔曼，1979）“梦工作”（弗洛伊德用“Traumarbeit”一词）是想像力的工作，它能使自我的内心冲突得到解脱。“即便是最无力的梦也能使我们震惊，因为它本身就具艺术性，它涉猎广泛，充满奇思异想，并且精心选择细节。”

“灵魂制作”是希尔曼从浪漫诗中借鉴过来的词。威廉·布雷克在《瓦拉》中以及约翰·基茨在写给他兄弟的信中都提到：“如果你愿意就把这个世界叫做‘灵魂缔造之谷’吧。然后你就能发现世界的用途。”这个说法给希尔曼提供了一种哲学的视角：“人类的冒险经历实际上就是穿越世界之谷缔造灵魂的过程。我们的生活受心理因素影响，生命的目标就是要达到一种心态，使它能够沟通生命和灵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想像力必须从梦中脱颖而出，它是不可缺少的。“梦工作是一种同时进行的烹饪操作……把迥异的成分加工组合成新的美味食品。我们管这样的梦叫做象征。”

梦是一位营养大厨，他烹饪的材料就是灵魂，他的厨艺与我们对他的态度无关。“在梦的解释开始以前，梦就已经有意

识地进行工作，把每天白天获得的材料消化吸收变成心灵物质，然后又把个人行为及有关事件加入到梦幻之中……”结果我们就会饱尝一顿梦的大餐。希尔曼总是使自己的著作读起来充满刺激。然而不幸的是，他也是一位心理学激进分子，与梦的“唯物主义”解释沾不上关系。灵魂从来就没有被看做是大脑保持隐私的“附带现象”。“梦是灵魂所发明的，别具一格的本土形象。”这种对灵魂的坚定颂扬，以及对大脑作用的诋毁，在某些人看来，仍然具有循环诡辩的性质，因为既然梦对于灵魂的制造不可或缺，那么灵魂对于梦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希尔曼试图在这一点上努力为自己辩解。他宣称“深层次的心理学的传统是呆在家里用自己的理论基石进行构筑”，他断言弗洛伊德和荣格两个人都避免把解剖学、生物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和神学作为自己研究的基本前提。但是这并不全是真的；至少不是他所列举的前三个学科的名字。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弗洛伊德选择呆在家里，这是因为神经心理学并不能足够成功地开发出他需要的“科学心理学项目”。荣格像弗洛伊德一样，承认“红外线心灵”的穿透作用对于生物本能角色的进化意义非凡，因为“它会逐渐融入生物有机体中，并在体内进行化学物理作用”。(CW8)荣格把这种理论称为生物学模型，以便与人种学的“行为模式”相区别。他认为这个概念最适合“科学心理学”的范畴。(CW18)

在此，我将不会选择呆在家里。我要带领大家放弃自己心理上的地方主义思想和知识分子的畏难情绪。这将是一次回归过去之旅，这将是到西方传统心理学的地平线上去进行的探索，它会深入我们头脑中最古老的区域。只有那时，我们才能够对我们的梦有足够广阔的认识，了解它所揭示的构造我们心灵的原始世界。

结论

结论就是我们感到疲倦并且想休息的那一时刻想到的名字。

阿瑟·布洛奇

从罗马时代起，理性的受过教育的人们就对梦采取了轻蔑的态度。但在上个世纪，这一观点已经被改变。这主要是由于弗洛伊德和其他知识分子著书立说对梦进行科学的解释造成的。荣格和其他人更进一步探索了梦的迷雾，这其中涉及到与弗洛伊德理论不同的含混观点，两派学者相互间进行了辩论和斗争；尽管梦的研究是一门内向的科学，弗洛伊德还是给他的研究伙伴提供了一笔外在的财富，或者毋

宁说是一种顽固的教条，禁锢着其他学者构成他们自己的观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非精神分析学派的学者从弗洛伊德的发现中收获最多。弗洛伊德和他大量的追随者事实上试图对原来的梦理论进行修正。根据他们自己的观点，他们成功了。但是在非弗洛伊德学派人的眼里，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变化。（我把知识渊博的基考罗夫特、温尼科特以及包尔比排除在外，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对精神分析学进行革命性的修订，以便使精神分析学能够长期发扬光大。）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那样，现在新弗洛伊德学派的力量正在崛起，他们把以前弗氏关于梦的“显性”理论给予更大的尊重和推崇，并自我赋予了新的含义。但是以前关于梦的“显性”和“隐含”内容的分野仍然盛行，新弗洛伊德学派仍然相信梦的愿望满足功能。其实，在美洲，传统型的精神分析学者仍然激烈地反对那些修订弗氏

理论的企图；而在欧洲，大部分同行们则声称对自我心理学和对象关系理论感兴趣。

这些争吵随着弗洛伊德学派对梦研究的兴趣减弱而逐渐淡化。到1937年，埃拉·夫里曼·沙佩注意到了精神分析已经偏离了梦的解释。正如萨哈·弗兰德（1993）所宣称的那样，这个学派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研究的焦点已经改为对对象关系的把握，相信潜意识的幻想可以通过每日生活来得到抒发。这样只要分析梦与现实的转化过程就可以了（例如，现实与梦中的症状、讲话和手势之间的转化等）。同时，作为结果，“当代（精神分析学派）分析的焦点也被强烈地建立在梦者身上，而不是梦本身。”（弗兰德）

当代的荣格分析学派则有很大不同。他们的焦点仍然集中在梦上，仍然关注梦对于梦者来说的意义（尽管一些荣格派的学者，特别是那些“发展学派”的成员，已经使他们向新弗洛伊德主义摇摆，从以前的分析梦变为分析梦关系）。梦一方面仍然被精神分析学的信徒们给予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被广泛认为是“一种启示性的东西，显示了分析学者与病人在精神分析过程中建立的对象关系。”梦当然可以反映这些关系，但是在我看来，这些关系利益交错，内部相互牵制，无法反映梦给我们提供的财富的全貌。弗洛伊德派学者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梦的研究，这更加证明了弗洛伊德理论无法解释梦的各种现象，而不是梦过程本身没有意义。

然而，如果我们超越传统型的精神分析教条和争吵，前途还是光明的。快速眼球运动睡眠的发现、神经科学研究技术的应用、一个世纪实践和经验的累积以及生物学发展的广阔前景都给我们带来了亮点。我们现在可以更客观、更深入地探索知觉的意思和梦的重要性，而不是落入人类意识的老套。

4 梦科学

无论持何种哲学观点，我都能
猜测在天堂里有比我梦见的更多东
西。

J. B. S. 霍尔丹

1845年，现代生理学的创始人约翰尼斯·米勒（1802—1858）的四个出众的学生，签署了一个著名的“反活力论协议”。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讽刺意义和悲剧意义的约定，因为它致使他们著名的老师自杀。米勒既是一名活力论者又是一位本色的哲学家。他在整个后半生都严重的意志消沉，他在56岁时终于自杀。像所有的活力论者一样，他相信所有生命有机体都由一种活力激发，而这种活力是不能被科学手段测量的。他的学生们坦率地拒绝了这个想法，并且签署协议表示反对。同时他们还宣布最近一段时期在生理学研究中取得迅速进展，这将最终导致梦科学的建立。

类似米勒和他学生之间的冲突在历史上很普遍，为此利昂·道代特用一个特别的词专门作了描述：“争斗（invidia）”。我们中最古老的倾向，看起来正在把我们赶到相互敌对的群体之中——这样导致典型社会群体的重新分化和组合。一个逃避不了的真相就是，当一个人加入某一群体时，他就成为“圈内人”，而不属于这个小团体的人则成为“圈外人”。圈内集团的成员被要求忠诚和有归属感，而圈外集团则

遭到敌视和怀疑。国家之间的战争，政党之间的斗争加上对立的学科、艺术和心理分析的派别之间的争斗，都反映了这种趋势。梦科学也不能幸免。

自从亚里士多德拒绝了梦是上帝送来的预兆的想法后，圆梦学就陷入各种冲突之中。在现代，活力论和唯物主义论之间的冲突一直进行。此外还有唯心论和副现象论、先天论和经验论、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学之间的较量。而在历史上，弗洛伊德学派和荣格学派也是两个有极端对立观点的例子。最长、最具决定性的冲突发生在那些相信梦是有意义的心灵通讯手段者，以及那些把梦看做是头脑代谢的废物的一派人之间。艺术家、作家、诗人和分析家都趋于第一范畴，行为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以及睡眠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则属于第二阵营。而在我的梦中，后者的群体被描述为“穿白大褂的人”。正如弗洛伊德在上个世纪末写道：“梦经常被拿来作比较，就像一个对音乐一无所知的人用自己的十根手指抚摸钢琴键一样……”这个直观而简单的比喻通常表明梦是一种真正的科学。在这个角度上看，梦是一种完整的东西，完全不可能拆开进行解释，因为不懂音乐的十根手指如何能够产生出一段音乐呢？
(1976)

这种唯物主义的反心理学的态度在当时一直很有市场，并一直坚持到了今天。典型的例子就是今天用电脑对人脑进行的模拟分析。例如，1977年，J. 艾伦·霍布森和他哈佛大学同事罗伯特·姆萨利就提出了一整套梦的神经心理学理论。他们把它称为“激活合成”假说。根据这个理论，梦是被“梦状态发生器”创建的，当大脑进入到快速眼球运动睡眠期时，前脑就会受到脑干发出的持续随机的误导合成信息的“轰炸”。梦是大脑把冗余信息排除后在脑皮层所留下的一些感官信号。“换句话说，脑干给前脑送来许多杂乱无章的信号，前脑则

把这些只是偶尔有关联的信息进行重新剪辑……而处于做梦睡眠状态的大脑,则像一台电脑那样凭借关键词搜索地址。”这样根据他们的观点,梦最终变成无意义的、随机发生的、自生自灭的信号集合,在睡眠中刺激着人的中央神经系统。但是问题是梦是否能够具有实际意义。

另一种计算机的模拟对比由英国心理学家克里斯托弗·埃万斯在他的书《晚间风景:我们因何、如何做梦?》中提出。他认为,梦是大脑计算机的“离线”时段,在此期间,它把过去一天获得的信息进行处理,并为应付明天预计要处理的信息进行“程序更新”。在1983年,弗朗西斯·克里克和格莱姆·米奇逊提出他们的“逆向学习”的梦理论,也就是,做梦仅仅是一个倾倒入余信息的过程。“大脑由于不断产生信息点的连接和经验的累积与修改而发生成长”现象,即在自己(皮层)系统上沉淀出杂质,而做梦就是一种杂质的清除工作。这一过程在快速眼球运动睡眠期间发生,他们断言:这一活跃的过程,泛泛地说,是一种反向的学习。我们把它叫做“逆向学习”或“反记忆”。换句话说:“我们做梦是为了忘记。”

克里克和米奇逊的假设受到了广泛关注,人们可能想到这一定是一个惊人的发现,但是如果他这么想他就错了。早在1880年,一个很类似的想法就被罗伯特提出,他把梦描述为“一个排泄的过程”。“一个人如果被剥夺了梦,”罗伯特写道,“他就会变得精神错乱。因为头脑中未完成的设想、未使用的想法和外界的各种印象将在他的大脑积累,直至使他的脑窒息,这样任何新的东西都无法进入他的脑部,他会丧失思考能力。”这个观点,如弗洛伊德所评价的那样,把梦贬低到了一种食腐动物的低级阶段。

类似的,两个反活力论协议签订人赫尔曼·冯·赫姆霍尔兹(1821—1894)、欧内斯特·布鲁克(1819—1891),都是坚

定的经验主义者,坚持认为在研究梦时,生理学分析应该超过心理学分析而放在首位。布鲁克的影响,在我们看来,促使弗洛伊德对自己的项目进行审视。因为他一直喜欢用意义导向的心理学手段对梦进行分析。麻烦的是研究人员由于都有自己的研究思路,因此对于采取其他方法的人采取敌视的态度。他们忘记了他们的方式只是盲人摸象,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摸到了全部,但实际上不过是鼻子、脚或尾巴而已,他们远远没有抓住全部。弗洛伊德显然也不能避俗。

因此,在黑暗中摸索更可取的就是对做梦采取神圣的态度,启用圣经注解学(解释性)和科学(试验性)的方法进行互补研究,以达到兼容各自优点的目的。当代最好的梦研究学者,例如J. 艾伦·霍布森等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没有采取纯粹生理学的角度研究问题。正如在后面章节中所提到的,霍布森持有这样的观点,即梦如果没有心理意义就不能被称之为梦。“我与弗洛伊德不同,我认为多数梦不是晦涩的或被删改的,它们更像是透明的和未经编辑的东西。”霍布森宣称,“它们能够清楚地和未加掩饰地表明意思,只不过那些包含高度冲突主题的梦经常会被梦者(和解梦者)所注意罢了。我赞同荣格提到的梦是透明的和有意义的观点,而不支持梦可明确区分为显性层面和隐性层面的说法。”(1988)霍布森甚至提到他赞同马来西亚新诺人每天早上讨论他们的梦,并以此作为最近行动指南的做法。“像新诺人那样,”霍布森说,“我把梦看做显示我内部状态的坐标,并把它列入我的日常评价中。”这也是荣格和弗洛伊德决裂后每日所作的例行训练。

另外一位重要的梦研究人员,科雷特曼的学生威廉·C. 迪门特,即“快速眼球运动睡眠”一词的发明人,也欣赏梦有丰富的含义,能带来巨大的变革力量的观点。他的其中一个梦展示如下:

一些年以前我是一个严重的吸烟者——一天要吸两包。然后,我在一天晚上出奇地做了一个活灵活现的梦,梦见我患了肺癌。我记得好像昨天我进行了胸部 X 光检查,看到那里有不祥的阴影,并且认识到整个右肺都被癌细胞充满了。一个同事随后又给我做了进一步的身体检查,在我的腋下和腹股沟处的淋巴结都检查出癌细胞扩散的迹象。最后,我终于知道自己的生命行将结束,并且会遭受不可思议的痛苦。我将永远看不到孩子的长大。如果我事先听到他们说吸烟会致癌时,我会戒掉香烟,这样的事也就不会发生。我决不会忘记当我从梦中醒来时的感受,吃惊、快乐、如释重负。我感到自己获得了再生。毋用说,这样的体验已经足够劝导我立即停止抽烟的习惯了。这个梦预感到将要出现的问题,并且以梦自己的方式为我找到了解决办法。

仅有梦能允许我们以身临其境的方式经历未来的选择。并且由此给我们的智慧以启迪。(引自拉伯格,1985)

这是梦能传达给梦者至高无上智慧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同时梦能针对梦者的一些潜在的自我毁坏行为施加影响。把梦仅分解成为“激活合成”或“逆向学习”不但是不够的,而且还是一种辱没。我们也不能忽视那些基于神经病学的理论,因为它们能向我们揭示梦是如何发展的,为什么会持续下去以及梦所具有的其他心理生物功能。

做梦的状态

全世界输家和弃儿，
聚集在苍白月光下，
看起来我们将永远，
改变和动摇这世界。

阿瑟·奥·绍格赫内西

20 世纪，在梦的研究领域出现的一个关键性的事件是 1953 年由尤金·阿塞琳斯基和纳撒尼尔·科雷特曼发现的快速眼球运动睡眠状态与做梦的关系。从表面上来看，它的发表再一次引起轰动，因为它远远不是一个原创性的发现。自从我们开始几千年的文明以来，到底有多少人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还是一个未知数。然而，据我们所知的一个事实

是，罗马诗人鲁克雷蒂斯于公元前 44 年就做到了这一点。在他当时完成的一本书《回归自然》中，他就描述到自己发现狗在睡觉时腿在颤动，因此得出结论说它正梦见追逐兔子。17 世纪，露西娅·芬坦阿也注意到了所有动物在睡着时都会周期性地转动它们的眼睛，她由此推断出这些运动与做梦存在着联系。而伟大的查尔斯·达尔文在《人的血缘》一书中写道：“狗、猫、马，或者可能是所有的高级动物，甚至是鸟，都会做生动的梦。并且这些梦被它们的运动和发出的声音所显示出来。我们必须承认他们是拥有一些想像力的。”（达尔文，1871）

学术纯净论者坚持认为我们无法知道动物是否能够做梦，以及它们梦见了什么。但是似乎全部事实都可以很合理地推断出快速眼球运动状态期间，它们事实上正在发生做梦行为。那些接受了正规心理学的训练的人大概都学习过关于动物知觉的“奥克姆剃刀”的课程（它强调我们要科学地安排，不

要做力不能及的事)。但是这个试验把人的心理与动物王国中其他成员区分开来,它给科学家提供了足够的防护手段,而理所当然地在动物身上进行一些令人震惊的试验。这是基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它们与我们不同”的理念,结果这种屠杀动物的暴行变得合乎伦理。正如哈里·T在他的一本书《梦的多样性》中睿智地指出的那样,“我们需要相应地考虑一下理论贫乏的困境,试着解释一下为什么有着光鲜的外表、举止怯弱(通过手术可以改变这种状况)、眼睛乱转的人类却不去体验(他们对待动物的做法)。我们和自己的宠物都有颤抖、呻吟、喊叫、性侵犯和其他类似的行为,而动物睡眠时还可以看到它们的手爪在迅速移动。只有满足了这个才被称为梦。”

从动物推导到人是一个简短的步骤,由《忧郁的解剖》的作者罗伯特·伯顿完成。他写道:“一条狗会梦见兔子,人也是这样,他们会梦见最想要的东西。”随后他补充道:“上帝不给我们发送梦,我们自己制造梦。”(麦肯齐,1965)如一条拉丁谚语所说的那样:狗梦见面包,渔夫梦见鱼。既然如此,为什么科雷特曼和阿瑟琳斯基就该把自己的观察工作作为研究的激励呢?答案是它开创了一个调查的崭新世界,一方面使器物性和客观性在研究中都能够得到体现,另一方面也协调了人体和头脑、知觉和潜意识之间的关系。而且正像我所希望的那样,澄清了物种发展史(物种的发展)和个体发展史(个体的发展)之间的关系。

另一古老的观察结果,后来又经脑电图(EEG)验证为正确的是印度人描述的三个状态:醒来、有梦睡眠以及无梦睡眠。我们现在常说的快速眼球运动睡眠与其他的精神物理学状态有很大不同。它典型的出现方式是脑压的降低;它是一种来自大脑皮层的不同步的电子活动模式。表现为眼球的迅速转动,同时,在某几组小肌肉内也发生零星的运动,而大型的

抗地心引力肌肉,如腿肌、背肌和颈肌也会发生不协调的痉挛现象。脉搏和呼吸也变得不规则,阴茎直立(这对弗洛伊德学说是个鼓励),血压、大脑温度升高以及新陈代谢加快。当接受实验者从这种梦中状态被唤醒时,他们通常有 70% - 90% 可以给出梦中所见的可信的报告。

快速眼球运动睡眠大约在整个晚上每过 90 分钟发生一次,并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从 5 分钟到 40 分钟不等。这种周期性的规律显示做梦并不依赖于外界的影响,并且有实验可以证实,无法通过施加外界刺激来诱导快速眼球运动的产生——这个发现与弗洛伊德的主张一致,即梦由梦者自己头脑中固有的激发程序创建,而不是来自外界刺激。

一个典型的晚间睡眠

睡眠由瞌睡状态开始,持续若干分钟,在此期间支离破碎的图象和戏剧的事件都可以鲜明地被感知。瞌睡状态后面是慢波(非快速眼球运动)睡眠。之所以这样叫是因为脑电图记录显示了频率下降和大振幅的脑波曲线,而同时眼球仍然是静止的。

这一背景下,慢波睡眠持续大约 90 分钟。然后第一轮快速眼球运动就开始了。脑电图记录的振幅和频率变得短小和不规则——非常像人醒着时所观察到的脑波。第一波快速眼球运动通常持续大约 10 分钟。而第二轮和第三轮快速眼球运动则持续时间更长,并且伴随有更短促的慢波睡眠状态。最后一次的快速眼球运动持续 20 至 30 分钟,然后通常就会醒来。如果一个梦能够被记起,那么它通常产生自快速眼球运动睡眠的最后阶段。所有的快速眼球运动占据每个晚上睡眠时间的 25%。如果有人对统计感兴趣,这就意味着一个 75 岁的人将至少花 50000 小时用于做梦。这等于 2000 天或 6 年。它可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活动。

最初研究结果发现,梦受快速眼球运动睡眠时间的限制,多数在慢波睡眠期间被唤醒的人都否认他们在做梦。然而,大卫·福尔凯斯在196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对这一观点提出充分的疑问。福尔凯斯在快速眼球运动和慢波睡眠期间弄醒他的病人,但是他没有问他们是否做梦,而是要求他们报告当前脑中有什么想法。根据试验,在慢波期间醒来后报告有精神活动的大约有20%—60%。福尔凯斯由此得出结论,快速眼球运动睡眠并不能令人信服的与做梦划上等号,因为在快速眼球运动状态之外,还有大量的精神活动存在。

然而,当报告把快速眼球运动和慢波睡眠醒来时的情况进行比较时,发现了本质上的不同。慢波睡眠报告中很少有“似梦”的活动,它们所经历的更像每日的思维,内容更加平凡和具有重复性。慢波时的想法很少与感官上的幻象联系起来,这与快速眼球运动睡眠期间典型的虚幻戏剧不同。如果精神活动真的发生在整个夜间睡眠中,那么在多数时间,睡觉者不是在做梦,而是在思考。总的来说,有证据表明大脑从没有全部处于休息之中,这与传统上对于睡眠的观点,以及弗洛伊德所坚持的梦是保卫睡眠状态的观点有显著不同。

梦生物学

荣格

比在有意识的清醒头脑下清楚得多。在梦中,灵魂用图象说话,并且把意思表达给直觉,这是人类本性的最原始层面。

如果睡眠和做梦不能够执行重要的生物学功能,那么这一定是自然界中最愚蠢的一种安排,是对时间的最大浪费。当一个动物睡着时,它不能保护自己,防备来自食肉动物的偷

袭,不能寻找食物,不能生儿育女,也不能保卫它的领土和它的幼仔。然而在1亿3000万年的时间里,不管生物进行了多么大的进化,睡眠始终坚持了下来。

每天24小时,所有的动物都显示出活动和休息的生理节奏。一些动物,例如猫头鹰、蝙蝠和啮齿类动物,采取昼伏夜出的生活方式;而其他动物,如类人猿、黑猩猩、狗等,则定位于白天做事晚上休息。睡眠在生物学里的优点是,它可以保存精力。同时,还可以强制自己在洞穴巢或家里等没有危险的地方保持静止。

非快速眼球运动睡眠出现于1亿8000万年以前,当时温血的哺乳动物从冷血的爬虫祖先演变出来,而快速眼球运动睡眠则在5000万年以后出现。在此之前,早期哺乳动物,如单孔目动物,通过产卵繁殖后代,这与爬行动物和鸟类相同。但是快速眼球运动睡眠出现的时间是哺乳动物从卵生进化为胎生时期(它们的后代直接出生自子宫,而不是下蛋孵卵)。为什么生物会按这种样子进化,首先是安静的非快速眼球运动睡眠,然后就是活跃多梦的新型睡眠?

最可能的解释是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的不同,后者胎生的幼仔需要更大的免疫系统和新陈代谢系统(以及学习的能力),而前者则不需要。冷血的爬行类动物白天在太阳底下就可以获得资源和能量,但是在晚上他们就无法使用这个优势了,因此他们此时特别容易受到攻击。而温血的哺乳动物,由于它们获得了恒定的体温,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可以使自己保持在防御状态。然而,支撑这一体系的哺乳动物必须在食物中获得更多的能量以便燃烧他们新陈代谢的锅炉。结果就是,有一个相当长的睡眠时间可以保存精力,对于他们的生存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做梦的睡眠又是怎么回事呢?这里的解释一定与胎生的后代会面临更大的危险有关。对于鸟类和蜥蜴类

来说,自己的卵对于保护下一代具有得天独厚的好处,但是对于哺乳动物的胎生幼仔来说,它们生下来则显得相对无助,在它们有能力独自生存前必须要经过学习和生长发育,特别是脑的发育。在我们看来,快速眼球运动睡眠是婴儿开发大脑、激活神经系统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因为它帮助构筑了基本的性格行为模式,如在母婴关系、探索环境和玩耍中所表现出的态度等。

当然,快速眼球运动睡眠出现在如此众多的物种和几百万年的进化史中,仅仅表明梦对于所有哺乳动物的生存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一认识刺激了对哺乳动物睡眠的研究,相信据此可以揭示梦的意义、目的和功能。

动物的梦

根据过去 40 年间积累的证据,只有最狂热的以人类为宇宙中心的行为主义者才否认动物会做梦。但是我们还问自己能否知道它们到底梦见了什么?答案是我们能够,而且我们当然要去找。这些证据来自于直接观察未经触动并且未经过任何手术的动物在快速眼球运动期间的行为,并根据脑电图的数据推断出在野生状态下醒来的动物为了维持生存所经历的脑活动。在收集资料方面,莱昂大学的米歇尔·焦韦特和洛克菲勒大学的乔纳森·温森成果最为显著。

焦韦特有两个重要的发现:(1)梦的形成来自于古生物学中脑的活动;(2)当大脑中心不能在睡眠中继续抑制思维活动时,动物和人就会从梦中醒来。例如,做梦的猫(它的在快速眼球运动睡眠期间负责抑制运动的下行神经纤维被切除)就会在它们的睡眠中“起床”,并且“挺起来”,做捕获猎物状,“猛扑”,“杀死”和“吃”猎物。

温森的研究兴趣首先被集中在快速眼球运动睡眠和记忆之间的关系上。用于储藏记忆的神经元排列在一种被称为“隆

起”的枝干系统上(“隆起”这个词在希腊语里是“海马”之意),并通过新皮质与大脑相连接。1954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约翰·D. 格林和阿诺德·A. 奥杜尼在洛杉矶对敏捷的兔子进行了研究,记录下它的“隆起”所发出的每秒6周期的常规信号。他们给这种信号命名为 θ 节奏。

对其他醒着的动物的更深入地观察,包括树鼯、鼯鼠、老鼠和猫等,都检测出 θ 节奏的变化,这对于它们的生存至关重要。因此,在猫的掠食,兔子的寻食,以及老鼠的摸索等行为都与 θ 节奏息息相关,并且这些活动都分别是它们生存最重要的技能。例如,一只饥饿的老鼠总是要在它决定停下来吃眼前的食物时进行一些预备性的试探。

在1969年,这些观察结果被收录进西安大略大学凯斯·H. 万德伍夫的一份报告内。他在报告中指出,只有一种行为在所有动物的“隆起 θ 节奏”中都可以找到踪影,那就是快速眼球运动睡眠。

很显然, θ 节奏与做梦、记忆储存和重大生存行为等有直接关系,因此这使温森得出一个特别重要的结论——也就是说,“ θ 节奏”反映了一个神经加工的过程,为物种的存活提供了关键的信息——在白天,收集信息;在夜间,通过快速眼球运动睡眠把信息存入记忆。(温森,1990)

总体来说,温森的观点得到积极的认同,因为它是建立在可信的数据之上的。梦被广泛认为是动物更新它们生存策略的一种手段。在梦中,动物可以把它们最新的体验与过去的经验教训相结合,对其生存策略进行新的评估。这个过程在动物睡着时才进行。原因就是只有在睡眠时大脑才会有空闲开始考虑一些虽然至关重要,却不能全神贯注进行思考或进行实践的事情——这就像银行职员在储户都离开后,关上大门数钞票一样。

大脑结构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被认为是处理和存储记忆的海马状隆起,它位于大脑两侧的脑叶上。另外,海马状隆起、视丘下部和丘脑都是大脑枝状系统的组成部分,负责情感体验和记忆存储。海马状隆起收到的信息来自于大脑皮质,通过有色带环绕的脑回部进行接收。信息再从海马状隆起出发,穿过视丘下部穹隆的管道到达脑丘,再返回正面的脑叶。

海马状隆起对于短期记忆是不可缺少的。在阿尔茨海默氏病中,海马状隆起遭到破坏,这样会导致病人的记忆发生间歇性障碍。然而,至少在疾病初起阶段,他们的长期记忆仍然是完好的。这些病人不能告诉你他们什么时候吃的午餐,但是他们在唱圣歌时却没有困难,他们还会记得过去上学时的详细资料,以及童年的往事。对于海马状隆起损害的病人的具体研究(不包括阿尔茨海默氏病的其他形式)表明,一段短期记忆大约需经过3年时间才可被“锻造”成为有效的长期记忆。这样,饱受海马状隆起损坏折磨的病人将丢失过去3年间的记忆,但是却可以记得在那之前发生的事情。而一旦成为长期记忆,就很难丢失了。

短期记忆转变成长期记忆的关键过程仍然不很明了。然而,越来越多的可能性指向了做梦——温森把梦称为神经之门,活跃的“化学神经传递素”通过梦被确认或拒绝进入大脑的特定区域。海马状隆起就是这样一个区域。当某一动物醒着时,保护海马状隆起的神经门保持关闭。当动物入睡时,门就被打开,允许适当的神经传递素通过枝状系统到达脑的其他部分。在快速眼球运动睡眠发生时,所有的门大大敞开,θ节奏也出现了。温森相信低等的哺乳动物也适用于高等的灵长目动物,包括人类:“梦可以反映一种从低等物种继承下来的记忆加工机制,在快速眼球运动睡眠期间这些信息对于动物的生存至关重要。这类信息可以构成潜意识的核心。”做梦与

记忆的联系显然在人类和动物试验中都有所体现：快速眼球运动睡眠会减弱人们记忆日常事务的能力。

为了使短期记忆转变成长期记忆，必须要把被梦到的东西放进记忆循环中3年以上。动物研究表明，在这个过程中，神经元和神经键的结合处都必须构筑成一个封闭的回路，以便各部分都能够进行沟通，这就像在树林中践踏出一条小径一样。因此要想记忆持久，必须要“践踏”出一条枝状线路，并使关键词保存在大脑新皮质的存储器中。

对于它所拥有的几十亿个脑细胞来说，大脑皮质的容量有限，如果所有的事件和经验都被放在上面，成为长期记忆的永久记录的话，大脑就要比现在大许多。温森推测，这样的大脑会很大，以至于我们必需要用独轮车才能装下。因此，我们必须进行一些排序和筛选工作，从有意义的东西中选出重要的和“需要记住”的信息，抛弃没有意义的东西。梦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起作用吗？克里克和米奇逊并不是惟一的研究人员，尽管很多作者强调梦的丢弃和“忘却”方面，而非选择梦的帮助记忆方面。事实上，大多数梦研究人员都认识到梦在个人记忆筛选和保存方面的重要作用。关键的问题就是，基于什么样的标准来选定内容：对于哺乳动物来说，决定一个日常生活经验转变成永久记忆的依据是什么？温森的答案是，对于物种来说，有一种集体“族群记忆”可以作为依据。换句话说，做梦是一个有选择性的处理装置，它有一套持久的标准和评估体系，以此来检索最近的回忆。这些回忆记录被存放在中央神经系统内，并且在几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不遗余力地完善。这样就会提供出一套不可缺少的规则，来决定对于许多既定物种来说什么有意义，什么没意义。

为了支持自己关于脑的大小、记忆储存和梦的功能等论点，温森引用了一个目前还存在的最后的单孔目动物食蚁兽

作为实例。食蚁兽又叫针鼹,是一种下蛋的哺乳动物,大约在爬行动物盛行的 1800 万年前就存在了。以我们的观点来看,关于食蚁兽最重要的事实是,尽管它是一种小动物,它还是有一个相对来说大很多的大脑皮质(事实上,和我们的一样大),而且,它不会出现快速眼球运动睡眠。既然它不做梦,针鼹就需要有更大的大脑皮质来保存和收集根据毕生经验总结出来的各种信息。

梦境健忘症

卫。
「我有用来忘记的强大记忆力,大
罗伯特·路易斯·斯泰文森

一个有趣的矛盾观点需要被指出:如果梦是如此的重要,如果它们与记忆存储关系如此密切,为什么大多数人记不住呢?有两种可能性:

(1) 如果克里克和米奇逊的“逆向式学习”模型是正确的,那么对梦的回忆将是遏制性的,因为我们应该记得梦里被设计来让我们忘记的情节。然而,赞成这个假设的很少。尝试记住他们的梦的人们并没有经历预想的精神损害。相反,他们似乎受益于此。

(2) 既然我们必须学习区分梦境发生和现实发生的区别,可能是天性方便地决定了梦境往往要被人们忘记。这将保护那些无法掌握这种鉴别力的生物——也就是,动物和小孩。举个例子,如果一只兔子连续几个晚上梦见一群猎犬包围它的洞穴在外面等着它,并且兔子醒来后依然认为那是现实,那么它可能会因为不敢出去觅食而饿死。因此,对兔子来说,忘记它的梦同时提高对梦带来的警戒将是最好不过的

了。既然梦是有着很长进化历史的古老的适应机制,那么在这种机制内部产生梦境健忘症就不难以置信了。

人类与哺乳动物有着相似的忘记梦境的理由,因为梦在我们和哺乳动物身上发挥着相同的作用。如果一只动物记住了它的梦,并且表现得好像梦境是真实的,这将粉碎梦的全部意图,因为动物的行为将不仅不会更具有适应性,反而会更少,并且它的行为将可能导致被怀疑为精神病。人类是不会因为记得梦境导致被怀疑为精神病的,毕竟人类具有区分梦境和现实的能力。因此,第二种理论的可能性更具有说服力。

大脑原型优先权

解。得的对人类的灵魂发展和结构的理

荣格

我们希望获得如同解剖人体所获

首先关于人类大脑要说明的是它是一个具有层次的系统:这是它的体系结构,它的进化,它的庞大的功能复杂性的反映。整个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两个巨大的由大脑皮质覆盖的大脑半球,它们占有大脑大约 200 亿个神经元细胞中的 75% 以上。在这些相对新的附属物后面,存在着大脑的较老部分,那些部分依然具有功能上的完整性。这些新旧成分在许多年以前被詹姆士·

奥尔兹(1922—1976)分别称为“热”和“冷”的大脑。“热”脑是指大脑中央部位,在很多方面被定义为弗洛伊德学派的“身份证”:它似乎是与“愉悦原则”相一致,其中充斥着冲动、不谨慎和无耻的欲望。“热”脑想要有它自己的方式,并且它现在就想要。另一方面,“冷”脑,或者叫大脑皮质,更有理性和更容易受

社会条件所影响：和弗洛伊德的“本体原则”相似，它使热脑的激情与环境相互调节，引起它们注意外部需求的局限性。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神经科学家保罗·麦克莱恩提出一个远比詹姆士·奥尔兹更为复杂，经验上更有成效的看法，他认为大脑不是一个联合体，而是三脑合一，每个都有其独特的系统历史，都有“它特殊的智能，它特殊的记忆，它的时空感，和它的马达功能”。(麦克莱恩, 19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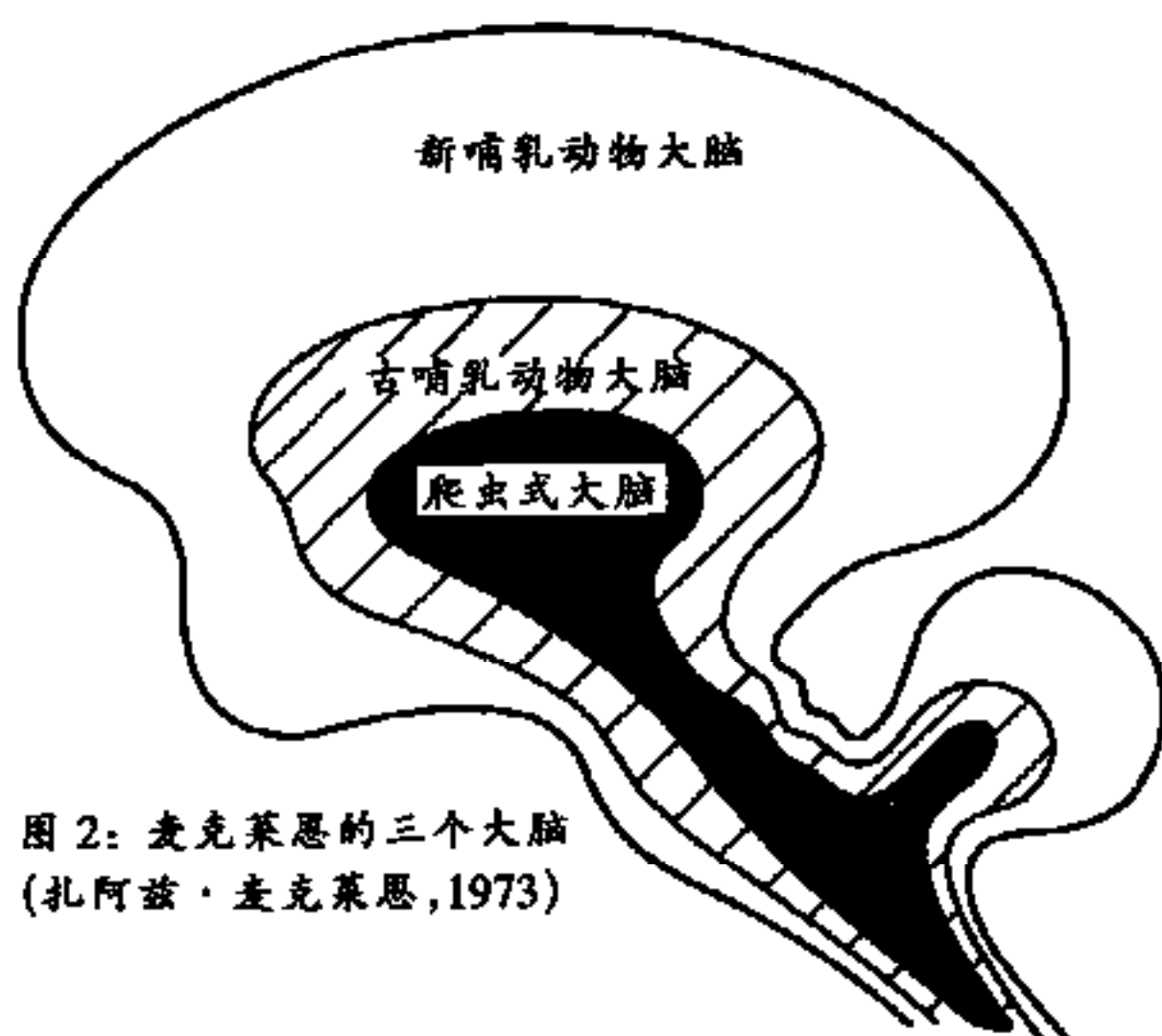


图 2：麦克莱恩的三个大脑
(扎阿兹·麦克莱恩, 1973)

麦克莱恩的著名的三个大脑的图表综合起来组成了他所称为的“三位一体”。另一位美国的神经科学家，洛杉矶的吉姆·亨里，认为主导的左大脑半球代表了一种区别于我们物种的第四种和最新的系统。

为了保持与这些意见一致，大脑的演变可能经历了四个阶段：

1. 爬虫式大脑

这是大脑的主干，脊髓的向上生长，大脑最原始的部分。

我们与所有脊椎动物都拥有这种结构，它在进化历程中保持不变。它包含对生命的维系极其重要的原子核，例如那些控制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的核子。另外，爬虫般的大脑包含网状活动系统，它负责警戒以及意识的维系，以及快速眼球运动睡眠的启动。成百上千万的神经元反射经由这里传播到前脑以及被知道与记忆巩固和做梦相关的海马状隆起结构。此外，当它们把注意力放在环境中的新鲜刺激上，并且停止了所有物理运动时，网状活动系统会引起所有脊椎动物都可显示出来的定向反应。

由爬虫式大脑情感代表的早期发展阶段并没有出现，也没有对未来或者过去事件的认知评价。在这个层面上，各种行为和反应大部分被本能所支配，因此看起来相当的主动。典型例子就是在领土的获得和防御中体现的爬虫行为，以及面临竞争威胁时的表现等。这在它们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得到证明。如同贝利(1987)所述：“我们的推动力，是身体内部的主观感受，是幻想、思维等的复合体（也就是爬虫般大脑）。爬虫式大脑为人类行为提供大部分的自动的、强迫的动力。在那里，自由被搁置，人们必须做不得不做的事情，不管他们的自我如何痛恨，充满偏见，冲动，也无济于事。”

2. 古哺乳动物大脑

这是由众所周知的中央大脑的亚皮质结构组成的。我们认为，这里面最重要的成分是边缘系统，不仅包括海马和丘脑，而且也包括垂体腺（控制人体所有的内分泌腺的活动）。边缘系统是一种优越的自我平衡机制：它不仅维持荷尔蒙水平的敏感控制而且平衡饥饿和饱满，性欲和满足，干渴和饱饮，睡眠和觉醒。如同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它在记忆存储中扮演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

通过这个进化的进程，害怕和愤怒等主要的情感出现了，

包括那些爱和配属,以及与之相关的追逐、搏斗、结合、交配行为性反应模式。意识更加显而易见,行为则更少地受到本能的支配。边缘系统,深深地包含于这些情感和行为之中,包括最陈旧和最原始的大脑皮质——所谓的古皮质。

在所有的哺乳动物包括人中,中央大脑是最复杂的结构,控制基本的心理—物理的反应和对环境的态度。一个被剥掉大脑皮质的动物,依然能感觉到关于吃,喝,避免痛苦的刺激的方式,但是它失去了认识事物意义的能力:比如,它会注意到天敌的存在,但是无法意识到对它的威胁。因此,精确的意义需要大脑半球的存在。中央大脑就这样紧密地与实现幸存和适应的所有基本行为模式联系在一起。

3. 新哺乳动物大脑

这是新皮质。它与作为本能的情感的行为反面的认知的和复杂的感性过程相关。

4. 人类大脑

通过人类大脑,两个大脑半球之间的侧面化进程功能产生了,与此同时,支配性的左大脑半球的发展与理性经验性的思维,以及语言和言语的运用相关。结合神经心理学和动物行为学这两门学科,把强烈的研究兴趣的焦点转移到中央大脑——作为促进物种行为模式的区域。麦克莱恩(1975)特别地指出:这些基本行为,如对母亲的依附,求爱和性爱行为,加上随之一起的情感,都是依赖于中央大脑的神经系统尤其是边缘系统的活化作用。麦克莱恩的结论大部分出自对动物的研究,但是弗洛-亨利(1976)的著作以及舒瓦茨(1975)等指出它们是不适于人类的。这些研究人员指出:个人情感的反应依靠连接边缘系统和腔壁及前右脑皮质区域的神经路径。而且,这一整个复杂的右大脑半球/边缘情感系统似乎是在左前皮质控制之下的,暗示了“冷”的主导半球发挥着压抑及约束

“热”古哺乳动物大脑情感活动的作用。

因此，当荣格猜想集体无意识的原型系统是否能够被给予一个本地的住所及名称以及必须拥有神经底层时，答案是肯定的。当然是不可能指明原型的任何精确的神经病学的位置的。包含了原型官能的中央大脑结构拥有一套极其复杂并且广泛分支的神经学基础，包括在大脑主干和边缘系统的成百上千万的神经元(本能或原型的生物学的作用)以及两个大脑半球(精神作用)。

梦中的原型优先权

我们期望在梦中寻见曾经在人类的生活上显示意义的任何事情。

荣格

有趣的是，大脑的层次结构也在它构建行为模式的方式中反映出来，这种行为模式是从动物行为论者称为固定的行为中产生的：这些是老套的马达顺序，生存和繁殖所必需的行为的构建基石，而且他们在典型梦境顺序和行为模式方面同等明显。例如，防御的行为，如躲避威胁的逃跑，在经典追逐梦中是很明显的，同理，攻击行为的梦出现在身体搏斗的梦中，欲望行为的梦出现在坦率的性欲梦中。四个基

本的固定动作是喂食、搏斗、逃跑还有通奸。如果快速眼球运动确实是一种“基因决定行为的预演”，则梦的重要意义是它们能够使动物适当地反应觅食、攻击或性机会，即使是在现实中遭遇味觉的、威胁的以及性爱的刺激以前；行为的神经中枢程序必须在任何实际行为被要求之前到位。

在艾伦·霍布森的《多梦的大脑》中，他维持这对于哺乳

动物和人类都是真理的观点。“既然行为的任何形式都是一种反射行为的复杂顺序，这一组织和前一水平的组织之间的差别仅仅是度的问题。即使是充分发展人性动物，当行为(或多或少)在自愿控制下时，特别的行为有固定的行为的特制，一旦足够就被触发。”他得出结论：“我们的梦清楚地告诉我们针对这些”本能“行为的全部剧目确实在中央神经系统以内被表现。梦的经验的非凡可塑性包括重要行为过度表示：害怕，侵略，防御，攻击；回避冲突；还有性。在我们的心理经验的水平，我们可以查找全部剧目的证据。”

霍布森的结论与 Hall 和 Nordby 的卷入了侵略，被追逐，性和其他的普遍发生在典型梦中的示例是一致的。那个种族遗传的古老结构在人的梦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些梦可能是从对大学生们报道的普通的梦演绎得出的，在梦里经常会出现下列主题（按出现的频率顺序排列）：下降，被追逐或攻击，重复尝试实现某任务，学习经历，性。（Sagan, 1977）

所有的这些类型的梦，除了那些与学术工作有关的，有相当明显的种系链接。举个例子，某动物在它的进化的早期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呆在树上，并不奇怪它应该梦见焦虑或掉落经历。同样，被追逐或被攻击的噩梦将可能发生在一个原来遭遇过猎捕、搏斗或优势竞争的物种上。而且，对付环境主要变化的重要必需品，获得自然的技能，执行宗教和社会仪式，都需要重复学习和尝试执行这样的任务。最后，性行为对物种生存的贡献是无须评价的。

两个基本的典型模式：对天使微笑和皱眉头

人们做过许多以事件的类型区分梦的尝试，特别是发生

在梦中的社会事件。这些分类的努力通常是最后得到一串长的列表,其中很难认出任何统一的或连贯的线索。然而,有两个主要的对比的行为反应模式组,二者有增加的一致性——一方面是一些与粘连附和有关的行为,另一方面是一些与冲突和优势竞争有关的行为。似乎,像其他灵长类一样——所有的另外的哺乳动物——我们既联合又敌对,我们既想要附属物又想要地位(也就是,从本质上讲我们既是弗洛伊德的,又是阿德勒的),如伯明翰社会系统研究所的迈克尔·钱斯所示。钱斯描述了两种不同并且相对的社会系统,他分别称为享乐主义和无偏差主义的模式。享乐主义模式被刻画为提供相互支持的群体的联合行为。无偏差主义模式典型地发生在有层次的组织的群体,成员在此都关心自己的地位与对威胁的防卫。

为了证实钱斯的两个基本典型模式的定义,跨文化的证据显示某个面部表情在享乐主义和无偏差主义的模式的关系中涉及,例如微笑、皱眉头、轻视。我们认为,这些行为为什么吸引人是因为它们的早期本体论的发展似乎与快速眼球运动的状态联系起来了。这样,快速眼球运动状态下的微笑,有时就是指“向天使微笑”,在社会发展觉醒中微笑最先出现在人类婴儿身上。同样,通常与愤怒、困惑、轻视联系的复杂的表情也首先在快速眼球运动状态中出现。换句话说,这些行为预演并且预感到几星期以后在觉醒中出现的那些社会能力。正是这些调查结果导致米歇尔·焦韦特(1967)得出快速眼球运动状态在种类特定本能行为的成熟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结论。我们将在第六章看到,在生存的基本能力发展过程中,在做梦和玩耍之间同样会有一个很有益的相互联系。

童年早期典型的梦

父母们不知道他们的娇嫩宝贝在做什么，当他们在黑暗中睡觉时。
查尔斯·兰姆

下面出现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如果胎儿和不满一个月的婴儿大部分时间都在做梦，那他们到底能梦见什么呢？大概，在荣格的术语里，他们梦见的全是些原始的东西。随着大脑的开发，基本思维能力已经初具形态。这种假设的证据来自于小孩子们的梦，在实验中发现他们的梦充满了原始形态的暗示。比如说，一份报告说有一个小孩“有另外一个爸爸”。然后他又转过去对他的爸爸说：“那个爸爸比

你高。”我也想起我小时候的一个梦，醒来后我当着刚出公差回来的爸爸的面跟我妈妈说，我有另外一个爸爸！在荣格的观点里，所有的孩子都有“另外一个爸爸”——原始的爸爸，它形成孩子基础的爸爸的意象，由原始的父亲和个性的父亲所浓缩而成的一幅图景。确实，荣格确信梦有一个原始的基础来自于他早期意识到他童年的梦有一些超自我的因素，那绝对不会来自于他自己的经历。通常来说，儿童对于黑暗、陌生人和快速移近的物体的恐惧是一种“远古的遗留”，那是进化所遗留下的祖先生存环境中对于危险的警告装置。我们可以看到，童年的梦充满了“怪物”和随时准备来袭的怪物。在黑夜中看起来情况更遭，因为人在黑夜的视力很不好，还有大猫总是在半夜狩猎。对“怪物”的敏感会使孩子将日常生活中自然发生的事情与其联系起来。因此，这种掠食者的原形经常出现在孩子的恐惧和噩梦中。比如说，苏珊·伊萨克斯给出一份报告说

一个一岁半的小孩特别害怕她妈妈坏了或者鞋底开胶的鞋子，以至于得把那只坏的鞋藏起来。15个月后当她再次看到它时她说：“我觉得它能把我一口吃掉！”

原型和神经科学

精神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就像身体一样能保持它的平衡。

荣格

我们所得到的现代神经系统的发现和建立在其上的理论都与荣格的原型说非常吻合，而他的理论是本世纪早期形成的。尽管保罗·麦克莱在荣格死后若干年提出了大脑三位一体的概念，荣格已经提出了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的梦境可以和动植物发展史上远古的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的大脑构造联系起来，并且它们可以被理解为自然深层的表达。荣格在《精神的进化》中写道，“在梦中比在有意留心

时更好地体现出来。”在梦中，精神用形象说话，并且本能地体现出自然最本质的东西。因此，通过对无意识内容的同化吸收，意识的短暂生命可以再次带入到和自然法则融洽相处的地步。(CW16)那时，这不过是一个预感，但是他却有勇气支持它。在它的基础之上，他创造了自己对人类精神病理学的理解并且设计了一套治疗方案使它痊愈。荣格的观点认为，我们的主要困难，要么是精神病，心病，要么是政治的，来源于与“年老的智慧堆砌”失去了联系。

如果我们希望重建与人的潜力的这座大水库的接触，我们只有一种方法：我们必须对我们的梦给予适当的注意，动物的梦富于分析的实践。比如，一个相当胆小的女人，害怕麻烦

并且苛求的老板，梦见一条大黑狗在它的狗舍里站住盯着她。一个声音说：“他是顽固的，但是如果你好好对待他，他会和黄金一样好。”她自己研究梦，她最初认为狗代表了她的老板，但是，在她的下一分析环节中，她认识到了它是一种顽固，潜在侵略性的她不曾利用的她自己的一部分。这真知卓见的价值在几星期后变得明显，因为她能在她的工作生活中好好利用狗的形象：当她的老板没能好好对待她时，她给了自己勇气变得顽固和有攻击性。这是一个补偿性梦的实例，使她没有意识到的潜力得到发挥。她发现了她以哺乳动物形式表现出来的顽固和侵略性足够地显示它仍然没有被完全吸收到她的意识性格之中，在她梦中以人类形象出现。

记住现在：巴特利特和艾德曼

我只能记得如此的事情是，
对我最宝贵的。

威廉·莎士比亚

当代神经科学证实了另外一位先驱的调查结果，剑桥心理学家夫雷代里克·巴特利特爵士，1932年出版了他的经典大作《记忆》：“记忆不是无数的固定的，没生命力和断断续续的跟踪，”他写道，“那是富于想像力的重建或构造，来自我们对整段的有组织的过去的反应和经历的态度关系。”记忆是一个活跃、动态的过程，像察觉一样，认出并且成像，是建立在过去经历之上但是需要考虑当前状况和当前需要的。

巴特利特拒绝了他从亨利·海德处借鉴而来领先的原子联想心理学，它以过度机械化的“记忆追踪”观念以及引进更

具弹性的计划观念领先于他。通过纲要巴特利特暗示了在时间上积聚的精神结构，它与根据当前事件对过去经验的活跃组织有关系。这个想法被洛克菲勒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的杰拉尔德·艾德曼吸收并扩展，他的头脑生物学理论，他把它称为神经的进化论，或神经达尔文主义理论 (TNGS)，在学术界引起不小的反响。他的书《记住现在》(1989)，给他的理论一条简短的线索。

一个不断成长的动物从出生的一刻起，就必须分等级地提高认识，并且把感觉信息进行分类和积聚。它经过一种被艾德曼叫做“肉体选择”的进化过程，类似于经过一种人际间的被达尔文叫做“自然选择”的进化。尽管自然选择导致了具体物理的或行为的性格的遗传生存，自然界产生新的物种，肉体选择也导致了对大脑中具体细胞、成组细胞的偏好。惟一的神经元构造建立于胎儿时期，而且只能由经验来见效，因此某种细胞群被选择，而且他们之间的连接加强了。据估计，在大脑中有大约千百万个这样的组，每个组由 50 到 10000 个神经元组成。全部系列神经元细胞组互相联系，并且有选择地反应特定的元素的范畴，例如“运动”或“颜色”。艾德曼称这些系列为“地图”。地图的构造使我们可能创建我们自己的感觉。肉体选择干涉导致最合适的地图的幸存：对应于成功的感觉的地图——也就是，他们大概最接近到“现实”——被加强，但是少数成功的地图被削弱或停止活动。

在整个特定的地图中以及地图的多个系列之间的连续相互作用允许了被艾德曼称做是“重入发信号”成为可能——地图之间的连续的通讯使大脑能够构造一种感觉，比如说“狗”，摸一条狗将激活一系列地图，看见它追着球跑，并且听见它吠叫等等。这些不同地图中的再进入信息与合成一种“小狗嬉戏图”有关系。

我们所共享的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由复杂的感官所编辑,这就使信息再收集成为可能。在艾德曼的观点里,精神是感官发展的基础。它甚至能在像鸟一样原始的动物身上实现显著的效果。归纳和分类对所有的动物学习不可缺少,并且这些活动会一直延续下去。

像巴特利特一样,艾德曼认为这些不是仅仅包含填充感官信息到已存在种类,而是一个活跃的再归纳它们到新的即将形成的对象的动态的过程。这就是从未停止归纳的,艾德曼通过记忆以及相信是知觉的基础认明的归纳。

通过一系列详细的步骤,艾德曼扩大了他的神经元分组定理,适应所有“更高”方面的精神,包括概念形成,语言以及意识本身。。

艾德曼所做的基本的区别在于“主要”的意识和“更高级命令”意识之间。他定义原始的意识为“精神上知道世间事情的状态——当前拥有精神形象,但是没有被过去和未来的一人所陪伴”。原始的意识来自于再进入信息的能力,积累起一定的归纳到一种感觉。这就意味着“对动物过去的学习有意义的事件可以和新事件联系起来”。艾德曼强调,过去事件吸收到现在,是深刻地主观的,并非基于客观建立在真实世界的事实,而是在过去对动物有“价值”或“意义”的事件。我认为,这正是发生在梦中的非常私人和主观的经历。

从梦境到意识

意识最高形式的活动在大脑的物
理发生中有其起源,就像最美的旋律不
会崇高到音符无法表达出来。

索墨尔塞特·芒

艾德曼相信哺乳动物、鸟类和一些爬行类动物拥有这样一种创造场景的原始意识,就是使这些生物得以迅速适应高度复杂的环境。爬虫类、哺乳类或鸟类的意识又要与更高层次的意识做比较——根据艾德曼的理论——“加入了一个懂得思考的角色的行为和影响的认同”。它具体体现了人的个性、过去、未来和现在,也延伸到一些猿类,只有他们会显示出高层次的意识来。而这

又决定于进化的语言和文字的发展情况、智商的普遍化、反省能力和自我意识,这些都是与人的左半脑的发展情况相关的。要使意识对自己有知觉,原始意识必须把它们自己作为主角从新分类。

那么,意识是怎样出现的呢?梦境又在这中间扮演了什么角色呢?为了说明,艾德曼做了两个重新开始的假设:

(1)初步的记忆(即“范畴价值”的记忆)和当前的感知是通过一种被艾德曼称为“知觉引导”的东西联系起来的。他称是这创造了原始意识。

(2)象征性记忆和观念的形成是通过一种被艾德曼称为“语义引导”的东西联系起来的。他称是这创造了高级规则意识。

这样,当基因发生变异,在进化的时候,艾德曼解释说:“记忆成了意识的基础和服务者。”那么我假设这一刻梦境也

同时发生并成了意识和记忆的服务者。

艾德曼的工作指出一条新的道路，把无意识作为一种总结的术语来描述地图内部联系的复杂体之间的再进入信息不断喧嚣的场面。当这些复合体的庞大数字在音乐会播放时，意识开始干涉。乐队的单个的演员都是互相联结的；每个人个别地诠释着音乐；但是同时每个人在调节其他人并且被他们调节。音乐被共同地创造。没有最终的或者是“高明的”诠释。现代理论不同于古典理论，它认为必须有某种侏儒在大脑，一个小人在“观察”对象并将接收到的形象和意见传达给大脑。

艾德曼的理论的关键点在于，一个会探究的生物体总是在寻找和假设事件的意义。有意义的地图正是那些选出的带有极大不同性的地图。如果更高的知觉在场，它看情况的符号的系统在……之上从意思被构造。这代表最高意义的概念的革命，并且它是一个更宽的科学的运动的部分到“把头脑向后放进自然”。(杰罗姆·布伦奈特,1990)迄今，在神经学和人工智能领域工作的人们还保留着智慧和语言的形式能够被设计成为以不必要要求任何“意义”的纯逻辑为基础的幻想。

摘要和结论

梦境本身就是进化的车间。

桑德尔·弗伦兹

对梦科学的研究最早开始于英国性学家哈夫洛克·埃利斯(1899)的阐述：梦描述了一种“大量情感的古老世界和不完整的思维”——向我们揭示精神世界进化原始时期的研究。(弗洛伊德,1976)在晚上，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我们的种群还处于植物时期的原始时代，与它分享我们日常体验中的细枝

末节。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证据：

(1) 梦境出现于 1 亿 3000 万年前并且涵盖了广阔的物种。显示出它是最伟大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精神运动。

(2) 睡眠中的脑电图记录表明，无论是对猫做实验还是人体实验都揭示，低电压下快速眼球运动睡眠所引起的快波发源于大脑中心的脑干，在古老的进化过程中一直起作用。

(3) 大脑中间的古哺乳动物结构在快速眼球运动睡眠时是活跃的，这些结论可以从人体发生的相关变化中推出，如脉搏和呼吸的频率、血压、阴茎长度、阴道血液流动、情感状况和体温的调节诸如此类。

(4) 当大脑中负责维持快速眼球运动睡眠中相对稳定的部分被移开或抑制住时，动物就“表演”出它们种群中特有的或是维持生计的动作。

(5) 这些观察，清晰地显示出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进化历程的大脑结构与梦境有关，它给两个假设提出了有力的支持：(a) 对于动物行为（即易雍学说中的“原型”）至关重要的神经元存在于那个部位；(b) 动植物种类进化的连续性存在于一种原型之中，它经历了从爬虫到哺乳类到人类的所有行为和体验。

(6) 调查发现，脑电图中的 θ 波——来自于古哺乳动物脑中一个特殊位置，即海马体——与至关重要的逃生行为和记忆储存有关，和快速眼球运动睡眠也同样有关。这个发现也为另一个假设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那就是，在有梦境的睡眠中，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在它自己的经验和该物种特有的潜在经验的启发下会更新它们的生存策略。

弗洛伊德对于梦的学说因此就变得不足为信了：梦并不是为欲望所激起的，不管是性欲、压力或是其他什么的。梦是

可预言的阵发性的现象，与中央神经系统的周期功率有关，并且有生物学的基础。就像霍布森(1988)曾经说的一样：梦境是“大脑中基因决定、官能驱动的产物，它的作用就是构造和测试行为背后的大脑构造和运行——包括认知和深层动机”。

尽管他相信这种测试程序对日常大脑思维运行是必要的，但他并不认为人们有必要记住其结论以从中受益。但是他承认，当他努力去记住它时确实从中受益良多。人们已经接受了欧内斯特·罗西的简明结论：梦境是“心理上成长、转变和传递的过程”，他们“自己建立起一个实验室来对我们的精神生活进行实验”。(罗西,1972)

5 有意识和潜意识,集体和个人

我的同伴,你已经落伍了,但我们必须继续前进。

荣格

1913年12月18日,荣格从一个可怕的梦中醒来,这个梦使他奇怪为什么自己会枪杀自己:我跟一个陌生的、长有棕色皮肤的野人在一个荒凉的石头山上。时间处于黎明前,东方已经发白,星星开始隐退。我听到齐格弗里德的号角声飞跃高山,我知道我必须杀死他。在岩石上一条狭窄的路上,我们拿着猎枪埋伏下来,等着他到来。

在太阳升起的第一缕曙光中,齐格弗里德在高高的山顶上出现了。他驾驶着私人骨头做成的战车,以飞快的速度穿下陡峭的山坡。当他拐弯的时候,我们朝他射击,他栽倒下车,死了。对毁坏如此重要和美丽的东西既感到恶心又感到遗憾,我变得小心翼翼,担心谋杀者被发现。但是下起了倾盆大雨,我知道雨会冲掉一切杀人的痕迹。我不再担心被发现,生命可以继续了,但一种无可忍受的负罪感充满心头。

就像荣格的海关检察员之梦,我们将以荣格典型分析的三个阶段为基础来分析这个梦。逐步确立梦所具有的个体的、文化的和原初形态的含义,以便“放大”它的意思。这个梦发生在荣格给弗洛伊德写信之后。这封信的措辞越来越尖

刻,让后者感到愤怒。信的要义如下:

亲爱的弗洛伊德教授,我希望能认真地与您交流。我承认我对您感情的矛盾心理。然而,我要指出,就像对待病人一样对待您的学生是一个错误。您在自己身边到处都能找到病症,这样就等于把每个人都降低到儿女的水平,让他们羞愧地承认自己身上的过错。同时,你又像父亲一样高高在上,安然地坐着。我亲爱的教授,您明白,只要您散发了这些材料,我就不会诅咒我的病症。跟我兄弟眼睛里可怕的光芒相比,他们没有变小。如果你完全除掉自己身上的复杂,停止父亲对儿子的游戏,代之以不断审视他们的弱点,好好地看看你自己,那么我就改过自新。无疑,您会被这种特别的友谊标志触怒,但它仍然对您有益。

结果,两周以后,弗洛伊德回复道:“我提议我们完全抛弃个人间的关系。对此我不会有损失,因为我惟一的跟您的情感纽带是一根细细的线——过去失约的持续影响。因此,我要说,您有完全的自由保留您所指的‘友谊标志’。”三天以后荣格回应道:“您希望我们抛弃我们的私人关系,我对此表示同意,因为我决不把我的友谊强加给任何人。这一刻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您自己是最好的裁判,剩余的只是沉默。”对荣格来说,他同一个人的第一次也是伟大的友谊就这样结束了,据他的儿子弗朗兹·荣格回忆,荣格永远没能彻底忘记这段友谊。

在友谊关系的结束和齐格弗里德梦的出现之间经过了一年时间,这一年对荣格来讲是极度紧张和烦恼的一年,曾有一段时间他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他有这样一种视觉:他惊恐地看见北欧被血的海洋淹没。在接着的梦里,整个大陆被北极的寒流冻结。后来,产生了一种幻想:“我一直生活在精神紧张的状态里,我经常感到好像有巨大的石头朝我压来。雷雨一个接

着一个。我经受这些暴风雨便成为问题。其他的被他们粉碎了——尼采和西斯德林,以及许多其他的人。但我身上有一种魔力,从一开始,我就认为,我一定能发现我在幻想中所经历的东西的意义。当我忍受着这些潜意识的侵袭时,我毫不动摇地相信,我在服从一个更高的意志,这种感觉不断地支持着我,直到我已经完成了使命。”与弗洛伊德的决裂释放了这一切,当他梦见杀死齐格弗里德之时,他仍然处于这些暴风雨的紧张中。“当我从梦中醒来,”荣格记录道,“我翻来覆去地思考这个梦,但却不能够理解它。因此我竭力再次入睡,但我身上有一个声音在说:‘你必须懂得这个梦,而且现在就必须弄懂。’心里的迫切一直在增长,直到声音说话的那个可怕时刻:‘如果你不能理解这个梦,你就必须自杀。’在我桌子的抽屉里放着一支装满子弹的左轮手枪,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开始再次思考,突然我茅塞顿开。梦的意思是说,我不再赞同英雄齐格弗里德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因此,必须把这种态度消灭掉。”

考虑到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品格,他们之间最后爆发冲突是不可避免的。1911年,荣格《性欲的形成和标志》第一部分的出版预示了这一点(弗洛伊德写信给荣格:“鸡蛋比母鸡还聪明是一件危险的事。鸡蛋里的东西必须找到爬出来的勇气”)。1912年随着第二部分的出版,冲突最后爆发了(荣格在写给弗洛伊德的信里,引用了拜火教的创始人的话:“如果一个人只是作学生,这个人对老师的报答就很糟糕。”)。在这部作品以及1912年在纽约的一系列讲座里,荣格表示出了异议,即性欲是一个比弗洛伊德认为的还要广泛得多的概念,性欲可以在普遍的符号里以“结晶的”形式出现,或者在人类的神话中以“原始的形象”出现。荣格特别注意英雄的典型,他解释说英雄同妖怪斗争的频繁发生的神话主题,就像青春的自

我努力挣脱母亲的怀抱。这使他能解释恋母情结和乱伦的禁忌,这些解释跟弗洛伊德提出的很不一样。(在荣格看来,孩子依恋母亲不是因为母亲是乱伦冲动的对象,就像坚持的那样,而是因为母亲是爱和关怀的提供者——这种观点预见了大约40年之后约翰·包尔比所倡导的理论革命。)

齐格弗里德的故事对荣格而言具有强烈的个人意义。1909年3月,他写信给弗洛伊德,承认“我身上的一种综合症是玩弄老哈利:老哈利是一个女病人,数年前我用巨大的努力把她从很严重的神经过敏中拉出来,她以可以想像出来的最坏的方式破坏了我的自信和友谊。她对我进行了卑鄙的诽谤,仅仅是因为我拒绝给她一个孩子。”(弗洛伊德/荣格通信)

这个病人是萨宾娜·斯皮尔林。1904年在伯格兹利,在荣格的关怀下,她治愈了自己的疾病。荣格用“巨大的努力”,把她从“很严重的神经过敏”中拉了出来(布鲁诺·贝特海姆已经指出,用“巨大的献身”更能准确地代替荣格的话),这是荣格第一次按照弗洛伊德的方法对此情况进行处理,结果很成功。然而,在彼此细致的交往中,他们相爱了,斯皮尔林产生了幻想:她注定要有一个荣格的儿子。这个孩子将被称为齐格弗里德。

齐格弗里德是一个奇妙的孩子,他将协调荣格和弗洛伊德之间,犹太人和犹太心理学之间在光荣主显节的差异。荣格将是他肉体的父亲,而弗洛伊德则是他的精神之父。关于这一点有一个很大的诽谤,几乎毁掉了荣格的事业,但是弗洛伊德协助解决了这一问题。在荣格的鼓励之下,斯皮尔林成为了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并且合格地成为一名医生,然后,为了作为分析家进行训练,她离开苏黎世到了维也纳。

她是一个杰出的学生,她把自己献给了弗洛伊德和荣格,献给了精神分析运动。在两个男人争吵着分手后,她努力工

作,使两人消除分歧。(卡洛特努图,1984)

由于在梦里杀死了齐格弗里德,荣格最后就毁掉了和解的这种幻想:犹太人弗洛伊德和新教徒荣格从来不能超越恩怨而团结起来,而是必须永远地分道扬镳。这是得克萨斯农业机械大学的大卫·罗森称做“自戕”(罗森,1993)的一个例子,“自戕”标志着荣格“创造疾病”结局的开始。(艾伦伯格,1970)

“这件事之后,我感到有一股莫大的激情,虽然我自己已经被射杀:这是我跟齐格弗里德秘密身份关系的一个标记,也是一个人被迫牺牲自己的思想和意识态度的标记。”这种身份和英雄的理想主义必须被抛弃,因为有比自私欲望更高的东西,在这些东西面前一个人必须委屈自己。(MDR)

文化环境

弗洛伊德和荣格主要通过信件维系着双方的友谊,弗洛伊德经常责骂荣格不更迅捷更经常地写信。荣格的许多信都对自己的迟缓表示抱歉,他总是以自己的工作作遁词。他所致力的工作对于心理分析运动的推进作用,比弗洛伊德所希望的那样要小,但是跟荣格自己在神话、比较宗教和文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有更多的关系。荣格在私下里一直研究自己跟弗洛伊德之间的差异,他准备了《性欲的形成和标志》手稿。弗洛伊德起初鼓励他从事自己的研究,因为弗洛伊德想让荣格把位于宗教和神话表达背后的潜意识动机归因于性和俄狄浦斯综合症,但是实际上,荣格把神话作为理解自己病人的梦、幻觉和幻想的出发点。

荣格在他的书里用400多页的篇幅来分析和放大一个美国少女的幻想。这个少女化名“弗兰克·米勒小姐”,在她做梦或者处于催眠状态时,她就创作诗歌和戏剧。其中一首诗叫《蛾子和太阳》,另一名为《伽万托普尔》的“催眠的戏剧”是关于印加人或者阿兹特克人的英雄的冒险的。这两部作品都是

在潜意识中产生的,这种潜意识预见了精神分裂和崩溃的开始。在“米勒小姐”的话剧中,伽万托普尔惊呼:“哎呀!没有人理解我,没有人像我或者神似于我姐姐。”荣格评论道,“米勒小姐声明这里表达的感情,极大地类似于齐格弗里德对布林西德的感情。”这种感情也极大地类似于荣格对弗洛伊德的感情。在瓦格纳的歌剧中,荣格和萨宾娜·斯皮尔林相知并相爱,齐格弗里德是哥哥西格蒙德与妹妹西格琳德乱伦结合的产物,布林西德赞同这种结合。如果斯皮尔林要实现自己的幻想,并且生一个叫做齐格弗里德的儿子,“精神乱伦”(也就是分析家和病人之间的性关系)的完成,以及对禁止此类关系的“乱伦禁忌”的违反。如果这件事不会引起诽谤,或者不会引起这两个男人之间关系的顷刻瓦解,这也将需要弗洛伊德缄默形式的串通和帮助。

荣格对于“米勒小姐”的评论在继续:“西格琳德是人的母亲,布林西德的角色则是‘精神母亲’。”可以想起萨宾娜·斯皮尔林已经告诉荣格:他将是齐格弗里德的肉体之父,弗洛伊德则是精神之父。“齐格弗里德从妹妹母亲那儿的出生,”荣格陈述道,“使其具有何露斯(上帝之子,他的父母奥西里斯和伊希斯是兄妹关系)的特征。何露斯是获得新生的太阳,是年老体衰的太阳神的复活。”年轻太阳即上帝人的问世,来自于人类的搭档,但他们实际仅仅是宇宙符号的载体。精神母亲因此给予它保护,在到东方的夜间旅行途中,精神母亲将其从胎中带到人世间。(CW5)这为斯皮尔林生孩子的幻想提供了潜意识的背景;这个孩子将调解弗洛伊德和荣格之间的分歧,他将在未来高举心理分析学的火把(在东方,他将在俄罗斯建立心理分析的诊所)。这也为荣格的梦提供了一些文化背景。

典型环境

在《性欲的形成和标志》的导言中,荣格对弗洛伊德的《梦

的解析》表现出赞赏，他论证道：“能让这本奇妙的书平静而毫无偏见地激发自己的形象的”人，将不会不受到弗洛伊德论点的感动，弗洛伊德的论点提醒我们说个人间的冲突（他称其为乱伦的幻想），是一切古代世界即俄狄浦斯神话的伟大戏剧的根源。这一简单评论可以跟油然而生的离奇的感觉联系起来。如果在现代城市街道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突然地发现古代的遗迹——比如长期被埋没的科林斯石柱，或者铭文碎片，这种感觉将会产生。一会儿，我们完全沉浸于这些当代人疯狂而短暂的生命。再过一会，非常遥远和奇怪的东西向我们袭来，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事物的不同序列。我们从当代的巨大迷惑中转过身来，瞥视更高的历史的延续。突然，我们想起，我们现在为自己的事情匆匆忙忙，这种生活及活动的相似情景2000年前就以具有细微差别的方式存在，相似的激情感动着人类，人们相信他们自己生活的独特性。似乎对于我来说，弗洛伊德所指的俄狄浦斯神话在每个方面都具有可比性。当我们仍然为个体心理的无限可变性而大惑不解时，我们突然看见俄狄浦斯悲剧的简单和壮观，俄狄浦斯悲剧是希腊剧场的永久的主要剧种。我们视野的扩展对此具有一些揭示。

这一段潜意识清晰地参考了十字军的梦，它为以下事情的发生提供了线索：荣格从弗洛伊德那里得到了灵感，从事自己的神话研究，他对所有人类经历的原型领域迷恋不已。在这本具有非凡雄心的书里，荣格用“米勒小姐”的幻想作为一条阿里阿德涅的绳索，来指导他穿过充满象征符号的广阔迷宫，就是说“通过绝对必要的放大，如果我们希望确立原型环境的意义”。但就像他继续承认的那样：“这些类似物一旦被研究出来，就占据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空间，这就说明为什么解释历史案例是如此繁重的任务。”但是，这只是被期望的：你越走向深处，基底就越广阔。

实际上,就像在 1950 年修订版《形成的符号》中表示的那样(CW5),他从来没有对这本书感到满意:“这本书是在我频繁的医疗诊断中用极快的速度写成的,我没有顾忌时间和方法。我不得不在找到材料的时候匆匆把它凑在一起。没有机会让思想进一步成熟。全部东西就像不能阻止的山崩一样向我涌来。只是到了后来,材料后面的迫切性对于我才明晰起来。这是所有精神因素的爆炸,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有限范围及精神分析学的狭隘眼界里,这些精神因素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呼吸空间。我不想诋毁弗洛伊德,不想贬低他在个人心理研究领域的非凡贡献。但是他对心理现象分析的概念框架在我看来似乎是不可忍受地狭窄。”(CW5)匆忙地完成写作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读者在阅读这本书时感到困难:这是对格言“粗制滥造的作品读起来难”的富有说服力的阐释。

在原型的环境中确立一个梦或者幻想,需要具有原型符号理论的广博知识,就像荣格的大多数梦一样,齐格弗里德的梦在符号理论方面是如此丰富——例如:上升和下降,死亡和再生,英雄,山脉,太阳,雨以及古人。读者要研究这里的这些符号是不实际的,但是读者会在第十章讨论的梦中获得大量有关的知识。

我们现在将按照顺序研究梦的各个部分。

我跟一个陌生的,长有棕色皮肤的野人在一起:这是一个原始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存在这样一个 200 万岁的人。这是正面,换句话说,就是指荣格的生命中还未实现的自我的潜力,这是潜意识的创造力荒凉的石头山:在荣格的生活里,孤独是一个经常的主题,跟弗洛伊德决裂意味着他从此以后将形单影只。“在与弗洛伊德决裂以后,我所有的朋友和相识都离我而去。但我早已预见到我的孤立,对我那些所谓的朋友们我不抱任何幻想。这是我已经预先彻底考虑过的东西。”

(MDR) 山的风景是抱负和精神向往，层次分明的上升和下降，统治和服从的地面。在梦中，山是合适的以不成角的形式出现的戏剧布景。时间是黎明前，东方的天空已经发白：生活的新阶段开始了。齐格弗里德吹着号角，表明他也希望自己加入这个崭新的日子。但事情并非如此。齐格弗里德的日子过去了。在太阳升起的第一缕曙光中刚刚开始的新秩序里，他无地自容：这是自我生命的一个新阶段，这是在用死人白骨做成的战车上个人化进程的新篇章——这一细节使人想到在荣格梦见地下室里的两个头骨，荣格解释说头骨代表人类（集体的潜意识）的共同祖先。

他以飞快的速度穿下陡峭的山坡：与太阳的升起形成对照，齐格弗里德在下降，在迅速地跌落——这幅景象使荣格想起自己关于中年危机的陈述，这一中年危机揭开了生命后半部分的序幕（“在中午时刻，太阳跌落开始了。这种跌落意味着上午被珍惜的所有理想和价值颠倒过来”）。这个梦产生于荣格开始定期“畅想”的六天以后：“我坐在自己的桌子旁，思考着自己的恐惧。后来，我让自己什么都不想。突然，好像我脚下的地面错开，我栽进了深深的黑暗中。”他开始天天这样做，还记录和描绘出脑中出现的幻想：“为了抓住幻想，我不断地想像跌入深处。我甚至好几次尝试抵达底层。第一次我到达了大约 1000 英尺的深度，第二次我发现自己处于宇宙的边缘。就像是到月亮上旅行，或者是下降至空空荡荡的太空。先是出现了弹坑的图象，我觉得自己走进了死亡的土地。空气是另外一个世界的空气。”(MDR)这样他就开始了他将要称做的“对潜意识进行实验”。他绕过一个弯，就在那个他绕过弯进入生活新阶段的时刻，他被击倒了。充满恶心和遗憾：这是弗洛伊德在荣格身上觉察到的弑母的罪过，当这罪过在两个场合变得最明显时，弗洛伊德晕倒了。

我转过身就跑:这是一种逃避的反应,是面对恐惧事物的恰当行为。

谋杀者可能被发现:被谁发现呢?可能是被原型的父亲,法的制定者,超然的我,标识语的化身发现,这些人将拿谋杀者问罪。

下起了倾盆大雨:繁殖的天性变得活跃起来,雨从(父亲)的天空注进(母亲的)地面,从(雄性的)有意识注进(雌性的)潜意识。天雨具有净化和治愈作用,还具有生殖功能。它有助于消灭过去罪孽的痕迹,启开肥沃生命的新阶段。

我忘记了被发现的危险:他已经远离开危险。

但是罪过埋在了心里。这是一次激烈的行动,写给弗洛伊德的并在最后导致关系决裂的那封粗鲁的信说明,荣格感到他是多么无情。现在可以继续生活,但以后必须背起罪孽的担子。荣格的关于梦的最初想法,认为梦揭示了1913年在战前世界展示出来的问题。“我想,齐格弗里德说明了德国人想要取得的东西,即把他们的意志施加于别人,为所欲为。”“有志者事竟成。”“我想同样地去做。但是现在已经不可能。”(MDR)然而,荣格忽略了这个梦也揭示了弗洛伊德想要取得的东西——把他的意志加于别人,为所欲为。现在那也不再可能了。在梦里,荣格最后把弗洛伊德作为自己的英雄榜样并为之作出了牺牲,他心甘情愿地代替弗洛伊德承担起走进下界的使命梦的结果:“我身上释放的新的力量帮助我完成了对潜意识进行的实验。”齐格弗里德因此就是一个复合体,这个复合体中浓缩了以下内容:(1)英雄的良师益友,弗洛伊德;(2)年轻的太阳神,即老太阳神的“儿子和继承者”及“王冠王子”;(3)有能力调解两个男人之间差异的超然的符号。他的死意味着荣格最后已经把这一切置于身后,为自己的进程即探究他自身的心理真相献身。

我思考这个梦,不光是因为梦的历史意义,还因为梦展示了它所能承载的转型力量。

有人可能已经说过,梦作为命运的神器参与个人生活。

原型假设的出现

项危险的事业。

我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是献身于一

荣格

走进下界(并返回原地的)主题发生在史诗《吉尔伽美什》,弗吉尔的《埃涅伊德》以及但丁的《神曲》里。在“米勒小姐”中,荣格也探测了“放弃世界”(与性欲的内向和回归联系在一起),其后是“接受世界”(与性欲的外向和更成熟地适应现实相联系)。但是,与荣格对潜意识进行实验最有趣的相似事件是,弗洛伊德 19 世纪 90 年代经历了精神崩溃。他用对自我进行精神分析,并通过跟威廉·弗里斯建立

亲密关系的方式医治了自己的病症。这是在对心理分析的基本原则进行加工的过程中发现的。

在 1913 年和 1918 年困扰荣格的烦恼是如此厉害,以致把他带到了发疯的边缘。他像一个孩子在花园玩耍,他听见了自己脑里的声音,他四处跟虚构的人物进行交谈,他相信自己的房子挤满了死人的魂灵。虽然这是在对他的非凡能力进行测试,但他认为这是一个灾难,好像自己正在被作实验:精神病专家正在崩溃,这样就提供了一个进行研究的良机。他能够研究第一手的全部经历,然后用它来帮助自己的病人。我在献身于一项危险的事业,不只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我的病人,这种思想帮助我度过了关键的几个阶段。当然,具有讽刺

意味的是:我,一个精神病专家,几乎在我实验的每个阶段都遇到了同样的精神材料,这种材料是在疯子身上发现的精神病材料。这是潜意识形象的资本,这种资本极大地困扰着精神病人。但这也是已经从我们理性时代消失的模型的想像力。(MDR)

对荣格而言,对潜意识进行的实验,肯定了他在伯格兹利病人身上已经观察到的一切,也就是说,对人类心理来说,存在着个人心理赖以存在的集体基础。

开始时,荣格把在幻想、梦、神话和精神病幻觉的普遍领域出现的形象归于原始的形象(1912),后来又认为是主导因素(1917),最后则是原型(1919)。总体上,原型构成了“古代人类的遗产”。(CW5)这一用法马上使他处于困境。因为,荣格把集体潜意识的内容描述成为起源于人类过去历史的“原初形象”,于是就为拉马克的指责提供了机会。也就是说,他赞同以下不可信的理论:从个人经验中获得的特性可以通过遗传基因传给下一代。直到1946年,荣格才充分地使自己免于这种指责。这一年,他对深深的潜意识(也就是不可知)的这种原型,以及这种原型所引起的原型形象、思想和行为,进行了明晰的区分。继承下来的是这种原型(拥有某种形象和经验的倾向),而非经验本身。

原型和生物学

原型具有纯粹生物学的方面，也为科学心理学所关注。

荣格

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荣格的普遍心理的观念对于从事学术的心理学家是不可接受的，荣格认为这种普遍心理由大量的、天生的、进化来的、心理的适应性所构成。这些心理学家仍然支持达尔文的模型，行为主义和学习理论同这一模型密不可分。

一些人对我的书《原型：自我自然史》中“专横地球”的看法进行攻击，我反驳道，原型和整体的潜意识都是值得尊重的

生物学假设。根据相对新的心理生物科学（对处于其自然栖息地的动物进行研究）中的资料，我提出，整体的潜意识包括心理适应（原型）的天然剧目。心理适应具体来说受到环境变量的推动，它负责在人类生命循环的各个阶段引导个体。从那时起，新一代进化心理学专家和认为世界可知的科学家已经吸取了类似的想法。他们认为“生命历史”取决于某种进化的“战略”和“战术”，这种“战略”和“战术”使生物体能够成功地竞争资源，度过它们的生命期。（克劳－福特和安德森，1989；沃特，1993）他们认为“达尔文的算法”是“专门研究把经历组织成具有适应力的有意义的机制和框架”。（卡斯米兹，1985）就像原型一样，算法通过自然选择演变，因为他们在祖先的环境（即精神学里众所周知的进化适应性的环境）里具有繁殖的相关性。对于某一个“领域”来讲，每一个算法都被设想为是具体的。这些“领域”如：选择配偶，给子孙和亲戚分配资源，避免猛

兽,获得语言,等等。

不管人们把这些心理的适应称为原型还是算法,认为世界可知的科学和分析心理学都把它们看做是内在的假设,即某种原型形象(例如母亲、孩子、陌生人、配偶),在社会和生态环境里将会碰到这些特征(水、躲避处、可食用的物质)。毫不奇怪,这些假设(以及它们幻想的成功)是我们梦里的典型特征。

随着尼科·廷伯根《本能研究》(1951)的出版,我们在世纪中叶听到了心理学革命的第一声惊雷。在书里,作者指出,每一动物物种的行为剧目,都取决于这一物种进化来的中枢神经系统的结构。廷伯根称这些结构是天生的释放机制。当在环境中遇到一种适当的激励(称为刺激标志)时,每个小姐或先生都会变得积极起来。当这种激励出现之时,天生的机制就释放出来,动物就以特有的行为方式作出反应,这种方式通过进化来适应环境。当考虑到我们物种的更大的适应灵活性时,廷伯根的观点跟荣格关于原型本质以及原型运动模式的观点非常接近。

第一次成功而系统地把这些概念运用于人类心理的尝试是由英国分析家和精神病专家约翰·包尔比进行的。约翰·包尔比认为,当雌野鸭一看见雄鸭英俊的绿色的头时就开始发情,或者一只母羊舔她羊羔的脐带时就依依不舍。人的母亲也是这样,跟她新生的婴儿在一起,当她看着儿子的无依无靠,看着儿子离不开自己时,就被感情征服了。所有这些反应模式(或者叫做包尔比所说的行为系统)天生就具备,不需要拉马克式的解释。

原型的相似物

原型。 生活里有多少共同环境，就有多少 荣格	可以从已经出现的原型的不同种类的数量推导出典型假设的本质。实际上，如果一个思想的意义可用后来宣称自己也有这种思想的人们的数量来衡量，原型的假设就肯定是当今世界已经出现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跟原型假设相似的影响更深远的几个东西可以列表如下：

表 1 同荣格的假设相似的概念

生态学	廷伯根	天生释放机制
心理学	包尔比	行为系统
人类学	列维-施特劳斯	基础结构
心理语言学	乔姆斯基	深结构
社会生物学	威尔森	基因遗传下来反应的策略后生的规则
精神病学	吉伯	心理社会反应模式加德纳深深地同源的组织
认知科学	卡斯米兹	达尔文算法

除廷伯根的天生释放机制和包尔比的行为系统外,还有潜意识的基础结构,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和法国的结构人类学派认为这种基础结构对人类的所有习俗和制度都有影响。而且,心理语言学的专家坚持认为,虽然它们的法则彼此不同,但它们的基本形式(Noam,乔姆斯基把它叫做深结构)是普遍的。也就是说,在最深层次的神经心理中,存在一个普遍的(或者是原型的)法则,所有的个体法则都以此为基础。

全新的规则的社会生物学生长在一个理论之上,这一理论认为:包括人类的所有社会物种的典型行为模式,都是由基因遗传的反应策略决定的,这种策略使生物的适应性最大化,从而使生物在其所处的环境中生存。社会生物学也认为,物种个体成员的心理发展,由后生的规则(epigenetic rules)决定(epi = upon, genesis = development,这个术语的意思是继续发展所依据的规则)。

最近,从生态学角度考虑问题的精神病专家开始研究保罗·吉伯所称的心理生物学反应模式,以及罗素·加德纳所称的同源的神经组织,这两个人对于单个病人针对他们社会环境的变动作出反应、调整的健康或非健康模式的完成作出了贡献。达尔文的算法已经被提及。所有这些概念都跟原型的假设一致,荣格早在数十年前就对实际上普遍存在的差异提出了这种假设。

心理学的“量子论”

原型是巨大的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它们引发真正的事件，而不是引发我们个人的推理和实际智慧。原型形象决定人的命运。

荣格

荣格的观点是，我们来到这样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充分实现了原形潜力；这就像其他任何关于我们的东西一样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梦。集体潜意识的原型指导和控制着我们物种的生命循环——出生，哺育，探索环境，对陌生人表示谨慎，跟同辈玩耍，成为社会的一个成年分子，在社会阶层中确立自己的位置，为了捕猎和对付团体外的敌意而在男性之间

建立联盟，婚嫁，养孩子，参与宗教仪式，承担成熟的社会责任，准备后事。因此荣格的格言是，每一个体的生命加在一起就是永恒的物种的生命。(CW11)对此提法有许多文化交叉的证据。乔治·穆尔杜克(1945)和罗宾·福克斯(1975)各自对人类文化的典型特征进行了归类，他们罗列了一大堆与下列东西有关的规则和行为：两性之间的关系，宗教仪式，治病实践，析梦，掌握财产，制造工具和武器，规定问候、待客、社会尊卑、合作等等形式的礼节。在荣格看来，所有这些普遍的原型模式都是起作用的原型的证据。换句话说，我们的生活不仅仅是像弗洛伊德声称的那样由我们个人的历史决定的，也是由作为集体的物种的历史，由编排于集体潜意识中的历史决定的。

荣格所提出的东西只是基本的概念，在这一概念之上可以建起一整套心理科学。这一概念对物理学中的量子理论具

有潜在的重要性。就像物理学家研究粒子和波以及生物基因那样,荣格把研究集体潜意识和构成集体潜意识的功能单位——“对我们所有人都相同的共同的心理结构”——当做是心理学家的事情。(CW5)这些心理结构一起构成了“古代人类的遗产”。梦的功能是,把这些“古老的遗产”融进做梦者的个人生活。

生命的原初阶段

你这个艺术女人,你这个艺术男人
你这个艺术的少年和少女
你这个拄着拐杖瞎眼的老头子
在每一个方向出生

施瓦塔什瓦塔拉《奥义书》

每天晚上,在我们的梦里,我们都致力于生物学的仪式,物种“永恒的”经验充满我们自己的个人生活经历。我们如何想像正在发生这种非凡的进程?荣格的答案是,原型充满了自己的能量,它们受到自身目标的规划,它们努力在心理(以图象、符号和神话的形式出现)、人格(以综合体的形式出现)、外部现实世界(以行为的方式出现)领域取得成就。他们完

成了生存的生物目标,实现了“具有包容性的完美”,完成了适应能力和成长,这些都被他归在精神术语个人化下面。 (“个人化是生物进程的表示——不管这是简单还是复杂——通过这一进程每个生物都成为它从开始就注定要变成的东西。”) (CW11)

就像我们遵从自己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特定的发展模式一样,我们经历被规划的一系列阶段,每一阶段都受到一套新的原型规则的调节。在我们心理和行为的发展中,这套原型规则

取得了成功。每一套规则都对环境有特别的要求，这套规则的能否运行（或者像荣格说的“聚集”）取决于满足规则的那些要求。如果环境不能适应这些要求，个人的发展将因我所称为的“原型意图的受挫”而受损。通过动员原型的资源，帮助纠正这种不幸，克服这种挫折是梦的一种功能。“虽然变化的生活环境会以同我们的思想方式不同的形式出现，”荣格写道，“它们可能的数量从不超过某种自然限制，它们或多或少地分成几种典型的形式，这些形式不断地在当代出现，这种情况已被看做伏魔者的合适领域。”珍妮特把这些“同时发生的心理存在”跟他所称的“下意识固定的想法”连在一起。在荣格看来，这些跟他用自己的语言并联系实验对之进行揭示的复合体完全一致。最后，他得出结论：集体的潜意识由原型的東西构成，个人的潜意识则由复合体构成。这种复合体作为亚个性而起作用，它在梦和幻想中变得“个人化”。荣格回忆道，珍妮特展示了“个性的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特性，具有自己的独立的记忆”。这些部分彼此相对独立地存在，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彼此替代，这意味着每一部分都具有较高程度的独立性。“关于复合体的我的发现，”荣格说，“确证了存在困扰人的心理瓦解的可能性，因为破碎的人格和复合体之间在天性方面基本上没有差异。”

在德语和英语里，“复合体”这个单词很快地流行起来，在1934年对复合体理论所做的评论中，荣格评论道：“今天每个人都知道人们‘具有符合性’。”“不是那么为人知道的，然而理论上却重要得多的东西是，复合体可以包容我们。”（CW8）复合体的自治力，以及在我们不知道复合体的情况下它们影响意识的能力，是荣格和弗洛伊德在他们的作品里一再关注的问题：“积极的复合体使我们处于紧张的状态，我们被迫进行思考和行动，在一定条件下惟一合适的词汇将被减轻责任

的司法概念。”他们只是说错了话,他们使人忘记这个人正要介绍的另一个人的名字。当音乐会上钢琴正伴奏着柔美的歌喉时,他们却在挠唱歌者的喉咙。他们又因为迟到而蹑手蹑脚地走近椅子,却再次制造了巨响。他们是我们梦里的演员。一个人越深入他们的本质,他们就越清晰地暴露了自己精神分裂的性格。梦心理尽可能清楚地展示给我们,当没有控制意识来压制他们时,个人化的形式表现是多么复杂,就像民间故事中的恶鬼在晚上打破屋子。当这一复合体变得“超群”并“声明”自己具有完全的个人品格时,我们在某一精神病上便观察到同样的现象。(CW8)

综合症并不是人们错误认为的本质上的的一种病症。它们是健康心理的构成部分,就如他们是神经或精神心理的构成部分。就像荣格在上面的段落所指明的那样,它们是构成个人心理的功能部分。也就是说,综合症是存在于大脑里的原型。

从原型到复合体:“范例的出现”

维联想上。

如果我对魔术师逻辑的分析是正
确的,两个主要原则就只是思维联想的
两种不同误用。同种疗法的魔力通过
相似性建立在思维联想上:具有感染
力的魔力则通过邻近的东西建立在思
维联想上。

J.G. 弗雷泽

这种实现过程是怎样发生的呢?荣格认为综合症的形成必须遵从上世纪末经院心理学家发现的两大法则:相似法则和系列法则,他还认为正常的综合症只有在两大法则都完备的情况下才会产生。举例说明一下,让我们采用一个人类生命早期阶段中最重要的原型:母亲原型。奥西里斯就如我们

已经注意到的,荣格不同于弗洛伊德,他认为儿童的大脑构造与他降临的世间是高度适应的。包尔比和他的同事宣称,儿童的神经生理系统与母亲的感性认识、活动经历是密切相关的,儿童必要的行为指挥系统同样与提供给他的人联系紧密(通常是母亲),儿童就是在这种天赋的“行为系统”(其原型来自他母亲)的塑造下逐渐成熟起来。荣格指出,母亲的原型是个体恋母综合症形成过程中的最重要因素,起初这种典型类型是潜意识的,然后,随着儿童在母亲密切的关怀下成长,他的那些受母亲原型影响的行为、感情、感知就会“释放”出来(就像生态学家说的那样),与此同时,儿童心灵里恋母综合症的一系列行为和母亲—儿童之间在外在世界里的行为链都会出现。这样,当儿童发觉他母亲拥有的母爱品质与他内心对母亲原型的期望相一致时,当他母亲在他整个孩童时代持续出现、与之紧密生活时,一个正常的恋母综合症就会形成。换句话说,如果其中任何一个法则没有充分满足的话,病态的恋母综合症就会出现,例如,母亲的行为指令系统在某些重要方面有缺陷,或者母子长期分离,都会产生上述病症。恋父综合症的形成也是同样的道理。

这样,综合症就成了两者之间的桥梁:一个是个体(个体发育)精神,一个是集体(系统发育)精神。它们的关系是:个体精神是“肉体”,集体精神是“骨架”。病理上的综合症与未出现的、未实现的潜在原型是紧密联系着的,这种潜在原型通常会导致对父亲或母亲的终生渴望。先前未发觉的父母经常梦见他们在童年时代缺乏足够的父母关怀。尽管多重性格是相当不寻常的状况,但可以这么说,我们在梦中或幻觉中都是多重性格的。没有人是单一性的,每个人都是复合性的。所有这些性格都是内在倾向的产物,在梦中,我们会遇上某种性格。

保罗·吉尔伯特在他的著作《人性和折磨》一书里

(1989),回顾了近些年来进化理论在精神病学的应用状况,宣称人类思维(智力)是一个碎片化的组织,它混合了一些特殊用途的能力、智力、天赋等等,并认为这是“正在凸现的范式”。那些能力、智力和天赋相互“包容”,相互作用。吉尔伯特认为“它们被煽动的程度越高,进行有用的逻辑推理就越困难。”

因此,“正在凸现的范式”只是荣格的范式,吉尔伯特的“混合特殊用途运作能力”理论是荣格综合症理论和珍妮特的潜意识理论(潜意识使人在梦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的综合产物。有关智力—大脑是有特殊用途的单元所构成的论述逐步增加,比如奥尔斯泰茵(1986)把这种单元称为“小智力”、弗德尔(1985)称之为“模块”和加德纳(1985)的“特殊智能”,所有这些都证实了荣格关于综合症是在原型的基础上形成的设想是正确的。

原型、综合症和梦

不是弗洛伊德所认为的梦,而是综合症充当了梦和症状的建筑师。

荣格

关于原型和综合症的概念是怎样帮助我们理解梦的呢?让我们举个例子来阐释一下。一位30出头的、迷人而且有艺术天赋的少妇曾向我咨询有关她女伴的一些问题。她们年纪相当,两人在一起已经生活了三年,但是某种紧张感(压力)在不断地增长,我的女病人对此不理解,并感到害怕。她说,不管她如何想办法,这种紧张感始终是挥之不去。在最初阶段,她做了如下的梦:

我正坐在厨房餐桌旁准备吃饭。达雷小姐(梦者的前学校老师)正在一个巨大的锅里炒什么东西。我对她说,我已经饿了,饭菜还要多久才能做好。她叹了口气,对我说道,“我已经尽我所能了,你应该学会有耐心。”我觉得很委屈、很气愤,但我没有说什么。然后她离开炊具把锅子端到桌子上来,当她把锅子放在桌垫上时,我注意到在锅子上有一些古老、相当原始的装饰物。她揭开了锅盖,整个厨房弥漫了菜肴的清香。这时她微笑地对我说,“你要的都做好了。”

做梦者的童年生活不幸福。她的父母在她三岁时就离异了,她的母亲虽然外貌悦人,但很自私、缺乏母性的柔情。在她六岁时,她母亲就把她送到国外一所学校念书。学校里的达雷小姐对她很关爱。因而在她14岁时,她已经把达雷小姐当做她特殊的迷恋对象。从大学开始,在她的整个学校生活里,她经历了许多充满激情的同性恋爱,但是所有这些恋情都未持续多长时间,因为她的情人发现她“过于强人所难”。

在她最初的梦境里,问题(和解答)都可以概念化(运用概念来解释)。她迫切渴望受到母爱的滋养,当那位慈祥和蔼的老太太没有及时满足她的要求时,她感到很受伤、很生气。这其实是她童年时期与她母亲之间不幸福经历的重现罢了。当她与其他女子关系密切时,她的恋母综合症就会发作。因为她对真正母爱关怀的渴望是那么强烈,如果没有及时得到满足,她觉得所受的伤害是那么的深刻,所以她总是强人所难以满足她的渴望。她所真正要求的是有一个女人作为生身母亲出现,以真爱来弥补她那有缺陷的恋母综合症。这一点也可从梦中体现出来,比如那个散发迷人香味的古老锅子即有此意。通过对她的分析,她必须要做的是要善于处理对爱的渴望,要有责任心,并且“学会有耐心”,这样她就不会强求她的伴侣为她做难以办到的事。

梦境把做梦者心理动力学上的毛病放在一个坚果的外壳里,这种方式让人印象深刻,在临床中是绝不少见的。正是这个原因,许多心理分析师十分重视原始(最初)的梦境,它们通常是在患者的第一个析梦疗程之前做的。上面那个梦境分析是我多年收集的病历记录之一,它表明容量巨大的梦境不仅贮藏了梦者目前存在的心理问题,而且还暗示了通过何种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其他的例子可参见第八、十章。

梦的目标、有机个体和意识

潜意识状态包含了有意识状态下所没有的许多东西。

荣格

通过梦,个体的生活才能与种群的生活嫁接上。它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个体的适应力、成长。

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荣格关于宇宙灵魂是由大量内在的、进化的、心理上的适应能力所组成的理论基本上不为经院心理学家所接受,他们仍然固执地坚持达尔文的生物进化模式,这种模式认为行为主义和认知理论有着紧密、无法摆脱的联系。在我的《原型:自我的自然历史》(1982)里我批评了这种教条主义立场,我认为原型和集体潜意识是适度(可观的)生物幻觉。通过提取个体生态学科(一门研究动物自然生活习性的学科)中相对较新的统计数据,我认为集体潜意识包含一种内在固有的精神适应能力(原型)的指令系统,它专门用来指导个体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并负责引导个体按阶段穿越整个生命历程。从那时起,新一代的进化心理学家和认知科学家也持相似的观点,他们说“生命历史”

依赖某种进化的“战略”和“战术”，这种“战略”和“战术”有助于有机体有效地竞争资源以扩展寿命。（克劳－福特和安德森，1989；沃特，1993）如同原型一样，规则系统通过“物竞天择”方式逐步进化，因为这个系统与祖辈的生存环境（生态学称之为进化适应能力的产生环境）是相关联的。每个规则系统是专门适用于某个“领域”的，比如配偶的选择，对后代、亲属的资源分配，躲避天敌的袭击，生活场所的选择，语言能力的获得，等等。我们称这种心理适应能力是原型，还是规则系统，不管是认知科学还是分析心理学都认为它们是固定假设，这种假设认为某个典型的人物（如母亲、孩子、陌生人、配偶）和特征（水、庇护所、食用物质）在社会的、生态的环境下会相遇。毫不奇怪，这些假设（和它们的虚幻满足）在我们的梦境中都是典型的特征。

随着尼科·廷伯根的著作《本能研究》（1951）的问世，有关心理学理论大变革的呼声才逐渐为世人所知，这是20世纪中叶发生的事了。在这本书里，尼科·廷伯根认为每一物种的行为指令系统都依赖于它中枢神经系统的结构，而这又是长期进化的结果。廷伯根把这些结构称之为天赋的释放机制。当动物受到某种适度的刺激时，它就会变得活跃起来。当类似的刺激出现时，这种天赋的机制就会释放出来，从而动物就会表现出其独特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是经过长期进化后证明是最能适应这种刺激的。如果我们考虑到我们人类更为灵活的适应力时，我们会发现，廷伯根的观点是很接近于荣格关于原型的自然本质和它们的行为模式理论。

为什么意识是必要的？假如没有它，我们能正常地发挥机能吗？如果我们就如认知科学家所设想的那样，只是计算机而已，那又会怎样呢？如果我们单单是一些复杂的机器人，按照程序生活，做着自己不知其意义的事情，那又会怎样呢？我们

是否会变得更坏?意识有充分理由不断进化,它让那些拥有它的个体获得选择优先权。这就是为什么像人类和海豚那样有高度意识的生物,远胜过那些意识模糊的生物,如蜥蜴和螃蟹。意识有助于个体生物监测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对自然、事物的性质保持警觉。就好比在第六日的上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正在发生什么事,并能分辨其利与弊。按照圣奥古斯汀的说法,我们不但生存着,而且还清楚地知道我们存在着,并以我们的存在和知识为乐。尽管它有许多精神财富,灵魂仍只是一个生物意义上的功绩,是生物学“渴望”抱负的表现形式,是自我个体化的原则。(“个体化是一个过程,根据具体情况或繁或简。通过个体化进程,每个生命有机体才能按其注定的结果发展。”)至于人类有机体而言,这种天数就是意识,自然早就意欲如此。

不管怎样,我们可以发现意识是有不同程度的,这种程度上的差异不仅在不同物种之间存在,而且也存在于同一物种之间,同样道理,在不同个体之间、在同一个体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差异。荣格坚持认为决定我们有何种程度意识的最重要因素是我们是否专心于我们的梦和它在何种程度上帮助我们使潜意识的东西变得有意识。通过对梦境的研究,我们“创造灵魂”,我们为了应对生存情势而“苏醒过来”,“变得有意识”,并且获得“整体”(健康)。这些来自于意识科学的发现又是怎样支持了荣格的学说呢?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杰拉尔德·艾德曼,这个领域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相信意识依赖于大量的相互联系的、和谐运作的综合症。现在,这已经是公认的观点。人类的大脑拥有至少 200 亿个个体元素,大大超过了地球上人类的总数,而且,每个元素按照每秒 100—300 个的速度发送出大量信息。哈利·亨特是这么描述的:“我们大脑里的 200 亿公民几乎在同时要相互对话 10000 次,频率极

高。正因为有如此大量的饶舌者在我们的脑子里,这就使得,这个系统对大脑本身无知觉和有知觉都同样让人难以置信——在睡梦中,这个系统里仍然有大量的元素活动,而且并不比苏醒时的活动数量要少。换言之,当你进入梦乡时,那个系统还在自我对话。”(亨特,1989)“意识是对亿万细胞每秒燃烧若干次、同时与上百万的邻居相互交流这些活动的持续不断的主观知觉。”

亨特关于意识是这样合成起来的观点在某些方面与卡尔·普里布莱姆的大脑全息照相理论有相似之处,他的理论认为任何给定的感性情境同时被不同的感觉传送程式“拿走”,以至于创造出一个跨程式的“全息图”。同样的原因,亨特坚持认为图象、声音、触觉和其他动力感觉和知觉经常是一起流动并相互影响,经过梳理就创造了意识。亨特说,思维是“一个复杂的合成物”。亨特承认道,这种理论的源泉是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人自我感知的思想,是一种内省感觉。亚里士多德相信内省的作用,认为它深藏于人的内心,可以控制人的自知感、想像力和做梦。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在18世纪为爱迪生和哈兹利特所采纳,这二位认为,众多感觉之间的多重相互作用就会产生一个整体的印象,这种整体印象远远超过了各感觉简单的综合印象。这可能就是最初的结论,认为意识本身就是格式塔心理疗法(完形心理疗法)。

令人感到有趣的是,亨特与在他之前的荣格一样,都求助于神话学来引申(详述)他的灵魂模式和梦的重要性。他发现许多与其观点相切合的神话故事都是有关埃及植物神奥西里斯和他弟弟赛特·奥西里斯肢解他的事迹。奥西里斯是神话故事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是人类所有创造能力、长生追求和自然界繁殖准则的象征。奥西里斯标志着人类由狩猎采集社会向农业社会的转变,因为他教会我们如何种植谷物和葡萄,

如何制作面包、酒,如何建造村庄、城市和寺庙。他做到这些,不是通过暴力强迫,而是采取教化、歌颂、演奏乐器的方法来引导人们,除以上之外,示范也是一个重要的方法。当奥西里斯完成这么多丰功伟业后,他的弟弟赛特·奥西里斯嫉妒他,并阴谋篡夺奥西里斯的权位以满足自己的贪欲。奥西里斯就成了这个阴谋的牺牲者。赛特·奥西里斯伙同他的帮凶绑架了奥西里斯,把他钉在木制的平顶镶板上,然后扔进了尼罗河。这个镶板被河水带到了大海,穿过巴比伦河,冲到腓尼基岸边,最后停在一棵柳树下。

奥西里斯的妻子,也就是他的姐姐伊希斯,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赶到腓尼基,把他的尸体收拾起来。为了欺骗赛特·奥西里斯,她把奥西里斯的尸体隐藏在尼罗河三角洲。但是有天夜晚,赛特·奥西里斯在月光下打猎,发现了这个秘密。赛特·奥西里斯用利刃鞭打奥西里斯的尸体,并把它肢解成十四块,散布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伊希斯没有被赛特·奥西里斯所哄骗,她逐渐找到了所有珍贵的残肢,就差生殖器了。据历史上最初记载,她把这些肢体组合起来,用防腐香油处理,使这个被谋杀的神可永远保存。她用死亡之柱取代了那个遗失的生殖器,死亡之柱象征着无尽的生殖能力。

奥西里斯成了一个具有伟大宇宙意义的神,他代表着死亡和复活,代表着玉米、酒类和树木的再生。作为死亡之神,他受到广大民众的顶礼膜拜,他给予信徒在另一个世界里享受永恒快乐、受到公正仁慈统治的希望。在某些重要方面,耶稣的神话故事只不过是奥西里斯神话的再现。奥西里斯被钉在镶板上,随后的解除痛苦,树木的陪伴,获得永生的能力,所有这些就是耶稣神话的原型。耶稣也被监禁,随后从坟墓中复出,在十字架上受难,最终升入天堂。这些有关诞生、道成肉身、死亡和再生的概念都是原型的概念,这些概念在人类的整

个故事中不断重现。

在亨特对这个神话故事的解析中，亨特认为赛特就是意识弱化带来认知失调的范例——“所有这一切早就在人工智能中设计好了”。从另一方面来看，奥西里斯代表着繁殖力和创造力。他是地府的神，主宰死者永恒的复活。“他姐姐把那被肢解、四处散布的尸体组合起来，并使他复活，这为阴间的创造力和想像力带来丰产和新的开始。没有跨程式的意识创造性合成，就如同被肢解的奥西里斯。”

亨特的理解在本质上与荣格是一致的——灵魂是由许多片面个性复合而成的。人生之本（伊希斯）是负责把潜意识与有意识连接起来的女调解人，她是使这一变化过程成为可能的催化剂。

古埃及奥西里斯和赛特的神话，为每夜发生在我们思维——大脑的事提供了一个隐喻，它同时还是我们文明发源以来全部历史的寓言。奥西里斯是伟大个体的范例，他可以说既代表人类又代表了自我的整个原型。另一方面，赛特提供了一个不受奉承、男权主义者的形象，他为了满足自己贪婪、邪恶的欲望不惜篡夺兄长的权力。在西方文明中，400多年来，奥西里斯在集体潜意识的深处长期处在静止状态，而在集体意识里赛特逐步被认同为统治者。与奥西里斯相反，赛特没有时间来适应自然永恒循环，他从自我中心需求出发颠覆一切，丝毫不顾及生态学。我们对环境所做的就是我们对自己作用的直接结果，如采用心理学术语，赛特代表着自私的自我作用于无私的 Self。就如荣格精辟的论述那样，“世界上惟一有错的东西就是人类。”（CW10）

在别处，我重新考虑了一个年轻农民的梦境，在梦中他看见他叔叔谋杀了他父亲。（斯蒂文，1993）——我把这个梦与奥西里斯神话详细对比，因为现实生活中两人都存在着争论：

梦中的父亲相对喜欢“有机”耕种方式,他的弟弟则提倡使用化肥和最新农业技术。在梦中,他叔叔用剑杀掉了他父亲,并把尸体埋藏在自以为找不到的地方。通过分析他的梦,我们发现这个农民认为他父-叔之间的冲突已经激怒了他,因此他想寻找一条发泄的途径。在这个例子里,做梦者能够设想他自己精神戏剧只不过是更大的戏剧的一部分,这种设想增加了梦者的行为能力。换句话说,梦提高了他对整个情境的意识感知能力。

6 梦工作

有创造性的想像力是我们可以从一开始就获得的惟一的東西，它是真实心理的基础，它是眼前惟一现实。

C. G. 荣格

心理学家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其他科学无法遇到的难题：所研究的体系事实上就是我们所借助进行研究的平台；去探索心理我们除了用心理探索外别无其他途径可选择。我们自己本身就是我们试图解开的谜。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原型的研究特别困难。这是因为我们的研究是在主观层面上完成，但研究的手段却是靠对客观运动的观察进行的。这就像一个孩子参加无年龄限制的比赛，必须以成年人的原初行为方式行事，还要按成人的语言方式说话。

萨莉·沃尔特(1993)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原始思维结构对进化是否有重要作用，对于生活在祖先环境里的个人来说，原始思维结构是否是决定心理适应能力的关键，以及为什么它们会在潜意识中发挥作用？沃尔特认为答案一定是“大脑只有有限的‘工作空间’”。原始人类，由于他们不能系统、连续的收集信息，进行思考，因此只能成为信息的奴隶，无法发挥思考的能力，无法利用信息帮助自己的生存和繁衍。然而，原初的功能在人类进化的漫长时代里仍然在潜意识里发挥作用：大约在1亿3000万年前，当单孔目动物让位

于哺乳动物时,快速眼球运动睡眠就开始了。梦的原初功能的意义开始显现,成为在进化史中普遍存在的重要推动力。

我们将在这章里分析这种原初形态,它们的表现形式涉及梦的各个方面,我们还可以在讲话、做诗、讲故事、症状形成、魔力、仪式和戏剧中找到它们的影子。这些令人着迷的带有原始味的相似之处使我们对梦的意义和目的又有了更多的了解,通过解读它们的含义,我们可以受益匪浅。

灵魂的两重性:梦和语言

你不能使你的世界变小和把你的灵魂简化,但要把整个世界装进你的灵魂里去,无论代价如何,你需要在休息前一鼓作气通过。

赫尔曼·黑塞·施泰本沃夫

梦的谜团总是围绕着这几个问题旋转:它们究竟来自何处?什么创造了它们?它们意味着什么?在梦中,像演讲一样,无形的想法被放进有形的模式之中——以图象和词的形式。说话和做梦之间的一个差别就是,我们能够采取某种措施控制我们所说的话,但我们不能控制梦。梦和讲话彼此相似,但在感官和思维的表达途径却存在差异:思维本身是不可见的和不能被听到的,而图象和声音则可以被听到和看到。

心理学与神经病共同遇到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去解释某些隐秘和私人的东西可以变成显性和公开的事物。每一个规范的概念都可以被改造成术语:潜伏的东西将成为显性的内容(弗洛伊德),原初概念则变成了原初图象(荣格)等等。快速眼球运动睡眠本身就是一种行为模式(廷伯根),深层

次的发现可以在表面结构中找到，这也就是词语（乔姆斯基）。每种术语都有特定的基本结构，依据某种规则来对产品的表面进行积极的加工。

精确地说，做梦和说话必须涉及头脑的基础结构，而且这两种行为都是很耗费能量的活动。因此两者都是进行通讯联络的不可缺少的形式。而快速眼球运动睡眠则是实际自我与梦中自我（在睡眠时）进行沟通的过程，里面没有涉及到说话。

梦很自然地使用到雄辩家讲演的某些基础特性：除了比喻和拟人，他们通常也使用比较（把一些东西与另外的东西相比）和夸张（把一个很小的点进行夸大）。一个比喻是演讲中的一个技巧，即把一个事物直接比做另外一个，好像它真的就是那个东西似的——例如，“他是在草丛中的一条蛇；但是她是一根强大的支柱。”梦中形象被比喻所代表，即涉及到两个人或两个物时，则抓住他们的共同特征进行强调。比如，我曾梦见自己的一位强壮而自负的同事患了脖子肿胀病，梦见他在牛粪堆上啄食，颈像公鸡一样挺立。当我醒来时思考这个梦，我认识到我对这个同事心中有一股反感的力量（投影效应？）。他自认为是散步的公鸡，但他脚下踩的不过是粪堆而已，而且我还想拧他的脖子直到它变得肿胀为止！比喻比直述带有更大的感情色彩和影响力：我们在讲演时喜欢使用这种修辞手法以加强说话的效力，这大概就是自我在梦中使用它们的原因。把梦看做是一个比喻通常就能够获得对它意思的理解了。

当我们心中开始考虑某些事情时，往往有一种自然的趋势来把思考的部分与整个事物分离开来，自己最赞同的部分一定要与反对的部分有所区别，这种现象通常被叫做“矛盾”。（即：划分事物中互补的部分）例如热和冷、左和右、战争

和和平等等。这一点对于心理语言学的学习也不例外。除了在语言（具有稳定性和集体性的一种共享体系）和讲演（一种私人的，面向集体的特殊表达方式）之间的区别外，语言学还有两种表述模式的区别：转喻和隐喻。转喻是指把一系列词语、短语和句子通过某种线性相关的关系连接起来进行陈述。而隐喻则是把一系列词汇按照一定规则关联起来，如基本词语元素（carn - iation, carn - al, carn - age, rein - carn - ation 等）；类比（香石竹、花、紫罗兰），以及具有相似性的图象和声音等。当我们分析两个梦时，我们就会对它的意义有更为直观的认识。

对于语言和讲演之间的区别，学者各有所述。乔姆斯基认为是语言能力（语言）和语言表现（讲演）的区别；本杰明·利·弗赫夫则认为二者是密码（语言学中词义的更深层结构）和明码（词被直接转喻的意思）的区别。保罗·库格尔在他著名的《讲演炼金术》一书中写道，弗赫夫的密码理论与荣格的“原型”、列维-施特劳斯的“基础结构”和劳坎的“符号法则”异曲同工。

库格尔提出这些区分在人类心灵中是必备的能力，人们必须区分出讲演中的两种互补的表述风格，而且通过一些特征，还能够辨识出不同说话人在个性上的区别，这就要看他们在讲演中所表现出来的转喻和隐喻、合理和荒谬、逻辑和虚幻，自我和心灵等指标。他进一步比较了荣格所定义的“主观心灵”和“客观心灵”之间的区别，“直接思维”和在象征符号转变时的“幻想思维”之间的区别，以及他本人在《个性，做梦，思考》一书中定义的“第一人格”与“第二人格”之间的区别。另一条分析途径可以在弗洛伊德的论述中找到，他把心理功能分为两个模式：“第一流程”，即通过梦、症状的形成和转化来表达隐喻；“第二流程”，即通过自我认可的合理逻辑和句法来实

现与现实世界的沟通。对于弗洛伊德的疗法,库格尔进行了细致的观察,这个流程首先对隐喻进行讲演和解释,把它们转化成自我心灵所能接受的转喻性语言。 (“哪里有本能,哪里就有自我”)荣格学派疗法则从另一角度阐述问题,坚持了对隐喻形态的把握,因为对于荣格来说,潜意识的语言并不是婴儿时代的产物,而是自然状态下人性的声音。

原初功能的不同解释对学科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弗洛伊德、荣格、乔姆斯基和库格尔也分别对快速眼球运动睡眠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其中一些方面归纳为表2。例如,苏珊娜·朗格就划分了离散型或代表符号型(语言和数学符号,包含一些特定词和标记)以及非离散型或非代表符号型(富有表达力的艺术和一些循规蹈矩的意思)的快速眼球运动睡眠。

表2 心灵的两重性:认知工作的两个模式

库格尔	转喻讲演 逻辑思维	隐喻讲演 虚幻思维
荣格	主观心灵 直接思维 第一人格	客观心灵 幻想思维 第二人格
弗洛伊德	第二过程 合理思维	第一过程 荒谬思维
朗格	离散符号 代表符号	非离散符号 非代表符号
德克曼	活跃模式	接受模式
大脑	左脑半球	右脑半球

阿瑟·代克曼(1971)也把心灵分为“接受模式”和“主动模式”，前者的特征是沉思，而后者的特征是决断和语言的使用。以上这些区别都被连接到大脑两个半球的不同功能模块中去，左脑半球与转喻、离散和代表符号发生联系；右脑半球则与隐喻、非离散和代表符号(斯蒂文,1982)有关。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直接转喻和发散思维具有明确的意思，而隐喻的话语，例如梦，则具有表象艺术的含义，它们的意义是多源和多重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永远不能有一个梦具有“真实”的解读。

库格尔渴望建立一门学科，他把它叫做原初语言学，是一个采取隐喻模式的语言学门类，关注具有“诗歌想像力”的语言。正如一篇宣言那样，他说：“原初语言学学习心灵的讲演。”一些不可知论者可能被库格尔所揭示的心灵态度所震慑。但是，当神学的光彩被剥夺时，心灵成为一个有用的心理术语，因为它暗示了一种杰出的参与，来自一种超人般的、“持久的”、“外向的”力量。事实上，它显示出心灵作为一个整体的协调立场。弗洛伊德本人对于象征的含义特别感兴趣，极力要搞清某些词和相关符号的含义，尽管他并不认为这可以成为探索原初体系的基础。这种兴趣可以在他下面的梦里得到分析和体现。这个梦，如果不考虑空间因素，我们可以把它的内容再缩短。这是他的一个女病人的梦。

她正从高处一些构造奇怪的栅栏或篱笆上爬下来……而不是爬上去；她发现自己很难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但是她感到满意的是，她的裙子没有被挂住，这样她很从容地继续爬下去。她手里握着一根大树枝；它实际上像一棵树一样，上面覆盖着红花，树叉向外伸展开。她想这些花是樱桃花；但是它们看起来像是两倍大的山茶花……当她下来时，底下的花已经凋谢了很多……一个年轻人……正站在花园里；她跑上

去问他如何把这些树枝移植进她自己的花园。他拥抱了她；而她则挣扎了一番，问他想得到什么，以及他是否认为人们应该像他那样拥抱她。他说这不会有任何损害：这是被允许的（弗洛伊德）。

在描述这个梦时，弗洛伊德把一些重要元素用大写字母标出，并把它们给予性的解释。总的来说，他把梦看做代表病人生活的一个流程。她正从一个很高的地方下来，表明她有“高贵”的血统。他继续说明道，“梦者看见她自己手里持着一根鲜花盛开的树枝，并从栅栏上向下面爬。在提到这幅情景给她的印象时，她联想到自己像一个天使一样向人间洒着百合花瓣，活脱脱一个天使报喜图——她自己的名字是玛利亚——几个穿着白袍的女孩在圣体节的行列里行走，当街被绿色的枝杈所装饰。这样在梦中的鲜花盛开的树枝毫无疑问暗示了性清白。然而，这些树枝被红花盖住，其中每个花朵就像山茶花一样。在她的散步结束之际——梦会继续进行下去——花都凋谢了。这就意味着在她的月经。同样，她携带的像百合一样的树枝好像证明她是一个女爵士，据我们所知，她在其他时间都佩带白色的山茶花，但在月经期间她带上了红的一枝。同样的鲜花盛开的分支（歌德的诗《少女的花》）则代表了她两性清白和现在的矛盾。这个同样的梦还表达她在一生中的某一点上成功地跨越了黯淡的一个瞬间（例如，鲜花的凋谢），这个时机与她的传统理念格格不入——她对于自己没有能够保持性方面的纯洁而感到内疚（在她的孩提时代）。”（1976）

至于那根树枝，弗洛伊德注释道：“树枝是长形的，因此是男性生殖器官的象征；这也是对她的家姓的一种平直的暗示。”因此，树枝被移植进自己的花园就是一种很晦涩的暗示，显示她希望失去自己的清白和与自己的一个年轻的亲戚发生

性关系。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一书中把这个梦例编了进去，这个梦是他的一个同事阿尔弗雷德·科比采克记录和分析的。这是一个非常短的梦，但是它的冗长的解释体现了经典的精神分析学的分析模式。

这是一个梦：我在一张庆祝生日的桌子的中心摆上花朵。这是一位不是神经病，但是有点过分拘谨和保守特性的女孩的梦。科比采克进行了分析。她订婚了，但是她对于有可能推迟结婚感到担心。

科比采克说他可以没有病人的帮助就光靠梦中的“流行象征符号”对梦进行解释——这种符号大概就是心理分析的惯例。“这是她婚礼愿望的表现：有花在中心部分作为装饰品的桌子象征了她自己的外阴部；她希望在未来自己的性欲得到满足，因为她此时已经一心一意地思考要生一个婴儿；但是她的婚姻之路还很长。”他避免提出这些符号对于她的意义，只是问她，她的脑中对分裂的梦现在有什么想法：我问她桌子上有什么花，她的第一个答复是：“昂贵的花，一个人要得到就必须付出代价。”然后，又说它们是山谷中的百合，紫罗兰和粉红色……或者是康乃馨。我又假设“百合”这个词是贞洁的符号，它在梦中频频出现，证明了纯洁的含义；她证实了这个假设，因为她把“百合”联想为“纯净”。“山谷”是在梦中经常出现的女性的符号；它与英语中的鲜花一起成为两个突出的标志表示她的童贞的宝贵——“昂贵的花，一个人要得到就必须付出代价”——和表示她希望自己的丈夫知道如何欣赏它的价值……

“紫罗兰”表面上看是无性的，但是……使我感到吃惊的是梦者把它与英语单词“违背”联系到了一起。这样梦的意义很有可能介于“紫罗兰”和“违背”两个词之间……为了用“花的语言”表达意思，梦者想到了“用暴力采花”（这是花的象征

意义的另一个说法),这就表明了梦者具有受虐狂的性格倾向。这是通向无意识之路的“口语之桥”的一个漂亮的例子……

在连接“粉红色”这个词的意思时她想起了“康乃馨”(carnations)。我想梦的意思就是在这个词和“肉欲”(carnal)之间。但是梦者首先联想到“颜色”然后才是“康乃馨”。罗宾塞克评价说“颜色”是由“康乃馨”(肉色)的意思决定的。这里的“决定”具有多重含义。梦者告诉他说,她的未婚夫经常给她送康乃馨,在这里康乃馨实际代表了男性生殖器。“这样,”罗宾塞克总结道,“在这个梦中,‘花’象征着处女、男性和玷污处女的多重含义。这里值得指出的是,花作为性的符号,其实在别的场合也频频出现,花不仅象征着人类的性器官,同时自己本身也是植物的性器官。也许情人之间送花作为礼物也是这种无意识的反映。”

罗宾塞克的阐述是直接并且有说服力的。难道这种循规蹈矩的说法就没有什么可补充的吗?库格尔令人信服地表明这是可以的。他评价说这两个梦都表明潜意识可以根据语音来构筑图象。正如弗洛伊德自己注意到的那样:“正如梦中试图揭示的那样,单词的拼写意义远逊于它们的声音。”

库格尔引用自己的一位女性弟子的梦说明问题,她梦见自己身穿“一件美丽的白色晚礼服”去参加一个舞会。她的男朋友送给她一束康乃馨,但是使她感到窘迫的是,这束花开始流血。库格尔明确地说,每朵花的背后都有“一些不变的或同步的幻想”作为女性和侵犯女性的标志存在。“它具有多重联系,并且都有从语音学方面延伸出来的原型梦幻。”(库格尔,1982)

在一份关于字词关联研究的学术刊物上,库格尔重申了荣格的发现,即潜意识是一种通过形象和声音的相似性进行

多重交叉关联的系统,他指出:“因此,当原始形象的不同方面通过语言的形式实现时,它们就会寻求用类似的发音模式来进行建构,这样会组合成为一个和语音有关的复合词。”那么,他是怎么解释这个奇怪的形象组合“鲜花→血迹”呢?在他看来,二者都是很巧妙和有说服力的。如果我们能够验证一下与康乃馨(一枝白色或红色的花)以及紫罗兰(一枝蓝紫色的花)具有同样发音模式的单词,我们就会被领入残忍的暴力、强奸、性、流血和再生的环境中去:紫色(vio-let)→暴力(viol-ent)→违背(viol-ate);康乃馨(carnation)→肉欲(carn-al)→残杀(carn-age)→再生(rein-carn-ation)。两种组合都把花、采花(同样的联想)和强奸等不同源的词汇集中在同一梦幻中。这种音素之间的联系在英语中已经足够引人注目了,但是,库格尔认为一幅典型图景所代表的核心关联意义并不局限于英语中,而且还存在于德语、法语和匈牙利语中。在德语里 Blüten 意味着花,Blut 意味着血,而 bluten 则是流血。在法语中 violette 是蓝紫色花,viol 意味着强奸,而 violer 则意味着侵犯。但是事实上还远不止这些,在非印欧语系的语言中,这种关联也同样存在:在匈牙利语中 verag 意为开花、花,ver 意为血,而 veres 则带有“血腥”的含义。

库格尔强调,这些令人困惑的关联不能单单靠词汇、句法或是语源来解释:它们更具有吟咏和印象派的风格——这完全与荣格在世纪初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即“自由联想的群组”(词意复合)通过音素之间的关联围绕着心中的图象展开,并且通过带有共同感情色彩的音节联系在一起。

如果荣格的原型理论和库格尔的语音演绎理论都有效,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神话中证实这种特定的组合。能找到实例吗?当然可以:得墨特耳的女儿珀尔塞福涅被赫迪斯强奸就是一例。珀尔塞福涅正在与奥金诺斯的女儿一起采摘花朵。大地

女神盖亚通过给她出示一朵以前从没见过的美丽的鲜花来诱惑她。这是一朵稀罕而奇妙的水仙花。当珀尔塞福涅伸手拾取时，大地猛然裂开，隐藏在里面的赫迪斯驾驭奔驰的战车向她冲来。他抓住她，把她带回地府，使她成为一个被强夺的新娘。最后，宙斯使冥王和得墨特尔之间达成妥协，珀尔塞福涅在春天的第一个生长季节回到母亲所在的地面世界，一旦种子被播下，就要在秋天从地面回到冥府。这个神话把花、强奸、自然、死亡、再生以及繁殖周期等想法联系起来。从弗洛伊德的教条来看，这个神话中的花纯粹是性和个人暗示的结合，我们还可以发现它揭示了上个世纪末存在于两个女人梦中的集体原初意识(摘花、死亡、再生)的复合。如果我们同辈人在梦中出现同样的符号也不奇怪，因为在我们心目中的原初复合体的核心并没有改变。这种花、暴力、死亡和再生之间的关联在各处都很容易看到——用血红的罂粟纪念二次世界大战的亡者，我们在死者坟前献上的花环，新娘带到圣坛上的花束，60年代由推崇“爱与和平”的嬉皮士送给战士的鲜花等等。所有诸如此类的例子，无论是在梦中还是在清醒的现实中，都是无意识地重新唤起对珀尔塞福涅和赫迪斯的故事，并且用词汇和形象来与他们发生联系。通过追踪这些原初的符号，我们可以面对面地与自己内心中不变的天性以及我们同宗的灵魂进行对话。

人类所有的诗作和故事中都包含着同样的原初理念。这就为探索梦的本质和功能提供了线索。

梦和诗：造梦

梦是一种无意识的诗。
让·保尔·里克特

造梦 (Oneiropoiesis) 是梦创造的过程 (来源于希腊语 oneiros = 梦 和 poiesis = 创造)。创造 (Poiesis) 还是“诗”一词的起源。正如我在这本书的开端所描述的那个梦一样，梦的理论太容易集中在信息处理方面，以致于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梦是具有高度创造性，富于想像力的行为。荣格说过：“梦是灵感。”有些梦确实比其他梦缺少灵感，但是他们都或多或少的具有把现实转变为其他东西的能力。“合适的诗，”马丁·黑代格写

道，“从来不仅仅是日常语言的一种更高的模式。而且恰恰相反：日常语言是一种被忘记的，因而过时了的诗。”

诗和梦共有的一个特征是他们表达意思都模棱两可，以便根据唤起的感觉和气氛创造一个语义关联的网络。

我爱你，亲爱的，
我爱你
直到大陆会合，
河流跨过高山
鱼儿在街头畅游，
我爱你，
直到海枯石烂
七星换位。
我看到鹅在空中飞翔

岁月像兔子般飞奔，
而我手中抓住的
是年龄之花
以及这个世界中
惟一的爱情。

(引自《当我在外面走了一晚上》，作者 W. H. 奥登)

这几句诗充满了原初形象——山，鱼，河，海洋，天空，鹅，花——这种梦很容易被转变为诗。荣格喜欢引用格哈特·豪普特曼的一句格言“诗是用普通词句焕发出原始回响的艺术”。这些对于诗歌来说不可缺少的韵律究其本源来自古老的宗教仪式。这就像快速眼球运动睡眠一样，在大脑的神经系统里面具有“补充燃料”或“驾驶”的功能。通过分析许多不同语言的诗歌经典，弗雷德里克·特纳和欧内斯特·波佩尔(1983)检测出了一种他们称为韵律脉冲的节奏：所有的语言都借用了这种韵律，它每隔2到4秒出现一次，而在大多数的诗句中，韵律出现次数也维持在2.5到3—5秒之间。因此，我们可以对诗歌进行朗诵，通过声音与语义的结合，我们可以感受到诗歌强烈的节奏，而韵律感也会同时进入大脑的左右半球，甚至深入大脑更深层的结构。叙述性的诗更容易带来这种效果，而这个过程恰好和我们把大脑活动与做梦联系起来看一样。

这就引导我们进一步得出一个二元的结论：梦是诗歌；意识是散文。

梦和故事

神话是早期人类心灵生活的碎片
……英雄周期，无论在哪里发现，都是
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理论的一个范
例，是宣扬「成功基因」的蓝本……
布鲁斯·查特温，《歌路》

几个世纪以来，作家们都被一个观点所吸引，即存在着一种包含一定数量基本情节的“故事原型”。当然，神话、童话以及传奇故事都吸引了篝火旁大批听众的注意力，因为神话时代总是和人类生存这个伟大主题遥相辉映。梦本身的叙述也是基于同样的主题，这两种类型之间的相似性是不言自明的。因此，约瑟夫·坎贝尔的格言就被用来做本书的卷首语。

书的卷首语。

在寻找这些故事的更深层构造之时，我们也开始从背景、剧中人、阴谋、荣格式图解、发展、突变以及消退等方面进行检验。此外使用库格尔的方式，把梦中叙述打碎成单词—图形碎片来进行分析应该是可行的，这样梦和故事都会显示出它们共有的原型，但是目前就进行这样大量的工作还不是时候。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快速眼球运动睡眠期间人的闹钟发生类似于讲故事的活动，或者说像放映一部电影，而在整个非快速眼球运动睡眠期间则没有这种类型的大脑活动。独立判断一份夜间梦的报告是否来自于快速眼球运动或非快速眼球运动睡眠期间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快速眼球运动产生的梦看起来是一个“平和的”梦，在里面采取的是一种戏剧性的叙事风格。换句话说，快速眼球运动是虚构的，而非快速眼球运动则采取非虚构的形式。

这是因为，我们都是社会动物，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群落之中，整个人生都像是一场戏：我们都逃不过在自己的“肥皂剧”中扮演角色。那么这部戏剧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呢？荣格的答案是“由自我创造”——没有别人比他更准确的了。它包含了生命中所有的酸甜苦辣，无论是谁无论他在何种环境下都适用；而且它本身也展现了我们的行为、想法、感情、故事，以及梦。梦和故事是很特别的东西，因为它们可以作为业已存在的两个领域间事物的桥梁——内部和外部，自我和环境——并把它们结合起来，使其更具有现实意义，更容易对现实世界进行回应。

其中许多内容已经体现出归纳故事基本情节的可能性。我所提议的分类系统将每一种情节都与生命周期联系到一起，而人生的每一阶段都可以用著名的戏剧和神话进行叙述，而且每个类型都与一种或多种治疗学派相对应。我们将把梦中戏剧分为五个基本场景：(1)奇迹般的出生以及英雄的孩提时代，这期间他的独特的力量刚刚被发现，他开始进行试验；(2)从乞丐到富翁，在这个阶段他的英雄业绩概括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勇者斗恶龙），并且赢得了整个王国；(3)男孩遇到女孩并在之后永远过上幸福生活；(4)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生存和死亡之间的斗争；(5)从富翁到乞丐：损失和失败、邪恶战胜正义、男孩失去女孩，恶龙取得了胜利。

所有的这些情节在梦中都随处可见。它们在表3中被列出，表中还有与情境相伴的最普通的特征以及各种精神病分析学派感兴趣的焦点。

最初的四个情节可以在英雄神话中找到，这样的故事在全世界都有记录，约瑟夫·坎贝尔为此专门写了一本《千面英雄》进行研究。英雄神话象征童年和青春期的典型任务。它们告诉英雄怎样离家出走，经历一系列的测验和磨难，最后与一

条龙或海怪进行了一场标志着“最高折磨”的生死大战。作为对英雄的奖励，主人公在胜利后会得到一笔常人难以获得的财富，即：一个王国的王位和一位美丽的公主。而在现实世界中，一个男孩会受到感染而开始他的冒险人生，他会挣脱家庭、父母和兄弟对他的束缚，在开始他会饱受磨难（几乎所有的传统型社会都是如此），最终为自己在社会上赢得一席之地（王国）。为了实现所有的目标，迎娶一位新娘，他必须克服母亲在他的潜意识中仍然留下的影响力（与龙的战斗）。这等于是第二次从母体分娩，最终切断脐带的束缚（战胜龙怪的过程经常是英雄被怪物吞进肚子里，然后他又用自己的方式把龙的肚子切开，这样作为母亲的儿子，他已经死亡，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男人他又获得重生，并且当上了王国的国王）。

表 3 基本情节、范畴和研究者

情节	范畴	研究者
(1) 英雄奇迹般的出生和童年	神话	鲍尔比
	宗教	弗洛伊德
(2) 从乞丐到富翁：英雄在逆境中的胜利	神话	阿德勒
	宗教	荣格
	文学	
(3) 男孩遇见女孩并在之后过上幸福生活	童话故事	弗洛伊德
	浪漫故事	
	喜剧	
(4) 光明和黑暗、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斗争	英雄传奇	荣格
	神话	
	宗教	
(5) 从富翁到乞丐：损失和失败	悲剧	正统学派
		精神病学

青春期的成人礼促进了这种转变的发生。如果不能经受这种最初的考验,或者不能干掉怪兽,就意味着无法从母亲那里得到自由,那么公主(灵魂)就无法从怪物的控制中得到解放。这样我们就会进入剧情 5。

对于女孩来说,到达女人的转变是一个更加现实的事情,当然女性意识并不要求她们像男孩子那样从母亲的世界转到父亲的世界。因此,作为女性成熟的开端,她并不需要像男孩子面对更多的要求和漫长的考验(对女性施加的可怕的割礼例外),事实上,对年轻女性来说,现在她们进入了一生中的繁衍阶段。她们经历的仪式似乎是把她们的认知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作为一个女人,她生命的本身就具有创造力,这是男人们永远不会知道的神圣的体验。

在许多文化中,并没有女性成人的仪式,她们成人的感觉是在落入成熟男性手中才建立起来的。因此神话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会躺在某个地方睡觉,直到一个王子到来后吻她,才把她唤醒(在这个过程中也唤醒了他自己的灵魂)。她是躺在灌木丛中的睡美人,或是熟睡中的布鲁海德,等候着齐格弗里德的到来。

在原始社会举行这种成人仪式的目的是帮助个人顺利渡过他一生中这一次关键时期,完成人生舞台中的角色转变。除了成人仪式外,还有加入猎人、武士或巫医队伍的仪式,婚姻仪式,孩子的出生仪式以及亲属死亡仪式等。这些都具有很高的价值,因为它们能够使公众承认转变已经开始的事实,并且通过仪式强有力的象征意义,可使集体潜意识中的原初形象活跃起来,适当地融入生命的各个阶段。这样原初的潜力就会紧密地与个人心灵相结合。

故事、童话以及神话同样具有这个用途。梦也执行着相同的功能。

尽管我们的文化除了军队训练新兵和对学生进行测验外不再提供成人仪式,我们大家不论男女,还是坚持要获得自己的原初体验。这一判断真实性可以从患者身上得到检验,因为在他们的梦中充满了人生关键时期举行集体仪式的象征符号——如成人、订婚、结婚、分娩、离婚或分离,父母或配偶死亡,或者面对一些新的挑战。他们在危机到来或是进入人生新阶段的时候,看起来就会需要获得参加集体仪式的体验。如果社会没有提供给他们,那么自我就会在梦中创造出来。我在其他地方曾经举过一些事例(史蒂文斯,1982)。下面的例子就是我开始撰写这本书时遇到的。

我处身于一个很奇怪、相当原始的地方。一个男孩正要参加成人仪式。他害怕自己因为无法忍受疼痛(我后来认识到那是割礼)而呼喊出来,这样有违自己的男人本色。我对他表示同情,为了安慰他,我告诉了他一则箴言,要他在割礼进行的时候反复念,这样就没事了。

随后主持仪式的首长到来了,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强有力的人,缠着腰带,脸上涂满了各种花纹。在他的手里还带着一件不祥的东西,我猜测那是割礼刀子。他没有看那个男孩,而是走近了我,这显示出我也是他们割礼的目标。这种事对于他们来说既熟悉又恐惧。为了打消我的焦虑,他给我出示了手中的物件。这是一种十字形的器具,看起来极其怪异,它的每一个分支上都打了孔,上面还雕刻着一只握着苹果的婴儿手臂。

这时场景发生变化,我看到一个喷泉,从四个管道里喷射出了四股水流。我的焦虑感又被唤醒了,我知道某种重要的事情就要发生。

梦发生前的晚上,我一直在看电视,里面有关于部落成人仪式的记录电影,但是这本身并不能解释梦中故事的发展和

象征符号的意义。当时我正在写一部关于弗洛伊德与荣格关系的戏剧,但是思想上遇到了瓶颈,我几乎感到自己应该放弃这个项目。我想这个梦一定与此有关,这样的事例对于自我而言正好意味着在成人仪式上遇到的困境。我马上认识到我心中的障碍在于害怕失败,担心遭到同事的批评,因为他们认为我不适合在人生的后半期才开始戏剧写作,而且涉及的内容还是这样两个地位显赫的人物。为了完成这部剧作,我必须从心理上进行一次仪式,但是像所有接受成人礼的人一样,我担心自己不能够通过测试。

但是为什么这一幕戏剧要用这样原始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作为一名 20 世纪末的精神病专家,却发现自己接受入门礼时采取了千万年以前的传统形式。当时那句箴言到底是什么?以及这个神奇的十字形物起什么作用?它们都清楚地表明一种有用的魔力。这种事对于有我这样文化教育背景的人来说真是太古怪和另类了。

在接下来的一天里,我脑海中一直闪耀着这句箴言的影子。每当我决心放弃时,它就突然在我头脑中浮现:“噢, Negrid, Negrid!”我随即就会坐下去继续完成我的工作。从核心上来说,这句箴言可以有三种解读:(1) nigredo——这是一种炼金术语,“使变黑的工作”,它在心理学中带有消沉和希望退入阴影中的含义(黑暗指人性的阴暗面,人往往不愿意承认它);(2) Negro——黑人,在欧洲人的梦中,黑人是现在活跃着的原始人的化身;(3)啊,格特鲁德,格特鲁德,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 4 幕,第 5 场)。

那么这些联系对我的梦和当时我所处的形势有什么影响呢?在这个剧中,我一直集中表现弗洛伊德和荣格友谊的积极方面,以及他们互相帮助共同协作的事迹。我现在认识到了在他们之中正在逐渐积累着敌意,他们之间每一场憎恨都将影

响到下一步的行动，他们的友谊正在被误解和互相指责所断送，而这将最终导致这一幕戏剧的崩溃。为了能够在舞台上表现这些内容，我必须摒弃自己对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尊崇，把他们在阴影下的东西搬出来。我能这样处理吗？这个梦告诉我能够而且必须这样做。

那么这个十字形的物件又代表什么意思？进入我脑海里的印象是一种夸大其词的生殖器崇拜，一个男人的阴茎像婴儿的手臂一样粗壮，拳头部分就像握了一只橘子。在我的梦中橘子可以被苹果所代替，我想这代表着伊甸园的故事，因为梦中另一个场景中的喷泉从中心喷出四股水流汇成了四条河。弗洛伊德学派把泉水看做是生命之水，它在梦中代表了男性精液中的物质。但是无论是花园还是十字器物对我来说都是曼荼罗，它们象征着一个整体的意义。突然间，我明白了这代表着可以用荣格的理论来解释弗洛伊德的难题，即，弗洛伊德学派坚持的狭隘性理论造成的缺陷可以用荣格的方法来进行弥补。性并不是答案的全部，但是它是整个问题的核心。我在写作剧本时遇到的瓶颈，与我在梦中遇到的瓶颈一样，都在于如何验证弗洛伊德性理论的重要性，以及他本人看到荣格的个人观点后内心深处发生的转变。对于我自己的心路历程来说，性心理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真实可信的。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梦中的所有象征符号都是“决定性的”。在那个梦以后不久，我就恢复了剧本的写作，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故事像梦一样，来源于各种人和事，并且按照一定的模式和前后顺序把它们组合起来。灵魂似乎也天生具有这样的表现。看起来我们周围就有大量的剧情存在，它们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整体，我们可以把它们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一旦发生就可以把它们归类。这样的剧情或典型模式是显而易见的，在梦中也一样。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一个梦者在几年中所做的各种类型的

梦进行检验。这种情景还会发生在一个人请别人关注自己梦中故事情节的发展上。一旦关注自己刚刚做过的梦,就可以找出梦中是否出现相互关联的情景。

一个人梦见他驾驶汽车下山时,制动闸失灵了。当他被问起这与什么发生联系时,他记起自己童年时代的一件事,在上学路上,当他骑车下坡时自行车闸坏了。接下来,与此相联系记忆就是有一次在山坡上滑雪时他暂时失去了控制。所有的这些连接虽然多种多样,但总是离不开冒险和失去控制这个主题,每次都是他快速地从高处向下运行。这个梦,以及它与相联系记忆,对于梦者来说都是警告他要小心,因为他发现自己已经处于类似的困境。同时这也暗示了他目前的生活状况:他正在处于“走下坡路”而失去控制的危险中。这种类型的梦对于析梦者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仅告诉我们做梦者现在所处的环境,而且还给出了梦者目前生活中周期性起作用的隐蔽模式。这也说明梦是如何反复跟踪重要的记忆痕迹并不断更新它们的。事实上这些踪迹经常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它们可以给梦者带来强大的精神动力:因此荣格评论说,并不是我们造就了复杂性,而是复杂性造就了我们。这一个重要问题在唐·丘肯的论文《梦和自我认知》中得到阐述,他把这些满载感情的记忆痕迹称为“自知之明”。

梦和记忆

昨日只留下回忆
昨日还只是幻觉，
但今天好好活着
给昨日美好回忆
使明日充满希望
好好珍惜今天吧。

一首梵语诗

正如荣格所看到的那样，这些核心元素与联想和记忆捆绑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复合体，它表现为充满感情的图象。因此弗洛伊德强调，记忆在梦的构造过程中也赋予梦以感情动机。诱发做梦并产生感觉的事件在梦者睡觉以前就已经发生，而在入睡后它又不断强化，并且把记忆中类似的东西都聚集起来，以便为做梦提供素材。这样，弗洛伊德通过自己所做的“艾玛的注射”之梦进行联想，找到梦中隐藏的一些线索，从而得出这个梦是自我辩解和报复心理作怪。但是类似的动机也会影响到相同类型的记忆，库肯总结说，这些记忆碎片可以按照一定的脚本组合起来。（加辰巴赫，1987）这样就像弗洛伊德在分析梦时自然趋向于问自己是不是有自我辩解心理和报复行为一样。难道这不是一个需要改变的思维定势吗？无论如何，这种推测方式本身是有危险的。如果以这种方式考虑下去，弗洛伊德进行自己毕生工作的精神动力就不会存在。而且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会使所有的精神分析学成果变得难以捉摸！精神分析不能归根结底变成分析家的自我辩解。当一个分析家坐在椅子中时，他必须庄严地承担责任。

在提出“感情脚本”理论的同时，库肯还把注意力放在了弗洛伊德的浓缩机制理论上：“浓缩是记忆元素进行比较和匹

在提出“感情脚本”理论的同时，库肯还把注意力放在了弗洛伊德的浓缩机制理论上：“浓缩是记忆元素进行比较和匹

配的过程。更具体地说，如果记忆元素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那么它们就会被装载进一个单一的图象内，或者用一个集中描述的形象代替。”弗洛伊德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通过使用自由联想，可以使记忆的链条发生混乱，无法按照一定的梦中场景进行有序的排列。换句话说，自由联想允许一个人逃脱它们自己编织的樊笼的束缚，揭示出自己复杂思维的奥秘。

睡前事件对相关记忆的激活作用很明显。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晚上所做的多个梦都可以有同样的连续性的主题。而且，深受同样内容的梦的困扰可以持续到第二天。这样，睡前事件能使记忆复苏，刺激记忆合成，并且把典型元素和形象带给意识，但是这些都发生在潜意识的层面，不能被人所感知。无论个人是否能够分析到，这一过程对于自我认知的发展具有微妙但是意义非凡的影响。

正如我们第4章所看到的那样，脑波仪测出的θ节律显示出海马状隆起是记忆储存的一个关键区域，是典型模式和梦的策源地。在这里以及其他的边缘组织内，都有典型模式的存在，它们能够被相关事件激活（受到影响后产生动机和联系），由此构造出记忆复合体和感情脚本。每个晚上，自由联想都可以使这些典型记忆得到认知、巩固，并且可以把它们改动得更能发挥生物学的效率。这个复杂而关键的过程被我们的心灵所体验，这就是在主观上“做梦”的经历。

作为“后见之明”，我们能够看到其他科学家对于记忆的锁链也有相似的观点。他们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区之前就已经认识到梦具有物质基础，只不过他们还不能明确指出θ节律或者海马状隆起对梦的产生所起的作用。梦研究的先驱赫尔维·德·圣丹尼斯(1822—1892)相信他的梦来源于记忆中所存储的陈词滥调（可套用记忆），一旦它们与日常活动联系起来就会形成梦。装载陈词滥调的记忆容器很接近于复合

体,事实上,它的作用就是对过去的信息进行收集整理——把类似的旧想法和形象与旧感觉捆绑在一起,成为一种模具。这一模具在平时可能不会起作用,但是在快速眼球运动睡眠期间它们就会被激活,变得不安分。在这个过程中,过去的经验和反应模式,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的,都增加而且改变模具的内容,使它更能适应现在的形势。

或者换一种比喻,在晚上进行的是一种行政性的工作。那么最近的经验就会被大脑分门别类按照一定的标准放进适当的文件夹内。这是进行浓缩工作所必需的准备活动,以便所有的相关信息能够被放进一个适当大小的图象中去。它与自由联想正好相反(自由联想是把某几份文件从整理好的文件柜中拿出,然后把它们摊开放在桌子上)。对于特定的梦者来说,真正的梦工作就是根据前一天收到的邮件中的指示来对自己的行动指令进行修改。无论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快速眼球运动睡眠不是一段休息时间;这时大脑像日间任何时刻一样忙碌。

梦工作是一种比较和模拟的过程。梦会回忆起过去发生的事情,并找到它与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相似之处。它们不能限制自己把新文件叠加在旧文件上;它们只能是在现有的文件基础上进行集中和合并。此外,梦想中的大脑还会进行横向和非发散性的思维谋,即它可以只看到文件的标题就能判断出有哪些内容是归于同类的——而这些文件在清醒的时候是永远不会被检索的。

由于具有高度的可移植性,梦中的大脑把整个一系列的记忆转移到另一个不同的单元之中,并且能够找到它们之间隐藏的和谐。这样的技巧是如此精湛,以至于它们能够在旧主题的基础上即席创作一个新的主题。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梦中我们都是艺术家、音乐家、剧作家和演员、布景师等。日间

情景的残余可以在梦中被选择作为晚间节目的素材，这样过去所积累的材料就可以作为进一步加工的基础。这样做梦不仅仅是一个贮藏的过程，在其中，短期记忆可以转化成长期记忆，这实际上就是现在许多科学家所探寻的知识宝库。同时，它也是记忆修订与重组的一个过程。在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弗洛伊德理论的局限性。他采取的悲观态度使他对于头脑的创新力并不看好，他一直认为梦中永远不会产生什么新东西，以他的观点，梦中事物不过是过去的记录回放而已。这就使他看不见梦最卓著的特性——能够进行创新发明，把记忆经过重新调配、回放后，就可以超过它们。当我们做梦时，典型的结构被我们梦到的事件快速地应用，它们包含的祖先智慧和能量都被激发起来，我们的个性也会发生微妙的转变。

梦和玩乐

人仅仅是在玩耍中才是真实的。

席勒

梦中的玩乐元素在过去并不是不被人注意。例如，弗洛伊德就很推崇诗人诺瓦利斯的话“梦是抵御单调乏味生活的盾牌；它们给想像力腾出空间，松开捆绑它们的链条，使每天所有的图象都混合在一起，给严肃的成年人以孩子般的快乐。”（伯特，1976）当人体入睡时，大脑可以通过做梦找到快乐。这就像爵士乐演奏家只有在顾客都回家以后才能够演奏出真正的音乐。这看起来似乎很奇异，但是对于所有的哺乳动物而言，

玩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因为这些活动不但可以使它们感到愉悦，而且与它们的生存息息相关——这里的玩乐包括美

食、狩猎、性活动,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玩乐本身就是对自己的回报。通过保证那些年轻的动物充分玩耍,大自然提供了激活无意识的潜力,并且能在玩耍中对自己生命中的关键技能进行训练:如社会合作和冲突、与同伴亲密相处、性活动、耗费体力的战斗、有节制的进攻、猎食、各种仪式、婚姻关系、抚养孩子以及培养创造性等。事实上人生中所有典型的活动都充满着玩耍的可能性。一个人可能接受席勒的名言,认为一个人只有在玩耍时才是真实的自己。而在梦中我们都在编辑着自己的人性版本。在一本关于人类是一种贪玩的动物的书中,约翰·休京阿评论道:“在玩耍中,总会有东西超过生活的需求”——即充足的快乐可以弥补生活必需品的匮乏。这是一条返璞归真的道路:人类伟大的进化过程本身就是在“玩”中进行的,正是通过玩耍,才能不断地出现创新的可能性,这一现象不仅在梦中有所表现,而且还在人的遗传物质中存在。梦总是根据过去的体验排演新的情节,这种变化使物种变异的脚本不断更新,自然选择就这样成为现实。梦是生物进化在微观世界的反映:自然进化原理在心理世界中同样起作用。

有时候进化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赌博。更多的时候是被自然所淘汰。但是一旦获胜,它就会使自己身上发生某种变化以适应自然界的的要求,从而形成新的生命形式。这时,生命体会改进自己的器官功能来面对环境的挑战,从而达成一种器官需求和环境允许之间的妥协和平衡。我相信,这也是大脑在做梦时所遵循的范式。

梦和精神病

症状总是被认为是正当的,并且具有某种用途。

荣格

许多权威人士对做梦现象与精神病症状进行了比较。伊曼纽尔·坎特经过观察后认为“疯子是一个清醒的梦者”,后来又得到克劳斯(1859)的回应。弗洛伊德引用他的话说,“精神错乱是当感觉还醒着时所做的一个梦”。肖篷豪尔(1862)把梦描述为一种简短的疯狂状态,而疯病则是一场长梦,而威廉·旺德(1874)则写道:“我们自己,事实上,可以在梦中体验到‘在疯人院中’所能遇到的几乎所有的情

况。”(弗洛伊德,1976)当代的研究人员,如霍布森(1988),重申了梦和心理具有紧密的联系。

霍布森描述了梦的五个最重要的特征,并且显示出它们如何在精神病中被模仿。这些是:(1)梦具有不合逻辑的内容和结构,对抗自然法则,把时间、地点、人物混为一谈;(2)具有强烈的感情因素,扰乱梦者的精神状态(例如噩梦和焦虑梦);(3)在没有外界刺激的情况下经历充分的感官体验;(4)不加批判地接受自己所看到、听到和感到的一些奇异的和古怪的事情;(5)当梦结束后就很难记得起来。霍布森把这些特点与精神病人的症状进行了比较,发现它们都具有丧失方向感、古怪的思维模式、强烈的感情状态、欺骗、幻觉、健忘等现象。

从正常意识来看,精神病与做梦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失去洞察力:把荒唐的事情看做绝对真实——因此,从梦中醒来就像精神病得到治愈,当黎明到来时才知道自己刚才处于骗局

和幻觉之中,你就会说“感谢上帝!这仅仅是一个梦!”在梦魇中会体验到糟糕的无助或瘫痪的感觉,并且随着恐怖而来的还有精神分裂和肢体僵硬,它被称为“刺激性静止”或“恐怖僵硬”,这种状态在精神病演化过程中时有发生,它是对沉重压力的一种极端反应。极度兴奋和恐惧可以影响到梦中的整个精神状态,这样也会发生临床上的癫狂、恐惧和焦虑等症状。在梦中我们也会得健忘症(我们几乎不记得在清醒状态时发生的事情)。而且我们也会交谈——事实上已经有很多研究人员把梦与科萨可夫氏精神病进行比较,后者的症状表现为在交谈中发生记忆丢失的现象(病人在交谈中会编造细节来掩盖或补偿记忆力丧失的情况)。另外,做梦还与临床上的精神错乱症状相似;而且,有趣的是,精神错乱症的脑电波形状(快波与慢波重叠)与快速眼球运动睡眠的脑波形状相同。

虽然现在还远远不能认为做梦就是在睡觉过程中发生的一种得到准许的疯病,但是这样的推测对于精神病理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没有一个权威比亚里士多德更有代表性了。他曾经认为,精神病患者产生的精神错乱,在清醒状态下人们的幻觉,以及在梦中所经历的离奇体验不是仅仅类似,而且可能共享同一个起源。同样,霍布森也评论说梦可以被看做是头脑中的一种精神产品,它的生成机制与精神病人症状的出现是一样的。这个结论是在超越梦本身领域的情况下对梦的制造进行科学研究所带来的结果:所有主要的精神病症状都能在梦中被处于正常状态的正常头脑所模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梦的研究就是对一个精神病的模型的研究。

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如何使梦具有适应性或创造性的功能呢?如果梦只是一种暂时的疯狂状态,那么究竟怎样去做梦才能够提高我们的生活状态呢?答案就是这依赖于一个人对于精神疾病的态度。如果一个人把所有的精神病症状都看

做是悲惨的和无意义的心理机能不全所造成的后果，那么所有类似的症状都不会给他带来什么有益的影响。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认为精神病症状是对自己所处的困境做出的合乎情理的反应，并且他本人也试图改变这些困境，那么他就会对噩梦中的暗示不那么恐惧了。

这就是荣格所采取的立场。“归根结底，我们并没有发现什么新东西，还是对心理疾病知之甚少，”他写道，“毕竟我们是在挖掘自己天性下的底层土壤。”(MDR)他的关于精神病是自然心理反应的持续夸大的观点不仅被弗洛伊德学派共享，而且得到了许多当代精神病专家的赞同，他们还把解梦学的基本概念运用到对精神疾病的治疗中。例如，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的布兰特·韦恩医生就把所有的精神病理症候群，不管是精神病或是心理病患者，都统计成天生应对策略失常的病人(“天生应对策略”是他对“原型”的称呼)。他认为，不论是否精神健康，“天生应对策略”是每个人所共有的。

荣格在这个问题上看得很远，他认为精神病症本身就是个性化的产物，疾病可以被看做是一种自我创造的行为，是在不正常环境下心智的一种发展历程。因此，神经过敏也是一种适应，它是“内部的适应”，是一个具有健康潜力的器官对于生理需求做出的反应。“由于一些障碍，如持续的过失，教育失误，坏的体验，不合适的观点等等，一个人面对生命中的困境会产生畏缩……”这样，个人的性情就会被扰乱，他无法像其他心理成熟的人那样有效地调整自己，因为在这个时候，他的原初体验无法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及时帮助他克服困难。

精神病就像做梦一样，可以被看做是对自己整体生活状况的一种有意义的反映。如果不把精神病症状看做是一种病理现象，它们就可以像梦一样被当做是一种象征符号，担负着

与自己的潜意识进行交流的重任。精神病症状可以显示出病人究竟在何处遇到了根本性的困境，并帮助病人找到某种解决方案。因此，发现了梦与精神病症状的相似之处并不是说要人消极地接受这种状况，或对梦产生误解。弗洛伊德也正确地看到了梦和精神病症之间的关系——不是因为梦是病理现象，而是因为梦和心理病症都具有调整和适应的特性，而且二者还分享共同的心灵资源。

魔力、仪式和转变

威廉·莎士比亚《亨利四世》	时它们会来吗？	说是所有人都一样，但是当你召唤它们	豪敦普尔：为什么我也一样，或者	魂。	格伦多尔：我能从地心深处召唤灵

当我们做梦时，我们进入一个可以被描述为魔域的世界，在那里，几乎任何事物和感觉都不受到约束：我们能飞到遥远的地方，我们可以与动物和死去的人对话，经历各种非凡的转变。此外，在梦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神奇，不仅自己身临其境，而且我们还会被梦转变成别的东西。但是一旦从梦境中醒来，我们就会感到

自己所处的世界与梦中是多么的不同。没有东西和梦中一样。

当我们从紧张的梦中醒来，我们就会明显地感到在自己身体中有一种远远超过自我的东西在游荡。它是一种超人的力量。这时，我们体验到的生活和我们的世界仿佛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就好像从自然界得到了鼓舞。我们仿佛又一次体验到了童年时期极端兴奋的感觉。

在我们自己的文化圈内,小孩子都像史前人类一样,处在一个魔法环绕的世界中,而且他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点。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即关于他童年的自传。他一直为自己的外部世界充满了秘密和魔力而苦恼,因为他自己无法驾驭它们。例如他做了一个小木偶放在他父亲阁楼里的铅笔盒子中,他还举行过火祭仪式等等。他是一个喜欢做白日梦的人,幻想自己是中世纪一个市镇的统治者。他生活在一座坚固的城堡里,那里面藏着整个世界的大秘密——里面有一个巨大的铜柱,在顶部有一个装载着从空气中提取特殊精神物质的容器。一旦柱子受到挤压,里面的物质就会变成奇妙的金币,从柱子下面滚出。

他这些幻想到底意味着什么?弗洛伊德学派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些情景归结为性的符号。这根柱子可以被看做是男性器官,它的变化无疑暗含了精子产生、胀大和射精的过程。然而,荣格却把它看做是对心灵变革力量的比喻,通过对少年心理的回顾,可以看到这预示着他通过吸收某种魔力从而长大成人的过程。这个幻想城堡和里面的神秘柱子就暗示了他所居住的小楼和里面的私室,这间屋子除了他本人谁都不允许进入。正是在这个房间,他开始进行幻想之旅。

在他的幻想城堡里,荣格体验到了一种发现所谓的“自然界最重要的秘密”时欲仙欲死的快乐。这使他对自我的内心世界更充满了信心,认为自己就是天生为探索未知事务而存在的。他这种强烈的内心倾向使他比任何人都敏感,他坚信我们个人的体验来源于过去进化过程中获得的动物性。“我不活着,我活过来,”荣格说,“我不做梦,我被梦见。”他相信自己的力量不是来源于他本身,而是来自另外一个先验的源泉。这个本原是一种在他的梦中透明的物质,并且如果说他“知道”它的存在,那么仅仅在晚上才能小心翼翼地进行沟通,使它得以

展现。

如果说弗洛伊德相信这种潜意识中的话语实质上是原始的，尚处于婴儿期，那么对荣格来说，这种语言实际上就是人性本身。人性通过神话和梦与我们进行对话。象征符号的超然功能同时也是人性的功能。其中的一部分人性在整个一生都获得自由发展，荣格把它称为“个性化”，埃里奇·纽曼称之为“中心化”，而亚伯拉罕·马斯洛则称为“本人才能的充分发挥”。与众不同的是，荣格把这个程序看成整个宇宙活动的一个方面。我们本身就是本性获得自我认知的手段，她在梦中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个性化是具有创造性的过程，通过它我们把对宇宙的认识变成自己意识的一部分。

我们大家都是由本性赋予活力的想法对于当今的科学世界来说令人沮丧。然而孩子像所有的原始人一样，是天生的万物有灵论者。这是因为他们不仅把动物、植物、树木、溪流、风等都看做有生命的东西，而且看做是具有自我意识的活物。它们能够通过某种神秘的参与活动来开动潜意识机制，这样的行为在临床心理学上被称为“投影认知”。具有“天性神秘”的浪漫诗作采用了深思熟虑的审美意境，它通过天生的富于想像力的技巧表达自己的审美观，这极大地影响了荣格对于心灵目标和功能的理解。

不论人们是否接受荣格对于心灵和自然之间关系的看法，毫无疑问我们都可以体验梦境。如果我们能够把自己融入梦中，与那些原初精灵在一起，那么我们人类的灵魂就会得到进化，我们会感到自己进入了原始森林，漫步其中。在这里，生命之水流过古老的迷宫。现代世界所看不到美丽震撼着我们的心灵。然后，一个鲜活的世界开始进入我们的知觉——这就像我们在孩提时代所经历的那样——这给人以奇妙的感觉，或者充满魔力、阴森恐怖，或者留有神迹。

梦中风景对于我们来说和现实看到的基本相同，并不感到特别神秘，用荣格的话说，这是因为我们与生俱来就接受了某种虚拟的原初映像。但是在梦中风景所唤起的感情方面，会有一种强烈的宗教感，这通常与原初形象相联系，也和我们神秘的过去时代所进行的仪式有关。醒了的情感能拥有宗教的紧张，经常与典型的数字和与季节有关的仪式联系在一起。那么这种梦的作用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总是创造像奥西利斯一样的诸神，为它们奉献贡品，然后对他们顶礼膜拜呢？我们梦见它们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吗？神学、神话和仪式是不是梦的延伸，以至于醒来后我们要把它作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梦是不是一个乌尔古城，等待我们去发掘？它们很可能是的。纽曼观察到人的魔法与宗教行为是“所有文化的源头”，通过这些自然仪式，人们赋予自己的灵魂以天人合一的魔力。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所有远古时期的人类都愿意履行宗教仪式来祝愿阳光普照、五谷丰登，而忽略了即便他们不祭拜，庄稼也照样生长，太阳也照样东升西落。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魔力核心。在一本伟大的但是充满误导的书《意识起源史》里，纽曼把耕作和祭日仪式以及在旧石器时代的射猎场景相提并论。他认为岩洞壁画中杀死牡鹿的仪式大大提高了牡鹿实际在射猎中被杀死的可能性。原始人真正体验过这种场景。西方社会的成年人不会认为这种情形真的存在，但是儿童可以完全明白其中的含义。作为上次战争中的一位英国学龄儿童，我对战争做出了一个重要贡献，即在练习本上画出了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被喷火式战机击落的情景。根据纽曼的观点，有魔力的仪式，特别是宗教仪式，只对仪式表演者发挥作用。这样做的结果，不管是在射猎还是在战争中，都取决于魔法仪式对主观心灵的强大影响力。我们的现代科学则给了我们假设，即，旧石器时代描述一头牡鹿

死亡仪式的壁画并不是去关注动物本身，而事实上，纽曼说，“仪式的魔术效果已经足够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并没有给人以虚幻的印象”。这样，正如原始人所预感的那样，他们将在狩猎中取得成功。然而，这种效果是经由主体（猎人）而不是经由客体（猎物）所获得的。（纽曼，1954）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在最高层面上，目标达成依靠魔法仪式的效果”。根据理性主义的观点，我们会说这不过是无益的虚幻而已，因为“决定某件事结果的是客观现实而不是主观臆断”。（同上）在这里，纽曼已经做了几个荒谬的假设——也就是，用个体发展（单个的发展）概括了系统发展（进化的发展）；认为史前人类都是“无意识”的；而且西方意识也从属于来自其他文化的压力。这些假设没有一个能经过生物学上的检验的。我们可以在梦和仪式之间发现共同的特征，因为它们都可以对主体施加不断增强的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梦是夜间非自愿的仪式。

7 符号论

当我看自然界的物体，例如朦胧的，遥远的，清光穿过沾满露水的窗玻璃的月亮时，我就像在寻找我身上亘古存在的符号的语言，而非在观察新的东西。即使新的现象存在，我仍然有一种模糊的感觉，就像新的现象是我内在本质中被遗忘的或者隐藏的真实东西，这些东西正隐隐约约地苏醒过来。

塞缪尔泰勒·科尔里奇

从做梦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人类心理的最非同一般的能力，是它具有编织图象的天才。什么时候图象变成符号？什么时候它被赋予意义？在德语单词 Sinnbild (Sinn 意为意识、意义, Bild 意为图象)里，这些非常明显。符号这个单词的词源本身就具有启发性。希腊语里的名词 symbolon 指一个金属牌或木符，它们可以被用作对身份进行确认。像骨头一样的物体，可以破成两半，每一半分别给予两个人（也就是，同一集团或秘密社会的每个成员），通过出示这一半并检查它们是否能合在一起，彼此就能确认对方的身份。进行交往的时候，每个木符的持有者都知道自己的一半是真实的，symbolon 两部分之间的“完全吻合”是满足别人以诚相待的准则。如果刚好合适，在熟悉的（已知的）和陌生的（未知的）人之间便立即产生了心理学所说的“完形”。同类 sym（等同于 together）和异类 bolon（从 ballo 演变而来，等同于 I throw）的结合，强调了这样一种思想：为了建立连接已知的东西和未知的东西之间的桥梁，或者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建立意识跟无意识之间的桥梁，必须促使陌生的东西走近熟悉的东西。

符号的形成,需要心理的有意识和无意识进行结合:它就是炼丹家称做的“结合异类”。对于其中一半,另一半是不可少的:没有意识的形成,无意识之流就得不到认识;如果跟无意识之流相分离,意识就会缺乏营养。因此,如果认为符号为心理健康和生命活力提供了营养,是毫不夸张的。

这种建立桥梁的心理能力——它用一种符号形式把不可协调的过程统一起来,被荣格叫做心理的超越功能。超越功能本身以符号形式频繁地出现:最具启发力的是希腊上帝赫尔穆斯(罗马人的上帝)的魔杖,魔杖有两条蛇相互缠绕。赫尔穆斯是上帝的使者,也是灵魂的传播者,是上界和下界、意识王国和无意识王国之间的人。赫尔穆斯用他的魔杖点击人时,他们就入睡并进入梦乡。

荣格对梦的符号的理解,根本不同于弗洛伊德。实际上,他们各自对于符号的态度,最能清晰地反映出两者之间气质的差异。对于弗洛伊德来说,符号是无意识的想法、冲突或者意愿的形象的表达。它是一个代用品,它有效地掩盖了它所表达的思想的真实含义:剑是阴茎的符号,鞘是阴道的符号,把剑插进鞘意味着性交。在荣格看来,弗洛伊德的符号不是符号,而是一种标记:“对已知事物化繁为简,进行简洁指明。”它一般指已经知道的东西,体现出了固有的意义。荣格对符号的理解大不相同。对他而言,符号“对相对不清楚的东西可能作了最好的概括”。这些相对不清楚的东西不能更明晰地表示出来:它是“直觉思维的表达,这种直觉思维不能以任何其他的或者更好的方式表达”。(CW6)对荣格而言,符号从不代表其他东西(这跟弗洛伊德的看法一样):符号可能是符号本身所具有的含义的最好表达方式。

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是即将被排干的不健康的沼泽,或者至少是自私生存的地盘。对荣格而言,无意识是流动不息的

溪流，它在所流经的地方哺育了心灵的风景：自私不断地被无意识日益增长的生活影响更新并重新焕发生机。在荣格学派看来，把符号分成不同的部分再对各个部分的含义进行解释，是一种活体解剖——把本应保持完整的活的东西剖开。

生存还是死亡的符号

恒挑战。

符号是对我们的思想和感情的永

荣格

荣格坚持认为，符号中本质的东西是符号的独立存在性：它们是具有自我生命循环的活体；它们问世，然后经历繁荣，再枯萎，最后死亡。只要符号具有意义它就具有生命力。但是，一旦它的意义不再存在，一旦发现符号的表达（它规定了所追求的东西）比被接受的符号还受到更大的尊敬或崇拜，那么符号就是死亡的。死亡的符号仅仅是通常的标志。因此，不可能创造（也就是说，自愿地在自私的意识

中进行创造）活着的符号，即从已知的联想得知的充满意义的符号。因为所产生的东西除了已经给予符号的东西外，什么也没有。

对于个人和文化来说，根据它们的年龄和所处的历史时代，符号既是死亡的又是活着的。在童年时代具有巨大生命力的符号，在我们长大时，经常失去它们的魔力。对于文化符号，这一点同样适用：举个例子来说，曾经是基督教精神符号的十字架，在我们当代大多数人中已经失去了激发虔诚的力量。只有当符号最好和最高地表达了某些受到崇拜但旁观者还未知晓的东西时，符号才真正地存在。符号迫使他进行无意识的参

与,并具有产生活力和提高生活的效果。(CW6)

分析证实了荣格的主张,即活者的符号具有产生活力和提高生活的效果。这是怎么发生的呢?荣格在《性欲的形成和符号》中,给出了他的答案。他声称符号提供了这样的方式:通过这些方式,精神动力可以从一个较低的应用模式转化到一个较高的应用模式:“形成动力的心理机制是符号,”他在《论精神动力》中写道。换句话说,符号论是动力形象的思想。这种具有丰富含义的动力,给符号以产生影响的能力,使符号可以影响自私意识使其重新确定自己的方向,提供了一条带领做梦者超越他现有环境的新道路。在体现、集中和理解以前的未知真理时,这种动力的转化强调分析的“惊奇”体验。荣格坚持说,当符号“被扩大”,没有进行分析归纳,或者归纳于已经经历的事件时,这尤其可能发生。

符号具有的生气是否被理解,是由人们接受符号的有意识态度决定的。形象本身就像物体一样没有意义,只有当我们赋予它们意义时,形象才获得价值。精神健康和个人幸福的源泉正是存在于此。生活在无意义和无价值世界的人们是病态的。他们很感到压抑,他们需要符号的灌输,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符号银行。治疗的艺术是给病人提供可以利用的资源,以便提供与病人需要一致的符号,秘密在于,这个银行不是位于大街上,而是位于自我身上。

符号的起源

灵魂有它自己的标识语，这个标识语根据灵魂的需要而成长。

赫拉克利斯

传统的心理分析方法，以及当代的许多心理疗法，都敌视符号，因为符号被概念化，被分解和简化。在科学和技术方面，这种敌视态度更明显。不能否认，对事物简化成各个部分再进行分析，使伟大成就的取得成为可能，但在此过程中，我们很快失去了符号意识所能带来的生活的提高。这样，在科学的进步中，我们失去了中世纪统一的宇宙秩序观，这一秩序认为地球处于上帝统治的道德世界中心，我们没有

发现同样的令人满意的观念来填充这一空缺。我们已经变成了理解世界而发明理论和建构信仰体系的人，正是这种倾向产生了巨大的符号传统。

许多人将会同意 J. E. 西洛特的观点，即这座符号的水库被同样的水源充满了。但是，就像 J. E. 西洛特一样，这些人不愿意确认，是否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史前社会某一个“原始的焦点”，符号起源于某一人类社会。这些人也不愿意肯定，是否它产生于我们大脑进化的共同结构和共同倾向。最牵强的解释是，原型的结构和文化影响都被包含进去。在所有的可能性中，很可能持续存在的符号的传统和神话，是那些被最仔细地吸收进原型需要中的传统和神话。

任何地方的人类心理，其作用方式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一结论现在不容辩驳：民间传说、神话和迷信的普遍的主题，为这种主张的成立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证据，就像认真的东

方学家、文化人类学家、荣格学派分析家、艺术历史学家、神话研究者以及那些精通比较宗教的秘密分支人的研究，为这种主张提供了证据一样。所有这些都证明了符号形式在多样性中存在着内在的“单一性”，对身体语言、手势和面部表情以及支配口头交流的“深入结构”的研究，也指明了所有文化现象的同一种原型的起源。文化所做的东西是：为在本体的发展过程中吸收原型模式提供了一种传统。这样，神话中出现的形象的种类同特定的文化传统相联，因此它们的形式是普遍的（例如：长得像龙一样的怪物、一半是人一半是野兽的奇妙动物、眩目的光柱，像坛场的几何形式，等等）。

就像奥托·兰克指出的，“神话是民族的集体之梦”，约瑟夫·坎贝尔在其格言中发展了这一想法：“神话是大众之梦。梦是个人的神话。”如果每一地方的人们都倾向于梦同样的主题，制造同样的符号，那么文化传统就有助于塑造这些符号，赋予符号文化传统特有的民族本性。只要人类存在，生产这种通用类型的符号的原型倾向将继续发展，不管它们的文化状况如何，所有的符号都是集体倾向和个人经历相互作用的产品。普遍的东西亘古流传，个人的东西则跟现世和现时相联。符号是两个东西之间的纽带。符号越古老，它的根源发育系统就越古老，它就越具有“集体性”和“普遍性”。符号越不一样，从制造符号的个体的本体特性的角度而言，符号色彩就越多。

当人们开始思考自己在自然界里的处境，而不是盲目地在自然界生存时，神话和宗教符号就产生了。很明显，大约60000年之前，我们身上发生了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对天体生物学热切的关注开始了。从纯粹灵魂的和图腾崇拜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文化经过了石头的、月亮的、太阳的几个阶段，随着10000年前农业和畜牧业方法的发现，我们形成了这

样的观点：天体、数字、植物和动物，它们都遵循一定的法则，遵循可预见的规律，遵循可以获知、可以研究和为了未来几代人的利益而记录下来的循环节奏。它们随着多神论、一神论以及最后炼丹术、道德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发展。所有这些发展都决定于符号的使用，这些符号是能够给混乱制定秩序的调节规则，在人类文化和文明的进程中产生的基本符号，一直持续到今天。

典型的符号

如果我们认为，心理表现除了诱发了更多的东西，那么一切心理的表现就是符号！

荣格

在调节一般的和特殊的过程中，符号揭示了自己原型的起源。就像一个指纹是其所有人特有的一样，它具有自己的特征，使我们能够认出它是什么。因此，一个单一的原型模式可以在大量的符号形式中得到表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符号的比较研究是相当重要的。只有当一个人收集并研究了大量的符号时，这个人才能探测出支配这些符号的原型。

就像达尔文表明的，物理形态学的研究揭示了在结构的明显的多样性中，存在少量一些基本形式。这同样适应于文学情节和梦里的符号。

因此，符号论通过类比起作用：就像太阳升起驱除了黑暗一样，英雄从鲸鱼的胃里诞生，自私从无意识获得解放，孩子脱离了母亲而得到自由。就像太阳到达天空最高点，英雄赢得了公主和王国，年轻人结婚并在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角色。经

验表明这些类比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它们使西洛特称做的“充分实现身份的天性”得到满足。不同的形象相互吻合,“揭示了本质上的忠诚”。虽然它们存在的方式不同,但它们在符号上是统一的:客观上的差异在主观上是一致的,这个统一体释放出了一股精神能量。啊哈!这就导出了亚里士多德对梦的评论,即梦的杰出阐释者是能最好地察觉类似点的人。(1900)

在不断地跟当代人交往的过程中,集体的无意识促使着新符号的产生。符号是肉体,原型的骨架在其中清晰可见。最抽象的原型的规则以这种方式清晰可见,它们以人的形式或者以动物的鲜活形象,或者以无生命的方形、圆圈和桥的形状出现。因此,雄性的天性和雌性的天性,阳和阴之间的原型关系,可以由性行为中男人和女人的坦率的形象来体现,可以用把剑插进剑鞘,或者太阳照明月亮来体现。善恶之间,光明和黑暗之间的原型冲突,是英雄跟恶龙之间斗争戏剧的无所不在的主题,英雄把恶龙杀死或者将其变成了猎物。人生命周期的一般过程,在太阳的上升,太阳处于最高点和太阳的下降中得到体现,在生命的磨难中得到体现。

这些形象不仅在人类史学家记载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中很丰富,而且在现代男人、女人和孩子的梦中也很丰富。尤其是在孩子们的梦中更丰富。这样,符号就是原型的意愿和需要的预言或者比喻。每个个人、家庭、社会、民族都会制造适合于自己境况的符号。虽然它们种类明显多样,但它们都建立在共同的结构形态上。例如,雄性的典型被认为具有一切潜能和特性,通过这些潜能和特性,雄性展示了自己。这样的潜能和特性有:渗透,进攻,竞争,自负,生殖力和保护的一般倾向,以及具有雄性特征的行为方式(求爱,交配,制造工具和武器,捍卫家园,执行法律,谋求主导地位,捕猎,战斗)。所有这

些倾向和行为方式，都有自己的符号关联，通过这些关联，典型的雄性在神话、梦、传说中得到体现：它们是集体的标志（如生殖器，死的支柱，长矛，公牛，耕作，骑士，国王，耶和華），以及个人可能具有的个体标志（例如他的刀子、钢笔、足球、靴子，或自己特有的与其兄弟、父亲、校长或军士长相联系的东西）。在成长的过程中，男孩子从这些个人的和集体的渠道用自己的符号炼丹术来合成自己的雄性身份，而女孩则以相似的方式发展自己的意向（她个人心理中雌性的复合体）。

符号因此是我们在可看见的现实世界中编纂意思，并把意思赋予符号的工具。它们是可觉察的规则，在其背后隐盖了有意义的意图。解释的艺术是将位于规则背后的意义神圣化，并把它转换成语言。但是语言不能仅仅限定意思，而永远不把意思讲明白。语言解释了亲密性、可能性和感情，但符号则在口头语言所能表达的范围之外引发了这些东西。那就是为什么符号必须在想像中进行琢磨，必须被描绘，被塑造并获得其应有的价值，无论怎么使用，都永远不能穷尽符号。只有那时，符号复兴的力量才能得到体验。

典型的毒蛇

没有其
他国家比
非洲拥有更
多的危险动物。

查尔斯·达尔文

毒蛇是一个典型形象，我们可以从它的无处不在，它引起人们的畏惧、迷惑和可怕的力量想像这一形象。为什么现代城市的居民，一在动物园里看见蛇就不仅感到心灵的突然震颤，而且会做一些有关蛇的梦和噩梦（这些居民无缘无故地怕蛇，他们以前从未接触过蛇）。对于生活在蛇

群出沒的沼澤中的捕獵者來說，這種敏感是可以理解的，但對於一位曼哈頓銀行的職員來說也是可以理解嗎？顯然，這裡涉及到了一些種系的東西。為什麼我們繼承了易於受虛構的蛇影響的習慣呢？可能是因為，許多危險的蛇曾經栖居在，並且仍然栖居在非洲那些地區，我們的物種曾在這些地區進化。很明顯，含蓄地存在於一些虛構的危險中的危險意識，作為原型的潛能已經在我們的無意識中扎下根來，這些意識已經在人类的染色體中確立下來。這解釋了為什麼我們仍然害怕蛇（對我們沒有危險的蛇），與之同時卻沒有體驗到對於汽車的害怕（汽車是最具危險性的）。這種典型的傾向是怎麼獲得並且傳給我們的呢？不是像榮格指出的那樣，是由在幾千年的人类生存中的重複“雕刻”在心理上，而是通過時間——自然選擇的神聖的生物學儀式傳給我們的。被繼承下來的不是蛇本身的原型的形象，而是覺察到蛇的形態具有危險的一種傾向。蛇具有這樣一些特徵：身體長長的，彎彎曲曲的，滑溜溜的，它長有毒牙，叉狀的舌頭不停擺動。每一物種都在其典型的環境中進化，它在生命循環的過程中遭遇了典型的境況。作為基因變化的結果（這一變化自發地發生），某一物種的個體將會隨機地獲得一種特性，這種特性使它比它的同伴更能適應特定的典型環境——比如，更能意識到蛇的危險。這一個體能夠幸存下來，並把它的新的基因材料傳給隨後的幾代。後代具有合乎需要的特性，使它們更有效地在生存鬥爭中進行競爭，從而在繁衍後代上取得更大的成功。結果，新的特性最後作為物種基因結構的標準組成部分確定了下來。

我們的典型傾向，已經以這種方式適應了在祖先的生存環境中所碰到的典型環境。在成千上萬年間屢次發生的，偶然的自然選擇變化，導致人類形成現在的基因類型或典型結構。這種類型和結構就像在人类的身體構造中表現明顯一樣，

在人类的心理结构方面表现也很明显。

因此,我们倾向于并准备跟下列东西打交道:典型的形象(例如,母亲、孩子和配偶),典型的事件(如出生、死亡、跟父母分离、求爱),典型的物体(如水、太阳、鱼、食肉动物和蛇)。这些东西都是为了在祖先的生存环境中使我们适合于生活,而由进化赋予的整个天赋的一部分,这些东西都在梦的心理,行为和神话中得到了表现。荣格以一向缺乏生物学的精密的方式,对它进行总结如下:“集体的无意识,是花了永世的时间才形成的世界的形象。”在这一形象里,一些确定的特征,典型物种或者优势种,已经在时间的岁月里结晶成型。它们是统治力量。(CW7)

我们都继承了一种倾向:我们情感上对蛇样的形态反应强烈,我们在梦里创造了蛇样的形象,这说明我们的脑袋里具有了基因认识的一些能力。因此,认识范畴“蛇”的内在倾向跟其他的倾向齐头并进,其他的倾向如:早在人类的婴儿认识一张自己所依附的特定人脸的特定形状之前,婴儿就具有认识基因范畴“脸”的能力。很明显,所有的灵长类动物都属于“蛇”这种范畴。确实,现在有证据说明脑皮层有“分辨脸”的细胞。这些细胞一定以某些方式参与创造出非常详细的充满特征的脸,一个人可以在催眠中看见这些脸,就像他在睡眠中看见这些脸一样。不可能同样存在“产生分辨力”的细胞。那么,一个简单的,被设计用来保护我们祖先不受危险爬行动物危害的警报系统,是如何归纳成为一个如此丰富的有关蛇的符号的规则?一个符号可以表示如此众多的不同意义,一定是因为弯弯曲曲的,滑溜溜的形象易于受到其他的典型形象——如那些有关性、魔鬼、愈合等形象的污染。自我通过混合它掌握的形象建构了自己的形象,就像艺术家把不同的颜料混合在一起。例如,1868年3月9日,约翰·鲁斯金,一个经常地

做性噩梦的人,梦见自己展示给年轻的侄女琼一条蛇,并让她触摸蛇的鳞:“她又让我触摸蛇,蛇变成了一个臃肿的东西,就像水蛭吸附在我的手上,因此我几乎不能把蛇拉下来。”(罗森堡,1963)在这个梦里,蛇很明显是表示罪过、恶心、恐惧和生殖器的标志。在科库勒的梦里,跳跃的蛇提供了一个解决科学之谜的办法,而在伊甸园里蛇则表示性的诱惑、魔鬼以及对上帝意志的背叛。在所有这些例子中,长度和弯曲性是基本的特征,这一特征又被加上了另外的意思。

实质上,毒蛇象征神秘莫测的东西,即处于我们身体内外的最原始的能量和力量形式。蛇的特征形态跟人的大脑茎和脊椎线相一致,它代表我们进化的爬行阶段。在无意识中睡眠的蛇,蜷缩在生命力之坛的最低处,它是一个仍然潜伏在神经系统核心的爬行生命。信奉瑜伽者相信,通过实行精神戒律可以引诱毒蛇蜷缩起来通过六个生命之轮向上运动,直到它抵达第七个未命名的生命之轮。第七个生命之轮位于前额(天目未开的第三只眼睛)。这又是一个个人化进程的比喻,个人化进程是精神能量和潜力从最低级的源头上升至最高级的表现模式。有趣的是,几个阶段通常具有数字七——金字形神塔的七个平台,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墓地梯子的七条通道内,它们是进行密特拉教仪式所需的七块金属,通向炼丹大路的七个步骤,等等。七的符号标志,跟七大行星和七大罪孽(以及弥补七大罪孽的七种美德)相联系。屡见不鲜的是,神话和传说中的怪物有七个脑袋,征服它们就是要征服行星所产生的影响的邪恶方面。七的特殊重要性似乎归因于这样的事实:七是第三和第四的相加,但是这种种系的意义还不太明确。

与蛇紧密联系的是另一个个人化的符号:宇宙之树。树应该表示个体化,以及意识的提升,这些不能不跟我们祖先攀登树,以便把树当作瞭望地点的实践联系在一起。但是在这里,

符号论又一次变得复杂。在某种意义上，树是阴茎一样的东西，它直立，强健，而缠绕它的蛇则弯弯曲曲，具有依附性，柔弱。在这个例子中，毒蛇是小人，即亚当和夏娃的迷惑者，夏娃本身跟古代阴界的腓尼基女神联系在一起。像所有的符号一样，想像中的这些符号被典型的倾向规定为将现象分解成相反的部分：树是被邪恶的魔鬼天性所环绕的善的生命之树。蛇本身也可以作类似的分解：阿斯克莱比亚的棒被疾病和愈合的天性环绕，而赫尔穆斯和墨丘利神的神杖上相互缠绕的两条蛇则象征了邪恶、健康和疾病。对于许多不同的医疗传统来说，蛇是神圣的：它能杀死人，也可以治愈人的病。同样的天性在同种疗法的实践中很明显：对引起疾病的因素的控制，会产生治病的效果。

就像所有的典型的符号都跟蛇联系一样，不同的文化都以其特有的方式跟毒蛇相关。它对犹太人来说代表了邪恶、诱惑和性的冲动，对印度人来说它是沙克提，即宇宙的自然力量。然而，蛇能激发敬畏、恐惧和谨慎的力量，这一点对所有人类社会来说都是共同的。它具有的蜕掉旧皮换上新皮的本领，则让人们把它跟复活、不朽和生命的延续广泛地联系起来。

最后，具有半是蛇龙半是人的食肉动物的神话传统是那么多。在人类想像的动物中，这些动物一定最早：胡穆巴巴（被吉尔伽美什和英吉度杀死）、米诺塔（每七年它就要人供奉七个男孩和七个少女来食用）、巨蟒（它被阿波罗压服在特尔斐）、美杜莎（它的头发是扭曲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毒蛇）、赛伯罗斯（它是冥府的守卫者，它是一只喉咙藏有毒蛇的三头狗），所有这些都跟我们古老的起源联系在一起。“他们暗指，”就像西洛特说的，“构成最深的精神地层的底部力量。”它们的天敌是英雄，从种系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他们之间的斗争代表了我们的灵长目的祖先跟危险的野兽之间的真实斗争，我们的祖先

被迫跟这些动物争夺地球的资源。智力和语言的进化,加上我们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为我们提供了赢得这场竞赛的“魔力”。

跟怪物的斗争是我们重建自己的梦,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怪物是处于人的阴影复合体核心的怪物。我们认为贪婪的,猖狂地侵犯无辜者,具有毁灭性的食肉动物是怪物。在每一代人中都必须重新取得英雄对怪物的胜利,因为单单是胜利本身就可保证集体的维护和持续生存。结果,每一代都制造了自己的怪物:莎士比亚的凯列班,萨德的120天的鸡奸的淫荡行径,玛丽·雪莱在《弗兰克因斯坦》里可怕的创造,布拉姆·斯多克的德拉库拉,诺曼·哈里斯的《沉默的羔羊》,所有这些作品的典型主题都是掠夺、恐惧和英雄的斗争,我们对于这种主题,就像原始荒原上我们的祖先对于这种主题一样反应强烈。例如在电影《大白鲨》和《侏罗记公园》里,都播放着典型的怪物野兽和它的征服者之间的比赛。(高升,1995)

因此蛇是能引起巨大兴趣的符号,因为它用某种方式把系统发育学和象征学连接起来,不光支持了荣格的原型的假设,而且使这种作用的模式既可以理解又对梦的研究有用。从神经学的观点来看,这种同蛇有关的符号论,维持着新皮层和边缘系统的联系线路的畅通,使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对话功能产生。旧的大脑不具有语言的天赋,不能求助于语言,不得不利用符号来概括脑里的交流,这提供了一种新旧大脑都可以理解的“世界语”。符号是信息的媒介。具有语言交流以及讲述经历的才能的前脑,把这些符号信息转化成可以讲述的形式。结果就产生了我们所称作的梦。

8 梦与治疗

世间所有的意识是相互脱离的；但是在原始的漆黑的梦里，所有的更具有普遍性、真实性、永恒性的人类却是相同的。在梦中，人类仍然是一个内在的整体，但是相互之间由于缺乏个性而无法辨别。梦就是产生于这些相互联系的深奥之中的，但梦决不会是幼稚的、怪异的和邪恶的。

C. G. 荣格

释梦，像其他心理疗法一样，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因此就不存在一种正确的或者错误的方法来诠释它。每个学派都把自己的教义反复地灌输给它的学徒，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积累，每个治疗家都会演变出一种个人的风格。最终，就发展为有多少位从事释梦工作的治疗家，就会相应地有多少种理解梦境的方式了。

我个人的对梦境的分析方式在本质上属于“古典易雍学派”（塞缪尔，1985），但是，接下来，我将不可避免地，描述我是如何释梦的。因此我应该郑重告诫读者：我将要作的阐释必然只是一种片面的观点。我并没有宣称我的方法是正确的方法甚至是最好的方法。那仅仅是对于我和我的病人们在取得一种我们所感觉到的治疗成果的过程中最成功的一种方法。并不是所有的治疗家都同意释梦分析是治疗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有些治疗家把释梦作为一个枝节问题，甚至是对“真实”问题的一种抵御。这些人把释梦看成是治疗家和病人之间的一种潜意识的关系——即所谓的转送与反转送关系，这些理论先驱者们有权保留他们的意见。在我看来，释梦分析

比任何其他的治疗方法更确定和快速地探触到心理问题的根本(以及这些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法)。梦总是表露出比自我所能知道的更多的东西。不管我记录下多么详实的内容,不管我的问题多么精辟,也不管我得到了多么诚实地回答,我很少感到我已经了解了某人,直到我听到了他们的梦。然后我才开始理解他们。在有意识的水平我们可以认为我们知道自已的问题存在于何处,但是我明白只有在潜意识的水平下的知道,才是确实的知道。这就是荣格在被人们问及他们应该如何面对他们的生活时,他回答说不,而反而愿意听听他们的梦的原因。对他而言,梦是“一种在有意识的头脑控制以外的一种不知不觉的,潜意识的精神过程的表达。梦能表明病人的内部真相和现实;不是我臆测它是即是,亦不是他认为它是即是,而是它本身就是……”(CW16)

梦所提供的关于问题本身和它的历史的珍贵数据已经足够重要了,但是,正如荣格所发现的,它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它可以矫正情形,它可以补充正在失去的物质……”(CW16)换句话说,它可以接近一个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这就是梦之所以不可缺少的原因:为建立历史记录、诊断、治疗提供必要的数据。

潜意识能获得有意识的头脑所无法获得的智慧这一现象已经不止一次地在神话和传说中被表明。一个犹太教的故事提到,在我们出生以前,一位天使是如何揭示关于天国和人间所有灵魂的一切,以及我们人类的命运将带来的一切的。然后,在人们出生的瞬间,天使用手指轻弹一下我们的鼻子,我们就迅速地忘掉了我们所看见的和知道的。只有到了夜晚,我们的灵魂超脱出身体,再次登上天堂,才能带回新的生命和智慧用以指示我们次日的的生活。爱德华·弗希特蒙特(1990)指出,这就表明了“一种动态的与‘回忆’起灵魂在诞生到这个世

上之前就‘知道’与大大小小的事情相似的象征性的梦境……(这些)基本的存在模式或典型的成为个体生命基础的动机。”

易雍学说的观点认为：释梦的目的就是通过梦和积极的想像力来调动某些超然的功能，从而帮助个体探触到这个原型的世界。西非的人们则普遍相信自我世界和原型世界的关系是由每一个个体与天国的圣灵们所达成的一种出世前的契约决定的。根据他们的观点，在你来到这个世上之前，你与你的圣灵达成某种契约，规定了你和你的生命种种——你的寿命将有多长，你对社会的贡献将有多大，你将会和谁结婚，你将会有几个孩子，等等。然后，就在你诞生之前，你被引向忘记之树，你拥抱它，就从那一刻起，你就会忘掉所有关于契约的细节。你将从此遵循你的契约里的条款而生活。如果你没能做到某一点，你就会生病，并且你将需要占卜者的帮助，而占卜者将使用他所有的技能来接触与你签定契约的圣灵，从而发现你到底在哪项条款的履行上失败了。(霍顿，1961)在西方社会，分析家们取代了占卜者的角色。

灵魂在每个夜晚冒险过程中事实上“记得”的那些东西，那些通过每个男人、每个女人、每个小孩的集体潜意识包装起来的人类秘诀的概略，并非源自天堂而是来自本性。本性也拥有独到的权利，它拿着小槌，时刻准备通过一种病症，一段情感，一次梦魇来命令自我。本性的动力趋向一种赋形化：在个体的现状中实现永恒的人性，此时此地——也即基督徒作为上帝化身为人的意图所在——弗洛伊德讽刺为一种人类婴儿对父亲式领导的渴望，荣格则把它看成是一种个性化的寻求。

精神防御

一旦勇气归属我，我便拥有了神秘；
一旦智慧归属我，我便拥有了权利；
经过退却的世界
进入到那没有围墙的根据地。

威尔弗雷德·欧文

灵魂如同一幢大厦，我们大多数住在顶楼，留给大厦太多未开发的空
间。因此，我们的生活是被抑制的，
远远比不上它们所需要的那样，而且
我们太多的才能被闲置和废弃。我
们时常感到自己能从生活中获得更多，
把我们的失败归因于外部的条件——
缺少金钱或者机遇——却没能
意识到那些必备的资源就在于我们
自身。如果我们紧紧跟随着我们的

梦境，我们会被引领到大厦的第一层，甚至地下室——同样是有着别一番风景的地方。我们可能不会总喜欢我们在那里的一切发现，但是，一旦进行探索、冒险，发现和惊奇就会随之而来。实践中，它绝不会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过程，因为梦本身是不会把它们智慧反映成个体所能轻易理解的语言的。只有依靠经验，人们才可能理解梦通过隐喻、寓言等等所传递的讯息，从而学会钦佩人类存在这一永恒主题当中的富有灵感的变化。由此，释梦分析可以被设想成为一种教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接受精神分析的人习得某种能够规避开忘记之树或使天使对鼻子的那下轻弹失效的艺术。

对于某些人来说，这可能是一次艰难和痛苦的经历，因为他们生活着的公寓，不仅仅是要塞一般的顶楼，一个守卫森严的城堡——压抑和否认是它的指挥官。抵御着来自外部世界的潜意识的同时，这些被围困的生命逃亡者们躲在安全的城

垛的疆界里消磨着日子，每天重复着填满他们的生活。只能在晚上，他们才胆敢游荡到墙外的世界里。梦，在分析过程的早期，能形象地说明这点：做梦的人们如同身处监狱或是集中营；突然某个时刻他们意识到了原来这里的大门已经敞开了很多年，而且没有守卫。分析家们的职责之一就是为其病人提供一个足够安全的环境——从而让她敢于冒险走出她自我防御的监狱，并且重新开始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然而，如果认为梦总是产生出如此清晰的信息将是一个错误。即使是面对一个在指明不确定性别病人方面经验最丰富的人，我也愿意使用“她”这个字眼，因为我想通过这种方式明确告诉大家我不仅仅是指“她”也是指“他”。有统计数据可以为证，多年以来，我护理过的女性病人多于男性病人（比例大约是60%对40%），并且我相信我的实践在相关方面也不例外。“有些将仍然是一个无法揭开的谜”，这并不总是因为他们是毫无意义的，而是因为分析家的理解不够深入到能为他们做出一个公断。分析对分析家而言同样是一个受教育的过程。

梦的报道与接收

当某人告诉我一个梦并且问我的意见时，我首先对自己说的是：“我不知道这个梦有什么含义。”这之后，我才能开始释梦。

荣格

实质上，我的方式是被从事古典易雍传统研究的其他的治疗家们共享的。这就意味着，每次和病人之间的会面都既被看做是一次私人会见，又被看做是一次社交活动，而且每位病人都会被给予展示给你所尊敬的人们的同等的礼貌和热情。荣格重

点谈到这一点：“如果人有神经过敏，那其实是一些别的情形，但是他们应该被给予正常的社交性的对待。”（本奈特）接待病人的咨询室应该给人舒适的宾至如归的感觉，而不会让人有身处病房的感觉。没有床，分析家和病人以适当的距离坐在各自舒适的椅子上。这就是荣格所主张的对咨询室的布置：对古典的弗洛伊德学派分析家们的老一套作出的反应——他们主张沉默而且冷漠地坐在视线以外的床的一头。许多精神治疗医师更愿意选择“顾客”或者“接受精神分析的人”的字眼而不是“病人”。因为多数精神治疗医师在医学上并不是合格的，因而他们会对“病人”这个字眼感到不适。作为一名医生，我没有这样的局促，并不是我把“病人”的地位看成是比我自己“低等”的。相反，我以为这其实是一种特权，并且我相信那些咨询我的人是有权利成为病人的。毕竟，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原型的关系，它始于治疗过程的开始。不同的是，荣格认为分析是一个辩证的过程，是在两个同等重要的人之间的双向交换。然而不管咨询室多么普通，原则是不能违背的，在那里的工作也是极为神圣的。绝不允许有任何的中断或骚扰：不得有电话，不得有狗，不得有猫，不得有鱼，不得有敲门声，只能有鲜花、绘画和书籍，一切都在一个尽量没有外部噪音的舒适的环境里进行。

坦诚是每位分析家态度的关键所在。每位病人都是惟一的。大体的规则、独断的思想、普遍的程序绝不允许被采纳。“学会你的理论，”荣格教导他的学生，“当病人在走出大门时，忘掉他们。”分析家必须成为一个专心的聆听者，让他的想像力随着程序的进展来表演。人通常不会很快地进入梦乡。通常，外部的事件在开始的10到15分钟内占主导地位。

我们继续我们的进程，在任何情况下，梦都会产生一个比本性所能产生出的更特别的话题。如果病人产生了一系列的

梦境,她将被要求做出一个选择,并且读取它的内容。我愿意在她叙述她的梦境的同时草草记录下我自己的理解,因为这样会帮助我把精力集中到梦的细节上去:这样我就能够掌握第一手显著的反映病人现在和将来的材料。集中精力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梦境的情形是诱人的,并且人们往往没能够专心于病人的梦境,反而是思绪随着自己想像的旅程远去了。

随着病人的叙述和我的记录,我通常会发现智慧的光芒指明我的理解:如同那些我所掌握的梦迸发出新的生命一样。无论如何,我保留了这些新形成的洞察力,而且我尽忠职守地询问这些病人的联想以及她们任何想像导致的结果。我并非是要讲叙她自己而是要协助她查明结果。我要求她选择她感兴趣的一个梦,我鼓励她选择对她来说更为重要的梦的某个部分,而不是在我表达我自己的意见之后。通常这会使问题更加明晰。然后我们开始扩大工作面,因为我们在对梦的认识上有私人的、文化的、典型的背景。通过这种方式,在没有对梦做出任何特定的解释前,它的含义开始以一种我们两人之间一致同意的形式出现。

有时,人们给我打印的或是文字加工过的对梦的阐释的副本,尽管它是有用的,但是我仍然喜欢他们亲口对我讲述他们的梦,因为讲述的不同方式能提供关于梦本身的很重要的线索。打印的副本不能给予我任何必需的笔迹的信息,我仔细阅读全文,就像病人在亲口叙述一样,然后在那些能打动我的地方做加强标记来强调重要细节。这样也有助于集中我的注意,把我的想像限制在梦境的范围之内。

到底什么时候适合分析家作出自己的贡献得到混成的结果呢?同样,这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经验告诉人们恰当的时候要来临或者预感要成文了。如果你的时间不当,病人

通常会让你知道,要么当时当面告诉你,要么不久之后,直接告诉你或间接借助于其他的梦。

只有当我们都觉得已经足够完美地处理了一个梦之后,我们才可以考虑转移到另外一个梦。视病人所给梦的长度和内容不同,我们一般在一个环节里研究三到四个不同的梦。一个特别重要的梦当然很容易占据整个环节,但是“一个重大的梦”则可能占据好几个环节。至于到底花多长时间在一个梦上面,则要根据分析家和病人之间的协议而定了。人与人之间做梦的数量和质量是互不相同的。通常,一旦他们进入到过程中,梦是足够丰富的,但是偶尔也会枯竭。并非是病人停止了做梦,只是她们无法回忆起来。为什么会这样呢?有很多因素需要考虑。这可能是一种防御:病人希望能够审查或者留存那些几乎出现但是她们宁愿不予承认的重要物质。她也可能是发现了自己将要负很大责任的负担,宁愿退却到一种消极状态,而让分析家来承担她的负担。它还可能反映出一个人缺乏承诺以及对有着巨大意义的梦的体验的失败。但是,在分析过程中梦的缺乏绝对不应该归咎于病人。分析家可能是在之前的梦的处理上太过迟钝或者不太适当,导致了病人不再对梦着迷。

当病人没能产生梦时,分析家必须特别小心,不要让他们有某种“一切都因我而不顺”的负罪感。这是属于他们的空间,他们必须自由的运用它,做一切他们认为是重要的。我通常会一直等到他们主动提及为什么他们不能产生梦,在我建议我们需要分析可能的原因之前。

治疗的初始阶段,可能不存在任何导致产生梦失败的隐含动机。毕竟,梦境健忘是一种必须被克服的自然现象。一些可能的途径将会在下方的章节中加以论述。毅力通常能够引发作为它的回报的难以忘怀的梦。

在最初的环节,我的惯例是向新病人解释:一份关于他们梦境的精确记录的重要意义,我会要求他们去购买一个容量大且精美的笔记本。我建议他们在每一页记录下每一个梦,相对的页面则用来记录他们联想和夸大的东西。我还要求他们记录在每个分析环节中发生的事情——好比是一位秘书“在做最后的会议记录”。对病人而言,这是相当大量的家庭作业,但是,正如荣格发现的,在分析过程中表现最出色的正是完成自己作业最好的。我自己的经验也可以证实这一点。毫无疑问,花在记录梦境、联想以及阐释性洞察力上的时间才是花得最值得的。

复合体及其转变

当我在梦中与某人争论时,他反驳了我并且启发了我,其实是我自己启发了我自己。

乔治·克利斯托弗·里奇滕伯格

心理疗法处理的是心理过程,而这些心理过程在极大程度上讲,是无理性的和情绪化的。因此,分析家的一言一行,在由理智和“事实原则”支配的同时也受到直觉和情绪的支配。理智对复合体的冲击是微乎其微的,因为他们本质上是不理智的。一旦形成,他们就会如同情绪上满载了群聚于原型核心周围的记忆一般,像一架陈旧的留声机持续复制他们的感觉模

式和他们的影响,在潜意识状态下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心理疗法正是因为复合体被转变得有意识而成功。这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分析家和病人之间良好的工作关系构架,以及建立在关系内部基础上的转换与反转换互动的意识,还有常规

的释梦工作。因为梦在调动改变复合体所必需的象征性的和情感上的活力的同时,也能提供直接到达复合体的通道。根据病人的观点,治疗的成功结果不仅需要承诺、智力、辛劳,同样需要放弃自我满足的幻想和抵御,以及发展客观认识自我的一种意愿。

梦是不可或缺的是因为梦能够实现治疗的理性的和非理性的目的:他们驱使做梦者保持与构成复合体的情感控制下的记忆的接触,他们带领她面对面地感触复合体是如何妨碍她的生活。随着这项工作的进展,在感觉、感情以及行为方面的基本变化变得可能,并且人的个性被转变。观测这一神奇过程即是发现梦是如何既提供自然的物质又提供转变发生所必需的催化剂的过程。

但是它是一项困难的、苛求的,有时甚至是使人恐惧的工作,因为不论我们多么希望从自我的复合体中寻求自由,不论我们多么理解我们的幸福是分裂性的,我们的复合体就是我们本身:他们是我们个体灵魂的骨骼和肌腱,是我们个体建立的盔甲。开始拆除这些重要的结构可能是对自我存在安全的一种威胁。约翰·洛克简明阐发道:“我就是那个我记得的我自己。”这是为什么自我分析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构成巨大挑战的原因。如果一个人是处在拙劣修补的地步,那么他就需要弗洛伊德或荣格的自我反省的天才。我们绝大多数人要求经验丰富的向导、哲学家或是朋友的陪伴,像炼金术士一般,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贡献给了转变的发生。

倘若不可避免的紧张和焦虑能在分析的关系中被容忍,进步会变得明显。新的象征伴随着新的感觉与感知出现。就在这时超然的功能成为它本身。

一个实例将说明这非同寻常的现象。在一位 55 岁家庭医生的分析过程早期,他产生了他的第一个连贯的梦。梦境如

下：我是一个正在把我的牛赶往集市的农夫。它们时而停滞不前，时而走错方向，让我非常生气。我对它们越发生气，情形就越发糟糕，直到一位年老的警察来接管并消除混乱。我醒来时十分生气、郁闷，几乎都要流下眼泪了。

这位做梦者之所以进行分析，是因为他对他的工作和婚姻不满。他患有高血压，酗酒，而且当事情越发紧张时他无法把握。最初，他对自己的问题不甚了然，而且无法回忆做梦情节。这是他给出的第一个实例，清楚地表明他是一个深受自我感觉和行为支配的强大的复合体。

起初，他无法理解，直到我问他在他的生活中他在何处经历那些相似的事情，他才恍然大悟。他说，当他的病人或者家人拒绝与他理想中的方式表现一致时，他感到挫败和狂怒。我鼓励他深入到这些感情中，当他照我说的做了时，他的感情世界升华了。

当我判定恰当的时刻出现时，我说：“并不奇怪，当你把他们像牛一样赶到集市时，他们要反抗你，给你制造麻烦。”他突然狂怒，呼喊道：“我不要像牛一样驾驭他们！”“你肯定？”我问。梦能够反映事物的本质：正是你自己把你变成一位农民。当他带上这句话上路时，他的怒气顿消，而且开始流泪。

梦以及它释放的情感，指引我们到他父亲的复合体。作为一个孩子，他怀着对父亲的巨大的敬畏——一位精力充沛，具有领袖魅力的，极其成功的商人——有着能让所有人听命于他的魔力。我的病人视其父亲为典范，希望通过遵从他父亲的意愿而获得其关爱和赞许，并且尝试着去模仿他。梦中农民驱赶牛群到集市的情形，极好地寓示了病人后天习得的统治、支配以及操纵模式。

真知灼见的意识震撼了他，而且他已经能够面对这个梦境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他对待其病人和家人的方式。梦境也寓

示了他是如何对待自己的，因为他无时无刻不像驱赶和操纵其他人一样驱赶和操纵自己。

然而，这并非全部。我们如何解释那位年长的警察呢？这个人物消退了梦境，提供了解决病人问题的答案。他是超然功能起作用的具体体现。因此，我们必须很认真地讨论他。我们发现他象征着两件事情：（1）病人不断追求却无从拥有的父亲形象；（2）病人理想中的自己希望成为的父亲形象——善解人意、能干、擅长妥当解决问题。换句话说，年长的警察具备所有父亲原型的特质，而这些特质正是现实中的父亲所缺少的。这些特质作为潜意识的潜能存在于人的个体。分析的任务是促使这种原型的动力与病人的生活结合在一起。我相信我们取得了成功。但是成功来之不易——代价是三年艰苦的工作。

这种富有成效的工作经常遭遇潜意识。年复一年的坚持中，我们的努力会导致个性的发展和意识水平的提高。本性循环产生的对自我的补偿行为很好地为梦的适应性功能服务：自我经历一些问题或冲突；潜意识的遭遇引出适应性的解决方法；这能够帮助个人学会面对更深入的问题；这些又会引起来自潜意识的补偿反应，往复循环。这些就是个性持续进行的循环周期。

但是大型转变发生之前，必须唤醒某人的真实状况。许多传统讲授这种理论。禅宗的心印被设计为从智力的愚钝状态唤醒学徒——他们令人厌倦的常规的看待事物的方法。格德杰夫设计的精神发展程序规定新学徒必须被震撼激发到有意识状态。当然梦能实现这一功能，因为它们能激发强大的能作为变化催化剂的情感。这就是它们之所以对心理疗法实践如此关键的原因。因为是不大可能通过自我水平的讨论或者通过意愿的刻意运用诱发个性的根本转变的。那需要感觉

以及把自我和自我的复合体抛到大熔炉的勇气的共同投入。梦中与觉醒状态相比,思想更具弹性,情感更具动力,而且不断增强的变异性能得出更多创造性的可能性。因此,要把所有起因于潜意识的象征标志结合起来,成为一个与治疗密切相关的问题,因为象征标志是活跃的思维,它们为从有官能障碍到适应性应用模式的精神结构转变提供了必须的动力。没有如此的结合,情感将保持僵化。在梦的媒介作用下,有意识和潜意识产生出超然功能的合成。这种辩证象征性产物通常是增强的安全性,有时是个人的富裕,偶然会是幸福。生活教会我:一个人更可能从自身寻找这笔宝贵的财富,而不是在外部世界寻求。有这么一个古老的故事:一位在世间搜索伟大财富的犹太学者,最终发现那笔财富就存在于自己卑微的住处。

个体神话

神话比科学更个性化,而且更能精确表现生活。

荣格

在成长旅程中,我们每个人趋于发展属于自己的神话,那是一种产生于人类文明神话趋势之外的,能满足我们个人精神动力需求的神话。(费因斯坦,1979;尤尔曼和齐默尔曼,1983) 这些个人神话作为一种信仰体系对个体而言实现了与集体神话对社会相同的功能。它们要么卓有成效,要么官能紊乱,要么依然适合现状,要么已经昨日黄花。一个好的个人神话应该是适应性的:它能依据个人的生存状况提供相应的令人愉悦的个人性格的合

成,并且促进针对现实的有效调节。另一方面,一个官能紊乱的神话,是一种导致病人接受分析的灾祸与不幸的失调的信仰体系。

在一位病人能清楚表达她自己的神话之前,分析家经常能意识到。因为她早已经掌握了它,似乎它组成了她的现实:它就是事情的实质,不存在别的可能了。神话可能会在最初的环节就变得明显。通常,它在第一个梦的分析中就会变得明显。可以只用一句话总结:“我是那种总与错误的人一起堕人情网的女孩。”“我是那种在大街上很潇洒,但是被我的同事们搞得很狼狈的男人。”“我是那种总是为别人着想从不为自己着想的女人。”“人们从未发觉我是一个被误解的天才,但是总有一天我将令他们震惊。”“我是那种要求不高,但是总是对生活失望的家伙。”

我怀疑大多数人在生命的旅途中决不停下来思考他们的个人神话是什么。当神话似乎有益于幸福和协调的生活时,这样做的意义不大。然而,一个未经检验的官能紊乱的神话,可能有力地毁灭个人所有成功的机会。明确你的神话的最可靠的方式就是经常关注你的梦境。一旦你没能做到,你可能会面对一些很大的危机。通常,危机是转变个人神话的号角:一个长久以来的神话变得僵化过时,灵魂必将构建一个更好的神话来适应变化的情形。这可能会卷入深刻的内部冲突和压力,特别是当差别强烈的神话同时存在时。神话与反神话之间的辩证必须得到综合,而且没有释梦或分析的帮助,这将是一个不会令人满意地完成的冗长厌烦的过程。伴有长期焦虑和循环复发压抑的人其实是处于一种未被调和矛盾的个人神话战场这一不幸的地方。梦境给反抗的人们提供强大的力量和实效,因为梦能够从前线传来夜间战报。缓和释梦工作中的冲突意识实质上是把双方带向会议桌,期望达成某种停火协

议或者制定出维持长期和平的条款。

灵魂,客体和主体

一个人决不能忘记,首先,他梦到的应该是排除其他所有人在外的自己。

荣格

关于梦是人类心声的最有力的证据是它们无可更改的客观性:它们与我们生命的细节息息相关,但是它们同时也适合于它们超个人的理想世界。它们昭示着某种家庭的没有任何其他渠道接受的真理:它们讽刺我们最为珍视的空虚,用一种能够显示它们视死如归的方式揭露我们死亡的事实。它们也并非老练的人:它们对待诸如某人的配偶、老板,或者分析家的笨拙是惊人的!

它们诚实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分析的进程中,潜意识状态清楚表明它并不关心分析家或做梦者本身,而只是关注他们之间的生存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释梦工作可能是一次令人羞耻的经历,以及为什么它是如此珍贵的原因。因为梦就是一面能看见真实自我的镜子,真切的和全面的:它们使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最大的盲点;使我们知道我们的潜意识区域;告诉我们当我们想到自己是最明智的时候其实是极为愚蠢的。梦具有如此的客观性是因为它们“以前已然明了”;它们的“记忆”比我们的久远得多:它回溯到百万年前。这就让它们能交换个人之间的观点,半生物的和半宗教的。

荣格经常谈到集体潜意识是作为客观的灵魂来区分它和它个人(主观的)的灵魂的。客观的灵魂带着权威说话,而主观的灵魂则依据自我的经验说话。它们互相通过梦对话,它们的

夜间交流正是个性化进程的关键所在。

客观的灵魂引导我们经历生活的全部阶段，补偿我们狭窄的自我局限，并且改正我们简单统一的谬想。只要对梦稍做分析，我们就会意识到我们远非是一个一元的个体，我们是多元的——一个由存在于精神物理实体中的不同个性组成的集合体，每种个性都在喧嚣，带着各自的需求、愿望、意图和历史。为了在巴别塔内部创建一些规则，我们将这些心灵内部的人们，分成两个不同的阵营——好的对坏的，强壮的对阴柔的，熟悉的对奇怪的。联盟和冲突在这些不同阵营间发生，这个正在享受优先权发展，那个则被否决和压制，前者反映在角色（我们显示给世界的个性）里，而后者被遮蔽（我们隐蔽的个性）。以个性化为目标的分析手段使这些极性被感知，而且把它们看做是整体形态的局部，看做是超个人的统一体的个体组成部分。世界三大宗教使这种感知与启迪，和“上帝与我同在”的感悟等同，而它们通过原始的象征——曼荼罗、十字架、基督、穆罕默德还有佛祖的形象来赞美的。

好比我们每人都是一个大房东，打交道的是大批性格迥异的房客：有的友好和善，有的过分苛求，有的则坦白得无法忍受。良好的判断力指示我们必须竭力了解他们，和他们相处，因为每个人都会遭遇生命的尽头。赋予个性要求在矛盾中具有鉴别力；需要智慧、机智、诚实以及众里寻一的才能。

梦的象征的多样性反映了灵魂内部个性的复杂性，每种个性，如同保罗·麦克里恩的三脑合一，意味着它自己对意识的统帅，以及它自己对我们每晚偷听的永恒精神戏剧的演绎。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们经常会思考剧中的人物和形象到底代表的是谁。人一旦投入角色时，梦关于我们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或者是对外部事实的反应都是以他的复合体、局部个性、神话以及操纵个体的隐含动力为前提条件的。没

能够将梦和个体联系起来，而且视梦为一种带有主观暗示的陈述，这显然是没有把握重点。主观阐释帮助病人承认被忽视和被压抑的局部自我，面对一成不变隶属于自身的罪恶；使她能够认识并收回那些她潜意识地加载于其他人的精神方面；提高她的个人责任感，鼓励她的自信心的发展，使她的自尊不再过分依赖于周围人们的赞扬。

一个 40 岁的女人，当她觉得自己已经一天天任由人们对自我的评价摆布时，她梦见自己回到学校被老师当众羞辱。“我为什么会来这里？”“我不需要如此。”“我为什么要忍受？”通过这个梦，她发现是她自己把自己变得对人们的评价如此脆弱。随着她越发对生活负责，她学会了避免使自己的观念任由他人的摆布，而且避免在她的精神世界与她吹毛求疵的父母针锋相对。当人们能放弃他们对别人威信的依赖，而建立自己的威信时，精神疗法进程便有了重大进展。我相信，带着内在形象的释梦法是取得进展的最好方法。

正如对分析法的批评理论指出，这样的工作提高了与他人交往的能力，而非变得自我放纵。在适应性的作用下，自我通过对梦的认识与社会以及对我们有特殊意义的个体进行协调，而且，通过他们客观的主观性，梦揭示了我们是如何典型地处理纷繁芜杂的关系从而帮助我们寻求更合适的生存之道的。一位 35 岁的教师，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大部分时光都花在独自烹饪上了，却梦到一个面目不详的男人把年轻人投进了厨房搅拌机里。研究这个梦，让他明白他如何使自己生活平淡而且在待人接物上问题严重的。在做完分析的 18 个月之后，他做了另外一个梦：他发现自己正在挑选和擦洗苹果，而且他以欣赏苹果的不同外观为乐。这个梦与他对学校职员年轻女人产生兴趣的进展吻合，他肯定这些事件之间是有联系的。

梦总是一成不变地被主观解释吗？如果我梦见一个朋友躺在大街上给众人擦鞋底，或是梦见他穿一身黑色羊毛大衣小跑在一群绵羊中，这个梦是在描述擦鞋底，一群羊，还是在描述他呢？可能二者皆非，可能二者皆是。荣格论述道，主观的阐释往往是正当的，除非梦中的形象与梦者生活中的人物有着极为密切的相似。这确实是事实。举个实例，一位忠诚的信赖的妻子不大会梦见她的丈夫与别的女人有染，或者一位十分诚实的商人梦见他被他的同事欺骗了，但是结果是经过调查发现梦里的暗示都是事实。这种类型的经验表明我们在梦里能获得直觉的知识，那些在现实中被我们忽视的知识。但是这些例子本身，主观的因素通常是存在的，在允许忠诚的妻子或诚实的商人变得过于正直而愤怒前，要他们思索是否自己也有偷情或者欺骗行为是十分必要的。

梦通常把客观的或者主观的相关事物浓缩成同一形象——比如，当一个男人把他的妻子梦成为一个妓女时，没什么不妥，可能有时她的确表现得像一个妓女，但是在梦里，她只能符合他的妓女似的灵魂的意愿。如果梦者知道如何对付他思想中的妓女，他可能不情愿唤起他配偶如此的行为。实践中，我发现在明确表达其含义之前多角度的看待每一个梦是大有裨益的，如同一名飞行员在起飞前检查他的仪器以确保他不曾错过一些重要的环节。梦是反映我们在生活中如何感知人的主观现象，但是事实上它们经常拥有类似那些我们投射到它们身上的特性。我们自身的梦境制造仪就像喜鹊或是一位抽象拼贴画家：它收集来自外部世界的物体，达到它自己的目的。它通过形象、事件，还有环境中的人来象征它所想要代表的内在情形：它是一个象征的盗窃癖。

某个由于自己无能在生意上一败涂地，濒临破产的商人，梦见他被儿子所在学校的校长访问。校长声明他的儿子不

专心,爱幻想,功课准备不够,如果他希望留下,他必须停止穿他的短袜。醒来后,梦者决定好好与儿子谈话,因为梦中他同意了儿子的校长。然而,他在接受分析6个月后,在他下楼吃早餐的路上,他意识到那个梦与他自己同样有关。他需要注意一下校长(他的上位自我)并且好好研究那个梦,以及梦中那个不专心的男孩。早餐后,他与儿子进行了一次收获颇丰的谈话,因为他已经能够把儿子在学校糟糕的表现归咎于自己了。如荣格所述,当我们想要改变孩子的一些东西时,我们应该首先考虑我们是否很好地转变过自己。

在所有的这些例子中,梦实现了补偿的功能,在梦里他们合并一些正从意识中消亡的东西:为了更加有效地生存,每个梦都带给个体一个它需要的未利用的潜在的包裹。梦带来的东西,可能是害怕、扰乱、压抑,也可能是生命的增强、富足,但是你得接受,它绝对不会总是一项令人愉悦的任务。无论多么痛苦,毅力所换得的报酬是丰富的。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有价值的局部个性已经被压抑了,并且因为无法被我们的家庭接受而无法进入到成长的过程之中。正是由于这些被弃绝的个体组成了荣格所谓的复合体幽灵。承受内疚、耻辱、绝望以及恢复到有意识状态的焦虑是在全体中采取的首要步骤。如荣格所说,“显然,一个人掌控意识,理解,比简单的逃避痛苦对人的天性更有意义。”(拜火教研讨会论文集)

幽灵

「我不认为我曾经遇见过海德先生？」由特森问。「是的，没有，他从不来这进餐，」仆役长答复道。「事实上，我们几乎很少在房子这边见到他，他最常出现的地方就是实验室。」

罗伯特·路易斯·斯泰文森（吉基尔医生和海德先生的怪事）

尽管接触一个幽灵梦可能会让人压抑，但不处理它的后果可能会更坏——因为压抑是对自己感觉的一种沉沦，是拒绝面对某人个性无法接受的结果。这就是人们感到最糟糕但又是很重要的。

在分析的早些时候，通常做如下的梦，自己独自在一所房子里，房子外面会有某个潜

在威胁或是邪恶的人物试图进入。受到惊吓的梦者会四处走动关上所有门窗，但是，就在她做这些时，一种不安的感觉滋长：我的这些举动都是无效的，无论采取什么措施，侵入者都会成功入侵。

分析家会鼓励梦者找出更多关于入侵者的信息，希望梦者通过自由的联想和活跃的想像找出这个邪恶的人物并视其为自己的一部分。这将很难成功，因为幽灵拥有上位自我（内在化的双亲式权威）所憎恨和轻视的特性：通常人们会否认他们自身的这些特性，愿意潜意识地把它们投射给外部世界那些不受社会欢迎的人。这就是在梦中怀有敌意的人物潜伏在房子外面的原因；但是个性化过程具备如下特征——幽灵最终会放弃其外部状况而入侵，即发掘意识个性的通道入口。

我否认弗洛伊德学派仅仅视梦为一种经过压缩或审查的表达的观点，不过，我确实同意幽灵梦境提出了我们通常因为

其令人不悦而回避的问题。毫无疑问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利用自我防御机制,我们表现得越发神经质,我们就利用得越发厉害。但是在分析的指导作用下,幽灵被承认和“拥有”,一个重大改变占据全部的个性:我们不仅会停止从自己的侵略里跑开,而且我们会占有它,对它负责,利用它,当然希望是道德地。

幽灵的核心正是敌人的原型。学会在大敌当前的环境下生活意味着人们更不可能把它投射给他人,从而人们把自己的时间贡献给和平和对世界的理解。自我于幽灵之间关系的发生其实是一种从利己主义模式到享乐主义模式的转变。

可以把局部的自我视为复合体的化身——比如幽灵、敌意、生命、父亲、母亲、孩子——给他们武装上意识,使之相互关联就像和真正的个性一样,不仅在内部创造力量和融洽,而且提高他们在外部的互动能力。关联两性的能力随之得到提高。我们总体上会在这个社会关系构建的世界里生活得更加舒服。

尽管幽灵通常作为扰乱、危险甚至敌对的反面出现,但绝非总是如此。仅仅被投射的局部个性被认为是消极的。幽灵也带来积极的潜力,因为它合并了那些未被实现的个体的局部。荣格叙述的故事完美地阐明了我试图表达的意思。

“曾经在一次火车旅行中,我发现自己与两个陌生人同在餐车里。其中一位是看起来很安详的老绅士,另外的一个中年人有一张充满才智的脸。我从他们的谈话得知他们是军人,可能是一位老将军和他的副官。在长久的沉默后,老人突然对他的同伴说,‘我昨晚做了个特别的梦。我梦到我与许多年轻的官员在阅兵的队伍中,我们的总司令正在视察我们。终于,总司令来到我身边,没询问任何技术方面的问题,

只是要我给美丽一个定义。我尝试了,但是我没有找到任何令人满意的答案,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可怕的羞愧。总司令继续走到下一个十分年轻的成年人面前,问他同样的问题。这个家伙给出了一个极好的答案,一个我没听到之前是绝不会想到的答案。我被震撼了。’突然,他出人意料地跟我讲话,他问道,‘你认为梦有含义吗? ……’ ‘……这个,’我说,‘有些梦当然有含义。’ ‘那么那样的一个梦的含义是什么呢?’他急促地问,脸部肌肉紧张的抽动。我说,‘你注意到任何关于那个年轻人的特点了吗?他看起来怎么样?’ ‘他看起来像我,年轻时的我。’ ‘那么,’我说,‘看起来你是忘记或失去了当你也是一个年轻人时,你也能做的一些事情的能力。显然,梦是在引起你的注意。’他思索了一会,突然叫出声来,‘就是了,你说对了!当我年轻时,我对艺术感兴趣。但是后来这兴趣消失了,就像许多人那样。’接着,他开始沉默,一言不发。”(CW17)

后来,荣格得知那位老绅士其实是一位将军,一个以脾气暴躁和过分为军队琐事困扰闻名的将军。荣格评价道,如果他保留而且发展了他的艺术兴趣而不是像常规那样放弃的话,对他(和他的下属)来说,岂不是更好。

这又是一个梦试图通过抓住被个体忽视部分的注意力来补偿意识取向的事例。但是事实上,分析家的干涉可以为梦者提供可用的信息。将军被他的梦深深打动,他描述给他的同伴,当然即使是没有荣格的协助,梦的补偿性意义也是有可能使将军觉醒的。

那么,所有的梦都是补偿性的吗?荣格是如上述那样陈述的,但是经验告诉我,他过于泛化了。正如我们所见,梦确实是补偿性的,但是并不总是如此。霍尔和他的合作者们通过广泛的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做梦通常反映梦者在觉醒生活中的行为。在一个平常的分析实践中,沮丧者趋向于做沮丧的

梦；焦急的人比不焦急的人有更多焦虑的梦，等等。梦经常附和意识的主要方式和态度而出现。正如他们所说：事情本来如此。梦与我们的日常活动息息相关：一个护士梦见在治疗病人，一个警察梦见在智胜罪犯，一个运动员梦见在跑马拉松，等等。似乎补偿是梦所能做的重要事情之一，但是就全局而言，只有当有东西需要补偿时，补偿性的梦才会发生。梦的原始目标是适应与自我完成；补偿是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之一。然而，梦补偿片面意识态度的可能性应该总是被关注的，因为只要一个人常常对这一可能性保持警觉，他就会走出狭窄的自我意识的局限，从而进入到破碎灵魂的境界，遭遇到那些不会在白天被感知的思维。（CW5）

角色

角色是自己和他人
都认定是，但是
在现实中不是的那个人。

荣格

人们被幽灵梦境威胁，是因为他们不愿意面对它们的内涵，而宁愿把他们自身无法接受的方面隐藏起来。幽灵特质通常被隐蔽在角色背后，我们戴上演员的社会适应面具面对外面的世界。我们越发对幽灵感到不安和罪恶，我们就越发容易发展一个被伪装、隐藏起来的角色。梦境以情节和形象来表示这种两难境地，不仅提供使幽灵一体化的机会，而且提供发展一个少伪装多真诚的角色机会。

尽管在目前角色是一种我们无时无刻不用来防御的建筑，但是它已经极其古老。在欺骗中幸存的能力（事实上是通过察觉欺骗而幸存）已经存在了好几百万

年。一些生物利用虚伪的颜色、模式还有气味诱惑其他生物致死，但是总会有一些采取聪明的伪装或诈死而逃脱厄运的。在人类社会，如此的计谋会被认为是不齿的，除非是用于战事中对付敌人，他们反而会受到极高的赞誉。在正常的社会生活，只有心理病患者似乎有能力没有任何负罪感地实施经常性的欺骗。趋于绝望的神经病患者无时不生活在担心假面被撕开的恐惧中。如同那些精神病患者，他们可能害怕透明，他们梦见他们赤裸在梦中，他们的畸形被暴露，他们朦胧的掩蔽被穿透，他们的面纱被揭穿，他们充满了对自己的空虚和羞耻被展示于世人的恐惧。维持自己欺骗性形象的强制冲动——用温尼科特的话叫做“虚伪自我”——可能会引起人们梦到自己是双重间谍或者是正在逃窜的罪犯。它通常伴随着一种对他人行为或言语的妄想狂般的敏感，并且伴随着一种强制性的核实他的伪装没有被识破的欲望——他希望能够继续保持隐蔽状态。

在这些情形下，与分析家通过释梦分享自己的情形可能是挽救生命的机遇。当梦使问题变得异常清楚时，病人会受益于此，并认识到她的“罪恶秘密”，通过分析家的赞同和肯定，她还能够找到打破僵局的途径。这是分析上的供认与赎罪的等价物。

荣格发现对罪恶秘密的招供标明了治疗的最重要时机。伴随这个关键的事件，治疗者与病人之间的联盟得到稳固，并且能开始认真的建设性的治疗。通常梦能通过掺入与秘密相关的联想使供认成为可能，一旦生效，病人会大胆与人分享她的秘密。这就对分析家提出了很高的技术要求，他必须运用他的直觉而不是过度的热心。在没有损失自尊的前提下承认罪恶秘密是极其重要的转折点：分析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对这一时机的把握。约翰·毕比（1992）指出，诚实，是关键所

在。分析家必须具备诚实的品质,以使病人感觉他是值得信任的。他的理论与实践也必须具备诚实的品质。揭示幽灵与角色之间冲突的梦说明梦者性格中缺乏诚实。必须建立具备诚实特质的分析关系,才可能治愈这种诚实的缺乏。

性别矛盾复合体

每个男人灵魂深处会有一个永恒的女性形象,一个明确的女性形象……女人则以拥有男性的基质作为补偿,因此她们的潜意识中留下了男人的烙印……

荣格

既然梦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而且被我们自身的局部性格代表所占据,那么男人的梦里男性形象占主导地位就不奇怪了。(霍尔和杜姆霍夫,1963)然而,异性形象通常也会出现在每个人的梦中——特别是在女人的梦中。这些也是主观上的解释吗?荣格的答案是解释既是主观上的又是客观上的。

在所有使我们能够使适应人类生活典型情形的原型系统中,与异性的交往相关的系统是最关键的。荣格把这种性格矛盾原型称为女性人格中的男性基质和男性人格中的女性基质。作为男人中的女性部分和女人中的男性部分,他们像一对相反物在二者的潜意识中起作用(会合),深刻地影响到所有男男女女之间的关系。

荣格还发现,在实践中男性基质和女性基质都在梦中和想像中起潜意识与自我之间的调停作用,提供内部和外部适应的方法。他把它们描述为“灵魂形象”,因为它们具有强大的能量,神秘而且超自然。男性基质与女性基质越发潜意识,它

就越发可能被投射——精神力学的过程可以解释“堕入情网”的经历。由于这个原因，荣格把性格矛盾复合体称为“实现投射的因素”。

我们演化的历史赐予的男性基质和女性基质对我们的种族的存在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它们启动并维系了异性之间的结合。当在梦中实现这一精神生物学功能时，他们是客观地被诠释的。但是它们作为精神构件的主观表现对性格发展同样有很大的意义，尤其是当它们由于个体成长被忽视和压制结果被幽灵所玷污时（不经常发生）。当这种情形发生时，女性特质往往在精神上保持中立，然而还是会被侵蚀、被压制；男性特质则类似地被压制在女性中，如果他的矛盾性格特质被发现，往往还会带有负罪感。这种情形更容易在荣格所工作的族长式环境里发生，男人和女人继续违抗性别的固有特质，尽管已经比过去减少了。正是那些男性/女性基质的已经被否认和压制的负面因素，启动了异性之间的关系，打破了内部精神世界的平衡，也阻碍了所有真正的创造性。基于这个原因，个性化要求这些被忽视或轻视的性别矛盾复合体被面对和吸收。

不管性欲上是否启发，异性形象都象征着至少可以接近灵魂意识的能量，但是，随着分析工作的进行，这些重要的资源将作为一个整体为灵魂服务。当性别矛盾特性可为意识个性所用时，一个男人的理念被文雅的亲昵能力所补充，并且一个女人的性爱通过理性的目的和智慧的理解所缓和。

分析实践中遭遇的某些最尖锐的梦，是处理自我与自我性别矛盾的关系。比如，一个压抑的商人在40多岁时梦到一个躺在床上垂死的流浪女。他抓住她的手听着她哭泣，他愿意她活下去。梦者是一位前突击队员，由于其英勇受到过表彰，并且结过三次婚。他是“百分百男人”，他的女性基质被忽视、

剥夺，营养不足，实质上已经消亡了。因此他依靠消沉和无能支撑起异性爱的关系。梦把他的注意力引向他自身潜意识的方面——他的敏感、感情、审美能力、爱情，以及个人承诺。他需要给它救助，保护它，使它能够幸存，成长。可怜的流浪女形象代表了她的灵魂，因为他对她的疏忽使她处于地狱之门。

一位 38 岁患有旷野恐怖症的单身女律师做过这么一个梦，梦中她的男性基质被灵魂彻底玷污了：我知道有什么东西在我回家路上的沟渠里等我。我很快确定惟一要做的事情是在我到达他潜藏的地方时把车开得飞快，但是令我感到恐怖的是，当我到达时，他从沟渠里爬出来，在我前面的道路上蹒跚，挥动他的手臂让我下来。我惊慌不已。只知道直接冲过去，把他吓跑。但是他太慢了，然后我听到恶心的碾压肉体的声音。我透过反光镜看见他躺在路上，在临死前的痛苦中抽搐。我感到生活终结了，罪恶感折磨我，我开车到最近的警察局，叫了一辆救护车，并且以一般杀人罪投案自首。这个梦显示她性格矛盾复合体与她的意识性格的巨大差异，导致她害怕男人会对她构成潜在威胁而宁愿躲避他们，如果她能做到的话。在她的分析中，她不得不面对这个源于孩提时代她的酒鬼父亲——一个不可预知的性别混杂的父亲的问题，在与一位男性分析家将近两年的合作后，一个能让她接近的男性基质形象开始出现在她的梦中。同时，她与她的男性同事、顾客的关系也逐渐有了改善。

自我

自我不仅是一点，而且也是一个包含了有意识和潜意识的圆环，自我又是这一切的中心，就像自我主义是意识的中心一样。

用来组织完整人格的那个天才，荣格管它叫“自我”，用一个大写的“S”来区别于我们的日常用法（也就是指自我或人）。“自我”体现了每个人继承了的典型的天赋。“自我”可以为每个人生刻画蓝图并带来环境允许的最佳状态。尽管它有明显的生物学的目标，“自我”也在艺术和宗教的灵魂中寻求满足，就像对待生命的灵魂和梦境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

深奥的谜团、一个秘密之源或是神灵内心的表露。众多的文明把它奉若神明并在如此普遍的外表之下存在二次或循环形式的象征符号（曼荼罗——像藏传佛教）、价格不菲的宝石（大钻石、伊斯兰的“受福珍珠”和佛教雨神的嵌宝石的网）、玫瑰或莲花（道家的金莲）、忠诚的夫妇（象征阳刚和阴柔的协调、阴阳之说）和神化或历史人物（如克利须那神、佛、基督和穆罕默德），凡此种种。在荣格的观点中，“自我”所提供的协调方式不仅是针对环境的，还有神灵、宇宙和精神世界。因此，他称之为“原型的原型”。

“自我”在梦中多是以一种整齐、结构匀称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比如曼荼罗，当自我处于混乱或危机中时。一个妻子另寻新欢并带走他们小女儿的男人会梦见他在瑞士一个山中胜地看日出。当他看着的时候，太阳变成了一个带着罗马数字的巨大的钟，指针快速而有规律的转着，就像雷达扫描仪。

他告诉我这个梦的时候，我们都意识到我们会从中得到大发现！于是我们努力做完全部的环节。那条暗示就是：尽管被剥夺了权利，但他的仁爱之心仍然保留着，一段新的生活即将展开，时间会治愈他的忧伤，他的视野（有意识的）将被拓展（雷达扫描仪），并且他的个性在分析中将得以延伸（瑞士是荣格的故乡，山是精神的热望）。这个梦的确是意义重大的，因为它给了他继续与妻子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光明的前景。

尽管“自我”仅仅以一种超自然的方式露面，它的出现却是不容质疑的，因为每一个梦都是个性发展的潜在的贡献者。如果把梦一个一个孤立起来分析，这种贡献也许不明显，但如果把持续了几个月的梦联系起来看，多半会得到答案。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还没有明朗的问题上和“自我”中尚未觉醒的方面。基于这个原因，如果想要发现“自我”的潜力并建诸于整体人格之上，解梦工作必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频繁地展开。在实践中，梦境人格变得更易于理解，人们也与它建立起了一种更为亲密的关系。意义重大的梦经常是频繁的，梦者释放了强烈的情感，早上也更想起床，并确信昨天晚上发生了重大事件。

而只有在人们经历了之后，他们才会感激这些不断发生的梦境所展现的丰富的内在。这时，在我们狭小的思想和情感世界里，人的全部经历——变得易于理解，当一个人被推进两难境地：爱或恨、明智或愚蠢、快乐或失望时。他很难作出选择，但是，一旦作出决定，它就会成为一种远胜于逃避的振奋灵魂的东西。达到这一步也就是要打碎人们单纯的理论假设。此时原型也就成了假设的概念，成为了像神灵和魔鬼一样超人的力量，抓住了人的生命，决定他的命运。这些有压倒优势的情感不是我们重新创造的。他们是当原型的精力被唤醒时处于主导地位的感受的预示。要想展现出这些

潜意识的东西就必须意识到在小自我之上还有一些更强大的东西，与之相比，小自我就像一块漂在海面上的软木塞。“小自我相对于大自我来说，”荣格说，“就像被驱动和驱动者的关系。”他用一个梦来证明了这些：我正走在一条起伏的小路上，太阳很明亮，我有一个很宽广的视野。然后我来到了一个小小的路边教堂，门是微掩着的，于是我就进去了。让我惊讶的是在祭坛上既没有圣母玛利亚也没有基督受难像，只是摆了一团很漂亮的花。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个瑜伽信奉者正在打坐沉思。当我靠近他看时，我意识到他长得跟我一样！我吓坏了，开始惊醒并想道：“啊！？那是一个正在反省的我！他正在做梦，梦里就是我，当他醒来时，我就不再存在了。”

他觉得这个瑜伽信奉者正在反省他现在可能的表现，这个与从前不同的想法迟到了14年，他曾经梦到一个飞碟的起飞，飞碟的样子就像一个魔幻灯笼。他把这两个梦都作为寓言来理解：它们都显示“自我”呈现人类的外形进入三维空间。潜意识是经验主义人格的发生器：潜意识才是真正存在的，而有意识的世界是虚幻的……这种情形跟玛雅人的观念非常相似。整个潜意识在我看来就是所有生物上和精神上的真相。（MDR）

个人不是被动地服从“自我”的，恰恰相反自我必须知道如何对所发生的作出反应。潜意识制订计划，自我去实施。展现一种象征就是展现潜意识的意图，就是一座通向未知世界的桥。但如果人没有像神话中说的那样永远粘在冥府的岩石上，那他就一定会回来。自我对潜意识所制造的东西作出反应，并且在它们之间继起的对话之外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然后有意识和潜意识就成为了一个自我平衡体系中的两个极点，这就是解梦的目的——带出一个更为平衡和更为明确的关系。这两个相等而又相对的极点的交互作用产生

了一种比单方面依赖任何一方更好的情形。这个最终位置既不偏向于有意识也不偏向于潜意识,而是第三种可能,那就是否定了两种意识的偏向而取它们的平衡点。这个成就是荣格为精神分析学作出的杰出贡献之一。

由于终生都对这种超自然的成就很关注,荣格被误解为一个神秘主义的鼓吹者,就好像神秘主义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东西。如果一个人非常严肃地研究一段时期梦境的话,那么即使是很短的一段时间,他也会有一些玄秘的发现,因为梦境是更为深奥、充满神秘和严谨的,带一个人去体验清晰的超自我和什么叫做“卓越”。每日的平凡模式被冠以流光溢彩的神圣的帽子。通过梦境,对神既敬畏又向往的感情变得不那么严重了。但这并不会导致原教旨主义而只是对它所体现出来的生命的意义有了一种更亲密的理解。

转移和反转移

受伤的外科医生弯折了钢
那敲打着紊乱的思想的钢
渗出鲜血的手后面
是医治者锋利的怜悯的艺术
那揭开了亢热的海图的谜底的艺术。

艾略特

在分析中的患者经常会梦到他们的分析师,但如果分析师梦见他们的病人就不太寻常了。这些梦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会在分析时所遇见的潜意识的预料中产生有价值的结论。弗洛伊德引入了条件转移来描述整个过程,也就是说,患者把过去某个关键性人物情感和观念转移到了分析师身上。这便出现了所谓的

“转移关系”,转移关系必须和分析与被分析、医患关系区分开

来,后两种是分析师和患者作为真实的个体所存在的关系。

最开始,人们都猜测分析师会十分了解他从过去带来的潜意识的暗示,以至于他肯定不会把这种暗示转移到他的病人身上。但是时间和经验证明,事实并不总是这样的,要是不想弄砸治疗的话,有时有必要观察一下病人传达给他们的潜意识的反应。这些分析师对患者潜意识的反射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反转移”。荣格极大地扩展了弗洛伊德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既然有史以来医患就是这样一种一成不变的关系,那么不可避免的,在分析治疗的过程中,这种原始的关系有可能发生进化,就是说,当原型投射在类似分析家的人身上时,能赐予他更大程度的治愈或毁灭患者的力量。在荣格的经验中,这样的原型,像僧人、巫医、魔术师和年老的智者都通常被投射。同样,强大的原型可以由患者在分析师身上激发出来,通过被扭曲了的医生对患者的察觉和反应:孩子、荡妇、处女、女巫、女性的灵感、母亲等而成为暗示,当暗示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激发出来,使情况明朗起来。荣格在深入研究中了解了更多的这种潜意识的激发,并以此为基础写成了他的一篇重要评论——《转移心理学》。(CW16)

所有的分析学院都同意治疗进程取决于转移和反转移的意识,尽管有些人坚持这些条件的发生可以没有梦的参与(就是说,可以通过分析和解释并感受患者在治疗过程中自己的表白)。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们是被误导了,因为梦境可以生动细致地显现出治疗时在医患双方激发出的隐藏的设想和原型。有一个50岁的女患者,做了这样一个梦:我的分析师在给我做分析,他很魁梧并且喜欢针对别人。他说我拿心理学和哲学来妨碍他的分析,“现在,”他说,“我们必须查出你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似乎我就要被哄走了。然后出现一群看起来很高兴的女人,她们唧唧喳喳,长得很性感,化了很

浓的妆。其中一个走过来在我的嘴上吻了一下。当她讲述这个梦的时候我们立刻达成了一致,那就是,这个分析师和女人是她臆造出来的。事实上我并不魁梧,也不喜欢与我的病人针锋相对(我总是诚实地说出我的想法,但并不粗暴或是咄咄逼人)。她也并不认为曾经有个活蹦乱跳的女人在她的嘴上吻了一下。这些形象只是她那并不清晰的剧本中的一小段表演。那个咄咄相逼的魁梧的分析师是她对我的评价吗?她仔细地想了一下,不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她有这样一个父亲,所以她把这种品质转移到了这个梦中的医生身上?也不是。她深爱着的父亲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和平主义者,一个忠实的斯韦登伯格的信徒。所以那个梦中人似乎是她的从未谋面的父亲或医生。那么梦境里为什么会出现他呢?他打碎了她的防御。她感到很受打击,但里面还有很有意思的一段:出现了一群性感活泼的女人,还有一个吻了她一下。

基于这一点我就不得不考虑这个梦到底在向我暗示什么,在以心理和哲学来防御的方面难道我还没有引起她的注意吗?我当然知道她有意这样做,但是也许我给予足够的刺激。还有那个活泼女人和她的吻又是怎么回事?通常在梦里与同性带有性爱色彩的遭遇表示这个人想拥有梦中的角色所拥有的品质或与之协调。因为这些与人的角色反差很大的特质现在还不可能形成意识,那么上述解释在此还能成立吗?事实上是可以的。

她的角色特点十分明显:人好得不可思议。泰然自若、风度优雅、温和并且敏感,总是一成不变的周到和顾全大局。从来不会有一根乱发,衣服也永远是剪裁讲究、洁净得一尘不染、搭配合理。这完全符合她敬爱的父亲一直以来想要她所成为的:一位完美的女士。促使她来做这种分析的是一种想要补偿这种单方面的斯韦登伯格式角色的愿望——她想成为一个

完整的人。为了完成这些，她得试着去丢掉她的防备并吸收自己的正面人格（活泼外向的女人）进入她的性格；但是只有变得果断并用她刻薄性格（魁伟、果断、一针见血的分析师）里面的理性力量去面对困境，她才能获得成功。因此有了梦。魁梧的分析师浓缩了五种精神实体于一身：（1）患者父亲的影子；（2）患者治疗医师的影子；（3）分析所触及的患者父亲所没有的男子汉气概；（4）她的带有敌意的一面；（5）她体内拥有的分析师性格的一面。此外，当我为我自己分析这个梦所带来的暗示时，我不得不承认她的优雅激起了我的魁梧、咄咄逼人的男性的一面，并且庇护她远离它。也许将来我会更多地压制她。这样的话，梦就揭示了一条信息，那就是，下意识的操作对治疗进程有着重要的作用。一个分析师的自己的梦也向他提供了一种进入病人心理的客观视角，而这种角度是他从前在浅层意识下没有想到的。一天晚上，我梦见来了一个新病人，一个很沮丧的女人，她的婚姻不太幸福，但在她本地的社区是一个令人尊敬的支柱。我梦见一件很值钱的东西从我的诊疗室里丢了，是她拿的。我是应该主观还是客观地看待这件事？她是我身体里的贼吗——我自己灵魂中的作贼的欲望？我高估了她的角色，没有完全接到她的暗示？或者它是客观真实的？是不是我的无意抓住了一些在我的浅层意识中错过的东西？我决定对此保持开放的态度，时间会证明一切。事实的确是这样。过了几周，她向我坦白多年以来她一直有在商店顺手牵羊的毛病，并且十分有规律。就像平常一样当这种供词被坦白以后，一套强有力的治疗方案就形成了。并且在任何时间和情况下都高瞻远瞩。我们很快发现了她顺手牵羊的原由：她觉得被缺少丈夫的爱和关注欺骗了，就以送给自己从来没有从丈夫那里得到的“礼物”的方式来补偿自己。我是不是应该早就告诉她我的梦？但还是没有下定决心。

这样做。分析的关系还处于它的早期形式，我不得不小心翼翼，让她感到安全和承认。告诉她我的梦会让她感到被侵害和判处。不告诉她，她就会对我建立起足够的信任，告诉我她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的“深藏的罪行”，并且相信我不会丢弃她或拒绝继续给她治疗。那么我的梦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呢？它充分地提醒了我她存有阴影的一面，以便于创造一个她用于忏悔的环境。这在她的治疗中是一个契机。明白了那到底是怎样一种行为，有助于她停止入店行窃并找到更为行之有效的方法来恢复自尊。因此，回想起来，我没有和她分享我的梦是正确的。至于我对她被抓获并起诉的感觉和真相是不是一致的，在她告诉我之前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在上述情况下，我也许会埋怨自己没有及早想到这些。这可能会是一个分析师能够做出的最不可思议的结论。

意识的道德规范

大。

潜意识的形象对一个人责任重

荣格

在荣格早年的一个分析中，一个自幼接受严格的天主教抚养方式长大的男人——幼年时曾经非常害怕地狱之火——做了一个梦，在梦中，他坐在他的家庭常去的一个教堂的椽子上。在他下方是一群试图抓住他的双腿的危险人群，但是他拼命逃离了他们所能及的范围。在北门里边有一只大号的刻花的石头容器。不时地有一只手提起盖子把人扔到下面熊熊燃烧的大火里。当尸体投进火罐后，每次都是先缓一下，然后会有一条骇人的火蛇翻涌出来。当他拼死停

留在至高点的时候，心中想道：“我不会让这些令人作呕的东西碰我！只有这是可以信赖的。没有了它一切都会回到过去。”最后，他终于用尽了手臂中的力量，去了地狱。

一个 16 岁的男孩带给荣格一个不尽相同的梦：他沿着一条陌生的街走。那里很黑并且他能够听到身后传来了脚步声。他害怕地加快了脚步，脚步声越来越近，他也越来越害怕，就开始跑了起来。但声后的脚步声似乎赶上了他。他终于停了下来，一转身，看到了一个魔鬼。他怕得要死，就一跃而起悬停在了空中。这个男孩遭受着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折磨，并且，就像荣格说的：“由于致使患者的小心翼翼和吹毛求疵，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简直是臭名昭著，他们不仅有表面上的精神问题，在内里更是彻头彻尾的不人道的野兽和残忍的魔鬼。这与复杂的他本身的性格完全违背，他本来有一个柔弱的性格，而现在他却不得不绝望地做着挣扎。”他还拥有一个绝对的超自我，这个病人觉得他必须把自己放在一个未受污染的完全纯洁的环境下——像梦里所指示的一样漂浮在空中般的纯洁。荣格评价说这个梦告诉他要是想再回到地上来就必须和魔鬼签定一个契约。(CW7)在这两宗案例中做梦的人都是直接被带到了阴影中，并且很明显他们逃不出恶魔的影响或者是为了成为健全人而勇敢地抵抗他们病态的超自我。鼓励和分析也许能够帮助他们做到，但还是摆脱不了问题：那只是把整体问题(宗教的)全盘转为了个体问题(道德的)。

分析的目的是通过对潜意识的研究而发展人的个性和觉悟。荣格的宇宙论论述道，我们对意识的发觉越多，就越是承担起了令人敬畏的责任，不仅是对我们自己，还有对我们的种群、我们的星球，最终而言，我们的宇宙。自然既没有知觉也没有是非观。她并不参与对像正义、同情、关切这些脆弱和被恶意使用的价值的评判。她只是盲目地遵从她自己的准则达

到她自己的目的,对于后果并没有道德上的顾虑。“宇宙并没有敌意,”J. H. 霍姆斯写道,“也并不友善;它只是冷漠。”

充斥了我们梦境和梦魇的主旨、主题、动物和人都是原封不动的自然的产物。我们通过带他们进入知觉而成为他们的管理者并且对他们所造成的危害产生了负罪感。由于这个原因,荣格坚持,有意识地把在无意中产生的图象、力量和个性拼接起来的这样一种行为“必须被上升成为伦理的义务”。对于影像的拼接和对于超我力量的浓缩同时同步地进行着。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就会停滞并进入盲目的状态(也就是说,潜意识地处在道德准则的强制下了),并且成为知礼节荣辱(自觉性地)和可信的了。如果没能接受潜意识中释放的道德责任感的制约,无论是分析还是生活中,导致的后果就是,无尽的邪恶!就像阿道夫·希特勒的情形一样。

在过去超我是一神学构造,它的道德贴着神灵认可的标签,它的认知就是上帝的声音,“上帝的死亡”驱逐了所有道德事实,道德被合理化,拿出来公开地讨论,成为了一种私人意见。基督教的超我对性欲的压制和刚愎自用在心理分析的排挤下夭折,再也不能防止我们心底潜在的邪念的滋生了。对于分析法来说就是走上了一条危险的旅途,遭遇所有的罪恶、耻辱、残忍和被老一辈锁在地狱里的魔鬼。如果想成为一个完整的人,那它将是一段不可回避的辛酸历程。

9 现实的梦

在你自己没有变成路之前你无法在路上行走。

释迦牟尼

那些意欲认识自己的梦的人，并不缺乏实际的指导建议，像相思病人卡普兰－威廉姆斯的《梦》、罗伯特·A. 约翰逊的《内心活动》、玛丽·安·马顿的《梦的理解》、罗伯特·伯斯纳克的《梦的释义》等等都不失为优秀作品。在本章中，我将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以及我的一些专业研究，简单地介绍一些有关梦的研究。

要记住并记录梦

梦中发生了一些事情
但是你并不清楚
是吗，乔恩先生

鲍勃·迪伦

梦境中发生的大部分事情我们都没有记住，大部分人一般情况之下很难回忆起梦境。甚至于许多人都有一种错觉，误认为自己从来不做梦。首先，人们必须认识到这样一点，就是能回忆起梦的情况相对来说很少，常见的是对梦的健忘。梦从白天的意识中消失掉，是非

常自然的事情。

一个人要有意识地记忆梦境是非常艰辛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本身是不符合常规的。除非他动机非常强烈，否则不会成功。最重要的是，他必须学会一些必要的心理学技能——有具体明确的意识去记忆和记录梦。他每天睡觉时做的最后一件事以及醒来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想一想自己的梦，要形成一种习惯。在你调整自己的情绪，慢慢安静下来，要睡觉的时候，你可以对自己说：“今天晚上我会做一个梦，早晨的时候我还记得它。”

通常情况下，这些小策略就可以帮助我们在第二天早上还能记得自己的梦。早晨醒来时，问问自己“我梦到了什么”是非常有效的。如果想不起来，也不要轻易放弃，不要有其他私心杂念。不要想接下来这一天的安排。闭上眼睛，静静地躺在那儿，集中精力，在头脑中掠过的每一丝想法都不要放过。在这之前我在想什么？在这之前呢？对，是一个梦！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不断往前追溯，直到再次走向梦境。

找一支圆珠笔，拿一个笔记本，记下自己的梦，并且坚持下去。电灯开关要安在手边容易摸到的地方，以便晚上想记录梦境的时候容易找到。如果你与别人合住，这些都要做得非常熟练。在你的床边有温柔和谐的灯光，或者有一支带小手电筒的钢笔能够照亮你写字的纸张，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如果你一个人住一个房间，那么你可以买台声控录音机。这可以帮助你完全醒来，打开灯；并且可以营造梦的气氛和想像。当你直接说出梦的时候，录音机就自动记录下来，使你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梦，这要比握着笔有意识地去回忆好得多。然而，这种方法也有它自己的弊端，比如，它对所记录的内容没有选择，咳嗽声、喷嚏声、哈欠声以及床的吱嘎声都会记录下来。这样早晨整理录音的时候就非常麻烦，因此，你必

须有一定的原则和要求来规范这种录音活动。否则,你会被湮没在无终止的录音带中,每个晚上都是难以辨析的嘟嘟囔囔声、呻吟声、叹息声等等。但是,这样的记录也是非常有益的,尤其是在你说梦话的时候。有时你在恍惚中会像巫师或女巫一样口中念念有词,这是很平常的事情。这些阴森森的话语可以帮助你认识自己在潜意识中的部分个性特征。

如果你在醒来的时候想不起晚上的梦,可以写下就在醒来的时候脑中想了什么。每天早晨都要记录下一些东西,这非常重要。一定不要写“没有梦”或者“没有什么可以记录的”。在你醒来的时候,总会有些东西在脑中的。把它们整理一下,记录下来,这会帮你形成内部意识,逐渐加强你对梦境的敏感性。

如果上述做法失败了,那怎么办呢?如果真是这样,除了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间醒来,没有别的办法了。可以让你的室友晚上发现后叫醒你(从你的呼吸以及不自觉的动作中发现)。或者可以定上闹钟,在你通常醒来的时间之前半小时响,这会在你最后一个快速眼动时期叫醒你。最好用机械闹钟而不是无线闹钟,因为定好闹钟之后,它会转移你的注意,偏离你的梦。

当你想起一个梦的时候,不管多么支离破碎,都要尽量详细地写下来。这时,你可能会想起其他梦境。把这些统统记下,不必在意它们的顺序,以后可以调整出正确的顺序。重要的是要养成习惯,每天早晨都有规律地回忆和记录梦境。你做得越多,坚持得越久,你就会越成功。但是,你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对梦不可能有完美的记录,因为晚上做梦和把梦写下来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经验。梦与记录的区别就像你在剧院看了一出戏剧和你把它讲给朋友一样。如果你要对发生的事情进行准确合理地总结的话,这需要有好的记忆力、对细节的

观察力。经过练习,你可能比较熟练,但还是会忘记一些事情,或者潜意识地篡改故事情节,或者与其他事情混淆等等。事实上,每个梦都有三个版本:(1)你真正做的梦;(2)你回忆出的梦;(3)你讲给你的心理医生或朋友的梦。弗洛伊德认为第二个和第三个版本的梦都经过了“再修改”或“再创造”。这些歪曲很难避免,但是如果注意还是可以减少这种影响。

联想与扩展

得到充分的表达。

极度的痛苦和欢乐都可以在梦中

托马斯·德·昆西

最好是在笔记本的一面记录梦,而在另一面书写每个梦的主题、符号之间的联系。梦中想像情节的突出特征、地点的描绘,或者其他任何事情都可以写在这儿,多写几页也没有关系。要尽量详细地进行记录,而不应吝惜纸张;如果需要还可以再买一个记录本。在你写的时候,一定要让自己完全沉浸在梦的情绪和氛围中,让自己在梦中自由驰骋,在笔间自由表达自我。

在你把梦大体记录下来之后,就应仔细检察它的各个细节部分——梦中的每一个人、动物、地点、物品、情景或观点。按顺序逐个检查,并且要问问自己,“在我想这些时,到底是什么想法、什么感觉、什么观点、什么记忆或反应呢?”认真分析划过脑海的每一丝思绪,不要漫无止境地浮想联翩,要围绕梦境进行联想,看看到底能联想起什么。当想起一部分时,就想梦的下一部分。最重要的是不要引导自己的思维,要被动地想,让思维完全不受控制。不要打断,不要检察,不要筛选,只

是记录下你所想起的每一件事情。渐渐地,你会越来越清晰地发现自己的潜意识是一个多领域的复杂系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你的联想努力就会创造出一个意义系统,为你的梦提供一个个人背景信息。这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这些联想的哪一部分有效用呢?它们都有用。哪一部分最能说明你的梦呢?你的直觉会告诉你答案。你会突然发现你做了有意义的联结,或者它们本身就出现在你面前。柳暗花明又一村,“能量得到释放。洞察插上翅膀,我们起飞了!”

洞察透视的时刻是令人陶醉的时刻,人们常常忘记了记录。但是这个美好的时刻常常一晃而逝。因此,必须及时把它记录下来,以成为有形的永恒。这样你可以随时轻松地回味它,审视它。

一个人要想确立梦的个性背景,他必须不断地审视内在的主观自我。然而,若要确立梦的文化传统背景,他必须转向艺术、历史、文学、神学、民间传说、宗教等客观自我。但是,宗教、神话、民间传说本身就像梦一样,是对原始冲动的符号表征。个体和集体就通过它们联系在一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传统以我们为渠道释放能量,达到最终实现的目标。我们的身心生活都体现了它们,我们是它们的公务员。虽然我们每个个体都与古代人类象征相联系,但是,它们体现着普遍的传统影响。不管它是母亲、魔术师、敌人、掠夺者、国王,还是神甫等,每一种原型都有自己独特的象征意义。随着经验的积累和丰富,一个人可以学会识别。因此,一个人可以充分利用神话百科全书和 C. G. 荣格文集及其索引。这种研究可以避免单纯的个人联想所带来的意义的狭隘和单一。对虚幻主题的想像可以丰富拓展梦的背景。你的视野得到了拓宽,你的经验开始与人性相联——这是梦的首要目标。

在自由联想时,没有一个明显的时刻,要人停止扩展。心

理医生和病人所选择的必然是主观臆断的，如果过分刻意地追求，则会使他们偏离生动的现实符号，而被数据所累。扩展引伸不是一个科学程序，而是一个比喻过程，是一个诗化地、主观地寻找集体相似和隐喻的过程。一个人通过扩展梦可以确立符号想像之间的联系，从而充分挖掘心理世界的所有可能性。当我们发现相关的联想时，我们会意识到相应的扩展——也就是最佳地服务于目的，并扩展梦的意义。

解释

义有多种。

像所有其他心理结构一样，梦的含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刚刚接触梦的分析的人会认为对梦的解释是超自然的，似乎分析家是夏洛克·福尔摩斯或者是神谕。事实上，这是一个复杂的解构和重构过程。虽然分析家在第一次听到一个梦的时候，有时可能会有一些直觉观念，但是只有在做梦者本人逐渐展开联想，梦的主题和象征逐渐得到扩展时，梦的意义才会得到充分展现。渐渐的，梦及其意义就形成了一个“格式塔”。

研究梦就像建筑师研究刚刚画好的建筑设计图一样，或者像荣格思考他第一部炼丹书一样。只有当人们理解了梦就是一系列的符号交流系统，以及背景决定了它的意义时，它才显得不那么复杂。梦境通过背景系统相互联系在一起，人们只有理解了背景才会理解梦的全部意义，就像胶片在显像剂中逐渐显现出图象一样。这时，新手们对于“怎么知道某个解释是否正确”的问题也就不称其为问题了。问题不在于得到一个

“正确”的解释,而是让梦自己说话,自己展示其全部意义。事实上,只存在一种错误解释,那就是从理论假设中推导出来的单一解释。理解梦的关键就是要尊重梦的符号象征的多义性。

这里需要提醒一下。在你探讨研究梦的时候,你在运用一种自然的自主力量。你最好怀着尊重之情,谨慎小心地进行,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会得出什么结果。如果你感到情绪低落,最好找一位经验丰富的帮手,不要自己孤军奋战在陌生的领域中。一个人独自研究梦是一项需要特别谨慎小心的事业。除了潜意识所存在的影响以外,自我分析也必然是一个时好时坏的影响因素,因为你不可能看到自己的盲点,很容易就掉进了自我庆贺的陷阱,仅仅采用一种反映个人立场的观点,而不是采用更为客观、可能更为重要的观点。有时与朋友的讨论可能会克服这些困难。另一种方法就是组成一个小组,在这个小组中可以与一些富有同情心的人讨论你的梦。然而,你应该时刻注意你所信赖的人,因为一个不敏感的反应可能会带来很大的伤害,并且可能带来长久的损害。重要的是,你要记住,你在梦中就像你在现实中一样是赤裸裸的,孤立无援的。一定要注意别将自己暴露于危险之中。如果你执意要这么做,那么回去翻翻梦的记录,检查一下自己对各个成分作出的反应。这些成分可以是:(1)情节开展的地点、情景、建筑物或风景等;(2)梦中的人物,他们的性格、经历、态度等;(3)这些人物性格及其自我所体现的信念和观点;(4)梦中人物的行为;(5)通常出现的动物,每个动物都有自己的象征,都有自己独特的行为方式;(6)象征性物品,如戒指、钢笔、剑、瓦罐等,以及交通工具,如马、轿车或自行车等;(7)梦中的情绪、情感以及总体的氛围;(8)对于做梦者具有一定意义的数字、颜色或者几何图形等。

如果一个人要充分理解梦,就必须考虑所有这些因素。既然如此复杂,不要轻率地做出结论。耐心等待,等着各种成分的细节都逐渐明晰化。它们都代表说明了你自已:有些你早已熟知,有些还很陌生,甚至让你感到不安。正是这些不熟悉的现象需要你特别注意。要让它们的意义得以充分的展现,你就必须忍受詹姆斯·希尔曼所说的“阐释学挫折”。希尔曼说,现象是老师,如果你要“倾听”现象,要在其中发现你自己,你就必须控制你的解释热情。

例如,你梦见一头猪。当你写下你的联想时,想一想这头猪在你的梦中扮演着什么角色,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它有什么行为?更重要的是,它有什么样的感受?你可能要去翻阅动物寓言集,看看猪象征着什么,但是追随梦中的猪可能更容易揭示问题。毕竟它是你的猪,可能是因为你的自我中存在猪的缺失,它才出现在你的梦中。可能是你的自我需要向猪学习。荣格写道,“我们对动物都有一种错误观念,我们不应从外表来判断。从外表来看,猪的浑身上下全是泥,还喜欢在脏水中打滚。对你来说那是脏,但对猪来说不是。你所要做的就是从猪本身来考虑。”(荣格,1930)每个动物都代表了它所属的物种;同时,它又在你的梦中扮演着某个角色。它是原型的个性联系,也是你的系统发生学意识的体现,即自我。因此拒绝、诋毁、逃避它是没有用的;一个人应该善待它,承认它是自己的亲戚,使它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这样你可以发现自己的“意想不到”的能力,释放它们的能量,使它们成为你个性的一部分。这时,你就真正成为你自己。

但是这很困难,因为我们经常发现梦中的行为会让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感到羞耻——我们可能欺骗了朋友或同事,或者抢劫了银行。你愤恨地想“我再也不那样做了”。但是,你欺骗了你自己:你的梦已经抓住了本质的你。诚实的也是必须的

反应是研究一下自己的梦,检查一下自己以及自己的生活,看看自己在什么时候做了那些事情。这是最重要的生活习惯。在自己分析梦的时候,经常碰到与自我的冲突,最终得到一种与自我和谐的满意解释。如果要成长为正直的智者,就必须正视梦境所展示的最糟糕的自我。

有的时候,梦为了产生作用会夸张夸大。为了让你感到自己有多么荒唐可笑,梦会夸大你的一些行为、你的态度或你的观念,使它们显得滑稽可笑。这就是为什么最好主观地解释梦,因为它客观无情地展示了主体:你。

有时,在你分析梦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矛盾的、模棱两可的含义。这时,最好不要在其中作出选择。相反,要容忍模棱两可所带来的紧张:容忍它,看它会出现什么结果。总之,相信自己;自我最终会理解,但是它必须理解人性。

根据不同水平的评价标准,梦的不同部分都有不同的含义,这经常困扰着我们。问题不在于去选择一种正确的解释,也不是去寻找对于理解自我、认识生活最有意义的含义。这儿最重要的还是要把事情的原貌记录下来,再在纸上总结出对你的各种含义。

做完所有这些后,问问自己这个到底是关于什么的?它的基本主题是什么?然后像回答你的朋友询问你看过的电影或一本书时作出回答——如“啊,是一个女人受她爱的男人虐待的故事”。这可能是你自己的生活故事。另外,最好给每一个梦都取一个名字,以总结梦的情节,就像新闻故事的大标题:农民的牛群遇险:警察搭救。这会增强梦的影响,并且更加难忘。

想像仪式

現象在想像中更加清晰鮮活。

詹姆斯·希尔曼

如果对梦的分析仅仅停留在智力活动水平上的话，永远不会有太大的成就和进展。我们必须去感知梦，它们所传递的信息必须转化为生活。有时这会自发的产生：梦或幻想所带来的剖析是如此深刻，它使人为之震惊，从而改变自己的生活，就像发狂的医生梦见自己死于肺癌一样。这种经历有着强烈的影响，使人只能跟从它的发展，而别无它法。通常情况下，梦所传递的信息并没有那么强大的影响力，而是需要人们采取措施

施加强它的作用。梦是个体的自我所必须具有的心理职责。它可能实际地发生，也可能仅仅采用仪式的形式，这本身就是一种符号表征活动。

因此，要充分利用梦，最好按照下面三个步骤进行：

(1) 基本的分析梦的技能：运用联想和扩展确立梦的个性、文化和传统原型的参照物，并洞察分析它的含义；

(2) 在意识之中记录下梦的本质，写下对你的生活的意义，解释它，对它的主要符号形象进行分析，赋予它现实的实体形式；

(3) 利用梦，释放它的能量，把它的含义运用到生活中，或者是直接运用在现实的各种关系之中，或者是运用符号在积极的想像仪式中创造出心理的格式塔结构等。

这三个阶段都需要人有很强的，甚至能把所有的梦都揭示出来的想像力。那位经常受到老板恐吓的秘书就利用了梦

来摆脱这种状况,当她感觉到受到不友好的对待时,她在梦中就把他想像成一条张牙舞爪的狗召唤过来,这样在他面前就不会再感到害怕,而在利用梦形成这种形象之前,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当她在意念中理解并记住这种形象的含义(第一和第二阶段)后,在需要时,她就能很好的利用梦的功能了。这种现实生活中应用梦的技巧需要有很强的想像力才能应用它。这些想像力大部分产生自他的梦中。

再看另外一个实际的例子,假设你梦见了一个你多年没有见过或者多年都没有想起过的男性朋友。在你梦里,他正在做什么?第一步,先决定他代表了你自己的那方面。为什么在潜意识里会有这种形象?大概你需要他来补充你的自我意识的一些不足。他代表着你自己可能想发展的某一方面。如果你还在为自己感到困惑,真是幸运,你的直觉告诉你到底需要什么。用你的朋友作为参照点,进行一些积极的想像是很有帮助的,把梦中的他想像成一个真正的人。你需要做一些和他有关的事情吗?你为什么让友谊流逝了呢?人的生命是短暂的,我们很少有人有足够多的友谊让我们挥霍。梦中的信息可能提醒你们之间的相互需要,你们应该重新成为朋友。

另一个可能是你梦见了你正在做平常生活中非常想做的事情:你正在一个斜坡上快乐的下滑,正在画画,正在制作盆景,正在花园里浇花或者正坐在飞翔着的飞机里。想一想梦中这些形象的含义,你应该考虑在现实中把它实现吗?梦经常和我们自己的非现实的一些生活相联系,而且能引导我们把它们实现。

但是大部分梦并不能很容易的利用到实际中来。它们的影响需要系统的加以组织起来才能发现。这就是宗教中对梦的利用具有重大价值的原因,然而很多人在这方面都存在问题。他们知道梦以及从中得到的启示非常重要,但是他们不愿

意接受梦的任何宗教形式的利用。同现代社会的科学唯物主义相比,宗教在当代社会的地位是尴尬的。但是它并不一直这样。在人类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无论是人的个体生活还是社会集体生活,宗教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宗教给重新确立基本真理,重新给永恒的社会价值赋予活力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工具,也给每个社会参与者予能量,给所有的转变一个新的角色和位置一个有效工具。但是在我们这个精神贫乏的时代,传统的价值沦落了,它所代表的形象被嘲笑。大部分宗教都消失了。我们很少有人知道它会同神圣相联系。这是一个主观世界贫乏的世界,荣格用“普遍的精神意识”来描述这种情况。他写道,在这个神圣宗教极度缺乏的时代,我们必须用改变内心世界,释放自我的力量,有想像力的疏导这种力量到现实的生活中等手段来设计我们自己。罗伯特·A. 约翰逊(1986)给出了许多例子来说明怎样用梦来实现这个目的。我自己也将讲述一个例子。

一个32岁的妇女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她感觉到她侍奉丈夫时她丈夫就像她的父亲。她怎么做才能把这两个她生活中都极端重要的人区分开来呢。显然采用一个方法阻止它是不够的。如果她不能度过总使她陷入过去生活的那个时刻,她应当为此做些更为积极的举措。通过分析,她意识到了她投射到丈夫身上的父亲形象以及在丈夫面前她自己的女儿角色,她希望消除这种形象和角色。这里宗教起了重要的作用。她拿走了五年前结婚那天用来装饰卧榻的所有玩具,这些玩具可能引起她对儿时一些事情的回忆,从而出现父亲的形象,然后通过一个很神圣的仪式,她焚烧了它们。对她来说,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象征性举动。这虽然没有立即解决她面临的复杂问题,但这却是向着问题解决方向发展的关键性的一步。而且当她面对丈夫时,她不断的对自己说,“这个人是我的丈夫,

我爱他,是因为他是他自己一个人。”这是一个自我暗示的仪式,这个举动来自她对自己一个梦的理解。(在她的梦里,她丈夫因为她是一个好女孩而送给她一件礼物,而且告诉她,这是他将要送给她的最后一件礼物。这是一个正在分泌乳汁的,很大的洋娃娃。)

这样的宗教在从梦中获取最大作用中能发挥潜在的影响,但是,它们的这种影响可能是危险的,燃烧的玩具能够将做梦的人同仍然存在于她精神中的生动活泼、富有创造性的儿童时代割断联系,但是她的情感和精神也被降低了。意识到这种危险的倾向,我们必须确保她潜意识的同她的儿时保持联系,必须用一种更富有想像性的态度来代替她对那些玩具的注意。

如果梦是人们潜意识的创造的一些象征性符号和情节,那么宗教就是人们有意识的创造的象征性活动。宗教把人们内心世界的精神和灵魂释放到外部现实世界,从而提高它在人们意识中的影响和作用。因而宗教的创造完全是一种理性和适当的活动。宗教并没有古怪和不正常的地方。仅仅是我们的现代社会把宗教搞成了现在的状况。

我们可以用同样在实际中取得好效果的理由来判断在生活中积极灵活的想像的运用是否是应该的。这种想像的过程和每个人自己有意意识和漫无目的的幻想相联系。积极主动的想像就像你处于清醒状态时做的梦。但是它又不同于白日梦,因为你仍然保持清醒、警惕状态,可以进入你想像中和其中的形象进行交流,同他们交谈,倾听他们的回答。它也像一个清醒的梦(一种你意识到你在做梦的梦),只是在发生的时候,你没有处于睡眠状态,头脑仍然清醒。在一般情况下,做梦就像一场戏,你可能是其中的一个角色而发挥作用,也可能不是其中的角色而不能起到任何作用。对梦中活动的最后结果你不

能施加任何的主观影响。然而在积极主动的想像中你却不同于做梦，你积极参与想像中的活动，注意事情的情节和其中出现的人物角色，然后你要对他们进行详细的考察。在这个过程中，你不仅仅是听一听他们自己给你的证据，而且你要亲自检查他们。

沉溺于这种想像可能会比进行宗教活动更为尴尬。因此，这里，你必须忽略人们对灵魂现象的偏见。灵魂现象在我们现在的文化里是古怪的，现在人们谈到做梦和进行想像时通常用来描述下面的状况：你生活在梦的世界里（那就是说，你脱离了现实生活），你是一个做梦的人（同样是说你脱离了现实生活），你纯粹是幻想。为了能使梦的研究达到成功的目标，我们必须正视这种偏见并且战胜它。否则我们将一事无成。我们现在仍然有这种看法：所有想像的事物都是虚幻的、不存在的，没有意义和价值。在这种观点之下所有的灵魂都不可能有具体实际的结果。我们必须证明空中楼阁并不是一个坏名声，相反，它们能比在坚实的基地上建造的更持久。

难以理解的是把梦中和幻想中出现的形象看成我们自己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形象。我们必须同他们打交道，就像在生活中同人们交往一样，只是这种交往更加深刻和诚恳。内心活动并不是刻意的逃避。只有我们真诚的对自己的灵魂产生的一切做出承诺，我们才能真正的融入到自我的道德力量中去。

对于我们来说，处于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境地是很难达到的。喜欢它的人一般是同自己的内心世界联系紧密的、性格内向的人。然而，即使是这些内向的人，也发现这种情况是很难达到的，因此一般的人都沮丧的放弃了这种尝试。对于那些在这种尝试中取得成功，并且经常处于这种境地的人来说，积极主动的想像比任何其他别的心理活动都增加了研究梦的好处。因为它动员起了直觉的功能，使我们的内在感觉更加稳

定、有力。然而它有潜在的危险性,因为它相当于灵魂上的自我诱导情节,就相当于一个人在清醒的世界里变成了一个做梦的人。积极主动的幻想的危险性在于梦能主宰和控制人的意识。另外自我意识成分不足,而且同现实的生活联系不多的人一般是容易接受暗示的人,这种人一般也不去适用这种情况。这种人在完全清醒着的时候,能把显示和做梦相混淆。总的说来,积极灵活的想像最好同那些正式的分析结合起来,而且当需要的时候应当有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为了进行积极主动的幻想(想像),你需要一个绝对安静、不受任何干扰的私人空间和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最好的做法是把特定的时间相应的分配到你的每一天,安排到你的日常生活中和家庭生活中去。在人们起来工作开始之前的早晨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如果你乐意,在人们都已经上床睡觉的夜晚也是一个很好的时间。有别人在你身边的时候,实际上是不可能进入完全属于私人的想像境地的,为了进行积极灵活的想像,要确保你确实是独自一个人,一直到想像结束为止。

为了进行这种想像,需要一个仪式。荣格想像他正向一个山洞里下落。曾经用埃斯库罗斯的概念描述当我们进行幻想或做梦时眼球向里转动的情景。此时,我们的灵魂受到启发,从而使我们意识到一些事情的真相,而这些事实在白天我们清醒的时候,我们是意识不到的。人们需要保持的是处于睡眠和清醒之间的那种状态,这种状态开始的时候人们仅能保持几分钟,但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这个时间段可能被延长,这取决于人们的眼睛睁开之前进行的幻想活动所具有的内在价值的大小。

为了进行积极灵活的想像,一个好的开始的方法是回想最近一段时间在梦中出现的一个人物形象,比如一个妇女。尽你自己的最大可能详细描述这位妇女的形象。然后问你自己

有关这位妇女的一些问题。她是谁？她喜欢什么？她多大年龄？她结婚了吗？她嫁给了谁？有孩子了吗？她的兴趣是什么？她为她自己做了些什么？在梦中她对你和对别人的态度是怎样的？她对你有何要求？当你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感到答案都是正确的，在某种意义上，你好像知道问题的答案。那么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从哪里来的。大概仍然来自梦中这位妇女形象本身。过一段时间以后，她可能开始谈自己的思想。于是一段对话开始了。在许多方法中，这种过程就像一个小说家写作的过程一样。对于许多作家来说，如果没有有关角色人物的一些细节，并在想像中给予回答，就不是写作的开始。但是对于另外一些作家来说，人物形象的开始从假定人物是她自己的生活开始，她打着自己的手势，选择她自己的衣服和环境，同她自己说话，这些都是作者从听到的话中记下来的。如果达到了这个阶段，这种创造过程同积极主动的想像就极为相似了。当感觉和情感都参与进来的时候，这种体验的印象就更为深刻了。

另外一种开始的方式是集中注意于现在正干扰你或使你感到困惑的一种心情。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将进入你的心情，让这种感觉控制你的想像，然后用语言和具体的形象来表述它自己。有时候，一个包含那种心情本身的形象将会形成。一个因为某种事情而感到莫名的悲伤而难以表达出来的人，静下心来进行积极主动的想像，会突然看到在温暖阳光照耀下的一堵红色的砖墙。这个一瞬间的记忆被转到他九岁时在学校里的一些情景。当时，他感到十分悲伤。他非常想念他的妈妈，他感到仿佛被爸爸妈妈抛弃了，因为他们送他到这么一个令人恐怖的地方来。在他宿舍前面有一堵红色的砖墙，当傍晚的阳光照射过来的时候，他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恐惧。它使他想起妈妈，它使他内心充满了想家的痛苦。在这个时候，显然

这堵红墙成为他逃避这一切的障碍，这堵红墙把他给囚禁起来了。这个想像中的形象连同这个形象唤起的记忆将会使这个人意识到他在清醒状态下一直困扰他的那种莫名其妙的悲伤到底是什么。这样他就能控制这种心情，并且能对它进行分析，进而他就能摆脱这种心情了。

自由的无拘无束的进行积极主动的想像最终会使人超越本人的个性进入到人类中的最理想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相同的想像主题将会重复出现，想像将会在同一种情况之下以相同的想像形象重复进行。如，许多年以来，有一个人总是以相同的情景开始进行积极主动灵活的想像。这种情景是，他独自一个人骑马经过一个草原向着一片树林前行。一直到他走到树林的边缘，什么都没有发生。然而当他走进树林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发生了。这是一片无限永恒的树林，他遇到的人都是永恒的，他们有的令人感到恐惧，有的很有智慧，有的人很性感。有时候，这种想像是如此的吸引人以致于他不愿意再出来。里面实际上隐藏着某种危险。

另外一个开始的方法是让想像从一个能够给你暗示的地方开始。我的病人当中有一个过去经常回到康沃尔河口。在那里她度过了孤独的童年时代。在那里她能够看大海的潮起潮落，看泊在岸边的小船，看海鸥在头顶飞翔，就这样在这种想像的奇特经历中她度过了几个小时。回到这个记忆对于释放她的想像的能量就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当你进行这种积极主动的想像的时候，应当把它记录下来。找一个舒适的地方坐下来，在你开始想像之前，在一个适当的地方放置一个记录本打字机或录音机。许多人发现，在想像开始之前闭上眼睛，直到想像开始，你能够控制它的时候再睁开眼睛以便记录正在发生的事情，这种方法是最好的。也许利用录音机或者通过触摸键盘打字能帮助你在闭上眼睛的时

候仍然能够记下你想像的事情。在你想像中出现的東西决不都是令人感到快乐或是必然有趣的。通常你可能想要忽略这些呈现给你的形象、人物角色和情感。但是,你一旦开始想像,就必须接受呈现给你的一切,必须搞清楚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代表着什么。记住想像中出现你最脆弱的地方、最难以理解的地方、你自己内心最深刻的地方,这些对你的成长都有着巨大的潜在力量。如果你忽略了它们,那么将会阻碍你自己的发展。

如果什么都没有发生该怎么办呢?耐心些,它会产生。想像就像大自然,它讨厌真空的存在。坐在那里等待,想像会用各种形象、人物、各种念头、声音来填充你空虚的心灵的。让它们进来,开始记录它们。如果它们又离去了,也不要惊慌。坐在那里静静的等待,它们还会回来。它来去不定,就像一只被观察的猫。

当各种形象和人物角色在你头脑中建立起来以后,那么积极主动的想像就开始了。你加入到他们中间开始一场对话。对待这些内在的人物形象要把他们当成现实中活生生的人物,按照他们自身的历史、意愿、生活去对待他们。他们就像你自己一样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所以要以尊敬的态度对待他们。可以向他们问一些问题,但是记住,一定要认真的倾听他们是怎样回答的。由于我们不知道你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别忘了记下双方谈话的内容。研究内心活动的关键是要清清楚楚地记下发生的一切(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用不同的颜色加以区分),怎么做不是关键的。重要的是你能记下它。直到你这样做了,它才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

一旦开始,你必须全身心的投入到你所进行的一切中去。你给你遇到的人越多的关注,你就会越在意他对你提出的问题的回答,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对你的意义就越大。积极主动

的想像的所有要点就在于它不是一种抽象的活动，而是现实中实实在在的活动，这种活动同你的内心精神世界相联系。然而不要完全被想像中出现的现象所迷惑，以致于失去自我的观点和立场。对想像中发生的一切，你思考过什么？你从这些经历中得到了什么？你同意那些观点吗？你能听从那些指示吗？它对你现在的生活和将来的生活有什么重要意义。当有一个声音告诉你去做什么，而通常这些都是应当由自我决定是否去做的，你是否听从指示去做了呢？人不应当让自己成为自己幻想控制的傀儡。同时，承认那些在想像中被表达出来的观点是正确的，能够理解那些同我们自己最珍视价值相冲突的观点可能是理智和正确是非常重要的。

当你做记录的时候，不要担心标点符号、单词拼写或者表述方式。记录的结果只是给你一个人看的。重要的是要尽你自己的最大可能记录尽量多的细节。其中含有重要或令人兴奋的材料的部分在以后可以用很多注解或说明，然后在一个正式的副本里总结形成，再把它们保存在一本特别的书本里或者是文件夹里。就像荣格在他的红蓝色书里保存的那些一样。如果你愿意把正在发生的积极主动的想像对着录音机讲述出来，就像一个体育解说员解说球场上正在进行的足球赛一样。然后，你可以把录音带上的重要部分记在书上。把它们整理在一起，这些有关自己精神的材料应当属于绝对私人性质而保密的，把它们锁起来。如果有人被允许看这些材料，那么这个人对你一定很特殊。同你内心世界的自我有共同的地方。这个人一定不会辜负你的信任。

当人们开始进行积极主动的想像时，人们常常抱怨他们很快就使它结束了，因此它起不到什么作用。如果你有这种感觉，不要悲观。在你想像中产生的任何东西都是自我活力的产物。在实际中，你进行的想像越多，那么你得到的就越多。成功

的秘诀在于坚持和耐心。当人们感觉到结束得太快的时候,是因为他们太操之过急了。他们总是想使这个过程加快,以尽快的得到结果。人们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去形成幻想。只有当它真正清晰形成的时候,人们才能同它交流。一旦你开始问问题并且得到回答的时候,你就开始了积极主动的想像活动。一个主要爱好是几何的数学家曾经抱怨当他进行想像的时候感到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太简单了以致于没有什么价值。“但是,”我说,“你是在同你自己对话,这是最主要的,你正在同自我对话,自我正在回答你的问题,这就是积极的想像。”他向我有些嘲弄似的看了看。于是我加了一句“回答完毕”,他被我说服了。

对梦的分析,不管它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都具有内在的价值。可能完全理解梦不太现实,但是一个人至少可以倾注他全部的精力去理解,把梦境带进白天的意识之中,让自己走进梦的神话境界。正如荣格所说,“寻梦一生”。一个人可以达到极限,并超越极限,这时他会发生本质的改变,发现原初的人性,从而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只有认识到现实存在的超越性才能完全发挥“自我”的内在动力。每天抽出时间认真地反省自己的梦,通过这个仪式,世俗的生活就会充满了希望和精神的动力。

10 普通的梦

所有生活在西方文明世界的人们都会在他们生活的某些时候有这些梦，而且有许多还会被一次又一次的重复。

加尔文·S. 霍尔和弗农·J. 诺德比

关于梦的分类标准到目前都还是不成熟的。许多研究者试图通过分析梦的具体内容而建立一些梦的分类标准。他们使用这样一些分类范畴：如主题（下滑、飞翔、接受检查、火车误点等），情感体验（焦虑的梦、沮丧的梦、噩梦、性侵犯或攻击性的梦等），以及生活中的一些重要事件（出生、工作的开始、结婚、死亡等）。这是在林奈时代对梦的分类标准。现在我们正等待着一个达尔文式的人提出一个革命性的解释框架，能够把所有类型的梦都能解释清楚。我的意图不是来承担这一任务，我也没有力图去设计类似亨特在 1989 年提出的那样详尽的一份分类标准。给梦分类就像向文件架的格架中放置样本，每个样本都有大量的，所有的分类标准都试图去包含但又不可能包含的，难以描述的组成部分。接下来，我将分析现实中一些梦的具体例子，而不是讨论它们的分类标准。在每个例子里，我们将分析理想中的问题解决模式同白天的生活现实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这种相互作用在快速眼动睡眠阶段产生出合适的问题解决策略。

那些生理遗传性的古老的构造在梦中成为重要的一部

分。在分析人们具有的最普通的梦的时候,这一点变得特别明显。在第三章里,我曾经提醒要注意霍尔和诺德比从世界不同地方收集 50000 多个梦这项工作的价值。这些被公布出来的、典型的梦包括各种不同的内容,有侵犯梦、打猎的梦、飞翔的梦、下沉的梦、被陌生人追赶的梦、风景游览地的梦、灾难性的梦、性梦、结婚生孩子的梦、考试或遭受同样严峻考验的梦、旅游的梦(不管步行、骑马、开车、坐飞机还是乘轮船)、游泳或在水中的梦、观看大火或是被困在地下某个地方的梦。他们总结道,“这些典型的梦表达了所有的梦关心的内容、注意的地方和具有的价值。”据说他们可能建构了关于人类灵魂的普遍性的参考模式(常数)。(1972)因此,他们实际上就为支持荣格关于潜意识的假设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虽然他们自己并没有建立这种联系。

就在霍尔和诺德比进行研究的同时,在美国的理查德·格里菲思博士和 O. 米亚基博士以及日本的大岛进行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研究,在这项研究里,他们比较肯塔基的 250 名大学生和东京的 223 名大学生所做的梦。他们收集了 1000 多个梦,然后对它们进行分析以发现那些重复出现的特定的梦。结果发现两组人的梦有惊人的相似。而且被测验到的重复出现的那些梦的内容主题同霍尔和诺德比描述的非常相似。

看起来梦经常重复那些我们称之为理想模式性的主题,这些主题在所有时刻,对所有地方的人都具有典型性,非常的重要。

痛苦和快乐的梦

哪里有爱，哪里就没有暴力；哪里
有暴力，哪里就没有爱。这是一个问题
的两个方面。

荣格

虽然我还没有具体的例子来证明它，但是在我临床的印象里，最近几年来，梦变得越来越具有暴力倾向了。原因可能要归于日趋复杂多样的新闻媒体传播手段以及不断涌进我们家庭的众多暴力形象，但是毫无疑问的一点是我们的整个社会正变得到处充满暴力色彩。对教堂和国家神圣形象敬仰的衰落，家庭的破裂，毒品的泛滥以及毒品引起的犯罪的猖獗，数量巨大、对

社会不满情绪强烈的下层阶级的增多，都是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因为我们在暴力冲突行为（社会阶层等各个方面冲突）上采取了一定措施和在社会友爱、同情等方面有一些琐碎的举动而有所改善。在这些现实的社会现象面前，同梦最初发生联系的最普遍的情况是，“它就像是每天晚上我睡觉之前正在观看的电视节目。”那些进入我们梦里的电视节目中的具有暴力色彩的内容对我们的心理和行为一定有潜意识的影响，尤其是在我们的儿童时代。不幸的是，对成千上万的青年人具有很大吸引力的电影里面主要也是有关痛苦、悲惨的争斗、战争的内容。而且，电影中不是向人们展示通过与对手对话、和解来解决问题，而是要把对手打败、消灭。

简单的内容分析揭示出痛苦的、侵犯性强的梦在男性当中更为常见，而且在任何年龄阶段都是这样；而欢快的梦在女

性中更为常见。但是这两种类型的梦在两性中都会发生。一个比性别更具有意义的对梦的影响因素是个人从小生活的家庭的类型。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深度心理学一直把人的侵犯性行为误认为是人的冲动性行为或人的本性。在特性论的影响之下,这种观点被另外一种认识取代了。这种新的认识认为人的侵犯性行为同人生活的社会环境和人成长的经历有关。在梦中出现的暴力现象就像现实生活中的暴力现象一样,原因根植于生理方面(生理解剖、脑的结构、荷尔蒙、神经传输系统等),也根植于社会地位、对自己领域的保卫等方面。但是暴力现象也同本体论的影响有关(早期的家庭生活,父母的生活模式等),也与人的个性类型和社会—经济因素有关(如金钱、教育和社会影响等)。可能的情况是电视和电影上的暴力现象并不能使所有的社会公众成员都产生暴力行为,而人们早期生活的影响起的作用更大一些。儿童时代的暴力现象的影响会起到很大的作用。那些暴力形象以及他们引起的梦对于强化那些被生活激活的潜意识倾向有重要作用。

同样的事实是那些欢乐、愉快的倾向同充满和睦、友爱、团结的家庭相联系。欢乐和痛苦的梦对我们都是有用的。因为友爱和社会地位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而梦使我们对任何可能背叛我们友爱的行为或攻击我们社会地位的行为的信号保持警惕。比如,来自稳定的、充满友爱的生活背景的人发现自己在工作中、在会议上、在婚姻中受到威胁、攻击时,会有一些非常强烈的、痛苦的梦。当梦中一些形象从快乐的类型变成了令人感到痛苦的类型时,梦通常为可能即将发生问题的婚姻提供了第一信号。同这些梦相联系的人之间关系揭示原来和睦的夫妻生活正被相互指责对方缺点的生活所代替。梦的研究在这一阶段特别具有价值。它能使做梦的人意识到他正面临的非常危险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夫妻关系正变得具有

破坏性,一些消极的、负面的预见正在被强化,愤怒、失望、争斗正在代替夫妻间原有的和睦、相互理解和真诚的爱情。如果要想挽救这场婚姻就必须做出努力,在积极的因素范围里尽量限制消极因素的影响,必须把占主导的关系类型由痛苦转向欢乐。当这种努力的需要被自我认同以后,潜意识将会在解决婚姻面临的问题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同样的,对于那些在痛苦、凄惨的环境中长大,因而受着痛苦的梦折磨的人的治疗方法也必须是促使、激励他们向快乐的方向转变。通常那些病人很长时间以来由于社会地位受到抨击以致于自我认同程度很低,不能以尊敬和富有感情的态度正确认识自己。对于这些病人来说并不是一个仅仅给他们父亲或母亲般关爱的问题,因为这种行为模式已经使他们形成了依赖性和孩子般的不成熟。应有的目标必须是帮助他们理解自己的能力和价值。这种利用病人本身具有的积极品质加上快乐因素结合的治疗方法会给梦的研究和分析提供必要的背景和帮助。

不幸的是,那些生活经历坎坷的人一般不能接受正确、良好的分析治疗,因为他们不能与他们的医生形成良好亲密的关系,他们认为对梦的那些解释、分析是在打击他们的社会地位。但是,为了使分析成功,有一点是关键的,就是人们应该提供以前曾经经历过的快乐的生活经历。这样可以形成良好人际关系的能力将会在梦中和在对梦的分析中不断的显示出来,而且这种能力会伴随着生活出现的友爱和温暖而不断得到扩大。虽然痛苦的梦的模式不可能被透彻的进行分析,然而,地位、身份、主宰和屈服是理想模型的值得注意的部分,通常这些都是我们在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想要得到的。在所有按照阶级等级秩序组织起来的社会里,一个人要想保证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不被别人取代,一定的自我控制和自我保

护意识是一个人不可或缺的警备状态。在政治哲学里,自从农业社会和剩余产品产生以后,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关系就存在着一个核心的争论点。对社会平等的政治关注促使潜在的社会冲突变成了外部的政治运动和性别之间的相互歧视。事实情况正是不管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观点是什么,它们都会不可避免的在我们的梦中重新表现出来,因为实际上我们正在面对并处理社会生活的真正面目,在这里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在使用暴力手段来取得社会的主导支配地位。例如,自信心脆弱的那些病人对于别人对他的评价始终有一种怀疑,始终有一种不安全感。这在他们的梦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他们的梦中有许多自我检查来对社会是否对他们的自我尊严产生了威胁进行预测。因此,快乐梦的模式是建立在相互的帮助和重新树立自信心基础之上的,而痛苦梦的模式则是以相互猜疑和相互提防为基础的。快乐的模式产生轻松的心情和友好的生活气氛,痛苦的模式则产生人们的痛苦和社会的差距。因此,很明显,痛苦的模式在所有精神紧张的时候都会占据主导地位。而快乐的模式则总和健康、快乐等因素相联系。当谈到在这两种模式中选择哪一种进行强调的时候,分析家的职责是很显然的。充满暴力和敌意的梦必须被接受,因为要转化那些负面的影响,但是关键的一点是对这些梦的处理必须在友好、和睦和相互支持的关系中进行。

主宰和服从之间的冲突不仅发生在社会生活中,而且在人本身的个性中也存在。因为超我在处理人的个性时总是具有一种非常强的反抗性和不服从性。这在人的梦中和受压抑、具有自我惩罚倾向的人自言自语的方式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樊世通(吉尔伯特在1986年曾引用)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况的内在的自言自语,“保持安静。闭嘴。不要说任何话,好吗?我不想听你说任何话。”吉尔伯特实际为受这种自我折磨的人提

出了一个有趣的建议，这种自我的折磨就像人的自我免疫缺乏症，人的身体自己反对自己。在两种情况下，自我的一方面攻击另一方面，就像一个占据了主导的爬行动物攻击一个试图占领它空间的生物一样的攻击模式。

同样的驱动力在先天就是性虐待狂的人身上表现特别明显。他们梦中和幻想中的补偿性原则特别明显。例如，受虐狂在自我认识和试图取得社会地位的时候，总是否定他们的竞争力和进取心，总是把这些特征影射给他们的男主人或女主人身上，认为只有他们才具有这些特性。相反的，虐待狂们则否定他们具有同情心、爱心等，而把这些认为是他们的奴仆们具有的。然而在受虐狂和施虐狂的梦里，在灵魂中这些被拒绝的个性是混合在一起的整体，通过对梦进行分析，它们都会发展起来，并且能进入到人的意识中。

因此，痛苦和欢乐的梦在人们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中能给人提供一个理想的模式而起到深刻而广泛的暗示作用。当人们的社会适应受到损害时，这些梦能给人们进行诊断性的调节提供有价值的材料。

焦虑担忧的梦和可怕恐怖的噩梦

我想有一个充满欢乐的世界
那时，所有的恐怖都被驱散
威廉·莎士比亚，《理查三世》

在睡眠状态下，通过举止行为，可以看到所有的生物都有恐惧、担忧的表现。释放这情感的情形看起来一定在他们的梦里。焦虑、担忧的能力是一种生物性本能，如果没有它，所有的生物，包括我们人自己都不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来。

忧虑的梦在人类中间非常普通，它们

的功能可能是使我们对危险保持警惕。这些梦给我们以警告、为某些事情做准备和推动我们做一些事情，就像我们处于清醒状态下时忧虑给予我们的一样。天生焦虑的人比那些生性平和的人有更多的忧虑的梦，这情况会误解荣格的理论：梦能补偿人们清醒状态的态度和表现。然而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忧虑只有当人们灵魂的过滤检查不再起作用的时候，才能进入人的梦中，在这种情况下，被压抑的愿望得以进入人们的梦中，这能更好的解释大多数忧虑的梦。梦中的情况和现实中引起人焦虑的情况是一致的。而且，当我们处于一种无忧无虑的状况，面对一件我们完全能做得很好的事情而完全放松的时候，担忧的梦具有补偿性，它能给我们一些提醒。有一场考试，一个重要的会议或发言，你可能没有准备充分，但是你却认为到时候一切都会准备好的。然而只有在梦里，你才会失望的发现当自己走进考场、会议室或聚会的地方以后，自己根本没有准备。这种典型的自我检查或角色参与的噩梦很明显的具有一种自我推动的功能。同样的，一场梦中经历的考试可能是现实生活中由于现在还没有面临，因而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另外一种考试的模式。因此，我们必须要对这种梦中给我们的警告进行分析。

从生理学的角度分析，焦虑是警惕的一种形式。为了在这个充满危险的世界中生存下去，一个生物体必须对环境的变化时刻保持警惕，这样才能对可能出现的任何危机情况做出准备。巴甫洛夫把这种现象称为反射，他称之为“它是什么？”反射。实际上，既不是警惕也不是“它是什么？”反射必然的产生焦虑。当考虑到可能的威胁或危险时，焦虑就转变成了担忧。通过担忧转变成害怕、惊慌和恐怖的这一系列转化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人的内在情感和外部形体方面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就可以看到产生自警惕的警觉状态的更进一步的

表现形式。所有担忧害怕的外部表现,如心跳加速、呼吸急促、颤抖、出汗等症状,都是神经活动加速引起共鸣和肾上腺素向血液中释放的结果。所有这些剧烈的变化都会使人对危险的情况做出准备,或者迎接它并同它战斗或者选择逃避。焦虑、担忧的梦能使人做出身体上的反应,令人感到害怕的噩梦同样起到这种作用。

噩梦在人们中间是很普遍、常见的,尤其是在儿童中间更为常见,噩梦的基本特征也具有普遍性。在梦里,做梦的人在面临危险的时候,感到十分绝望,心里充满担忧和恐惧。在英语中,噩梦(mare)这个单词的意思是可怕的事物的意思,这个词的最初来源是古印度语的 mara,就是“破坏者”的意思,这个词可能又来自魔鬼(mar),这样最后形成 Nightmare(噩梦)一词,所以噩梦包含的含义就是被魔鬼破坏了一个可怕的梦。噩梦这个词从本原上揭示出,噩梦实际上是来自一个“夜间恶魔”给人们带来的灾难,但是对噩梦是来自人们灵魂内部的认识却使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一个联系:噩梦实际上是被引诱才发生的,而且是做梦者本人精神进行引诱才发生的。弗洛伊德的解释是最为经典的。因为,弗洛伊德认为,所有的梦表现的都是人愿望的实现,同样,噩梦也是这样,虽然它不是做梦者有意识的一种愿望,然而弗洛伊德坚持认为,我们实际上是希望体验噩梦中发生的那些可怕的事情的。

必须承认,人们有时的确希望体验被惊吓的感觉,否则他们就不会去看恐怖电影或去进行其他惊险的活动了。但是这是一种对惊险情况的自愿的体验,目的是证明我们能够控制因这些惊险的情况引起的紧张感觉体验。虽然这些情况可能也是很惊险的,但是我们知道它们是安全的,这些可怕的状况实际上并没有发生。然而噩梦就不同了:梦中的威胁就像实实在在存在一样,看起来好像根本没法逃避。人们不希望去重新

体验噩梦中可怕的经历，从噩梦中醒来的人根本不愿意再进入睡眠，因为他们担心噩梦会重新再来。

一个关于噩梦的种系发生的解释从本义上说比弗洛伊德的解释更为合理一些。毫无疑问，这些可怕的梦是关于物种生存的一些内容。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它，这些梦都会加强我们迎战或者躲避危险的能力，而且使我们为处理现实中将要发生的实际的紧急情况做好准备。在人类的进化史上，在适应能力进化的环境中，主要的威胁来自食肉动物和充满敌意的陌生人或陌生的环境，至今，这些形象在现代人的噩梦中仍占主要内容——处理一些具有潜在危险的情况，如全身没有任何遮掩而被暴露在公共场所，被拘禁在一个封闭的地方而没有逃脱的办法，孤单一人在漆黑的环境里，或者被送上很高的地方而有向下掉的危险。实际上，在焦虑、担忧的梦和噩梦之间经常出现的特征是那种飘忽不定的忧虑（可能由很多种不同的情况引起）和恐惧的忧虑（特指一种情况）之间产生的特征的反映。当我们仔细分析现代社会的男男女女在梦中所经受的那些恐惧时，这些恐惧在现代社会中根本不存在。它们都是被夸张了的恐惧对象，包括动物或对生命具有潜在威胁的环境，这些都是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曾经遇到过的。

这种对普普通通的刺激就产生恐惧反应的倾向原因是遗传方面的倾向性的原因，这种倾向性曾经对于人们获得生存能力具有重要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使人们个体为现实中存在的危险做好准备。这些倾向性的存在能够解释为什么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人们会因为各种各样实际并不存在的危险而感到害怕的原因。因此，在一个到处都是陌生人的商场里感到惊慌或者是当水管子在草地上像蛇一样滑动就感到恐惧，这些情况对于一个能够正常进行自我调节的人看来都是荒唐的，但是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反应都是可以理解的，它

们是人类古老的反应模式的一种表现。经常做噩梦的人实际上也是遭受同样被夸大的一种体验的折磨。这种体验是对我们人类生活环境中存在危险的情况的自然反应。

噩梦还能和不同类型的心理反应联系起来。例如，被疾病缠绕的人的噩梦通常是无法医治的绝望。而那些患有精神分裂、孤独症的病人经常被远离人群的噩梦困扰，虽然在梦里他是自愿孤单一人的，但是，他在这种孤单面前变得特别脆弱，因此那种令人害怕的原型被激活了，不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梦中，这种现象的结果都是严重的精神妄想症。

从种系发生学的观点来看，噩梦的基本特征并不全是通过视觉和听觉的途径来了解，因为从先天性聋哑人的梦里同样可以推导出这些特征。例如当海伦·凯勒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梦见过一只狼，“它看起来要扑向我，它锋利的牙齿撕咬着我的身体！我却不能喊出声（事实上是我只能用我的手指比画），我想拼命的喊，但是我却不能发出一点声音。”虽然不断重复出现的噩梦和焦虑、担忧的梦令人感到难以接受，然而它们的确能为我们学习和成长提供有价值的机会。它们可以提醒我们注意那些具有潜在危险的情况，而这些危险的情况是做梦的人在现实中没有注意到的。要想在现实生活中发现这些同梦中经历类似的危险是什么并且要帮助“自我”采取合适的措施来应对它们，对这些梦的分析就可能有一种非常迫切的需要。经常的，这种对梦进行分析的结果在将来遇到“梦真正发生的时候”可能会变得更加清楚、明确：能使他们面对威胁而不慌张、害怕。面对持枪的凶手，不是逃跑或因害怕而发抖，而是勇敢的面对他，质问他是否有什么问题。自然的，个人的自我尊严、自我认同和自我信任程度就会有提高，噩梦可能也会从此停止了。在孩子们的噩梦中尤其是这样。

儿童的梦(孩子的梦)

他想知道你将怎样去处理那蛇一样的东西……在早晨，他说它变成了蛇，就像在树枝上挂着的绳子。他说，他们夜里还会来吗？

威廉·高丁《苍蝇之王》

孩子的梦用很有趣的细节告诉了我们有关梦的功能和目的。从理论上来看，灵魂实质上是生来具备的所有无意识的集合体。当儿童成长的时候，不受约束的灵魂和行为能力将会使儿童和他的外部环境发生相互作用，形成复杂的功能。语言的出现，父母和同伴的影响，自我意识的增强，在游戏中逐渐表现出的简单的竞争和合作的行为模式，这一切都为

儿童成长为健康的社会成员提供了必要的技能。梦，就像游戏一样，可以为儿童在发展自我、环境和本我之间提供精妙的场所和机会。

最初的时候，孩子们在区分现实和梦的时候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大部分在五岁或六岁的时候就能将它们区分开来了。法国发展心理学家让·皮各特认为这个过程包括三个阶段：(1)直到三岁或四岁的时候，儿童仍然不能区分梦和现实的生活。例如，他们可能虽然已从噩梦中醒来，但是仍然认为梦中可怕的鬼怪仍在床下。父母要尽力解释，那仅是一个令人害怕的梦，不是真实的。直到孩子们亲眼看到床下真的没有什么东西，他们才会变得平静下来。(2)在四岁到六岁之间，儿童能区分梦中的事情和外部的事情，但是他们仍然不能完全理解梦中的事情完全是心理内部的现象，和外部现实的世界并没有必然的联系。(3)在五岁到八岁之间，他们能够理解梦完

全是心理内部的现象。在这个阶段出现第一个完全清晰、明确的梦。

分析孩子们讲述的他们的梦的内容可以看出在梦中他们有更多的烦恼,而不是快乐。布兰达·马龙在《儿童的梦》这本书中曾经描述了大量的这样的例子。他说,很多儿童向他抱怨他们从没有做过一个快乐的梦。这和弗洛伊德的观点完全相反,弗洛伊德认为儿童的梦仅仅是愿望的实现,因而都是快乐的梦。他的理论继承者大量引用的两个例子是关于弗洛伊德的外甥赫尔曼和女儿安娜的故事。当有一次弗洛伊德生日的时候,赫尔曼仅有一岁零十个月,他被推荐代表大家给他舅舅送上一篮子味道可口的樱桃作为生日礼物。然而当那个时刻真正来临的时候,赫尔曼却遇到了困难,因为他很难抵御美味可口樱桃对他的诱惑。弗洛伊德写道,他生日过后的一天,“他突然从梦中醒来,带着一个只能是来源于梦中的令人兴奋的消息喊道,‘赫尔曼吃了所有的樱桃。’”(1976) 在第二个例子里,安娜是弗洛伊德最小的女儿,那时仅有一岁零七个月,一天早晨,她呕吐了,所以一整天她都没有吃东西。经过一天的饥饿,在那天夜里,人们听到安娜在睡觉时发出激动喊声:“安娜……果子……樱……桃,野生……樱……桃,恶心,布丁!”

虽然许多孩子的梦毫无疑问的是实现他们心中最想实现的梦,然而看起来这仅仅是相对来说很少的一部分。更多的时候,他们的梦充满了担忧和恐惧,这些恐惧真正令人发生兴趣的是它们和儿童的年龄阶段与人类对生活环境的进化性适应相符合,如他们被抛弃,被可怕的动物追逐,被绑架。更为有趣的是,它们典型的反映了狩猎社会的特征,就是说,噩梦中的恐惧都是对鬼怪和神灵等的恐惧。年龄非常小的儿童自然的就像我们的祖先一样把这些梦产生的原因归于外部的影响,

如上帝、神仙和鬼魂等。通过对那些特别容易做噩梦的儿童の詳細观察能看出，这些儿童在生活中同令人恐惧的事物的接触更多一些，如被陌生人或动物追赶，在黑暗的环境里，一个人被孤单单的抛弃。这些重复出现的噩梦在父母的帮助和安全保证下加上在深夜里打开灯的作用下可能会得到极大程度的缓解。正如经典理论所预测的，鬼神主题的梦的比例将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的降低。克鲁格(1975)发现，六岁的儿童鬼神主题的梦占47%，九岁的时候下降到36%，而在成人的梦里只占26%。

布兰达·马龙的发现中，给人印象最深刻、最为有趣的部分是儿童们对梦的本质和功能的陈述和认识。这些陈述和认识比那些正式的分析家和梦的研究者做出的分析更富有诗意，更有趣味。例如，伊夫(四岁)把她的梦描述成“我枕头里面的画”。俄琳的描述则表现出梦具有补偿性作用的本质，他说，“我们做梦是因为我们有问题要解决，然后我们的梦就能让我们兴奋起来。”马龙的至少两个被试者谈到了梦和记忆之间的联系，“做梦帮助我们回忆头脑中那些时间很长而变得很遥远的想法和思想。”罗斯玛丽说(十三岁)，“我们的梦激起我们的记忆”(七岁)。阿德勒关于梦的观点被阿尔文(七岁)很好的表达了出来，“如果你想做某件事情，首先你必须去梦见它，这样你就知道如何去做它。”梦是一种娱乐形式的观点也被布莲表达了出来，“我们做梦，所以当我们睡觉时就不会感到厌烦和疲劳。”

荣格对儿童的梦特别感兴趣，在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体验过这些梦是多么的有影响力，它们能预测和形成将来的发展模式。我们能记起的最早的梦有时候令人恐惧，大部分成人都有这种感觉。这或者是因为梦中的形象的原因，或是因为父母的影响的原因。正如荣格观察到的，儿童梦中涉及到的

问题并不真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而是他们父母的问题。虽然儿童们的梦值得特别注意,但是荣格提醒说不要太多、太详细的关注它们,因为如果全身心的太过于关注梦中想像型的对象,可能会不利于儿童对现实社会环境的适应。同样的危险也能发生在太过于关注内心世界而忽略了外部关系的成人身上。然而对儿童的梦进行研究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领域,通过研究,儿童的梦能告诉我们快速眼动睡眠对儿童正在形成的具有适应能力的个性特征有何促进作用。

诊断性和预测性的梦

了。

有人梦见天空被破坏,他自己死

阿特米德洛斯

偶然之间,人们会梦见身体的某个器官正遭受疾病的缠绕,这种情况应当认真对待,因为这种梦可能为实际上就存在的疾病提供了第一信号。霍尔(1991)描述过这种情况,有人在冠状动脉瘤被确诊之前曾经在梦中感觉到有东西在身体内乱抓、乱咬。我的一个病人因腹痛而从一个很长的、令人难受的梦中醒来,在梦中,她试图用各种办法去打开排水管。随后,她被查出患有胆结石。梅达德·博斯

(1957)描述了一个病人曾经连续两个夜晚做了一个同样的梦,在梦中出现了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痛迫使她坐在内部很热的管子上。每次在她的两腿之间都有一种焦灼的痛,当她醒来的时候,这种疼痛就消失了。在第三天晚上,当她再次从梦中醒来的时候,疼痛却没有消失,而且她发现自己发热。当她把医生喊来进行诊断后,医生诊断出她患了急性膀胱炎。

有很多例子证明梦的确可能显示出一些病理上的症状，如果从快速眼动睡眠相联系的激素和神经功能的突然变化的角度来看，这种联系是正常的，毫不感到吃惊的。心率不齐的症状可能很快在一个令人烦恼的梦中体现出来，而患有高血压的病人比血压正常的人会有更多的令人感到心烦的梦。

荣格的一个病人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很有建设性的例子。他是一个博学能干、40岁的中学校长，在威廉·旺德心理学方面懂得许多。荣格把这种心理学看成“没有描述人们生命的具体细节，而是关注一些抽象的概念和理论”。他来找荣格抱怨说他经常莫名其妙的头晕，而且伴有心跳加速、恶心，身体虚弱、疲倦的感觉。荣格立即想到这些症状和高山病的症状非常相似。这是一种在瑞士非常普通的情况。当患有这种病的人很快的爬到一座高山之上的时候，他们不能适应这么高的高度。

这个病人讲述了他三个连续的梦。在第一个梦里，病人发现自己处于瑞士的一个小山村里。他是一个身穿长袍，非常严肃的人，在他的腋下夹着几本厚厚的书。有一群孩子在他周围，他们被看做是他的学生。他们正在看着他，他们说：“那个人很少来这里。”“为了理解这个梦，”荣格说道，“你必须知道这个病人是一个具有很好的社会地位，接受过良好的科学教育的人。但是他是一个从社会低层开始努力的，他是一个自我奋斗型的人。他的父母都是贫穷的农民，他通过自己的奋斗达到他目前的位置。他是一个非常有抱负的人，仍然充满向上攀升的希望。他像一个从海平面升到6000英尺高度的人，在那里他看到12000英尺的高度就在他上面。”他希望能达到它，但是没有意识到他并不适合这样做。这个现实中对生活的不满足是引起他高山病症状的原因。这个梦给他现实中的心理状况一些安慰。“不是注意他从哪里来的，他仅仅向往自己将

来的职业,他希望自己成为一名大学教授。这个梦通过提醒他的出身,对他的向往做了一个补偿性质的实现,因为他正处于一种想达到超过自己能力所及的目标的危险状态。”

在第二个梦里,他想他必须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他正在整理他的公文包。但是他发现时间过得很快,火车马上就要离开。由于害怕迟到太久,他立即开始匆忙的收拾一切。他想把衣服收拾到一起,但是他的帽子不知放到哪里了,上衣也不在原来的地方,他在屋子里面到处找它们,“我的东西在那里?”最后,他终于把它们都收拾到一起。然而当他冲出房间时,才发现没有带公文包。他迅速的返回来寻找它,同时他看了看手表,发现时间已经很晚了。于是他向火车站跑去。然而他发现路面非常的软,他就像在沼泽地里跑,双脚根本不能快速移动。当他艰难的到达火车站的时候,发现火车刚刚离开。

这是一列很长的火车,当他正在观看的时候,它正在转弯,他想,如果这个火车司机有能力不让前面的机车开足马力就好了,因为如果他那样做了,他后面长长的火车将会偏轨。就在这个时候,火车司机突然降低了火车机车的速度,火车挤在了一起,一场事故发生了。这个人从梦中醒来后,仍然对梦中的情景感到后怕,迟到和在前进的路上必须要克服许多障碍的梦是非常普遍的,对那些尽职尽责、全身心关注工作的人来说尤其如此。荣格写道,“最使人恼怒的事情是,当你太想做成某件事情时,而总有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在阻挠它。”做梦的人想使自己尽快的离开家,但是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阻力阻挠他实现这个目的。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可以不用等其他火车转弯就能冲在前面的火车司机。荣格把这种行为比做这个人还没有做好准备就想达到12000英尺高度的努力。他忘记了他的本我属于心理存在的先锋派,他必须先处理拖在他后面的“长尾巴”,然后才能继续前进。

荣格把他病人的第三个梦看成是一个“大梦”：“我在乡下一个简陋的农家小屋里，同一个年老、慈祥的老人在一起。我在同她谈论我计划中的一次远行，我计划从瑞士步行到莱比锡。她非常吃惊，因为我对我的计划感到很满意。就在哪个时刻，我透过窗户看到一片草地，那里有几个农民正在堆干草。然后，景象发生了变化。在那片草地上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像螃蟹又像蜥蜴的怪物，它向我爬来，先向左爬去，又向右爬去，因此我发现自己好像站在一把张开的剪刀口上。然后，我手中拿了一根木棒，我用木棒轻轻的敲打着这个怪物的头，把它杀了。此后，好长时间里，我站在那里注视着这个怪物。”

这个做梦的人又一次回到了他原来生活的环境，发现他自己同那个慈祥的老人在一起。就像在第一个梦里，他为自己穿着体面、拿着书本和那些山村孩子在一起感到吃惊一样，现在，他惊讶的是这位慈祥的老人竟然同他谈论他的莱比锡之行（在那里，他希望得到教授的席位）。当荣格问他和哪个简陋的农家小屋的联系时，他说：“那是一间在巴塞尔附近的叫圣·杰卡布的古老的小屋。”荣格立即把这个联系同文化背景相联系，给予了更多的思考。小屋所在的圣·杰卡布在1444年曾经有一场战役，在这场战役里，1300名瑞士战士阻止了有30000名强壮战士的勃艮第军队前进的步伐。指挥官命令数量很少的瑞士军队在发动进攻之前等待支援，但是当敌人逼近的时候，他们都勇敢地攻击了上去，结果他们几乎被杀光。然而，他们勇敢的行为阻止了勃艮第军队的继续前进。荣格观察到：“这里又是一次个人想法超前而没有实现同自己过去的一切建立联系，这种行为注定是要失败的，病人的这种追求是导致他出现高山病症状的原因，他走的太高了，他没有为这个高度做好准备，他忘记了他是从哪里开始奋斗的。”

转回到梦可能给现实带来的一些暗示这方面，荣格让病

人注意到在这几个梦中都出现的关于英雄的主题。他正沉浸于自己是一个英雄的幻想之中——一个身穿长袍，有着美好未来的人；一个在圣·杰卡布，战场上不惧死亡，英勇战斗的战士；一个战胜怪兽的勇敢者。做梦者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在他的联想里，他就是一个勇敢的义勇兵：“我感觉到自己就像是一个要去和一条龙战斗的英雄。”荣格强调，“这个龙的形象和英雄的形象总是同时出现的，龙和同他战斗的英雄是同一个神话里的两个形象。”

然而在这个梦里的例子，这个怪兽不是一条龙，而是一个蜥蜴和螃蟹的混合体。荣格从神经解剖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特征的含义：蜥蜴代表着爬行动物的脑和脊柱的神经中枢，而运动神经占主导的螃蟹则主要表示副交感神经系统的功能。根据这个分析，荣格警告他的病人，他在意识层面想达到的一些目标和神经系统发生了冲突，如果他坚持现在的做法，他的身体将会遭到自己神经系统的攻击而产生不适。这就是在他身上已经出现的类似高山病的一些症状。

然而，这个做梦的人不同意荣格的解释。他说，他用魔杖战胜了怪物，因此，他再也不用担心那个螃蟹似的蜥蜴的反对力量了。但是荣格打消了他的这种想法。“那个魔杖并不是一件致命的武器，那个怪物还会再次出现。想一想你为什么长时间注视那个怪物的原因？”“你的梦里包含了一个警告，你的行为就像那个火车司机，或像那些后面没有任何支援而莽撞的冲上去同敌人战斗的瑞士战士，如果你继续坚持你的做法，你将会有一场灾难。”但是这个病人仍然去了莱比锡，结果他最后凄惨而痛苦的死去了。荣格没有描述他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但是那个又像螃蟹又像蜥蜴似的怪物使人可怕的想到癌症的可能症状。因此，这一系列的梦实际上是诊断和预测。它们没有起到治疗的效果，这不是梦本身的错误，而是做梦人的

过错,他们没有注意梦给他们的警告和暗示。(CW18)

坠落和飞翔的梦

婴儿在树梢上摇啊摇
风儿吹过,摇篮摇动
树枝断裂,摇篮坠落
摇篮和婴儿掉了下来

梦中对坠落的警醒可能有着系统发生学的根源,因为我们遥远的祖先生活在热带丛林里,在树枝间攀援,他们就有着坠落的危险。在较近的时代,树木为躲避掠食者的人提供了避难所,站在上面还可以查看宿营地或者是不名身份的敌人,但是,警觉的需要仍然存在。在现代,梦仍然以现实的和象征的方式警告我们在高处时一定要小心。

飞翔的梦较少系统发生学的根源。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人们都迷恋于鸟儿,无论是把它作为猎物,还是作为标志、符号或者图腾,都说明人类认识到了它的力量、美丽和迁徙。在航空时代到来之前很久,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就揭示了人类对鸟儿的羡慕,他们热切期望能与鸟儿一起分享天空。毫不惊奇,飞翔的梦可能是最令人愉快的体验。在梦中飞翔,可以超越一切,摆脱所有的限制和束缚,获得完完全全的自由,从而让人陶醉片刻。这种状态永远不可能长久,但正因为此,才使得它更加令人愉悦。

上升和下降的象征还深刻地寓含着道德的意义。希腊伊卡尔斯神话中就描绘了飞得太高(骄傲自大)和坠入地狱(报应)的危险。爬得越高,摔得越狠。失去立足的根基,或者是从栖木上摔下,都象征着社会地位的丧失。摔倒的妇女象征着道德的沦落(除了从圣经意义上来说,男人明显逃过了这一劫

难)。坠落还象征着丧失控制,如在“坠入爱河”中。

反复出现的对坠落的恐惧的梦通常源于过分的控制欲望,因为人们对失去控制后要发生的事感到神经紧张。通过对梦的分析,一个人可以理解这一问题,并且能让自己在梦中坠落,这说明他处理问题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一个医生经常做噩梦,梦见自己悬在悬崖边上,心中充满了坠落的恐惧,这说明他把自己的病人当成了牛马来对待。他感到自己的胳膊已经没了气力,他坚持不住了。在这危急关头,他会惊醒过来,满头大汗。一旦他理解了这一经历的象征意义,我鼓励他再梦到挂在悬崖边上时就让梦自然而然地发展下去,他几个月之后才能做到这一点。他最终成功了,仅仅跌进了一个浅水坑里,醒来时极度放松。同其他释放控制需求的梦一样,这促使他对自己、自己的病人和家人形成一种温和、宽大的态度。

山水风景的梦

对山水风景的梦是详细的,带有情感色彩的,富有象征意义的。这与原型以及适应技能的进化又有什么关系呢?戈登·奥兰斯和朱迪思·希尔维根(1992)在他们的“对山水风景的进化反应”一文中指出,对山水风景的审美反应至少部分来源于狩猎者的心理结构。狩猎者要经常改变自己以适应居住地,要更好的决定往哪里迁移,在哪里住下,在不同的地方进行什么活动。我们的祖先

痛失一切后的世界如何
潮湿的,还是荒芜的?随它们去,
随它们去,荒芜,还是潮湿;
杂草万岁,荒芜万岁。

杰德勒·曼理·霍普金斯

有着和我们一样的需求——寻找住处、食物和水，要保护自己免受猎食者和敌对部落的侵袭。虽然我们现在的位置与原来孕育我们的环境有着天壤之别，但是与我们所选择并为之作出反应的环境相比，人类基因的变化很小。因此，奥兰斯和希尔维根认为，过去进化得来的反应模式在潜意识中影响着我们的反应。

原型模式可以提高以后的适应效率，因此，在适应环境的进化中，对山水风景的梦可能起到了强调往日迁移或狩猎中的重要线索的作用。在现代社会，我们仍然必须协调物质环境，分析威胁和危险，去我们必须去的地方，然后再找到回家的路。正如另一位山水风景梦的研究者斯蒂芬·卡普兰(1992)所言，我们始终都是以信息为支持的动物，不断地努力去认识理解周围世界。不仅仅是在对环境适应的进化过程中，在今天的生存也需要不断去探索和建构周围物质环境的“认知地图”。这种行为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因此我们要在梦中给它大量的时间，这不足为奇。白天我们获得了新信息，就在晚上更新并拓展我们的认知地图。一些有趣的研究还考察了人们喜欢的山水风景的种类。研究发现人们最喜欢的、感到最惬意的环境与热带非洲的景象相像——我们人类从那里进化而来。可能是因为那里满足了我们的需要：有营养丰富的食物、可以提供庇护的树木，还有连绵不断的山峰、峡谷和平原等一望无际的景观。

另外两个研究者贝灵和福尔克(1982)向不同年龄的被试者出示了山水风景的幻灯片，其中包括热带雨林、落叶林、针叶林、东非景象以及沙漠。他们发现8岁的孩子总是选择东非景象，并说他们愿意去参观并住在那里，而不愿去其他地方。15岁以上的被试者对东非景象、落叶林和针叶林的态度都很好，他们选择了这三个生物群系而不是热带雨林和沙

漠。虽然对两张东非干旱季节的幻灯片的评定要低于对绿色生长季节的东非的评定，但是所有年龄段的被试者最不喜欢的环境都是沙漠。这与梦中山水风景的影响完全一致，沙漠是贫瘠、孤立、绝望的象征，而肥沃富饶的风景象征着希望和复兴。

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是在贝灵和福尔克的研究中，没有一个被试者曾经游览过东非，加之年幼儿童总是选择这种风景，贝灵和福尔克由此推断：对风景的感受存在一个发展模式。我们先天倾向于热带非洲景象，但是在成长过程中其他环境的影响可以改变这种先天的倾向，如所有被试者都熟悉的美国东部的落叶林。虽然经验对审美反应有着重要的决定作用，但它并不能完全取代先天的反应模式，这在年幼儿童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这些研究发现与我们的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千万年来，人类所选择的居住环境强烈影响着成功的繁衍和生存，从中进化而来的心理和行为机制反过来又经受着巨大的选择压力。对居住地的选择逐渐形成了对一种环境的情感反应，也就是促使人类拒绝、或者探索、或者居住的消极情感或积极情感。

对于大部分动物而言，探索似乎是积极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可能是所有研究、调查、迁移的基础。然而，它也有潜在的灾难，可能有茂密的灌木丛或者根本就没有掩盖物，恶劣的天气，森林火灾，地震，雪崩或者山崩。所有这些在梦中都有体现，并且有丰富的情感和象征意义。

仅仅把梦视作是“信息加工”过程的观点认为山水风景梦只是更新认知地图的机制。但是，这种观点完全忽视了山水风景梦所激发的深层情感。组成梦境中的风景的树木、山峰、河流都体现着原始的兽性，并且具有一定的心理含义。

神志清醒的梦

神志清醒的做梦者无所不能！

——斯蒂芬·拉伯格

神志清醒的梦是指一个人在梦中知道自己正在做梦。1913年，荷兰精神病学家弗雷德里克·威廉·冯·艾登研究了自己在1898—1912年间做的352个清醒的梦后，向伦敦精神研究协会递交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首次提到了“神志清醒的梦”这一词。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第一个清醒的梦的：我梦见一片田地上的树全都光秃了，我在上空飘过，我知道那是四月，而且我肯定我看到了树枝的自然变化。在梦里，我告诉自己，

我的幻想根本不可能创造或者制造出像我在上空所看到的树枝摆动那样复杂的形象。在梦中大脑似乎可以合成类似于电脑游戏中的复杂动作那样的动作细节。让冯·艾登感到震惊的是，他自己不仅在梦中仍然有意识，而且他能指挥自己的注意力，并能自由地表演某些动作。

他按照赫维·德·圣丹尼斯立下的传统，采用了实验法来研究自己的梦。“1904年9月9日，我梦见我站在窗前的桌子边。桌上摆着各种物品。我非常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做梦，我想自己可以做什么实验呢……我拿起一只红葡萄酒瓶，想用拳头敲碎它，同时我还想要是在现实生活中这是非常危险的，瓶子完好无损。但是等我过了一段时间再看时，瓶子已经碎了。”

就像演员忘记自己的台词一样，瓶子后来碎掉的事实给冯·艾登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自己处在一个虚幻的世

界里,虽然这个世界模仿得惟妙惟肖,但是还是有一些小小的疏忽。在梦中,他把瓶子扔出了窗户,试试瓶子摔在地上时自己能否听见哐当声。“我的确听见了,我还看见两条狗给吓跑了。我想这个喜剧世界模仿得如此绝妙。”

正如其他许多人发现的一样,在梦中保持清醒是一段令人兴奋的体验。休·卡洛维的笔名是奥利弗·福克斯,他曾清醒地梦见自己是一名学生,他如此迷醉于这个梦,并把他的生都献给了梦的研究事业。他说他在梦中清醒的时候:瞬间,一切清晰百倍,大海、天空、树木从来都没有如此美丽。甚至普普通通的房屋也鲜活起来,透着一种神秘的美丽。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如此幸福,头脑清醒,以及一种无法言表的自由!真的无法表达这种感觉,一切言语都显得苍白无力,不过它只持续了短短几分钟,后来我就醒了。(福克斯,1962)

神志清醒的做梦者都同意冯·艾登的观点,认为在这种状态下,做梦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梦的内容和进程。做梦者可以在梦中尝试在现实生活中永远不敢尝试的新策略——如转过身来直接面对一头冲过来的狮子。你还可以认识到一个完全不同的自我:也就是你的各种侧面,直面它们,并与它们对话,接受它们。你在梦中还可以充当一个局外人,冷眼旁观,对之加以批评和改变。换言之,在神志清醒的梦中,你可以直接做一些在分析梦时你只能间接做的事情,结果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在神志清醒的做梦、积极主动的想像、催眠和通灵的出神以及某些严重的精神病之间明显存在着一种亲缘关系。所有这些都可以长久改变当事人本人,都是处于一种临界状态,在其中意识和无意识交织在一起。在所有这些状态之中,人们研究最多的是催眠状态,并且认为在深度催眠状态之下可以产生深刻的心理精神变化——例如,血流停止,过敏反应得到抑

制,全身麻木。因此,通过这种催眠可能可以抑制某种癌症的发展。然而不幸的是,只有 10% 的人可以进入深度催眠状态,这种状态并不是可以学习的。神志清醒的梦可能具有的治疗功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但是,只要它是可以学得的,它就会是非常有效的。斯蒂芬·拉伯格在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睡眠实验室的研究开创了对神志清醒梦进行实验调查研究的先河。拉伯格不仅成功地教会自己以及他的学生成为熟练的神志清醒的做梦者,而且他首先使用了一些技术,使得观察者能发现被试者在睡梦中何时意识到了自己的梦(观察被试者的垂直眼动)。他得到了一些重要的实验结果,例如发现人在醒着的现实中对某些事情体验的时间长短决定了他在梦中体验此类事情的时间长短。

我在对梦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发现如果病人能够成为熟练的神志清醒的做梦者,可以推进他们的治疗进程。好像是他们可以积极主动地运用他们的想像,这样就可以赋予他们的经历更多的含义。

虽然神志清醒的梦可以自发产生,但是这种情况相对较少。就像我说的,它是可以通过学习而毫无困难的获得的。就像记忆梦境一样,动机是关键。重要的是要形成一种必要的心理系统——就是一种希望在梦中能意识到梦的欲望。首先,必须锻炼并提高回忆梦的能力:如果熟悉梦及梦的内容,那么就能更容易地在梦中意识到梦。德国心理学家保罗·拖雷建议形成一种对意识状态的“批判-反思态度”。你应该养成一种习惯,经常问自己“我在做梦吗?”就在你醒着的时候,至少也要这样做十次。尤其是在你即将入睡和醒来的时刻一定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拖雷说,一般在这样练习的一个月内就会出现第一次清醒的梦。有些人甚至在练习的第一个晚上就有了这样的梦。正如斯蒂芬·拉伯格所说,关键是要让你的身体在你

头脑清醒的时候入睡。“1,我在做梦,2,我在做梦”,等等。最终,在说到“42,我在做梦”时,你会发现你真的在做梦,并且幸运的是,你仍然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俄罗斯哲学家皮埃特·D. 奥斯本斯基和美国心理学家纳山·拉伯特都强调睡眠之前的催眠状态:你一定要坚持回忆划过脑海的任何事物,经过练习,你就有能力有意识地反省自己晚上的第一个梦了。

但是,这些技术在睡眠周期开始时不太可能派上用场,因为快速眼动一般要在非快速眼动之后进行。如果一个人能午休一会,在午休时更可能直接进入快速眼动状态,这时就容易成功。在这个时候更可能做清醒的梦,更可能自己酝酿梦。有一次,我与一位希腊同事一起参观了阿蒂卡不太出名的阿斯克雷宾。我们吃了山羊肉干酪、橄榄,还喝了红葡萄酒,在田园式午餐之后,我躺下来,并且告诉我的同伴我要睡觉了,还要做一个有关阿斯克雷宾人的梦。阿斯克雷宾人很快就出现了,他急急忙忙地向我走来,讨厌地盯着我看。他说,“你看,我希望你不要到这儿来浪费我的时间。”说完这些,他又匆匆地离去了,我就醒了过来,为自己轻浮地对待治疗圣地感到羞耻。

帕特里夏·加菲尔德在她的畅销书《创造自己的梦》中,指出自我提示是进行神志清醒的梦的有效方法。她指出,在睡觉之前,要不断重复,“今晚,我要神志清醒地做梦”。她说她在运用这种技术时,有一条“经典的学习曲线”,神志清醒的梦从零次逐渐增长到每周三次。(加菲尔德,1976)

一旦你有了自己的第一次神志清醒的梦,以后你就容易做这样的梦了。这就好像克服了一个概念性障碍一样。在罗杰·班尼斯特四分钟跑一英里之前,人们认为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随后,成百上千的人与他一样克服了这一障碍。做神志清醒的梦也一样。

因为梦是如此的真实,你很难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在做

梦。你可以怀疑自己是否在做梦(为了神志清醒地做梦的第一步),但是,你不要确信。你怎么能确信呢?这需要一个测验。你需要做一件你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做的事情——腾空,飞翔,除了你的手脚外没有其他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测验。程序是这样的:我在做梦吗?我想是的。好,我要飞了。准备起飞,起飞!能行吗?哇,可以,我在飞。因此,我是在做梦。

憧憬未来的梦

梦通常在事情还未真正发生之前很久,就准备,或者宣布,或者警告这件事情。这不是一个奇迹,也不是先知先觉。大部分灾难都有一个很长的酝酿时期。

荣格

憧憬未来的梦不应被当成是先知先觉或者是预言的梦。荣格写道,“如果把它们看做是预言,那就错了。因为它们不比医生的诊断或者天气预报更能预示些什么。它们只不过是某些可能的真实行为的憧憬组合。”(CW8)因为“梦中的一切都是以看到过的事物为基础的”,因此,产生憧憬未来的梦是可以理解的。(CW9)

最初心理病人告诉治疗师的梦可能是憧憬未来的或者是对未来的期望,这也正是治疗师所感兴趣的地方。荣格引用了同一个病人的三个这样的梦,它们分别发生在三个不同治疗师开始新的治疗疗程时。第一个是这样的:“我必须穿过边境线,进入另一个国家,但是我找不到,也没有人告诉我它在哪里。”

随后的治疗没有成功,一段时间之后就中断了。她又请了第二位治疗师,她梦见:“我必须穿越边境线,但是晚上漆黑一

片,我无法找到海关。找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看见远处有一丝亮光,认为边境线就在那儿。但是,我必须走过一条峡谷和一片丛林,才能到达那里。在丛林中,伸手不见五指,我迷路了。然后我发现有个人在我旁边。他像疯子一样抓住我。我惊恐万分,醒了过来。”

第二次治疗也中途夭折,这明显是因为治疗师与病人的关系过于紧密,在治疗过程中失去了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客观性。

在荣格开始为她治疗时,她做了第三个梦。“我必须穿过边境线,或者我已经穿过边境线了,我发现自己在瑞士海关,随身只有一个手提包,我想我没有什么要交代的。但是,海关官员搜查我的手提包,令我惊奇的是,居然翻出一张双人床。”

荣格认为,如果按照因果关系的逻辑来解释,就不能抓住关键。“对分析情景的信息把握不能出丝毫差错,正确的理解是对于有效的治疗具有重要意义。”第三个梦说明,在她来找荣格为她治疗时,她已经“穿越了边境线”,她所要处理的可能是婚姻中性的问题。(CW16)

虽然荣格同意生物学理论家的观点,也同意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梦是做梦者为以后做事做的准备”的观点(CW5),但是他反对把憧憬未来的梦看做是神秘的预言。自我的有意识的批判性评价总是必需的。这可能会使得人们认为梦是某种壮观心理图景,因为它毫无错误地指引着人们的生活朝着战争的方向发展。(CW84)

这儿可以画神经学上的平行线。前脑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普罗米修斯——带来光明(意识)以及对未来的远见(普罗米修斯是一位先知)。后脑就是伊比米西(伊比米西总是事后诸葛亮),间接地带来了黑暗(无意识,潘朵拉的魔鬼)。前脑的普罗米修斯的力量给予了梦先知先觉的能力;它们既是对未来

的憧憬与预期,又受到原型智慧的指引。但是,它们不是福音——仅仅是对未来可能性的模仿。

性梦

可以说,任何一种观念无不体现着性事实或性欲的。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原始冲动在性行为中得到进化,性伴侣之间的纽带控制着个体的生活,也保证了种系的繁衍与生存。有关这种主题的梦是所有梦中最普遍的一种。因此,弗洛伊德认为可以合理地把大量物体看做是男性或女性性器官的象征:“所有伸长的物体,如木棍、树干、雨伞,以及所有长的尖锐的武器,如刀子、锉子以及长矛,都可以看做是男性的性器官。”另一个经常用,但是不太明显的象征物就是指甲锉——可

能是因为上下摩擦的动作。盒子、箱子、柜子、烤炉,以及中空的物体、船和各种容器等,都象征着子宫。梦中的房间通常是妇女;如果象征着进进出出,这种解释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在梦中穿过一套房子或者是一个妓院或闺房,上下楼梯、台阶象征着性交。

在男性的梦中,领带通常象征着阳物。毫无疑问,所有武器和工具,如犁、来福枪、左轮手枪、匕首、军刀等都象征着男性的性器官。(弗洛伊德,1976)弗洛伊德对这些象征物的枯燥乏味、千篇一律的还原主义的解释忽略了所有其他的含义,使得这些象征物的含义得到掩蔽或猥琐的删改。性梦的内容通常都很明确:它通常坦白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图,而不是在复杂的象征物中扭曲自己。当今人们的性梦根本不用求助于在

楼梯上跑上跑下,或者把剑放入鞘中,或者把长的直物插进中空的圆物体。这可能是弗洛伊德的性解放影响了我们对性的态度。

虽然弗洛伊德所列举的所有物体可能毫无疑问地象征着人类的生殖器,但是它们可能还象征着其他许多事物。正如荣格曾经说过的,阴茎本身就是一个生殖器崇拜物。自然赋予它以力量和生殖能力以及男性性别: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人类的阴茎是其他灵长类动物的三倍。(戴蒙德,1991)

中国道教中的阴阳概念可以说是对男性和女性原则的性质和力量的最早概括之一,也是最复杂的概括之一。阴阳这两个基本的力量渗透在所有的现实之中,并且男性和女性都有这两种积极活跃的力量。阳性代表着积极的、精力充沛的、坚定有力的,它的属性是热的、光亮的(太阳及其光辉就是它的象征);它的王国是上苍和精神世界;在它勃起这一方面,它能激发、促进、创造,使事物结果或成功;在它进攻的一面,它战斗、摧毁;它本质上是外向的;它是积极、冲动的,同时又是自控的、禁欲的。

阳性是独断的、积极主动的,阴性是被动的、包容的(月亮和洞穴是它的象征)。它的王国是土地、自然、子宫,因为它本质是要妊娠、给予阳性以力量,将生命带出黑暗;它的运动是内向的。

不仅仅我们的文化认为男性代表着独断、身体攻击、毁灭性,女性代表着妊娠、孕育。生物学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会如此。它们之间的区别具有明显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就说明了它们的原始起源。

两性结合的基本象征是异性相融,这是炼金术士的主要目的。然而,这个象征并不是经过掩蔽的性交的替代物,相反性交只是异性相融象征的一个例子而已。异性相融象征着相

反的心理过程和变化的融合，这同时促进了心理和精神的发展。同样，两性结合产生的孩子也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孩子，他是把相对立的自然重新组合成了一个新的形体。炼金术中的国王和王后、床上的男人和女人、天空中的太阳和月亮、田地里的公牛和母牛都可以加速两性的结合：这是一个普遍的、永恒的神话。对于做梦者的生活最关键的是他的自我意识对性所采取的态度。只有在对事物仔细考虑过之后，才能适当地理解它们的相关联系。然而需要强调的是，与异性结合的渴望很少只是针对异性群体中的一员：个体渴望的是被认为是异性的特征，是个体为了更加完整而需要的。所渴望的异性特征可能在一同性个体身上也能得到很好的体现，或者体现在一个动物身上，或者是在神话形象上，或者在任何有助于个体完整性的事物身上。柏拉图在解释人类起源时解释了人类这一根本的周期性的欲望，上帝和神灵把人类分成了两半，这两半不停地追寻着彼此以求与之结合。早期太空生物学中天空与大地的结合、神话传说中王子与公主的婚姻、炼金术中金银的结合都是集体无意识中的异性相融象征的具体例子。这种象征在当代人的梦中，与在远古时代祖先的梦中一样没有什么分别。

11 梦和创造性

所有这些发明和创造都发生在
令人高兴和快活的梦中。

沃尔夫冈·阿马迪厄斯·莫扎特

弗洛伊德的梦理论不为同事荣格所赞同，它的主要缺陷是没有能够对梦的创造性潜力作解释。弗洛伊德的许多理论都在梦文学中得以引用，但是，就像他向威廉·弗莱斯承认的那样，他把大多数梦文学视为无益的。在《梦的解析》一书中，他特别蔑视像 W. 希尔德布兰特（1875）那样的理论家。此人赞美梦的创造性的鉴赏力：“我们当中很少有人不能从自己的经验中证实，”希尔德布兰特写道，“在创作和梦的天才的构成中，不时会出现情感的转变和亲密，感情的紧张和混乱，视觉的清晰，观察力的敏锐，智慧的异彩等这些我们永远也不能说在我们清醒的生命中已永久具备的东西。在梦境中，可以梦见一首奇妙的诗，一则恰当的寓言，一个无双的幽默，一个稀罕的嘲弄。梦总是按照奇怪的理想主义观察世界，并且经常通过它对事物本质的深刻理解提高他看到的效果。它以天空真正的光彩向我们描绘了地球的美丽，展示了最高权威的尊贵服饰。他让我们看到最恐怖状况下的恐惧，把我们的快乐变成难以形容的辛辣的玩笑。有时，当我们清醒并且仍然受这些经历中的一种影响时，我们不禁感到，在我们生活中真正

的世界从未给过平等。”(弗洛伊德引用,1976)

弗洛伊德引用这段话,并批驳其中“人类大脑是由哲学支配而不是由纯自然科学支配”的说法。他满怀兴致的谈到,19世纪早期的梦理论家高逖夫·冯·舒伯特宣称,梦是精神从外部自然力的解放,是灵魂从感觉约束中的自由,它表明作为精神生命的升华,对我们已几乎不可理解;今天他们只是被神秘主义者和虔信主义者所重复。

弗洛伊德在这里比任何地方都更清楚的背叛他的简化论思想和对潜意识可以获得任何新的或原来的东西的观点的敌视。把梦看做是一个封闭系统的产品,仅表现于与早期愿望相关的潜在本能的梦理论。很难解释梦对文化、历史、哲学、艺术科学以及政治和体育所作的极为丰富的贡献。

根据现有资料所得出的结论,J. 艾伦·霍布森(1988)说:“在快速眼球运动睡眠中,大脑和精神似乎都进入奇妙的创造工程。显然,我们的梦不是简单的以往经历的再生。相反,我们实际上经常在缔造全新的梦。因此,对老问题的新思想、新感觉、新观点可望在梦中产生。这些有可能被带进有意识的头脑或作为我们深刻的创造技能的一部分而保持无意识。快速眼球运动睡眠的新的、积极的功能理论的最高点与我们承认神经系统不只是一个复印机有关系。神经系统依靠外部信息构成世界的画面的同时,也清楚地使用该信息创造能测试现实的世界画面。

“这样,一个人或所有人的头脑从根本上说是具有艺术性的。当我们看到孩子的绘画时明白这一点,但往往以成人的观点轻视它。我们大家在夜晚做梦的时候都是超现实主义者,都是毕加索、达利、费利尼,完全陷入兴奋和可怕交汇的情感之中。”

在过去50年里,创造性曾是调查的大众领域,但是加德

纳·墨菲对创造过程四个阶段的分析并未得到改善,它们是:
(1) 对资料的沉思;(2) 对不能直接进入意识的仓库或记忆库中的信息和经验的巩固;(3) 启发,我找到了,就像阿基米德经过长时期“浸泡”(和酝酿)后跳出浴池所获得的足够经验;(4) 证实,这时在启发时刻得到的见识受到考验,它的价值得到评估。

启发可以直接在梦中发生,也可随后发生。启发还可以在不受指使和完全自觉的情况下自然产生。鉴于第一和第四阶段主要依靠意识、逻辑过程,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主要依靠非意识、象征性和情感过程,对这些中间阶段来说,梦的贡献最大。爱德华·德波诺关于垂直的(逻辑的)和横向的(创造的、联想的)的思想的区别在这里是恰如其分的。垂直思想以直线的方式,有逻辑步骤地前进,横向思想对现有资料重新安排,使之成为能产生新的和出乎意料的见识的替换模式。对一种或另一种思想方式的高度重视导致时尚的变迁。当大多数权威同意对创造性过程有无意识贡献的时候,有些人则坚持认为这是夸大其词(奥尔舒勒,1984)。可能的情况是,垂直的和横向的思想都被用于解决问题和创造成就,哪一种思想方式都不会用于相互排斥。还必须承认,墨菲的四个阶段并不永远是有序地分别发生,重叠是常有的事。但是表现墨菲和德波诺描述的那种过程的事例如此之多,以致无法否认它们对我们理解创造性见识的贡献。

启发的时刻可以比作灯光的闪烁:“我将座椅转向火炉并陷入半睡,”凯库勒写道,“火粒在我眼前飞来飞去,像蛇一样扭动和旋转。看,哪是什么?一条蛇抓住自己的尾巴,在我眼前轻蔑地转动。就像从灯光的闪烁中醒来,我用整个晚上研究(苯环)的假定结果。”(德贝克,1968)

列维的典型实验的观点表明,化学活动引起神经冲动的

传导,是在一次非快速眼球转动睡眠中发生的:“在复活节的前一天晚上,我醒来了,打开灯,在一张薄纸上做了点记录。随后我又睡着了。早晨6点钟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是,我不能辨认那天晚上所做的重要记录。”(列维,1960)一个熟知者讲述道:“第二天他很痛苦,他认不清字迹,也想不起答案,虽然还记得他都曾有过。这天晚上情况更糟,一直到凌晨3点灯光再次闪动的时候。这次他不在意,而是立即去试验室开始他的试验。”(杰勒德,1955)

数学家卡尔·高斯发明了一种在梦幻状态下解决复杂数学问题的能力。答案时常像“突然闪光一样”地到来,他说。(哈德马德,1945)但是,启发的闪光并非自动产生。必要的能量须在墨菲的第一、第二阶段通过艰苦的智力努力而取得。在光辉的启发突然充满他们的精神田野之前,科库勒和列维都曾为他们不同的问题奋斗了许多月。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在经过数日未能解出一个数学方程式之后,法国哲学家康德从梦中得到答案。威廉·布莱克曾试图发明一种新的雕刻技术,在梦中他的已故的哥哥向他演示了这种技术。当他醒来后按照哥哥的方式去做时,发现这种办法很管用。

突然的创造性见识来自对无意识者掌握的信息的自发重新组合,这种组合是通过深思和巩固两个阶段的艰苦工作来实现的。正像J. P. 吉尔福德坚持认为的那样,储存信息的价值与其未来用途成正比。创造性取决于“搜寻”有关信息记忆库的能力和取决于直观见识能力的程度是一样的,突然间答案就“产生”了。为分析如何发生,吉尔福德将两种储存信息的生产做了有益的区分。前者是集生的生产,即当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时(西班牙的首都是哪里),一个受限制的要求必须满足;后者是分散的生产,即要求对有关观点进行更广泛的搜寻(你能说出多少个M打头的首都城市)。

德波诺的垂直和横向思想有明显的相同之处：当有意识的头脑更多地利用垂直思想并更多地依靠储存信息的集中生产时（也就是说更清晰、逻辑、准确、严肃和一贯），做梦的头脑则使用横向的思想和集中的生产来表达它的意向（也就是更隐喻、含糊、似是而非、幽默和反复无常）。

横向思想和分散创造成功的关键，是人类头脑辨认模式或格式塔心理学的能力。面对新的造型，我们用过去遇到的类似造型进行比较，以便对他们进行分类和区别。医生为了诊断而给病人检查时就是这样做：他把病人的迹象和症状与他储存的大致一样表现的病理知识进行比较。当模式合适，格式塔心理学得到辨认的时候，成功的见识也就发生了。在梦中发生的多数记忆库扫描，是试图找到与现在正面对的事物相对应的以往经验。

这实际上既是搜寻有关的感情经验，也是搜寻认识经验。这种对应的发现对有意识来说是荒唐可笑的，因为它可能构成类别之间的隐喻联系，而这种联系通常被认为是相当独特的——比如蛇和苯的分子之间，化学和音乐之间。19世纪俄国化学家迪米特里·门捷列夫花费巨大努力试图发现某种秩序原理，使之成为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化学元素之间的显然不规则关系的基础。有一天下午，“他在椅上打瞌睡，他的家人在隔壁演奏音乐。突然，他在梦中了解到基本原素如同音乐中的主题和短句一样互相关联。他醒来了，拿起一张纸，写下了现代化学元素周期表。”

50年以后，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把门捷列夫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个阶段。波尔自问为什么惰性元素会首先存在。为什么它们互相区别并如何保持稳定？例如为什么在氢和氦之间没有过渡元素？经过几个月对此问题的研究，他做了一个观看赛马的梦。马在用白粉清楚标出的跑道中跑。只要相

互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马允许改变跑道。如果一匹马沿着白线跑,踢起白粉,它就立即被罚下。

当他醒来时,波尔意识到这个“跑道规则”象征着他的问题的答案。当环绕原子核作轨道运行时,电子就像马奔驰在跑道中一样,必须沿着规定的线路运行。运行电子的路线由“量子”决定,这些简单的事实便对元素的稳定性做出解释。就在这一经验的基础上,波尔创造了他的量子理论并随后获得诺贝尔奖。

另外一个对科学历史极为重要的梦,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年轻时做的梦。他梦见他用雪橇沿着陡峭的山坡滑下,越滑越快,当接近光速时,他意识到头上的星星把光折射成他从未见过的色谱。这一景象给他留下永生难忘的深刻印象,他认为自己的整个科学成就是对那个梦沉思的结果。该梦提供了“思想实验”的基础,并通过它创造了相对论。

如果墨菲在沉思和巩固阶段中孜孜不倦的探求被忽略,就不会有重大事件中的发现。所有的资料必须搜集、组织、仔细考虑和吸收;所有的逻辑可能性必须予以考虑并反复试验。只有这样,令人兴奋的启发才会发生。这是酝酿的要素,或者被杰里米·泰勒称之为“采取措施促使发展”。“每当我们就最重要的生活问题向自己提出诚实的问题时,我们都在促使梦的发展,”泰勒写道,“愿意并且向梦的愈合和创造性信息开放,将使我们接触溶入每晚梦中的原本的创造性冲动。”(1992)

就像泰勒正确坚持的那样,成功的关键在于事先对问题全心全意地处理。如果我们在清醒的时候能集中处理某一最突出的问题,梦就很可能加深原型结构并释放由它包装的活力。泰勒说,在这点上,我们经常“酝酿”梦,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他认为全心全意是发表意识个性和生活的最重要的

动力。“我逐渐认识到,全心全意、真实的热情、对人民的参与和自己一生的活动,对演变和个性化产生最大的区别——甚至超出某人对某事的全心全意。热情地、全心全意地参与到看来最琐碎的事务中,将促进真正的心理精神发展,而如果内部分裂,感情和能量受阻,即使是最聪明地或熟练地参与到最深刻、重要的活动中,也是不成的。”

这些想法和生物发现如何共存?梦的生物作用,像我曾经说过的那样,是对那些白天占据我们头脑,夜间寻找做出反应的创造性办法的问题进行研究。在无控制情况下,这些将是生存问题,对他们认为更活跃的梦的生存所具有的更大威胁,则是参与到对这些梦的反应中。全心全意的秘密就在这里。如果我们在处理一个自己所关切的问题中想得到无意识的帮助,我们应致力于对此问题的有意识的工作,就像离开它不能生活一样自我帮助自己,梦帮助自我。无意识必须用有意识的勤奋进行耕耘、播种和施肥。之后它才能为我们办事,如同权威威廉·伍德特所说,“像一个不知名的人,他为我们创造和生产并最终将成熟的果实塞进我们的衣兜。”(凯斯蒂尔,1964)

数学家亨利·波茵卡尔就是用这种方式发现倒挂金钟植物功能的存在。他相信数学的智力对无意识的思想过程是非常直观和依赖的,这一过程重新估计和补充了在有意识下进行的思想。“当一个人在解决一个困难的问题时,”波茵卡尔写道,“常发生的情况是,工作的开始阶段,没有进展,他就或长或短地休息一下,然后再坐回桌旁。前半小时什么也没有发现,而后一个决定性的观点出现了……大概是潜意识的工作在休息阶段继续运作,这一劳动成果随后展现给数学家。”(冯·弗朗兹,1968)

当这一声明作证的时候,无意识的活动在清醒和睡眠中发生,这将解释梦酝酿和艺术激励之间的明显联系。看来,创

造性有赖于主动进入非意识。莫扎特在写给“巴伦·约·P”的信中描述他的作曲方法时写道：“当我完全处于独自一人、自我支配、心境良好的状态下时，比如坐在车厢里旅行，饭后散步，晚上睡不着的时候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思想进入最活跃最丰富的境况。至于这些思想什么时候和如何到来，我不知道，也不能强迫。这些思想使我高兴，我记在脑海中，我习惯于吟诵它……所有这些点燃了我的灵魂，如果不受到干扰，我的课题会扩大，变得有条理和明确，整个课题，虽然需要较长的时间，在我的头脑中变得几乎完整无缺，这样，我就可以像一幅画或一尊美丽的雕像那样一目了然地观看它。在我的想像中我没有连续地听到有关部分，但毕竟听到了，就像一次性全部听到一样。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我简直不知该怎么说！所有这些发明，这些生产，都发生在令人愉快的、活生生的梦中。还有，实际听到的毕竟是最好的。我不会轻易忘记所生产的东西，这也许就是我的神灵应感谢的最好礼物。”有人曾怀疑这封信的真实性，但是其中的看法完全反映出聪明的、非凡的领域，不可思议的生产力，称得上是最伟大的音乐天才。柴可夫斯基、瓦格纳和贝多芬都被证明具有超人的洞察力和激励力并据此创作出他们的音乐。《蝴蝶夫人》的作曲普契尼称，“是上帝向我口述的；我只是把它写在纸上。”《春的礼赞》一曲是根据观察的结果写出的，是斯特拉文斯基看到年老的圣人们围坐成一圈，观看一位年轻的姑娘跳舞，直至死去。他在极度疲劳和充满想像中听到此音乐：“我把听到的写了下来，我是上帝用来航行的船只。”

在南北战争期间，朱莉娅·瓦德·豪和她的同伴唱着《约翰·布朗的尸体》，到华盛顿进行采访，但是当他们回来后，有人问她为什么不给这个曲子起个好名字。当天晚上，她睡得很好，但是第二天早晨很早就醒来了。在她等待黎明期间，头脑

中涌现出了许多美妙的词句：“我的眼睛里看到了上帝的光辉……”“但是她仍然安静的躺着，”她的传记作家写道，“一行接一行，一段接一段的词句随着进行曲的旋律毫无停顿，不可阻挡地涌现出来。她看见有长长的音符队列在她眼前晃动，听见民族之声从她自己口中说出。她一直等待着，直到这个声音和队列结束；然后她从床上弹起来，抓起笔和纸，一气呵成地在灰色黎明中写下《共和国的战斗圣歌》。”

另一个著名的在梦中写作的例子是塔迪尼的《魔鬼的颤栗》。在他的老年，塔迪尼告诉天文学家拉兰德，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把灵魂卖给了魔鬼。在这个梦中，他把自己的小提琴送给了魔鬼，以此试探他的反应。“但是，”他说，“当我听见他完美地演奏了一首优美的奏鸣曲时，我感到非常惊讶，他娴熟的技艺完全超出了我的想像。我很高兴，完全折服了，我感到自己呼吸急促，很快醒来。之后，我拿起小提琴，试着把我所听见的声音进行重复。但是没有用。我所写的《魔鬼的颤栗》是我最好的作品，但是它怎么也比不过我在梦中听见的那个！”（德·贝克尔，1968）

另外还有许多例子被布莱恩·英利斯收集在《未知的访客》中整理出版（1987）。在凯斯特勒基金会主任鲁思·韦斯特的协助下，英利斯对照了各种“超越日常现实”的情节，这些灵感“使人在无意识中插上了幻想的翅膀”。而这些使人思维敏捷的“未知的访客”与荣格所说的“200万岁的自我”或者“第二人格”是一致的。它可以被人性化为自己熟悉的伙伴，就像荣格所举的《腓利门书》的例子，里面充满了活跃的想像。尽管这些富于想像力的活动没有得到任何引导，但是它显然被苏格拉底付诸于实践中了：“在过去，我对预言之声已经习以为常，它已经成为我的良伴，”他说，“如果我要做的事情不对，即便很琐碎，它也会表示反对。”他把这个伴侣称为自己的魔

鬼。根据我们获得的柏拉图的记录，苏格拉底认为自己受到“神圣的鼓舞，以自己内部的耳朵作为媒介，接收来自上帝的消息——这实际上是具有听力方面的特异功能——他还可以用普通对话的形式通过内耳进行交流。”苏格拉底并不认为这份天赋是自己独有的；他相信自己一定是与诗人共享的：“他们一旦拥有灵感就会迸发出许多优美的诗句，”他宣称，“就好像他们那时的灵魂并不属于他们自己一样。”真正的创造力是建立在拥有的基础上的，“因为当一个人获得了一部分被称为理性的东西时，他毋庸置疑会创作出好诗来。”但是他必须要进入一种“神圣的癫狂”状态（我们称它“阈限”），这样他才能控制住自己创造性的技能。很多人证实了苏格拉底会时常进入一种着迷、沉思的恍惚状态，对外面的世界浑然不知。

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所要看到的，具有领袖感觉的人也具有高度的魅力，并且对他们的追随者产生巨大的影响。他们会用英雄救世主的原型来给自己定位。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隔膜似乎在如此的情况下可以互相渗透。他们生活在一个相对永久的“阈限”状态，并且利用它的巨大力量为自己服务。

温斯顿·丘吉尔和阿道夫·希特勒都相信他们邀请了这个“未知的客人”到自己的心灵中常住。“我有时有一种被干涉的感觉——事实上这种感觉非常强烈，”邱吉尔在1943年对一群矿工说，“我想要压制它。我感到有一只无形的手介入了我的生活，对我进行庇护和指导”。他相信这位保护者不仅指明了他的政治前途，而且，在某些场合，还救了他的命，比如他在布尔战争中免于被俘和在二战中避开炸弹的袭击。邱吉尔也是具有高度创造性的：他能很快的在多种多样的政治难题中做出正确选择。

另一个具有天生灵感的历史人物是圣女贞德，以她的年

纪和社会背景,她显示出了令人惊异的智力和足智多谋。她相信自己受到上帝的鼓舞,来把法兰西从英国人手中解放出来。她还相信自己直接从凯瑟琳街、玛格丽特街和迈克尔街得到指令。莱斯沃克转述荣格的话说,这是一种精神控制,对于她来说是完全真实的。她实际上能看到并触摸它们,尽管通常它们与她通过声音交流。现在很难怀疑贞德的报告是否真实,因为她有很好的原因把这些意念压下去:众所周知,如果她承认自己有心魔,那么在接受审判时就会很容易被以“异端”定罪。

这种精神恍惚的状态,被传说是灵魂从身体中脱离造成的。这与诗人、作曲家或艺术家在灵感到来时的情况很类似。当肖蓬豪尔拒绝相信自己头脑里飘荡的灵感来自于别处时,他说话的语气就像是媒体。许多人把这种状态描述为“占有”。从某种意义上说,梦也是一种占有——占有了活跃的想像。在一则评论的手稿中,生活在17世纪的神秘人物吉恩夫人宣称自己对将要写的东西一无所知,但是她坚持了下来,“我看到自己的正在写的东西是我根本就不知道的;在那个时间,我拥有了一笔知识的财富,我这才明白原来我并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也承认:“我确实不能说出口到底写了什么。在我完成任务之前,好像某种东西抓住了我,并且在我们能够完成作品最初部分之前就拥有了我。”因此,斯佩克·扎拉苏塔评论尼采说“我想他能通过某种手段使纷扰烦乱的世界变成可听可见的事物,其精确性令人匪夷所思”。

作家、作曲家和艺术家都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他们为自己工作中遇到的情况感到吃惊:他们发现了自己以前从未认识到的事情。“我对自己所写出的词汇感到吃惊,”撒克里写道,“似乎有种神奇的力量正推动着我的钢笔。”(《杂论集》,1860)

所有的这些例子都表明这种奇妙的影响力来自于无意识。

对于那些立志想当作家的人,特别是如果他们天性懒惰,可能会被这篇关于灵感的文章所吸引。然而,获得灵感的代价比他们的想像要高得多。科尔里奇就是通过抽鸦片烟来激发自己,完成了《库布拉克汗》的写作,他回忆说这段经历就像是进行听写,但是经常被来自波洛克的人打断。我为此也感到困惑,既然这样,他为什么不换个地方去写。也许他喜欢这种打断。也许创造性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琐事,使艺术家希望从中逃避。

我渴望见到来自波洛克的人
把我的想法带到天边,
我正在变得不耐烦看见他
我把他看做是朋友。

斯泰威·史密斯

然而,这样的灵感不只被限制在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圈里。在《运动心理》(1978)一书中,迈克尔·墨菲和R·怀特也举出了各项运动中运动员的实例。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都具有某种天赋,使他们能够取得超人的成绩。当贝利首次出现在1958年世界杯赛场时,他在整个比赛期间都处于“一种精神恍惚状态,仿佛未来正在他平和的眼前展开”。罗杰·班尼斯特描述了自己如何在恍惚的状态下用4分钟跑完1英里:“我感到自己完全从躯体中分离开来。”高尔夫球手们也经常描述说,当他们感到自己处于巅峰状态时,就会定下心来进行一次远距离和高难度的击打,并且知道自己的球肯定会入洞。进行了完美演出的音乐家们也具有同样的感觉。就是赌徒也知道一旦自己“运气”来临,挡都挡不住。

在这些场合所发生的事情看起来都和潜意识有关，正是在里面积蓄的知识和经验使自我得以流畅的释放。这时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边界已经“溶解”了。这种出神的状况以意识分离的形式表现出来，与其说是脱离现实，不如说更专注于手中的任务本身。然后，无意识的力量被允许接管整个思维，而个人体验也被转换成潜意识的状态，从而给自我带来深刻自信和卓越的能力。

所有这些都暗示着一种具有创造性的能力存在。它们本来就蕴藏在我们心灵的潜意识中，只不过我们一直没有找到办法来加以利用。对于我们来说，培养这种能力最成功的技术就是有意调整“梦工作”和激活想像力。但是，事实上，当我们集中关注这个潜意识中的创造者时，通常会面临一个麻烦，就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当我们遇到某个必须完成的工作时，要么集中精力彻夜未眠，要么躺在床上进行“梦工作”，但后者的选择显得更困难。美国作家奥利弗·文德尔·霍姆斯关注到这一点，认为通常的经验是顺其自然，在灵感到来时根本不用记住任何东西，甚至是一本书的标题。“没有人指望一蹴而就，于是我们说，‘等一会儿，灵感就要来了’，然后就继续进行原先的谈话。一会儿，也许是几分钟以后，我们正在搜寻的各种想法又会不期而至，像是自己订购的商品一下子被送来，又像是在我们的意识之门前搁了一个篮子。但是它究竟怎么来的，我们无从知道。”（英利斯，1987）另一个利用潜意识的著名方法是把它作为一只闹钟使用。如果你必须在早上6点钟醒来，那么只要在睡觉前用头撞床头板6次，那么你就会在精确的时间醒来。我也有在早上醒来的经验，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但是找到闹钟就发现表盘上正好是你需要起来的精确时间。这种方法也通过看我的手表得到验证。在一部关于幻想的著作《心理学原理》（1890）中，威廉·贾梅斯指出：“每个幻觉

都是一种感觉,它和真实感觉一样,好像有实物摆在那里。只不过这个实物碰巧不在那里;仅此而已。”

12 著名的梦

大人物的梦很重要，
那是总统做的梦
总统醒来把它告诉秘书，
他们再把它告诉内阁，
在你知道战争发生之前。

路易斯·西姆普森

历史学家没有充分地从理性的原因的角度描述战争和革命，文化和社会的运动，经济和政治危机这些过去发生的重大事件，尽管他们认为理性的原因引起了这些事件。但这是一种偏见，因为它忽略了事件中所包含的无意识的和生物学的因素。历史是通过由个人组成的集体的力量写成的——一些人由于其所处的地位，所具有的能力和魅力，因而比另外一些人重要。在巫师状态里，那些心理结构使无拘无束的人影响尤其大。这些人是预言家、先知、统治者、独裁者、煽动者和神话制造者，他们拥有使百万人倾倒的魔力。他们的思想是如此有力和具有坚韧性，它能经受住数千年的考验，促使芸芸众生走向大是大非的方向。不管他们是摩西、基督、佛、穆罕默德、圣雄甘地，或希特勒、列宁、墨索里尼还是成吉思汗，他们都能超越纯粹的个人环境，把原形的力量引导进拥护他们的大众。这些人是历史故事中的伟大人物，他们与当代的时代精神联盟，成为它的发言人和它的代理人，他们宣告自己是更崇高目标的历史使命的执行者，是受命运之神引导的总督。他们身上出现的神话是由想像和梦构成的。不

幸的是,这些宣示的真正意义并不总是得到理解,结果可能是可悲。众人的命运可能由这些大人物身边的随员的贤能与否决定。亚历山大的梦导致轮胎的获得,但是只是在必要的梦的工作完成以后。泽克斯和汉尼拔则如他们统率的军队那样不太幸运。

汉尼拔是迦太基的将军,就在第二次迦太基战争之前,他梦见朱比特·卡比陀林纽斯邀请他进攻罗马。他决定接受邀请,结果他的军队遭受的损失比泽克斯遭到的还大。他如此憎恨罗马,毁灭罗马大帝国的愿望是如此强烈,汉尼拔认为这个梦是实现其军事雄心的证明,丝毫不考虑朱比特是罗马的保护神,朱比特几乎不考虑迦太基的利益。如果汉尼拔仔细研究这个梦,他也许会想到这一点,就不会发动给自己带来灾难的侵略,而是抑制这种毁灭性的冲动,将其埋在心底。

在使大多数人遭受 20 世纪折磨的半仙中,有个人把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他分明意识到通过巫术可以施加自己统治的力量。阿道夫·希特勒通过把自己描述成一个脚步由命运引导的梦游者,用他的巫术影响了德国人,使他们易受精神传染病的影响,这种病的肆虐折磨了整个欧洲大陆。

希特勒的梦和视觉

我用梦游者的自信沿着
命运之神规定的道路前进。
阿道夫·希特勒

阿道夫·希特勒经历了一个梦,他认为这个梦证明自己处于命运安排的社会上层。梦发生在 1917 年,当时他作为一名下士在索姆的巴伐利亚步兵团服役。这是一个噩梦:他梦见自己葬身于熔化的铁和土地的崩塌之中。他醒了,感觉需要空气,

就从掩体走出去。他走出战壕,继续向前走进乡村。这是极其草率的,但他觉得不由自主:他像一个机器人或是一个患梦游病者。

突然,敌人的大炮叫起来了,他匍匐在地上。仅仅是一声爆炸就足以使他清醒,恢复意识。他赶忙跑回战友那里。战壕已经辨认不清。掉落的土挡住了去路,在掩体的地方是一个巨大的弹坑。他所有的战友都不见了。他们或是被直接命中炸成了碎片,或是被活活埋掉了。从那时起,希特勒确信自己被上天赋予了神圣使命。(德·贝克尔,1968)

1938年3月3日占领奥地利后的那一天,当时希特勒站在维也纳的 Hofburg 的阳台上接受了成千上万人的歇斯底里的赞美。处于高度兴奋状态的他凝视着天空,清楚地看见德国的战神奥丁的形象,他俯视喧嚣的场景,专横地直指东方。他据此确定了入侵俄国的计划。就像汉尼拔,希特勒没有研究那种场景的更深含义,结果他把自己的国家导向了灾难,这种灾难比他的迦太基前辈受到的灾难更大。如果他想一想,他就会想起奥丁是一个特别不能信赖的神:他很容易把自己的信徒推向死亡和失败,而不是开始时的辉煌和胜利。这至少会给他机会仔细考虑自己征服世界的疯狂,人类所受的巨大痛苦就可能减少。由于没有客观地考虑问题,没有人性,除了命运之神为他选定的路径外,他不走其他任何道路,因此就把他的人民引向了世界毁灭,数百万人成为他的牺牲品。

掩体的梦不是含糊的,希特勒相信它可以被看做是自己的真实命运——在毁灭性的轰炸中,在地堡中死亡和毁灭的预言。然而,它不光坚定了希特勒对自己特殊使命的信念,而且使他相信自己的坚不可摧。这些也传给了其他人,当希特勒在这些人身边时,这些人互相告诉对方“什么也不会发生”。因此,他在自己经历的每个阶段都看到了命运之手,崇信自己的

直觉,他相信这些直觉是神灵的暗示。(法斯特,1983)他在非凡的军事成就中采取的措施,跟手下将军们的建议相反,这进一步使他确信,就像不断发生的从死亡中神奇地逃离那样。在慕尼黑纳粹党啤酒酒店做完演讲以后,他没有按照惯例留下来跟党的信徒们闲聊,而是突然决定离开。他离开后几分钟,一枚炸弹发生了爆炸,炸死了八个老同志,炸伤了另外的数十人。1943年3月,一枚放在希特勒从东线飞回柏林的飞机上的炸弹没有爆炸。几天以后,在展览会上刺杀他的再次尝试,由于他突然决定离开而遭到了失败。1944年夏,希特勒看到了自己受神灵保护的最令人惊奇的证据。在希特勒的会议室,康特·冯·施陶芬堡放了炸弹的箱子被一名将军搬到了支持地图桌子的木制底座的后面,当时希特勒正站在桌子上。将军无意的行为挽救了希特勒的性命。最后,希特勒的建筑师和军队部长阿伯特·斯皮尔决定,通过通风道把毒气弄进地堡来杀死希特勒,就在斯皮尔的企图实施之前,希特勒决定对通风管进行保护。

这些不寻常事例都是荣格称作的同步处理:强有力的原型力量集中于某人身上,外部事件都按照跟他一致的方式改变自己。希特勒坚信,自己是他的人民的英雄和救星,他认为自己在光明和黑暗力量之间进行着斗争,看起来他具有赌徒的好运——直到他的敌人联合起来将其征服。

当他对观众演讲时,希特勒似乎拥有把自己置于巫师境界的技巧,这使他的演讲极具魔力。他说自己最早认识到这种能力是在年轻时参加完演出之后,演出带有瓦格纳式的权威,他描述了人民的反叛者和保民官卡拉·迪·里恩兹的故事,由于卡拉·迪·里恩兹的同伴不能理解他,卡拉·迪·里恩兹被抛弃并被毁灭。希特勒惟一的少年朋友奥古斯特·库比兹克当时在场,他描绘了演出结束后他们在林茨上方的福雷

茵堡散步时所发生的一切。“言辞激越,就像滔滔洪水。他以宏伟博大的想像为我和他的人民勾画了他的未来。”当库比兹克30年以后在拜罗伊特遇见元首时,希特勒评论道:“它开始于那个时刻。”(法斯特,1983)

在希特勒灵感的引导下,整个纳粹运动呈现出了准宗教的形式,有宗教仪式,有游行,还有字饰。好像德国群众把他当成了耶稣:他们涌向他这个“救星”。库尔特·柳代凯,希特勒的随员之一,在兰尼恩堡集中营,他描述了希特勒的演讲才能:“立刻,我的挑剔被一扫而光……当我听这个人讲话时,我不知道如何描述自己心中掀起的波涛……它的激情似乎感染了我。我体验到了像宗教一样的升华。”

作为一个党,纳粹党没有如此前后一致的政治纲领,但希特勒却能在其个人神话中一贯地坚持一系列偏见,一贯地坚持否认自己的阴暗面。19世纪的一股嘲讽把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看成了“没有思想意志的世界”。希特勒世界观的精华是德国民族主义,它献身于针对黑暗力量(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国际犹太阴谋)的生与死的亚达尔文主义斗争。他也受笛卡儿所讲的由病毒、白蚁和梅毒传播的世界范围的疾病这一思想的困扰。他拥护霍宾格尔的“世界冰理论”,这一理论指出了贯穿宇宙的火和冰之间的永恒斗争。他的想像力被宇宙大灾难的景象煽动起来:“我们也许将灭亡,”他说,“但是我们将与世界同在。”被错误地指控为亲纳粹的荣格,已经在1936年预见了这一后果。德国人的神话很独特,它认为上帝被黑暗的力量推翻了。当1945年英烈祠被大火吞噬时,就像第三帝国那样,整个神话故事结束了。“德国现象突出之处,”荣格写道,“是一个明显‘着魔’的人使整个民族着魔到如此地步,以致一切事情都确定了运动轨迹,沿着这条轨迹走向沉沦。”(CW10)无疑,就如历史学家经常跟我们所说的,《凡尔赛条

约》，20 世纪 20 年代的通货膨胀，30 年代早期的大萧条都有助于希特勒上升至权力的顶峰。但是，如果希特勒没有那种可怕的力量聚集集体无意识中的最可怖的原型力量（这种力量在他自己身上和不幸地跟随他的人民身上存在），他权力的上升就不太可能稍纵即逝，他的统治就不会持续那么短的时间。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个可怕的邪恶的例子，这种邪恶可以由一个人加于世界之上，而这个人完全摒弃了对他掌握的巨大力量所应负的责任，进入了巫师的状态。统治者的梦和视觉，能对历史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一点非常明显，但艺术家和智者的梦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却没有被充分意识到。笛卡儿在 1619 年 12 月的一个晚上，做了一个对我们的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梦。

雷内·代萨泰斯的“大梦”

如果不是灵魂的跳跃和闪烁，人类将以他最大的激情和悠闲走向腐朽。

荣格

这个梦分为三部分（每一部分结束时代萨泰斯都很清醒），梦被他描述成其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海甘蓝，1992）梦坚定了他从事哲学的信心。被普遍认为是理性发源的文艺复兴开始后，最具影响力的哲学产生了。说这种哲学受梦的影响很深远，很具有讽刺意味。实际上，笛卡儿为哲学家们高度理性的学科所作的革命性贡献竟来源于非理性的，这对哲学家们而言是很尴尬的。

笛卡儿有把他的梦记在包有羊皮纸的小笔记本上的习惯，我们于是知道了关于 11 月的梦。在 1619 年即三十年战争

灾难的第一年，笛卡儿出席了奥地利的弗迪南德二世的加冕典礼。以后他呆在了乌尔姆的近郊。时间是冬季的开始：“那时我在德国，在那里我受到尚未结束的战争的征召，”他在1614年写道，“当我从皇帝的加冕仪式返回军队时，我被冬季的开始阻却在军营里，在那里没有人跟我谈话使我轻松，没有对我关怀和热情。我在一个温暖的房间里独自呆了一整天，在房间里我思考自己的思想，没有受到丝毫打扰。”

他似乎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有了重要的发现。结论是，从今以后他将不再信任任何东西。他凭自己的思想自付着除宗教和政治外的一切事物；他否定了自己所处社会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认为没有东西是真实的，因为一些尊敬的“权威”已经对那些东西作了陈述。重大的发现是，所有的科学都可进行数学的分析，都能被简化为“数学通用式”，这个发现是在他做梦前的那一天完成的。他断定这为一种新的“奇妙的科学”奠定了基础。怀着这个重要发现所带来的激情，他倒在床上进入了梦乡。在这个点上，神父巴赖特开始讲起故事：

在他入睡了以后，他想像自己看见了鬼并且被他们恐吓。他感到右侧很虚弱，他相信自己正穿过大街，为了能够继续旅行他被迫往左侧倾斜。

惭愧自己的这种走法，他努力站直，但是猛烈的风吹向他，使他踉跄了三四次。他艰难地向前迈步，每一步都担心跌倒。后来，他看见了一所学院，于是走进去，希望找到摆脱痛苦的休憩的地方。为了祈祷他努力抵达学院的教堂，他意识到自己在路上跟一个相识的人迎面走过。为了向那个人祝福，他努力折回脚步，但是再次被猛烈的风吹回教堂。后来在学院四边形的的人群中间，他看见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礼貌地叫他的名字，告诉他如果希望发现N君，他有一些适合于笛卡儿的东西给他。那个女子看起来像是从外国买来的甜瓜。

他很惊讶地看见，那些以四角形的形状聚集在那人周围互相闲聊的人们能够用脚笔挺地站着，而笛卡儿仍然必须歪歪扭扭、摇摇晃晃地走路，即使风力已经减弱。这个时候他在疼痛中醒来，害怕邪恶的精灵企图把他导向歧途。已经用身体的左侧入眠的他，现在换成了用右侧入睡。他祈祷上帝保佑自己不受梦的邪恶伤害，祈祷免除自己的一切不幸，这些不幸可能是对他罪孽的惩罚。他认识到，自己罪孽严重，足以引起上苍的震怒，然而在人的眼里，他过着一种相对无可指责的生活。他清醒了大约两个小时，思考着善良及邪恶的问题，然后又入睡了。

他开始重新做梦。他想自己听到了一声巨响，他想是雷击。醒来时他很恐怖。睁开眼睛，他意识到大片的火花在屋里飞溅。他以前经常发生这种现象。在晚上醒来发现自己的眼睛闪闪发光，能觉察到离他最近的物体，这是很不寻常的。他镇静下来再次入睡。

他现在梦见自己在桌子上发现了一本书，但是他不知道是谁把书放在那里的。他打开书，高兴地发现是本词典，他希望这本书会对他有用。后来另一本书出现了，它怎么来的同样不得而知。这是一本名为《诗作集》的不同作者的诗集。他好奇地想发现里面包含了什么，于是把书打开，视线落在那行“Quod vitae sectabor iter”上。与之同时，他不认识的另一个人出现了，这个人指着开头为“Est et non”的那首诗，赞美它的优美。笛卡儿说他知道这首诗，这首诗是奥索纽斯的一首田园诗，它被包含在这本诗集中。他想把这些展示给人，于是翻开书页，还吹嘘自己知道章节安排。当他寻找地方时，这个人问他这本书是从哪儿来的。笛卡儿回答自己不知道。就在一秒钟之前，他手里拿着另一本书，这本书刚刚消失，他不知道是谁把书带来然后又拿走的。

他一停止说话,书又出现在了桌子另一端。然而,一检查书,他发现字典再也不完整了。同时,他在诗集中发现了奥索纽斯的诗,但是却不能找到以“*Est et non*”开头的诗,他告诉那个陌生人说,自己知道由同一个作者完成的更优美的诗,诗以“*Quod vitae sectabor iter*”开头。这个人企求看一看它,笛卡儿努力地寻找,他看见了几张画像——是铜版雕刻的——书的精美使他惊呼不已,但是跟刚才的不是同一个版本。这个时候那个人和书都不见了,但笛卡儿没有醒。奇妙的是(这个善良的神父发现),虽然不知这种经历是梦还是幻觉,他还在继续睡觉的时候,就断定“这是个梦,而且在醒来之前还对其进行阐释”。他得出结论:那本词典指出了一切科学之间的联系,题为诗作集的诗集具体而清晰地指明了哲学和智慧的紧密统一。他认为一个人不应该因为发现诗人——即使那些其工作看起来是傻呼呼的消遣的诗人,也比哲学家在著作中产生的思想更深、更明智、更好——而感到惊奇。他把这种惊奇归因于神圣的热情和想像的力量。想像的力量使智慧的种子(它就像燧石中的火一样存在每个人头脑中)更容易发芽,使智慧比哲学家的“理性”更富有光芒。笛卡儿继续解释梦中的梦,断定以“*Quod vitae sectabor iter*”开头的,关于“人应选择什么样的生活”的诗,指出了智者甚至道德神学的谆谆教导。

仍然不肯定自己是在做梦还是在思考,他平静地醒来,睁着眼睛以同一种精神继续解释自己的梦。诗集中的诗跟他一致,他认为那些诗具有暗示意义和激情。那首写毕达哥拉斯的“是与非”的诗“*Est et non*”,被他理解为所有人类知识和世俗科学的真理和谬误的反映。当他看见这些东西都在根据自己的意愿变幻时,他大胆地相信,真理的神灵希望通过他的梦向他揭示一切科学的宝藏。现在,除了在第一本书中发现的小铜版像外,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东西。在次日接受了一位意大

利画家的来访后,他不再试图解释那些东西。要解释死去已久的人的梦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不能就他的联想或者他丰富的想像询问做梦者。由于这个原因,当笛卡儿的 20 世纪的一名传记作者马克西姆·勒鲁伊请求 弗洛伊德进行解释时,弗洛伊德婉言谢绝了,弗洛伊德只是说甜瓜可能是性的标志。

然而,这个梦是非常“大”的一个梦,它具有重大意义,不仅适合于 笛卡儿而且适合于我们的文化。试图解释梦的意义而努力很有价值,因为就如我所希望的那样,这种努力使我们进一步洞察梦实现其作用的不同寻常的方式,这种努力表明“文化模式的梦”是如何为哲学和科学的革新提供必要的灵感,而不光是为神话和宗教提供灵感。虽然笛卡儿似乎对梦进行了令自己满意的解释,但梦不仅仅是他的眼睛所看到的東西。如果我们在通常的阶段走进梦,这就变得很明显。我自己对梦的理解,主要是由约翰·R 和析梦者玛丽-路易斯·冯·弗朗兹医生的有价值的研究决定的,我向这两个人表示深深地谢意。就个人背景来说,笛卡儿(1596-1650)有了自己的梦时才 23 岁。他是当地议会的一名顾问卡兹的第三个活着的孩子。他的母亲,珍妮·布罗查德在次年的分娩中悲惨地死去了。他的父亲在珍妮死后不久再婚,结果父亲每年只能见到他六个月。父亲虽然为儿子的聪明高兴(他称儿子为“我的小哲学家”),但他似乎为儿子的娇嫩的体质恼怒(凯恩说他已经继承了母亲的心脏虚弱以及不停的咳嗽),他也为儿子的孤僻恼怒,后来他干脆鄙弃儿子为“只能被裹在小牛皮里”。8 岁时他被送到安由皇家耶稣会学院。在那里由于健康问题,他受到长辈们的特殊照顾。他拥有自己的房间,在那他可以躺在床上数小时进行沉思,这是他一生中都保持的习惯。因此,他的伙伴取笑他,称他是“瞌睡虫”就不足为奇了。到了 16 岁,他离

开学院前往巴黎,在巴黎他学习了数学、音乐、哲学。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些男性,但对于女性则小心地避开。

我们对笛卡儿的私人生活了解甚少,但从已经确证的东西来看,很显然,像许多在早年失去母亲或者跟母亲分离的不幸的人一样,他具有精神分裂病人的个性。就是说,他是个不与人交往的非常内向的人,他显得对其同辈冷酷无情,他生活在充满想像的个人世界,躲避跟他们的亲密关系。他没有参加他兄弟和姐妹的婚礼,当他的妹妹和父亲死亡时,他仅仅是表示遗憾。他确实与一个荷兰的女仆有染,并且这个女子生了一个女儿,她只活到了4岁,但是他很快就摆脱了这种纠缠。似乎他爱过的人是30岁的荷兰哲学家、物理学家和医生艾萨克·比克曼,他在1618年12月10日跟她相会,这一天正好是他做那个大梦的前一天。虽然这两个人之间的学术联系持续了近20年,但比克曼没有接受他的爱情。

因为这个精神分裂病人没有感到对任何人和任何事的依恋,他经常是一个流浪的人和隐士。两者都适合笛卡儿。1618到1628年间,他在欧洲不停地游荡,为荷兰拿骚的毛利斯军队服役,为德国巴伐利亚的公爵服役,为匈牙利帝国的军队服役。他在德国、法国、波兰、意大利和荷兰旅行。他一生中定居的大部分时间处于1628到1649年间,那时他住在荷兰,写了最重要的书,但即使是在那里,他的住所也至少改了18次。在这游牧生活后面的动机,好像是尽可能使自己的住所隐秘。他总是把住所划分成两部分:外面是接待室,里面是圣所,圣所是他秘密的实验室,他在这里解剖动物,活活地把兔子割开。他说,不需要注意它们的惨叫,因为它们没有灵魂,没有感觉。它们的尖叫跟没有上油的草车吱吱的叫声没有区别。精神分裂病人人格上的这种冷酷无情不足为奇,他们习惯于虐待狂的性幻想。存在着对待动物的巨大的虐待动机并非难以置

信，这实际上跟另外一个患精神分裂病的天才马塞尔·普罗斯特特的行为一样，后者通过把针扎进老鼠获得了性满足（佩因特，1965）。从神经病学模型的角度来看，就好像笛卡儿的新皮层（他的“冷血”大脑）在功能上跟他的老皮层（“热血”的边缘大脑）脱节了。结果他以自己的理解做事，对人类生活中的平常事件没有任何感情。因此，对他来说，把自己比喻为是他自己理性的思想就有了可能。

笛卡儿看起来除了具有精神病人的心态外，也还有些狂躁压抑。他把自己漫长的早上睡眠描述成冬眠，他说当他悲伤时就睡得很多，“但是如果欢乐把我包围，我则既不生病也不睡觉。”似乎他在高度狂躁中度过了做梦以前“具有非凡热情”的日子。然而，这并不能使他得到的卓见归于无效。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自己思想功能的神话是不可一世的，不意味着我们的文明从那时起已经从这种膨胀中收益或受损：他对自己的梦的理解丝毫不能纠正这一点。相反，这种理解使它变得复杂。这种理解坚定了他追求真理的使命，使他相信自己能获得成功。

文化背景。在将三个阶段的步骤（个人的、文化的、原型的）引进对梦的分析时，我指出这三个阶段通常重叠。在分析诸如弗洛伊德、荣格和笛卡儿这些巨人的梦时这一点尤其正确，他们对我们文化的贡献主要取决于他们的生活。就像荣格指出的：“即使我在处理经验资料时，也必须说说自己的东西。”（CW4）——就笛卡儿而言，他全部的哲学成就是其精神分裂品格的丰富而睿智的表达。因此，这一部分将继续研究他生活中的个人和文化背景。

笛卡儿可以说是现代的哲学之父。他不仅是伟大的17世纪中反抗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主要催化剂，而且，他对在其死后半个世纪中发生于哲学和科学思想领域的革命作出了关键的

贡献。1619年12月10日他产生了建立统一的普遍的科学的想法，这种科学把所有可能的知识都联系在一个无所不包的思想体系内。这一思想最早预言了后来众所周知的宇宙理论：直到今天，这种灵感思想的可能实现仍然使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感到激动。受他的影响，怀疑一切成了占据主要地位的科学品德。怀疑一切直到它被科学证明，成了知识界的时尚，这实际上导致人们抛弃了可以作为觉悟方式的知觉和感觉。虽然他明确地把宗教排斥在自己的论说以外，然而他改变了人们对上帝以及上帝在宇宙中作用的认识。上帝不再是制造浩大世界里每个细节的创世之神，他蜕变为时钟的制造者，他建立了宇宙大钟，他给时钟的发条上弦使它滴答地走个不停。麻雀继续从天空掉落，但无人注意。这样，“神圣”就跟“世俗”分离，人类在无生气的宇宙中漂移，宇宙依照数学定律旋转着。

因此，我们难以夸大雷内·代萨泰斯·扎阿兹对我们文化的影响。在我们用以思考自己以及自己生活的宇宙的方式上，他的影响依然明显。

许多人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像笛卡儿那样理性的人会受到梦如此大的影响。研究了许多精神病人以后，我相信，答案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只有在梦里，具有这种品行的人们才能体验参与或献身于真正重要的东西——跟真正重要的东西有联系这种感觉。梦使他们感到拥有灵魂的感觉（也就是具有肉体 and “心”的活着，有感觉的动物的感觉，不光是一个高效率的人才）。

精神分裂病人倾向于把对外部世界中社会关系和物质客体的体验当成是虚的，结果，他们表现得冷淡，跟别人关系疏远，不易动感情，不参与社会事务。这对那些在童年时代遭受重大创伤（比如失去母亲或者在很小的年龄被迫离开家）的人而言尤其适用。失去母亲和离开家的灾难都在笛卡儿身上发

生过,结果他逃避进了“沉思”和陶醉于思想的个人世界里。在小的时候把孩子送往学校的残酷做法,从中世纪到现在一直存在于欧洲国家的某些阶层中。对于许多人来说,在英国的“绅士”和官员阶层中间这已经成了一种惯例。就像我在临床实践中观察到的那样,把孩子跟安全的家和他母亲的爱相分离,是产生“坚强不屈”——不暴露情感,有礼貌但又冷漠的“官员和绅士”风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一个人8岁时要在一所寄宿学校生存,压抑脆弱的情感是必要的。温暖而充满关爱的母亲的持续存在,给予孩子无价之宝,艾里克·埃里克森将其称作基本信任——即可以信任和依赖母亲、世界和生活的那种安全感。对于正常发展的孩子而言,母亲起着“安全基石”的作用,孩子在此基础上开拓环境,不断跑回母亲那里寻求安慰。好像孩子在每一次探险中都把母亲带在身边,通过母亲跟世界交往,用跟母亲联系起来的已经增长的情感对环境进行投资。我们就像喜爱母亲一样喜爱这个世界,整个童年母亲都为我们而存在。

笛卡儿被剥夺了这些东西,他不光缺乏理解人们或者动物的能力,而且明显地超然于所有物质世界甚至他的肉体之外。就如他在《方法论》中所言,“我是一个其整个实质或本质是思考的生物,我不需要任何地方,不需要任何物质东西。”结果,他能够完全地把他的肉体 and 物质(他称之为 *res extensa*)以及思想或灵魂(*the res cogitans*)区分开来。这种区别被证明有深刻影响,通过他的出版物,他使基督教规则已经确定的思想和肉体之间的联系走向终结。他承认肉体 and 思想有时候“交织在一起”,就像他希望自己的胳膊移动胳膊就动起来一样,他坚持这种联系比实际上更明显。他的追随者跟这种内在的令人不满的处境进行着搏斗,其中一个人想出了“两个时钟”的解决办法:肉体 and 思想像两个完全互相独立的时钟,它们记

载着同样的时间，两者间的差异是一个报时而另一个不报时。

一个观察者可能以为，沉默的时钟是引起另一个时钟鸣叫的原因，但他错了。思想和肉体之间的通常联系，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毫无疑问地真实的，这种联系对精神分裂病人来说，很少是时间上的巧合。吉尔伯特讽刺之为“机器中的鬼魂理论”。同时代的精神病学家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克服笛卡儿的精神和肉体之间绝对分裂说的缺陷，但是这种完全人为的分裂仍然深深地植根于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中，心理学仍然在努力争取自由。

由于跟外部现实世界隔绝，精神病人怀疑自己意识的真实性，他采取了很深的主观主义观点。笛卡儿把这种认识升华成了哲学教义，即著名的“怀疑方法”：人不仅应该怀疑一切，而且应该系统地对它进行怀疑。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他说自己运用了想像他个人和现实恶魔之间相互关系的方法，“现实恶魔使用了他自己所有的精力来欺骗我”。例如，他会以这种方式思考“天空、土地、颜色、形状、声音所有的外部东西不过是梦的欺骗”的可能性。

这种思想不是精神分裂病人的特征。我的一个精神病人曾经告诉我，年轻的他无论何时乘火车旅行，他都相信全部事情是一项搁置起来的工作。火车并非真正地驶离起点，驶向目的地。相反，许多聪明的被遮住视线的人，为了产生旅行的幻想，正在卷起经过窗口的风景的彩色帘子。笛卡儿想，恶魔正在爬起来搞相似的伎俩。肯定某事的需要，对它而言就像哲学锻炼那样成为了心理动力的必需品。从极具主观性的、个人主义的立场来看现实，他迈出了撰写方法论和第一个人的沉思的不寻常的脚步。它的方法是，使读者怀疑一切，然后逐渐地，一步一步通过有逻辑的论证使读者信服。使用这种步骤，他想

出来的一种不受自己对事物怀疑产生的影响的解释就是他自己的思想。“不管恶魔的欺骗有多大,”笛卡儿写道,“只要我想自己是某种东西,恶魔就永远不能使我变得乌有。”他得出结论:“我是,我就是”,“我思故我在。”在一切怀疑之外惟一存在的东西是“我”。这是最终的精神分裂病人的处境。它意味着,他自己的思想过程比物质和他的思想更肯定,他的思想比其他任何人的思想更肯定。一个人会毫不担心自相矛盾地说,这是高度精神病人的一种极端疯狂的膨胀。

原型环境。这种梦包括许多原型标志:精神、侧面(左和右)、风、陌生人(N先生,即在学院周围四边形人群中的那个人,他对书感兴趣)、房舍(学院,教堂,四角形)、果实(甜瓜)、善恶、雷、光(火花)。

与弗洛伊德的主张相反,笛卡儿事实上记录了关于这几个符号和关于梦的其他方面的联想。例如,他在《个人的深思》里说,“风表明神灵、时间的运动、生、光和沉思等。”他把甜瓜看做“独处魅力”的标志,词典表示所有的科学,诗篇则暗示智慧、激情和神谕。要理解其他的标志,我们除了运用荣格学派的扩展的步骤检查笛卡儿生命的内涵及其广阔的外延外,别无选择。因此,如果我们要全面理解梦的多层次含义,我们的解释将不得不包括来自个人和文化背景中的资料。我们将按照它们的出现顺序选取关键的标志:神灵。在梦里,这些神灵以下列形式出现:(1)吓唬他的鬼;(2)邪恶的神灵,他第一次醒来时害怕它,它企图把他导向歧途;(3)火花,在他第二次醒来时,火花似乎充满了屋子;(4)看不见的手,这些手似乎在捉弄他,让一些书出现又消失。对神灵、鬼等等东西深感兴趣的荣格,把这些东西解释为在无意识中自发的综合症的体现。在相信这些现象是真正存在的地方,人们容易把物质的东西归因于这些现象。笛卡儿12月10日的经历指出,颠倒了他的现

实意识的恶魔观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方法：无论如何，在无意识的层次上，他都经受了如此的体验。

侧面(左或者右)。梦的评论家似乎已经忽视了笛卡儿用左侧入睡然后在疼痛中醒来。他的第一个动作是翻到右侧。对此现象的一种简单的解释是：在梦中，他意识到自己被力量(梦的麻木)强制在不舒服的左侧姿势中，他改变这种姿势的希望促使他醒来。梦表明其虚弱右侧的无能为力(因为他需要用来改变身体姿势的右侧的肌肉麻木了)。前面的解释者已经忽略了这种明显的可能性，因为梦麻木的事实只是近来才被广泛地认同。虽然一个简单的物理学解释就能说明笛卡儿的经历，但这种解释本身不能说明跟其相联系的标志的意义——这些标志有鬼、恐惧、风和“左边”。

文化中的事实揭示了人类对左边和右边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一致。一般来说，右边跟善的东西、神圣、健康、积极和意识联系在一起，左边则跟邪恶的东西、世俗、疾病、消极和无意识联系在一起。在许多语言里，“右”和“左”这些词语的普遍使用含蓄地表明了这种联想。关于这些差异的普遍的一致，跟我们所知道的大脑两侧的不同功能一致(因为中枢神经系统组织的交叉，大脑控制着身体的相反一侧)。占主导地位的左大脑(管理着身体的右侧，其功能是作为身体右侧的附属物主观地体验出来的)参与了逻辑的、口头的、数学的以及各种思想活动。居于从属地位的右半脑(其功能受左半脑的支配，我的原型对许多这样的证据作了总结)参与了非逻辑的、非语言的、非数学的和符号的过程。实际上，自从罗杰·斯珀里在20世纪50和60年代开始其著名的分离大脑实验以来，所收集的有关证据，与弗洛伊德对于主要的(右半脑的)思想过程和次要的(左半脑的)思想过程的区分一致，前者相对地没有组织性，是原始的，具有魔力的，它受到情绪的支配，后者随着

语言的获取而发展,是具有逻辑的思想过程。

在很多传统中,左也跟地、女性和母亲联系在一起,而右则跟天、男性和父亲联系在一起。当我们把这些认识用于笛卡儿梦的第一部分时,我们发现他对鬼怪和风力的恐惧,剥夺了他右(意识、理性、智力、“善”)侧的力量,把他压迫到左(无意识、非理性、有感情和“恶”)侧。他很怕自己这样在街上被人看见,于是到学院和教堂寻求庇护。对于刚刚发现一切科学的基础,正要为理性时代的开始奠基的人而言,这是一个有益的经验。而且他害怕掉向地面(地、女性、母亲),他被风吹得转了“三四次”。荣格特别对三和四这两个数字的原型标志意义感兴趣,他得出结论:“四表示女性、母亲和体质的东西,三则表示男性、父亲和精神的東西。”就像在前一部分我们注意到的,笛卡儿将迫使自己的肉体和精神永远地分离,永远不会把“四”这个女性的东西融进自己的个人生活。

风。笛卡儿个人把风跟精神、生命、光和沉思联系起来,源于“元气”(走道哪哪就起风的神灵)和“上帝的呼吸”的风的原型标志。前一天的认识已经设想了这种强有力的力量。经过洗礼的人,由于高度意识到自己的个性,所以敢于丢弃学究的外套而信任自己的思想。他马上受到幽灵和精神力量的困扰,这些力量剥夺了他右侧的力量,使他转向左边。似乎他正在努力寻求心理的补偿。

地盘房舍(学院、教堂和四角形)。地盘是一块神圣的土地,在那里进行着转化的仪式。笛卡儿在梦里寻求到学院的四角形和教堂中庇护。在军队、教堂和学院这样的机构里,他被剥夺了母爱,那些机构对他们来说就像自己的家像是母亲的替代品。而且,对精神分裂病人来说,机构生活的正常关系消除了他们的顾虑——处处防范更自由的、更具威胁性的正常的家庭和社会生活关系。对笛卡儿而言,作为在耶稣会会员学

院生活八年的结果,学院和教堂很相似。

陌生人。梦里有三个陌生人:N先生,这个人在学院的四角形里,他有文学兴趣。如果有人让笛卡儿分析,他可以要求笛卡儿尽可能详细地描述这些数字并让他给出自己所产生的联想。通过让他进行积极的想像,确立自己的身份和他们希望自己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如弗洛伊德认识到的,没有这些信息我们就处于不利的地位,我们就只能猜想这些数字表示什么。

陌生人是处于阴阳复合体核心的原型。阴阳复合体在梦里表示做梦者的无意识的那些方面,因为这些方面是不真实的不具有生命的,或者它们已经受到压抑。

梦告诉我们关于N先生的哪些东西?笛卡儿忽视了这位绅士而离开他。然而,从他忘了自己没有跟他打招呼于是想返回去弥补可以看出,他对这位绅士态度积极。他为什么忽略了N先生?因为他太专注于自己的思想,太专注于跟自己的片面和风搏斗。但即使那样,他也感到需要跟N先生处好关系。如果他要像四角形中的那个人一样重新获得平衡和站直,也许他具有一些笛卡儿已经“忽略”和要求的品质。他情感上的孤立,深深的怀疑态度以及智力的抽象,这些都需要用N先生所提供的东西来弥补。这能是什么?体验情感的能力,爱,以及为生活献身的 ability。若无笛卡儿的联想,我们就无从知道这些,但是临床经验将使一个人倾向于怀疑N先生是笛卡儿的积极的影子。(也就是体现由于历史原因,到目前为止笛卡儿还不能够具备的那些品质。)

就如所发生的那样,单单是回归的尝试就在梦中产生了积极的发展,学院四边形中使人消除顾虑的数字产生了他希望送给N先生的甜瓜。如果笛卡儿成功地找到了他。弗朗兹使人信服地论证到,四角形中那个不认识的人代表了笛卡儿

的一个方面,这一方面安然地存在于教堂亲爱的拥抱中。不管笛卡儿对其他的东西怎么怀疑,他将在自己的一生中成为一个坚定的天主教徒。

由这个数字和笛卡儿自己激发的对这位 N 绅士的积极态度说明,没有生命力的“错过”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由学院和教堂的传统精神维系着。这些是母亲的惟一的替代品,他可以很好地利用这个替代品,为自己人格中不发达的部分汲取一些营养。在梦的最后阶段,未知的(即无意识的)数字,又跟生活中“诗的”需求联系起来。

甜瓜。这是梦的一部分,弗洛伊德对它进行评论道:甜瓜是性的标志。甜瓜可能是性的标志,但弗朗兹的研究已经揭示了甜瓜对笛卡儿而言可能意味着更多的东西。例如,她已经确定,他会意识到这个果实的圣经意义。以色列的孩子们后悔在埃及的土地上错过了这种高兴:“我们记得鱼,我们在埃及自由地烹食它们。我们记得黄瓜、甜瓜、韭菜、洋葱、大蒜。但现在我们的灵魂干涸了,在我们眼前除了这天赐食物之外,什么都没有。”精神病状态是“灵魂干涸”的状态,香甜的甜瓜适合做这种境况的解毒药。但是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它意味着什么?

在甜瓜和苹果之间存在着有趣的语源关系。希腊语的甜瓜(等同于苹果)是拉丁语 melo 和 melonis 的词源,我们和法国人从拉丁语中导出了单词“甜瓜”。为了从西瓜中区分较小的可食的甜瓜,希腊语把前者叫做 melo-pepon(“苹果甜瓜”)。对一个受过耶稣会教育的人来说,苹果甜瓜的标志意义具有强有力的女性、性和邪恶的弦外之音。这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他从梦中第一次醒来时,花了两个小时思考世界上的善恶问题。

冯·弗朗兹医生也确信,笛卡儿可能意识到拜火教徒(受到基督教迫害的诺斯替教派)所声称的标志的重要性。对拜火

教徒而言,生活的全部意义和目的是拯救束缚于黑暗中的“光源”,把它们带回光的原有的王国。所有的拜火教信徒是严格的素食者,他们依靠植物和果实生存,植物和果实据说含有大量的这种光源,在黄瓜和甜瓜中尤其丰富。

因此,在圣经和拜火教中,苹果甜瓜的标志强调性、善与恶以及个体意识的萌动性。而且,它把甜瓜和笛卡儿一从“雷击”中醒来就在梦幻视中看见的火花联系起来。甜瓜的性的标志不光是由甜瓜的暗示性形状引起的,而且它是子宫以及生育的缩影,甜瓜充满大量的种子体现了这一点:正是由于这些,甜瓜也被认为是精囊。

最后,作为一个充满精液和具有维系生命容量的东西,球形的甜瓜是自我的标志。如果把甜瓜横剖开,它便形成了完美的坛场,这是一个完整而彻底的原型形象。甜瓜在紧贴地面生长的瓜蔓上的叶子中生长,这一点对笛卡儿而言还暗示,如果自己要生存和个体化,自己就必须变得现实,跟世俗的现实世界进行交往。果实来自于遥远的异国的土地,暗示如果做梦者的雄心壮志同其有紧密联系的地面很远,有一些“完全不同的”其他东西出现。用荣格学派的话说,甜瓜具有灵魂和自我的含义,虽然笛卡儿不懂得这一点,但他最后醒来时决定去朝觐圣母——这是最后发出的誓言,他的这种行为也许意义重大。在梦中,甜瓜对荣格来讲意味着超越自我的标志,它把以前的不一致或者相反的心理倾向[在这个例子中,就是自私和没有生命力的自我,尤其是它的女性方面(灵魂)的不一致]统一起来。

善与恶把他压倒,使他向左侧倾斜,他后悔不已的那些罪孽是什么?笛卡儿如何做了,起床,在孤单的时候就躺在床上?可能他对色情幻想并不陌生,这种色情幻想是基督教说教中指出的邪恶形式,有这种幻想的人要经受地狱之火的折

磨。约翰·科尔相信，甜瓜的性的标志对笛卡儿来说，不光具有女性的并且还具有男性的含义，他相信笛卡儿的罪孽意识更重，因为笛卡儿隐蔽的性的欲望是同性恋。就像他指出的，11月10日做梦的那个晚上，是笛卡儿跟艾萨克·比克曼头次见面的周年日。有理由相信笛卡儿爱上了（没有得到回报）艾萨克·比克曼。这种爱，以及他跟荷兰侍女的恋情，仅仅是建立恋爱关系的尝试，结果都遭到了失败。

雷。笛卡儿自己把这解释为“真理之神”从天上降临到自己身上。雷所具有的神话和宗教寓意，把雷跟上帝的意志和裁判连在一起，梦中的闪电则与突然发生的思想启蒙和升华连在一起。（荣格）虽然笛卡儿听见了雷声，但他在自己的梦中没有看见闪电，相反，他醒来时看见屋子里大片的火花在燃烧。

光。光是意识的原型形象。在某种意义上，笛卡儿的火花可以被理解为通常在虚幻的梦视觉中可以看到的小的光点。但是它们显然具有更大的意义，因为它们给了笛卡儿深刻的印象：他把它们体验为来自上天的暗示。笛卡儿的“火花”在许多方面都跟火花或者鱼的眼睛相似。鱼的眼睛现象是跟笛卡儿同时代的炼丹家在炼丹的过程中发现的。他们注意到，当原来的物质转化时，便产生了许多“零星的白的火花”。荣格把这些（在他题为《具有多重意识的无意识》文章里）解释为，在无意识的东西朝着有意识摸索时明显的无意识的闪烁。当完整的自私意识出现时，它被逐渐聚集的“多重光明”包围。

火花被不同地解释为“天主灵魂”的表现，它被认为是上帝精神的宇宙的灵魂。火花还被解释为自然之光，就像帕拉塞尔苏斯描述的那样：“火花被神圣的鬼点燃，又赐予内在的人。”帕拉塞尔苏斯相信自然之光是动物身上共同存在的闪光的本质，它存在于一切自然物之中。对荣格来说，这样的表示都是最终目标的表现，这些目标含蓄地存在于所有把它们导

向意识的自然形式中。火花是表达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中潜在和有意的目的的形象。笛卡儿把雷击和火花体验为产生于他身体以外的力量的表示，这些雷击和火花就像在较早阶段中的幽灵和风。像梦的系列的整体，它们是那样震撼人心，以致于他想像它们只能来源于上天。

笛卡儿知道，随着这些梦的发生，一些天启的事情出现了，它们揭示了一些以前他从来未想到过的东西。新的意识产生了，它在他身上成型。他的命运是建设他自己的哲学，通过这样做，他正在实现的不仅仅是上帝的意志。含蓄地存在于一切事物身上的自然光，通过他将在人类的思想或在一个人的思想中变得明显，这种思想的存在可能是确定的。“自然之光”直接来源于上帝：它的使命是使他的思想之光最清晰地展示出来。

诗。在梦的第三也是最后一部分中的梦直指奥索纽斯的处境。奥索纽斯是一个喜欢怀疑的诗人，他的诗“*Quod vitae sectabor iter?*”(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写了社会生活的无益：一方面，“严重的惩罚落在单身人士的生活上”，而结婚并没带给人以安全，“玛斯的征战只换来鲜血”，“要避免一切友谊，因为友谊导致罪孽，而罪孽使毕达格拉斯被毁灭。”由于“害怕”这一点，因此绝对不培养友谊——由于这一过错迪蒙曾在雅典赎罪。这首诗用一句希腊格言结尾：“人不出生是幸运的，如果他出生了，很快就会死去。”

第二首诗“*Est et non*”(是与非)是关于怀疑和肯定，以及人们尤其是哲学家之间存在的冲突和一致的。我们怎么能够确定，天明亮的时候一定是白天？“光每隔多长时间从许多火炬或者雷电上发出来？那是人的夜里的灯，而不是白昼。”这首诗这样结尾：“在现实中人的生活是多么悲哀，他们永远受着这两个单音节词语的左右。”

总之,除了才智的那些东西之外,这些诗无疑概括了他所有对生活的不满,他所有谨慎的情感付出,以及对确立什么是真实的和肯定的东西的专注。“对他而言,除了热爱真理外,不存在什么东西,”巴赖特评价说,“他从那时起到现在,一直在追求他生命中的职业。”

画像。这是荷兰艺术取得巨大成就的时代,这是伦伯朗和福兰兹·豪斯(他将描绘笛卡儿的画像)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个人的人格受到以前从未有过的研究和重视。就像甜瓜的种子和屋子中的多重亮光那样,梦中有几幅画像暗示:所有以前从未想像过的可能性现在对笛卡儿而言正在变得可能。弗朗兹评论说,自我的第一个梦的标志是单一的东西(甜瓜),这一标志在随后的两个梦的插曲中裂开,从而揭示了人格具有内在的多样性(种子、火花和画像)。

结论

如果梦的用途是促进做梦者的个人化发展,那么,雷内·代萨泰斯的伟大的梦既是胜利又是失败。这肯定了他的信念:在其经常思考的意识中他拥有揭开宇宙奥妙的能力,拥有阐释被编码成数学符号的上帝思想的能力。但这没有使他走向现实:梦不能使他动员潜伏在自己身上的一切潜能,使他在心理上和感情上变得不可捉摸。而且,由于他的巨大影响,他身上的这种分离使所有我们这个社会的受教育者具有的理性能力和非理性能力之间的分裂进一步扩大。

笛卡儿所留下来的东西,使西方人的自私变得更变本加厉,更超然、更坚决、更具约束性,这样就促进了进步和灾难。这种进步和灾难随着商业的扩展、对地球的开拓、高傲的统

治、科学的发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制造而产生。笛卡儿从梦的第一部分醒来时所看见的星星点点的亮光，合在一起产生了思想启蒙的光芒。运用逻辑的和数学的语言进行编辑的思想具有普遍的有效性，这一肯定结论能在时间或者历史范围之外存在。作为笛卡儿从一个梦之夜获得的智慧之光的结果，笛卡儿点亮的火把在 17 世纪后半叶将由另外一个患有精神病的天才艾萨克·牛顿高高举起来。这样，人类精神就从中世纪迷信的黑暗中获得了自由。

上帝说，自然和自然的法则隐蔽在夜里

让牛顿顺其自然吧，一切都是光。

这就是笛卡儿和牛顿点燃的光所具有的力量，它到达了最炫目也是最惊心动魄的广岛爆炸的顶峰，而且还将使我们的星球处于天启的大火中。笛卡儿的视觉为我们带来了巨大利益，对此我们不能否认；但它也具有不利，他把我们集体推向精神分裂的方向。他的梦是试图对他在社会和感情方面的不适，以及他才智的过于膨胀进行弥补，但是因为他缺乏心理学方面研究梦的卓见，他就抓不住梦的含义，他把梦看做是重新确定自己在前一天“奇妙的世界”视觉中构思出来的使命。我们的整个文化，依然在经受这个梦以及他不能理解这个梦所造成的损失。

13 做梦和知觉的艺术

本质是不完美的，而艺术是完美的。

炼丹师座右铭

在这本书里，我论证道：我们的梦里除了有纯粹的个人因素外，还有更多的现实因素。对此现实进行研究的渴望，导致分析的产生：它产生了宗教、神话、心理学和艺术——所有这些东西都试图构建自我的镜子，以从中发现个人实现的路径，取得“更高的”知觉成就。当社会变得无神化，心理学聚焦于老鼠，分析的艺术和礼仪活动就实际上成了庆祝生命奇迹的惟一方法。伟大艺术的永久特征是把我们引导到初始的王国，并通过对艺术的完美掌握来揭示短暂中的永恒，特殊中的普遍。希腊人在艺术里给了我们一个容器，用来装载人类生活并对之进行过滤，以便让我们看见终极的现实。哲学家路德维格·维根斯坦因很好地表达了这一点，他说：“艺术工作被视为亚硬币，美的生活被视为亚硬币的世界。”这是艺术和道德之间的纽带。把物体看做是来自它们中间，这是看事情的通常方法，而亚硬币的观点则从外部看它们，在这种方式里，他把整个世界当作了背景。像我们接触的那样，梦像一件艺术作品，像一个亚硬币物体。梦跟艺术工作不同，因为它是每个人凭自己的力量自发产生的，而伟大的艺术则要求做漫

无止境的努力,接近原型的王国。“真正的艺术作品,是涌向海滩的第七次浪潮,时间的洪流不能使它退却。”西里尔·康诺利这样说。

然而,在梦和艺术之间存在许多有用的相似点。首先,两者都要求鉴赏和创造的能力,两者是同一过程(也就是交流)的两个方面。艺术像梦,它是通过使用符号进行情感交流的一种形式。第二,艺术家不只是做梦者,也不是只图娱乐的那种人,他是把人灵魂带进冥国的上帝的信使,他让人走进更加神秘更加非凡的世界。“艺术家不是一个拥有自由意志、寻求自我实现的人,”荣格写道,“他是这样一个人,他通过艺术实现自己身上的目标。”

作为一个人,他可以有七情六欲,有意志和个人目标,但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又是更高意义上的“人”——他是一个“集体主义的人”——他传输并且塑造人类的精神生活。(荣格,1933)第三,艺术可以对整个社会起到同样的弥补功能,就像梦可以对社会中的一名成员起到安慰作用一样。由于这个原因,艺术家们负有文化责任,可以得出:艺术批评家用同样的正直做自己的工作,而所有优秀的分析家都向往这种正直。跟神话一样,艺术作品是大众的梦。在过去,艺术作品的功能则主要是宗教上的。“艺术不是一种消遣,而是一个教士。”让·康德说。

从此角度来看,伟大艺术家的主要作用是作为先知的注解者,他收到原型的信息,用弥补这个时代缺陷的方式把它翻译成当今的语言。荣格把它描述如下:“艺术家的向往逃避了不满的现实,伸展到了无知觉的原始意境。用这种无知觉弥补当今时代精神的不足和片面,是再好不过的。”

伊卡洛斯的堕落

对心的渴望加以补偿的一个事例是皮耶特·布鲁海尔的《伊卡洛斯堕落》。它画于1558年，现在在布鲁塞尔的音乐艺术馆里，这是我们文明的伟大标志之一。16世纪中叶是这样一个时代：人类世俗的雄心使他们变得疯狂。我们为了统治世界，把勇气、屠杀和科学的机智有力地结合起来，我们已经走在征服自然的征途上。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时代已经开始了。但是它是什么，它在哪儿结束？布鲁海尔的画反映了这些问题。现在对我们来说比他当时画画的时候还重要。他展示给伊卡洛斯：他朝着太阳趾高气扬地飞翔，超越了自我，他跟哺育我们的海洋轰然相撞。同时，人类世界的永恒循环沿着它无限的轨道前进——渔夫捕捞着鱼，牧羊人放着羊，农夫耕着地，太阳则庄严地穿越浩渺的天穹。380年后，威斯坦·奥登在他优美的诗中描绘了此番景象：

布鲁海尔的每件东西如何消失。
定然是来自于灾难，
农夫可能已听到了浪花和被抛弃的哭喊。
对他来说失败并不重要，太阳光芒万丈
它白色的腿必然在郁郁葱葱中消失
昂贵精细的轮船必定已经看见大海，
孩子横空出世，真是奇观
到某一地方静静地航行

这幅名画包含了古代神话，它揭示了我们现在的命运。人

超越自己奔向没落的故事远比伊卡洛斯或亚当的轻率的故事古老。文明来临之际,在基什城中流传着一个传说:大鹰用它的背驮着金·特纳飞向天空。当他们攀登到世界之巅时,金害怕了:“啊,我的朋友,”他哭了,“不要再往上爬了。”鹰认识到自己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于是失去了前进的勇气,他们一起坠落地面。人升起然后跌落的神话主题,是目前我们进步的寓言。自从逃离伊甸园,它就一直困扰每一代人。我们抛弃了我们祖先所依赖的大自然(上帝意志)的恩赐。基督教则把那一刻描绘成创造死亡的时间。实际上这是死亡被认知的时刻。从伊甸园的树上偷吃水果就像普罗米修斯偷火——这是一种独立的自我意识的获得。

不是上帝把我们赶出了伊甸园,是我们厌倦了那个地方而离开。我们希望返回到伊甸园,但是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已把它焚为灰烬,我们榨取伊甸园的资源,把所得的收益交给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进步和堕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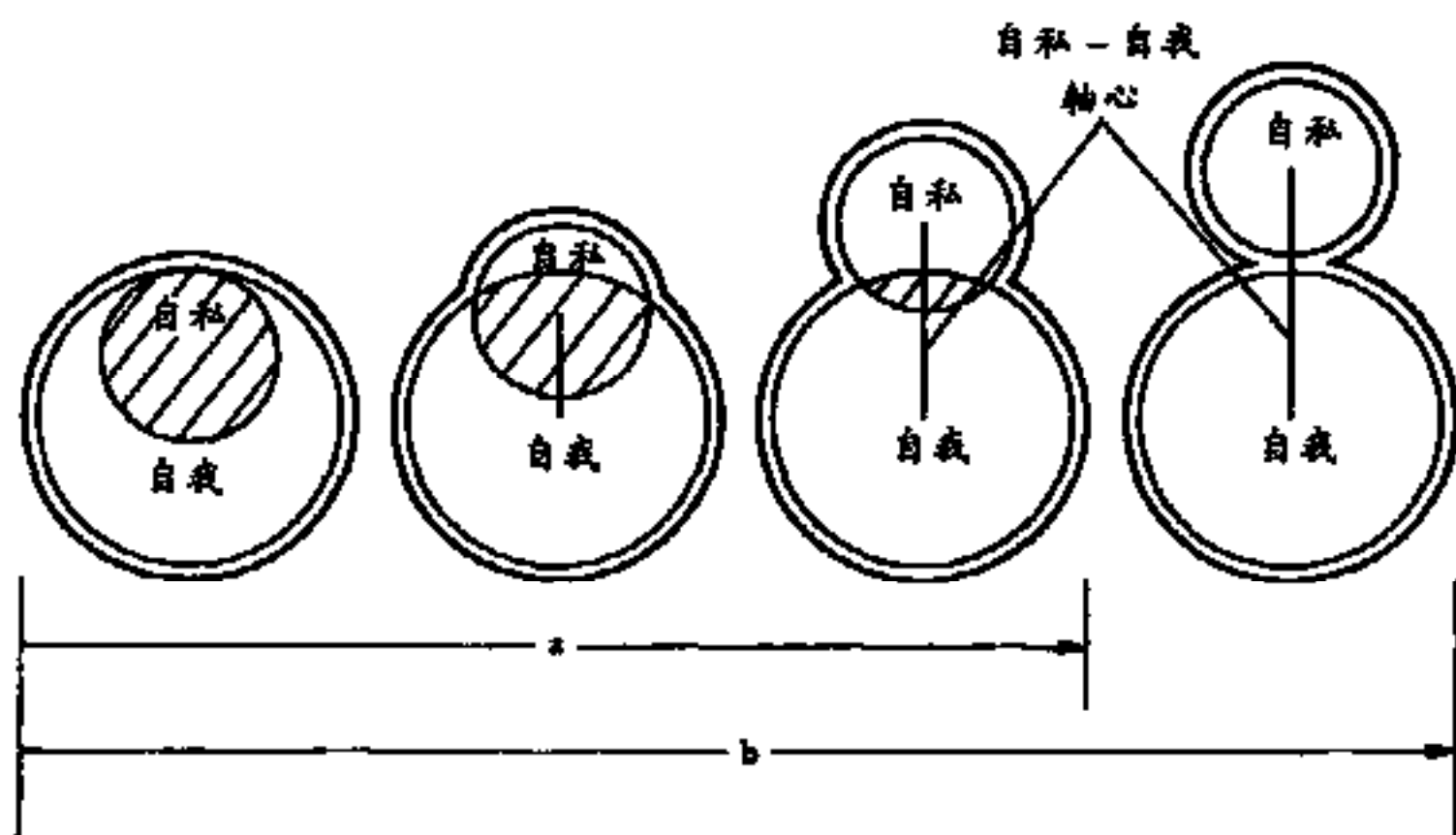
升起来的东西一定会落下。

谚语

让我们用放大梦的同样的方式把布鲁海尔的画放大——把我们限定在文化的和原型的层次,因为我们在处理一件艺术作品而不是个人的梦。在堕落以前,我们通过自我的良好的操作,比现在更直接地适应着现实,结果,人类社会彼此之间以及和自然环境之间都生活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当然,自私还存在,但在收益中的作用已经降低。伴随着堕落,发明了农业,同时抛弃了我

们西方人称作的中东式的狩猎和采集活动。传统的无限的在数千年间繁衍扩大的“冷”社会，不断地被具有活力的和与时间相联系的“热”社会取代，从而进入历史的大漩涡。与此同时，自私作为一种自然力量出现了。原始思维向现代思维的转型，与自私跟自我的逐渐分离相吻合，也与自私和自我之间神经精神之链的“延伸”相吻合。（自我轴向定位；图3）

耕作的同时产生了一种时间意识，但它不是我们生活其间的线性时间。它是具有季节性的循环的时间：从夏到冬，周而复始；播种，收获，耕耘，再播种，时间在轮回。就像约瑟夫·坎贝尔指出的，时间“根本不知道走向何处”。格雷·艾伯利（1995）在其充满审视的书中，罗列了他看到的原始和现代之间的差异。（改编自爱丁格尔，1992）我大胆地在表4中运用和扩展了他的列表。



在原始思想(a)和现代思想(b)中，自私—自我轴心从出生到成熟的发展。首先，自私是作为自我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然后，由于本体论的继续发展，自私逐渐地从自我脱离而独立。连接两者的垂线表示自私—自我轴心，这是保持人格完整的至关重要的纽带。自私的阴影部分表示在发展进程不同阶段中自私—自我的相对地位。

对于原始的人类来说，人性在宇宙的序列中保持着中心地位，他密切地参与自然的状态（列维－布鲁称之为参与奥妙），他具有时间的节奏和循环观，具有主要存在于精神世界的现实感，他绝对地接受道德价值，认为生命是永恒的，相信神话和仪式跟精神的健康和生机是不可分割的。跟现代的人类相比，人性在宇宙序列中居于外围，处于跟自然分离的客观状态中，他发展的时间具有线性观，他具有主要存在于物质世界的现实感，他相对地接受道德准则，认为生命是有限的，相信神话和仪式跟现代生活的必需品没有关联。

表 4 原始思维 and 现代思维的巨大差异

	原始思想	现代思想
自私——自我轴心	简单、紧凑	复杂、松散
宇宙定位	中央	外围
跟自然的关系	主观的参与，“主观参与奥妙”	孤立，具有客观性
时间概念	有节奏、不断循环	线性地推进
现实	精神的世界	物质的世界
道德价值	绝对	相对
生活	永恒	有限
对神话和仪式的态度	必要	无用

随着自私从自我的不断分离，自私丢掉了默默无闻而变得叱咤风云，它终止了跟地面的联系，学会了飞翔。从那时起，它飞得越来越高。我们从直觉已经知道，布鲁海尔和希腊人是正确的：这是一种极端危险的职业。伪基督教有充足的理由把人从远祖的环境中逃离看做堕落，因为他们用道德准则衡量这种逃离，把逃离视为对宇宙法则的背叛。它是一种在恩赐中的堕落。现代的世俗观恰恰相成对照：“堕落”是对无意识的升华，是从黑暗中爬升，虽然知道这是危险的。通常发生的危险必定是：我们脱离自然的法则太远，我们想完全破坏动态平衡原则，把自私——自我轴心延伸到破裂点，远远走出了原型的现实世界，结果我们整体上变得很不明智。那确实是一种堕落。一些人说我们已经走到这种地步，我倒觉得还有一段路要走。我们还没有垮掉，只是正在退化。这就像从帝国大厦跳下的人，当他经过第五层时，有人听到他在咕哝：“目前这种位置很好！”

现代的伊卡洛斯

关于上升下降的重要一点是，生长、发展和意识都需要螺旋式上升和进化，需要深度和高度。如果把历史描绘成“上帝脑中创作的史诗”，你会看到这出戏剧分成两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人性离开它的核心，进而跟这个核心完全分离；第二部分描述人性又返回它的核心。这种‘纷繁复杂事件下的基本循环节奏也能被尼古拉·马基雅维里理解’。命运规定，世界的万事万物应该有潮涨潮落，它们一旦达到最完美，就再也不能前进，他们必定得后退……”睡眠和清醒的轮替，维系着我们当代人跟我们原始自我的脆弱的精神联系。这是影响人

类自我意识和生存的关键现象，它由知觉和做梦的有规律的同步和不同步决定。

大自然的思维

大自然本身很和谐，它过得很舒适。
艾萨克·牛顿

当荣格引入“大自然的思维”这个词语来解释“我们所有人身上的 200 万年的人类史”时，他引入物种进化来形容处于人类世界核心的古老的驱动力。作为仍然活跃在我们梦中的典型的适应策略，他不断地奋斗促进我们在经常偏离轨道的现代世界环境中生存。当我们生病、不抱幻想或者变得神经，那是因为基本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当我们高兴、生机勃勃，那是因为基本的需求得到了满足。200 万岁的自我只不过反映了大自然的

意志，这种自我意识贯穿于永恒的进化的时代，它为我们共同面临的危机提供了被我们忽视的古老智慧。维系现代思想的主要幻觉是，它是史无前例的，现代生活远远不像人类在以前所经历的那些东西。他背叛了确实是史无前例的思维的狭隘，因为以前的文化没有熟视无睹永远多样的人类世界，相信一些产品如波音飞机、通信卫星和汽车的生产可以否定祖先过去的强大影响。我们很容易忘记，人类精神在逆境中曾被锻造成由坚韧物质构成的东西，很容易忘记原型的坚韧系统已经运行了百万年，它已经受了地球上所发生的每一次狡猾和严厉的变故的考验，很容易忘记从十多万年前我们家族的出现到现在，整个大脑的构造完全没有发生改变。

从那时起我们的大脑几乎没有进步。在那么短的时间里

我们的大脑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功——创造了最具适应能力的器官。大脑跟我们在伊甸园里曾有的意识能力完全一样。所“演进”的东西不过是文化上的一致,这种能力怎么运用。文化是大脑之外的记忆的存储器。设计了第一套弓箭后来又在油漆岩洞的古人类完全有能力制造核导弹和装饰小教堂。他们所缺乏的是文化上的支持,技术上怎么制造、记录并传递给下一代。他们不制造电视肥皂剧、洗衣机和文字处理器,而是献身于宗教仪式、叙事诗、跳舞、歌唱以及梦的解释。对我们来说这些“原始的”活动是把他们从心理上和社会上凝结在一起的东西。如果我们的文化史无前例,那是由于我们抛弃了这些古老的活动,这样我们当前处于困境的原因就产生了。

在过去,所有的人类社会都使用技术。技术的功能是把个体和集体统一起来,把过去和现在统一起来,把个人的有意识思想和集体物种的无意识思想统一起来。这些礼仪和仪式以及他们精美的服饰、舞蹈和颂歌,一起被我们理性的世俗的社会放弃了。这样一来,我们就已经放弃了我们的剧目里生存的最关键的机制。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可怕的事实,对于它无所作为,很可能我们的文明甚至我们的物种都将灭绝。

荣格理解这一点:在当代世界,我们遭到了精神方面的剥夺,因为我们已经跟自然思想失去联系,它的需求再也得不到满足。荣格设计了治疗方法来恢复这种联系。他第一个认识到原始意识不断打破我们的梦——对宇宙中一切事件都处于中心的意识,参与自然现象的意识,据有无限的精神世界的意识,或者进入神话王国的意识。在神话王国里人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礼仪或一种仪式中,这在今天的世界里是永远不会发生的。不幸的是,荣格的“自然思想”观即使作为一个比喻也不能使人满意,因为不可能存在完全封闭在现代思想中并且不受当代事件影响的自我封闭的“原始思想”。所有的精神现象,都

是天生的潜能和有推动作用的(或者有阻碍作用的)环境相互作用的产品。

自私意识也是近来才演进的东西,就像荣格(1933)、纽曼(1954)、杰恩斯(1976)和韦伯(1983)在其吸引人的书中暗示的那样。意识的产生已经数百万年。从文明出现至今,所发生的事情是:意识领域的扩大,技术知识的积累,自私心理的加强。当这一过程继续的时候,就像自私跟自我的进一步分离,“原始的”思想不得不调整,个体从对群体的整体认同中分化出来。对文化历史形成中个体力量的不断认同,对能实现最高目标的英雄魅力人格的向往,两者并肩而行。

英雄的上帝是代表了升腾、明亮和意识的太阳神,这不是偶然。但是,有节奏的循环中上升和下降的概念在这再次被融进神话。英雄在白昼升到天空中的最高点,晚上又落至海洋深处,在数小时的黑暗中,在海洋里他跟巨大的海洋魔鬼战斗,早上又胜利地出现在东方。“在这一系列的危险、战斗和胜利中,”纽曼说,“光明是英雄世界的主要标志。”英雄总是带来光明和撒播光明。

用神经学术语来讲,英雄的胜利是左脑对右脑的胜利,是作为整体的前脑对边缘系统和脑柄的胜利。英雄的神话代表左半脑主宰的典型。英雄的夜间旅行是从夜里有意识的自私跌入无意识的地狱。新旧大脑之间精妙联系的开始,使得在典型的眼睛迅速跳动的睡眠里两者之间频繁的联系成为可能。

世界的锁链

这种景色很壮观，几支强大力量被造物主塑造成几种或一种形式。当这个星球按照固定的重力定律不断地旋转时，在如此简单的开端中最美丽最奇妙的东西已经演进、正在演进着。

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

这是达尔文的荣耀。托马斯·赫克斯利最早察觉到人类意识的进化使得大自然意识到人类的存在。1925年在到东非的访问途中，荣格有了类似的想法。当他站在小山上俯视延伸到地平线的大平原，遥望大群的瞪羚、羚羊、角马、斑马、野猪，像缓缓的河流向前移动时，清楚的认识到了“意识的宇宙意义”。如果没有人类的意

识，他就意识不到面前的景象，这些景象就仍处于不可知状态。“本质是不完美的，艺术是完美的。”荣格现在发现意识通过体验世界客观的存在，赋予世界完美。“现在我知道它是什么，甚至知道的更多：没有人就没有创造的完成。实际上，人自己是世界的第二创造者，他独自创造客观世界——如果没有意识，我们就听不到、看不见，默默地进食、出生然后死亡，数百万年一晃而过。意识就将穿越不可知的深夜，走向不可知的结局。”人类意识创造了客观的世界和意义，人发现自己在过去大千世界的形成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MDR）荣格用这种觉察力，发现人类向更圆满的意识发展的历程，是在宇宙和永恒的背景中不断发生的事情。精神心理作为自然的一个客观部分，要服从于主宰宇宙的同样定律，它本身是那些定律的最高实现。人类精神心理通过意识的奇迹提供了一面镜子，大自然可以在镜子里面看见它的影子。

荣格 70 多岁时，开始对称作杰勒德修士的 16 世纪的炼丹家产生了兴趣。炼丹术相信，丹药的炼成只有通过把整个人跟统一的世界融合起来才能实现。在创世第一天开始孕育的世界里，这个统一的世界什么也没有分离，一切东西都是统一的。荣格说这种信仰是“经验主义世界的永恒本原，就像自我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个体人格的本原一样”。(CW16)荣格认识到，炼丹术在表明一个处于所有宗教直觉核心的深刻思想，即“个人跟超人之间的统一，单个的道跟宇宙中的道的统一”观。(CW16)

我猜测，我们中的大多数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某段时间发现了某种预期的视角。雷本尼兹称这种视角为“经久不衰的哲学”，它是这样一些观念：一切存在都有神秘的前提条件，它渗透在一切带有意义或目的的模糊的直觉意识中。经久不衰的哲学形成印度教、佛教、道教、苏非教派和基督教的神秘核心。当思考宇宙及其运作的规律时，即使无神论者也会受到触动。“不信神的天文学家，”爱德华·扬说，“是个疯子。”

聚精会神地对终极、无限、一切事物的统一的思考是“启蒙”或者是“悟道”的经历。大千世界的宗教设计了精神戒律，用来产生无意识的超然状态。柏拉图把它描述成离开阴暗的洞穴，走入光明的世界，而爱因斯坦则把它看做“摆脱孤立的幻觉”。从超然的角度来看，地球上整个生命的进化，是意识逐渐出现的过程。意识的目标是不断认识世界的本质，认识事物之间的统一性和世界的大链。

意识的本质

魂？

人知道人类的事情，拯救人类的灵

科林斯

当许多权威已经就先进文明取得的“更高意识”著书立说，已经描述通过研究梦而取得的意识方面的发展时，很少有人试图解释“更高级”的意识形式的发展。因此，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尝试描述这些不可琢磨的术语可能是什么含义，虽然总是有我们可能错过的主要的东西，其警示意识概念的核心是有生命个体的自我意识。个体具有从古至今再到未来的个人身份。

随着时光的推移，时间闪逝的意识和个人身份的延续意识，连同保持记忆并在理解现在和预见即将发生的事件中运用这些记忆的能力一起增长着。拟订未来的目标，为获得成就而系统地工作，需要有意识地决定推迟满足目前的需求，或推迟满足未来某一时候的需求。长时间地集中精力于任务或想法直至任务或想法的实现（“注意力时段”），也需要有意识地运用意志。

考虑到无限人类思维头脑的有限，意识意味着认识和思考想法、感官刺激、感情的能力，鉴赏它们的含义的能力，把它们翻译成语言的能力，尽可能形成对现实的全面而深刻的理解的能力。总之，意识是控制发生在意识内外的东西，评估那些偶然性，并推理它们，决定在环境中最佳的（也就是最俱适应能力的、最有利的、最有道德的）选择。

当为了庆祝世界的奇迹而精心地塑造情感体验和知觉的

能力时,意识就变成了艺术。如何不断提高具有多样功能的意识的讨论,把我们带往空间和视觉的比喻中——例如海拔(深度)、范围(广度)、大小(成长发展)和复杂性(差异性,多样性)。通过开阔视野,人提高了意识,人在更高的水平上看事物,等等。个人意识越高远越开阔,就越容易实现最后的超越。

进化过程的每个新阶段,不但超越而且吸收了前面阶段的东西。我们为自己的智力成就沾沾自喜时,我们忘了那些成就是如何由我们前面的生灵的智慧决定的。缓慢的种系意识的提升,爬行动物、哺乳动物和灵长动物头脑里意识沉重的脚步,在我们头脑中和在我们地球化石中扎根的记录,这些促使一些人看到了为我们的进化而绘制的整个路径——经历自我意识,从下意识到超越意识——到目前为止,我们“仅仅走到了动物和人类之间的中间地带”,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瑜伽中有一个相似的含蓄的概念:我们身上存在一切更高水平的未实现的潜能(“Kundalini 能”)意识,它像一条蛇(“邪恶的力量”)蜷缩在脊椎底部最低处的“查克拉”里。练习 Kundalini 瑜伽,据说是唤醒沉睡的力量,以便它从物质自然世界里最底处的查克拉升起,通过世界的大链演进,经过思想大脑的中枢,到达超意识和超然的第七个也是最高的查克拉。

在“生命力瑜伽”和“需要的层次”之间有一种亚伯拉罕·马斯洛(1968)所指出的惊人的相似。根据马斯洛的说法,需要有五个层次,这五个层次从需要食物、水和衣服的基本的生理需求出发。当它们被满足时,产生的下一个需求则关注所受的安全和保护。随后又产生了爱、附属物和归属感。这一层次的满足导致对地位、尊严和自尊的需求的出现。最后,当所有“较低的”需求已经得到满足时,在层次的顶端出现了圆满的需

求:对自我实现的需求——“成为一个人能够成为的东西”。马

斯洛的第一、第三和第四层次对应于生命力瑜伽最初的三个查克拉,它们的顺序依次是:实物、性和权力。在跟这本书所描绘的理论方面也存在明显的相似,例如,爱和附属的需求(弗洛伊德、布罗比的享乐模式),尊严与地位(阿德勒的遭罪模式),自我实现的需求(个人化原则)。马斯洛发现,坚持“自我实现”的人们醉心于他成为的“高处体验”(新的高度)——它跟神秘意识“博大的感觉”相近,这是一种更广阔的视野延伸到明显一望无际的地平线上的感觉。这种顶点体验的描述,使它们听起来像印度自我意识的一个例子——“经久不衰的哲学”的意识或敏锐的插曲知觉:纯粹个人主义的认同存在损失,它被对存在的,将永远存在的和曾经存在的一切事物普遍认同的感觉所取代。

如何获得这种期望的意识状态?为了促使她们出现,可能通过已被设计出来数个世纪的精神的戒律。一些人通过练习超然的沉思达到了那种状态。在我自己的生活中,我已经在梦中体验了接近这种东西。

像许多很好地进入生命第二阶段的那些人们,我经常思考死亡。“30岁以后人每天早上都悲伤地醒来,”爱默生写道,“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他死亡的那一天。”就我而言,则是每天晚上悲伤地上床睡觉。又一天从预定的数目中逝去。有多少个左边?一天早上我醒来,得知我的看法已经改变。显然我有一个梦,在梦里全部问题以不同的方式显示出来。而我虽然努力了,却仍然记不起梦里的细节。留给我的全部东西是某种意义已经改变的感觉。那是什么?没有梦的情况下,我能做的惟一事情是——积极地想像。我思考这种变化的感觉。它跟什么有关系?它跟我的死亡有关。它已不再重要。为什么不重要?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它是什么?一切事情都将继续,她们远比作为个体的我的生存和生命重要。这带给我平静和快乐的

感觉。为什么？因为我从死亡问题中得以脱身。我的意识不再限于我有限的存在：它延伸进万事万物中。随后我的梦里发生了什么？我第一次领会了大我意识。

就像韦伯（1983）指出的，就像在整个世界已经实践了数千年，这是设计仪式的牺牲而得到的东西：对自我的认同的牺牲，有利于对世界永恒的基础的认同。在过去 2000 年间，我们文化实行的模式是弥撒，基督是牺牲（羔羊），他为了他个人的存在（十字架）而死亡，他升入了天堂（超脱状态），跟上帝和一切存在（大我意识）的源头及延续结为一体。一个人通过进食基督的肉和血（面包和酒），把自己和基督凝为一体，参与到从对个人认同到对超越自我的大我认同的神秘转化中。

对没有在基督教堂进食圣餐的我们来说，弥撒的转化力量是不变的，但是如果我们处于无意识，在我们的梦里我们每个人都能具备自我的超越个体的力量。主要差异是，梦的转化是不可预见的：他仅仅发生于它会发生的时刻。作为信奉者，一个人不能通过简单地步入教堂，在每天或每周都经历同样的东西。但是我怀疑，许多基督徒也没有经历过。他们参加宗教仪式，但不为所动。就像哈姆雷特的叔叔克劳迪亚斯，他们口是心非。这就是当宗教到达生命的尽头时所发生的事情。神秘的力量重归于产生力量的无意识。伊卡洛斯就会永远地栽入大海。

无论灵魂变成何物？

纵使我们在远方的内陆
我们的灵魂都向着不朽的大海
大海把我们带到这里

威廉·沃兹沃思

当他们不再信仰上帝，社会便发生了灾难。他们的文化的脊梁不再拥有看不见的支持方式，变软，变碎。这是历史的重大教训——巴比伦、埃及、希腊、迦太基、罗马……没有神话和宗教为宇宙增添意义，好像芸芸众生进入自私的与世无用的阶段，他们在这一阶段失去了生存的意志。在当前世纪，许多评论家已经对我们社会的这种状况进行了诊断，他们用这样的词汇：“灵魂的死亡”

（巴莱特）、“精神的崩溃”（艾伯利）、“灵魂的丧失”（荣格）。“我们中大约三分之一的病例，”荣格写道，“不是由于明确可解释的神经过敏，而是由于他们生活的无意义和没有目标。如果称这为我们时代的普遍神经过敏，我不会反对。”（CW16）

对我们文化中伟大的神话和宗教标志的尊敬的丧失，把我们从原型的根基分离出来的社会制度和集体价值的出现，两者相互吻合。我们的文化变得越世俗，越物质化，越外向，我们的生活就变得越“无意义和没有目标”。对传统机构——家庭、教堂、政府及其官员、法律及其代表的尊重，不可逆转地下降，社会结构开始瓦解，犯罪、政治腐败和公众的堕落日甚严重。答案在哪里？不是返回到教堂的旧有方式，因为那些标志已经死亡并且没有希望恢复。荣格开的药方建议变得内向：“摒弃对外部世界物质目标的排他性追求，发掘我们自己的精神本质中潜伏的塑造标志的能力。”需要进行艰苦的心理研

究,让内在的无意识的宝藏对我们的思想敞开,以便真正地实现我们的完美。经验已经教给他,在那个过程中,意义和目标充满人的生活。

荣格似乎已经相信,如果足够多的人一实现个人目标,就这么去做,发展更高层次的意识,新的神秘的一致便能产生,使集体恢复意义和目标。这些艺术将对神话的复兴作出不可或缺的贡献。不幸的是,很少有迹象表明这一切正在发生。分析梦的领域主要集中于个人的心理力量,集中于人格调整的问题上,任何个人意识的提升,都被认为跟追求那些目标接近;这些艺术实际上已经抛弃了所有精神的或美感的目的。

20 世纪的艺术除了补偿我们文化研究中的瓦解力量,已经变得具有某种征兆。像我们已经注意的那样,抑郁的病人的梦里发生了类似的东西;这些梦没有缓解抑郁的情绪,而是倾向于加强这种情绪——直到集体的无意识发生了一些新的原型的集中(装饰),表明了变化的可能性。

对我们而言,20 世纪发生的一切,在启蒙和理性的年代,可以理解为确定的一系列过程的高潮——不光由雷内·代萨泰斯的梦表明,而且它的思想功能升至这样了不起的高度,依靠科学的帮助,他能够俯视,命令以及最后颠覆上帝的统治。把生命中所有关键的东西都归因于产生了促使人类精神无灵魂和理性化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从而导致赫伯特·马休斯所称为的“片面的人”的产生。据此,反映集体的、变化和进步的世俗价值观的艺术,就被剥去了神话参考的用途,被剥去所有精神上的用途。在上帝的尸体上长得肥壮的思想功能,在它外向而高傲的气势中凯旋归来,它在艺术中恰当地否认美丽、爱和人类灵魂。从此以后,现代派正统说留给这些受鄙视价值的惟一地盘,将是梦的颠覆的世界。

制造灵魂

在无意中我获得了灵魂。

詹姆斯·希尔曼

不应该忽视弗洛伊德对我们的精神败坏的贡献。想方设法通过他的关于我们隐蔽的好色的狭窄理论，他怂恿我们相信，我们行为的最坏的可能的解释总是最接近于事实。弗洛伊德的门徒们在这一证词中承认了他们的共谋：“我们很沮丧，”艾里克·埃里克森写道，“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启蒙意义被歪曲成普遍的宿命论时，人就仅仅是他父母的生殖的过错，仅仅是他自己的较早的积累。我们必须勉强地承认，即使我们试图用

科学的决定论设计对很少人的治疗方法，引导我们促进很多人中存在的精神疾病。”（1962）卡尔·斯泰姆阐明，精简的哲学，“是最广泛的心理分析思想的一部分”，它跟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中庸那么和谐，这跟对一切精神东西的鄙视联系在一起。

因此，从解梦学的立场出发，“令人遗憾的弗洛伊德的解释已经失败，弗洛伊德研究艺术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弗洛伊德的影响贯穿 20 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加剧着也是现代主义标志的对精神东西的鄙视。“典型的资产阶级”在冷淡抽象的个人主义和火热冲动的性之间的脱节，维持着思想和情感功能之间的裂痕，后来赫伯特·马休斯将这种脱节政治化。赫伯特·马休斯在 20 世纪 60 年代用超越自我的和现实的原则支持清教徒的职业道德，提倡为了服务于快感原则而进行革命起义。年轻人痴迷地接受了马休斯的提示，但是它对治愈处

于我们文化核心的精神分裂病没有起到作用。罗尼·雷格的《分裂的自我》，被认为是一本有关精神分裂的著述，由于公众认为它在描绘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著述变成了畅销书。这是雷格的贡献。而荣格的贡献则是，提供了分析自我是如何分裂的视角，设计了能够证明对思维重组有益的方法。

荣格的治疗学意图在其死后不久就受到了挑战，詹姆斯·希尔曼当时是苏黎世 C. G. 荣格研究院的年轻的院长。他出版了两本有影响的书，《自杀和灵魂》（1964）和《寻找》（1967）。正是在这些书里，他把我们文明的关键需求解释为“制造灵魂”——从灵魂的非常不受认可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勇敢的说明。希尔曼认为灵魂意味着一种景象而非物质。他想像灵魂是自我维持的，是一种意识依托的想像的过程——“使意义成为可能的一个未知的部分，它使事件成为经验，它可以用爱表达，它注意宗教。”他在其作品中最频繁地使用这个词语及其含义，宣布了“艺术的死亡”，表明它的死亡，三年以后在纽约的独立人士的画展上，展示了他的“著名的尿壶”，他给它起了一个讽刺的标题《喷泉》。实际上，这不是自然的死亡，而是一种谋杀，是永远地杀死高贵的艺术的预先尝试。包括我们的本质、反思、做梦、想像和疯狂——这些具有象征意义或比喻意义形式。灵魂将等同于“思维的诗样的基础”，它必须主要关注“深度心理学”。最具宗教性的、心理的和社会的志向是向上的，我们治疗学的发展应该把我们引向寻找“灵魂的更深层次含义”。赫拉克里斯的一篇宣言将深度心理学概括为：你不能发现灵魂（心理）的局限，即使你走遍每条道路去那样做；这是它的含义（理念）的深度。对希尔曼而言，最基本的一点是“灵魂的范围是深度（不是宽度和高度），我们的灵魂所经过的空间位于底下”。希尔曼说心理学是“灵魂的标示”，走入灵魂的迷宫，“我们永远也不能走到尽头”。（1979）正是下面

发生的東西（深度、黑暗），揭示了上面所发生的東西的意义（意识、光明）。

希尔曼重新肯定了荣格的觉察，即焦虑、情绪低落、无意义来自于跟原型世界失去密切联系：“我们文明中盛行的低落情绪部分是灵魂其失去阴界的反应。”（1979）通过深入研究梦提供了重新建立这种联系的可能。我们关于阴界的神话想像，超越阴间地狱返回到荷马时代、凯尔特时代以及日耳曼时代的黄泉。阴界是死亡，梦，先祖神灵昭示的王国。在伊利亚特里，荷马代表许普诺斯（睡觉）和萨纳多斯（死亡）双胞胎兄弟，阴界是冥府，受居于奥林匹斯山的宙斯统治。在罗马神殿里，冥府变成了普路托（财富），当我们在晚上入睡并且进入雷姆状态时，在短暂的瞬间，我们就英雄般地到下面访问死亡王国。查龙把我们送过冥河，我们经过赛伯鲁斯，被允许进入冥府帝国。制造灵魂，创造心理的完美，取决于两个世界的相互渗透，因为阴界和阳界，真实世界和梦的世界彼此之间都密切联系。他们间的相互作用是完整的，他们间的相互依存体现在整体中。“我们研究梦不是为加强自私，”希尔曼说，“而是实现精神世界，使生命在死亡中变得重要，通过提炼和加强想像塑造灵魂。”（1979）

就像荣格构思的，心理治疗的关键作用是使人扎根于个人的神话中，看见原型背景下的个人的生命经历。或者如希尔曼指出的，是使人的个案史成为它的灵魂史。记事是钥匙，神话和民间传说的“遥远的”特点吸引着灵魂的记事向往，使之进入无限王国——边缘的时间。经过分析，我们把自己生活的故事收集起来，制定出我们如何抵达此点的演戏顺序，所发生的事件塑造了我们，注定了我们的命运，并且通过扩大把我们的故事跟超人的人类记事联系起来，在神话、经文和艺术中颂扬的时候，肯定的深刻的联系意识，为自我、集体、宇宙和永

恒提供基础。

对全部的欲望和追求

仅仅连接……

福斯特

神话、仪式和梦的作用是把组成大脑思维的系统统一起来。西方文化的成就是把三者分离开。这是雷内·代萨泰斯的遗产。在启蒙运动以前，自我、社会和宇宙被体验为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因为宗教把它们凝在一块，世界充满了灵魂是因为想像使然。我非常感谢加里·埃伯雷，他使我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英语单词束缚跟官服一样都有印度——欧洲语系的背景，宗教跟系带一样都有拉丁语系背景。梦、神话、精神、戒律和宗教仪式都有

相同的系带或束缚的功能。与瑜伽气功不同，坐功是特意被用来将肉体、思想和精神系在一起，想像他们能产生相似的神经心理功能，是一种牵强附会。“祭祀、仪式和梦加强了新皮质和边缘系统之间的联系，把两者凝在一起”。如果这种想法正确，那么海马就是婚姻床，在那里一对夫妻和多对夫妻完成了结合。如吉达所揭示的，所有瑜伽的戒律目的都是把个人和万物的本源大我/婆罗门重新统一起来。

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对此技术并不了解。我们有意识的思想在意识上处于不确定的漂移状态，它支离破碎。可以从几个层次上理解我们集体的困境：从心理的角度而言，思想跟情感分离，知觉跟感知分离，自私跟自我分离。从文化的角度而言，人民大众跟艺术家和传教士分离，对那些伟大的标志和我们过去的传统不再崇敬：从神经学的角度来说，新皮质、边缘系

统和脑神经之间的联系没有今天频繁。由于跟上帝的私人关系中惟一灵魂的想法明显减少，我们每个人相对于大众都无足轻重，除了相对与我们自己和那些爱我们和依靠我们的人。人口规模越扩大，我们每个人相对来说就越不重要，直到最后我们的地位被完全忽略。现代主义在艺术中表达了这种迈向无意义的卑微的衰退，后现代主义是这一成就的记录。

几乎抛弃了所有无意识的文化的宣示，留给我们的惟一神话是我们在睡眠中创造的个人神话；留给我们的惟一仪式是分析的亲密的仪式。不幸的是，对个人神话和亲密仪式的诚信虽然促进了个人心理的完美，但它很少能医治社会的分裂。惟一的集体的神话是电视和电影工业生产的那些东西，日常生活中惟一的集体参与，常常是在孤寂的时候看电视。很少有值得赞誉的例外，我们电视屏幕上每天排练的神话缺乏道德的和神话的意愿，他们的目的只是让人娱乐，消磨时光，并使网络获利。“上帝的死亡”与三个“世俗的神话”——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受科学唯物主义启发的）无限发展的神话的出现相吻合。这些“神话”中只有达尔文主义未受到触动。第四种神话被看做是一种假设（依照希腊地球女神命名），仅仅引起了一些知识分子的兴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广泛流行，虽然有一些它的影响在扩大的迹象，但它本该如此。

我认识到把达尔文主义描述成神话，我将触怒一些生物学家。这不是我的意愿；他们被触怒，只是因为受到了幻想和可鄙的现代神话观的感染。在物种通过自然选择进化的理论中，达尔文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世俗的创造神话，神话具有解释“生物如何诞生”的功能，它比以前或之后的神话解释得都好。不幸的是，它对神话的精神和宗教功能没有进行解释的功能。相反，就如达尔文害怕的那样，它使神圣的东西失去神秘并打倒了上帝，在万物的机制中，它很少为灵魂的生存预留一

席之地。这就使德斯卡斯提出的灵魂和物质之间的分裂观点站不住脚：宇宙被清除掉了魂灵，被视作是死亡的。因为我们再也不把盖亚看做具有生命，我们没有认识到自己正在杀害她。我们把德斯卡斯的精神分裂病人的怀疑论带进它的最终的结论。他使大脑左半球的控制维系着才智的颂词合法化：惟一具有普遍永恒的有效性的精神事件是那些用逻辑和数学的语言制订的事件。怀疑的人仅仅关心世俗。它反对神圣意味着，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对待这个星球和互相交往。当没有神圣的东西时，我们可以以我们喜欢的任何方式来使用它。

第八节 神圣的根茎

了变化而离去。

一个东西留在原地，许多东西发生

珀西·比斯谢·雪莱

需要做什么？我想，对于这一点可能有相当程度的一致。在现代和原始的思维之间需要和睦和新的融洽，这样就可以治愈思想和感觉之间、前脑和中脑之间、自私和自我之间的精神分裂的脱节。需要有超越自我的眼光，需要意识的变化：抛弃英雄大丈夫主义式的自私的压迫思想，树立更温柔的女性化思想。需要集体理解的重新定义，这种集体理解认为，我们是一个生态整体的全部，我们每个人都对生态的维护负有责任。当如亚历山大·波普在他的散文《人》中所表达的：

一切东西都只是浩大世界的一部

自然是其体，灵魂是上帝

显然，从纯粹实用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恢复我们物种和地球上所有其他生命之间初始的一些平衡。我们极需要减少世界人口，改变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疯狂破坏，在较小的相互帮助的社区里重建人类生活中心，促进对所有创造的尊重态度，学会把我们看做是自然的仆人而不是她的主人。首先，需要改变个人优先，这样我们就不仅仅为我们自己服务，而且为所有的生物服务：我们需要依据全球的尺度对个人观念进行发展。这种心态上的根本改变有可能吗？如果可能，它将会带来什么？

如果我们自己处境的诊断正确，如果我们知道需要做什么，为什么我们不去那样做？在这我们触及到了基本的问题。知道的还不够。知识必须变成集体行动：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必须服从于全球意识，大我意识——这种意识肯定我们在“浩大世界”的位置。如果他们的保护仅仅作为一个科学的或政治的问题，我们的星球以及我们的物种将会灭亡：它应该成为一个宗教问题；必须把星球和物种看成是神圣。只有满怀热情地传播知识，才会被集体的能量驱动起来去寻求超越个人的智慧。

目前个人可以看见“很少有必要的转型迹象发生”。我们只有这样的理由：我们没有统一起来的梦。没有至高无上的神话动员我们集体采取行动，唤起我们热诚的献身，除了四处游荡及对需要做什么喋喋不休外，我们不愿做任何事情。20世纪有效地摧毁了基督教世界的支柱，但是，当我们审视这片废墟时，我们看这些建筑是那样漫不经心。历史上，伟大文明寿终正寝已不是第一次：所不同的是灾难的程度，以及灾难正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实。也许，在拥有足够力量能把我们的

集体想像聚集在一起的新神话产生以前，这种灾难必然会发生。重大和必然的历史变化发生之前，都有灾难的发生。弗洛伊德的妻子给他讲述一个有关一系列可怕事件的恐怖的梦时，他很平静地说，如果内在的解放和启蒙要产生，世界的混乱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继续形成我们个人的命运——我们中的许多人比以前的人过得都舒适和满意——在灾难的大背景下。就当前而言，人类的染色体幸存下来，人类精神努力适应着加速变化的不确定的世界，我们每个人都在我们能找到它的地方寻求安慰——也许在荣格的依靠其根茎生存内的植物的眼光：“它真实的生命是看不见的，他隐藏在根茎里。出现在地面上的东西只能熬过一个夏天，然后它枯萎了。”——一个短暂的幽灵。当我们思考生命及文明永不停息的生长和衰老时，我们摆脱不掉绝对无用的印象。要清醒地面对我们当前的问题，就要唤起集体的意识，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将其贡献给更深远更广阔的意识的发展。对那些从政治的角度考虑物质运动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只是一小撮非凡的人的神秘的努力。虽然所有的革命都是由那些首先明确集体需要的个人领导的，反则不然，除了在或大或小程度的意义上我们都有意识外，意识并不是集体现象。无论是从经验还是从形式上，意识都是一种个人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为人类举着一盏简单的油灯。当我们的灯油耗尽时，这种光对人类整个的光亮起的作用很小，因为还有如此众多的其他人的灯发着光。在这个意义上讲，通过数百万闪烁的灯火，宇宙于是可以看见可以理解，宇宙使自己清醒过来。一些灯比其他灯燃烧得亮，每盏灯一被点燃就熊熊放光。

当你看绵延的山脉，看辽阔的海洋，或者看燕子筑巢时，宇宙在利用你的眼睛和头脑，通过眼睛和头脑察觉和理解那

些现象。会有这样的时刻：你认识到这些景象是暂时的，是为了让你在这个星球上做短暂的停留而借给你的东西。但是就像宇宙利用你一样，宇宙“知道”自己总是这样。在观察的这个时刻，永恒和有限被熔化在一起。对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使我们从最近处瞥见佛、大我或道的本质。一个人在那个时刻得以浏览一下无限的世界本原。

然而这些光的闪烁是偶然的，可能许多人从来不知到这些光亮。事实是，只有通过研究梦，通过培养巫师的境界，从而获得从事意识的艺术所必需的观察力和技巧，超越自我的状态才最有可能实现。

14 科学和灵魂

我们应该小心不让才智控制我们。当然，才智有强壮的肌肉，但却不具有个性。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写到上一章中间，我做梦了，梦见我正在给多种族的观众讲课。当我说话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处于梦境之中，讲师代表了我的自我和观众自我。我的一部分把我有意识的头脑中产生的想法说了出来，余下的另一部分则专心地听讲。“精神分裂病人喜欢否认他初始的起源，”我宣称，“它是一个种系的势利小人。”我暗自想，“这必须是做梦时眼睛不跳动的睡眠，而我则在睡眠时眼睛跳动。”我用发表演讲的方式继续讲解：“知觉的发展是实现底下的东西，又渴望上面的东西，它是较低同时又较高的潜力的逐渐展开。”“解决掉它，”我想，“很明确，这是一种睡眠时眼睛不跳动的状态。再深入一些，深入到睡眠时眼睛跳动的状态。试着飞起。”我立刻飞起来了，发现自己懒洋洋地在离我家不远的德文希尔海岸上面翱翔。我注意到潮水退了，大片的沙滩暴露在太阳底下，海藻正在凋谢。我没有把手垂直向下——就像在“飞”的时候通常做的那样，而是有节奏地像翅膀一样地上下挥舞着手臂。我想到自己一定是只鸟，但是什么样的鸟呢？“一只阉限的鸟。”观众中一个女人答道。那是什么样的鸟？我看自己的腿，它是长有巨大

蹼的青蛙腿。“一只神奇的鸟，”我想，“一半是飞禽，一半是两栖动物。”“它是一只巫鸟。”观众中有人说。我很激动，马上从梦中醒来，把那一切记了下来。

就像我的梦雄辩地表明的那样，通过清晰地做梦进入神巫状态，就是进入飞禽——两栖动物世界。这是一个奇妙的世界，半有意（空气和光）半无意（水和黑暗），人如若再深入就得飞起来。通过梦我得出结论，如果从相反的角度，在我们中（在才智和灵魂之间，在200万岁的人和同辈人之间）寻找一致，我们就必须培养飞禽——两栖动物技巧，以便在神巫的双重世界里生活。观众中的那个女人是正确的。实质上，这是巫师们通常做的。就像艾利亚德在他的杰作《巫师行为》中表明的那样，巫师的创造模式总是跟上天入地结合在一起。在仪式和梦中获得双重成就是巫师行为的必要前提：“经历了它们，一个人就已经超越了人的世俗状态。”也就是说，通过跟自己身上的医师原型以及随之而来的为别人聚集神力的能力的交锋，他变得神圣、崇高和神秘。巫师的魅力不仅取决于走进痴迷境界的能力，而且取决于这种痴迷的意志，就是说，他不是痴迷的奴隶，而是痴迷的主人。他控制它。他拥有保持头脑清醒的痴迷的艺术，他使主动进入巫师状态的技巧得以完美，他传授给所有那些碰到他的人“每一种神话传统中宣称的个体能够达到不朽的意识，个体本身不死也不生，只是简单地来回穿梭，好像是通过一个面纱，在形体上出现又逝去。”（坎贝尔，1962）。传统——一种经久不衰的哲学心理学，可以很好地理解这种现象。这种心理分为意识清醒、睡眠和做梦三种状态，还有超越这三种状态的第四种状态，它把三者都统一起来。巫师是第四种状态中的巨匠，这可能吗？

为什么在这本书的结尾时我就该有巫师的梦呢？除了写有关“知觉艺术”的那章之外，我也正在修改关于“梦的科

学”的一章，并且准备就神经科学以及研究梦的实验方法作个讲座。在这一点上，我痴人说梦地说自己太聪明了，太“左脑化”了：我需要一个巫师钻塔，它屹立在被热爱的世界上，在那里土地（知觉、才智、科学）跟海洋（潜意识、神秘、灵魂）汇合，土地和海洋随着海浪变幻的步伐互相走近又分离。似乎潮水退得太多，海藻正在死亡。我知道这适合于我们的文化，但是它同样适合于我吗？无论如何，从比喻的和实际的意义上讲，梦使我得以鸟瞰在写书的过程中所涉及的领域。当每天出去散步时，我从高空看到的崖壁和海滩是我和我的狗所喜欢的地方。梦最打动人的地方是它的情感力量：它是神秘的，它有宗教的强烈力量吗？

这跟我本身宗教教育的缺乏可能有关联。就我所知，也许除了向诺亚提示洪水结束的鸽子（写一本书有似于在方舟上遥遥无期地流浪）外，在峡谷上飞的巫鸟与基督教肖像画法没有关系。在绝大多数文化里，宗教的原型是在童年被激活的。相信宗教或神话会被带入其中，被信仰同一宗教的人们包围。对挑剔的成年人而言，初次跟宗教打交道，实际是不可思议的，因此传统上信仰某一宗教的人会对信仰另一宗教的人表示出蔑视。就我而言，父母用启蒙的自由意识把我养大。这种意识认为，在我长大时，应该允许由我自己对宗教事物作出决定。因此，作为孩子，我接受了很少的宗教教育。结果呢？是对宗教建筑、艺术和仪式产生了美感，却对人为上帝的存在和教士建立起来的有关上帝的教义彻底地怀疑了。然而在我的梦里，在随之而来的浮想联翩中，我清晰地体验了宗教：我下面的景象以及景象上面的我的翱翔，都是神圣的。

我研究梦的时候，神圣的思想和感觉开始复现。它是什么？是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的感觉。它对我有什么至高无上的价值？是生命、知觉、爱情，它使我知道我是活着的。我需要梦

来告诉我那些东西吗？是的，因为我认为那是当然的。它是想像力的失败。由于缺乏跟活生生的宗教仪式的联系（以便为我每天创造至高无上的价值感），我于是自己制造梦境实现那种感觉来把我唤醒到神圣的领域。但愿具有巨大魅力的“神圣的刺激”能对我敞开几分钟。偶尔，我在神圣的地方对这得以一瞥，有时在我们的自己的哥特式大教堂，但更多是跟世俗没有联系的。垂死的基督教在它过去的殿堂上，在古希腊、日本和印度的神殿上曾保持这些联系。但是在我的梦里很少受这样的冲击。我从和我分享同一梦境的人们那里得知，在梦里我一点也不孤独。在潜意识中我是一个原始的动物。为了探索宗教走近神秘的世界，作家 J. B. 普里斯特利在为有关时代的剧作努力工作时做了这样一个梦，他写道：“我想它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比以往任何经历都深刻的印象，不管是清醒还是做梦，对我说的关于生活的事也比我已经读的多。”梦如下：

我梦见自己独自站在一座很高的塔的顶部，向下一看，无数鸟朝同一方向飞着，那里有每一种鸟，有世界上所有的鸟。空中这巨大的鸟的河流蔚为壮观。但是现在，一种神秘的方式改变了齿轮的方向，时间加快了，于是我看见了鸟的后代，看到它们破壳而出，飞进生活，交配，衰老，蹒跚并且死亡。翅膀长成了又发皱了，身体光溜溜的，又马上流血、枯萎，每时每地，无不充斥着死亡。这些鸟盲目地为生活拼搏有何用呢？急不可待地试飞翅膀，匆匆进行交配，做这么多无意义的努力有什么用呢？当我向下凝视，几乎是一瞥眼就好像看到每一个生灵默默无闻而又渺小的历史，我感到心痛。如果它们，如果我们谁也不出生，如果斗争永远地停止，将会好一点。我站在我的塔上，依旧孤孤单单，非常不幸。但是现在齿轮又被改变了，时间跑得更快，甚至到了使得鸟儿静止不动这种速度，使鸟儿像一个遍地播种羽毛的巨大平原。在这个平原之上，穿过一种

白色火焰，战抖着，跳跃着，然后急匆匆地蔓延向前；我一看见它就知道这白色的火焰本身是生命，是生灵的精华，它在疯狂的向我扑来；我知道什么都不重要，什么也不可能重要，因为除了这抖动的匆匆的闪烁的生灵外没有其他东西是真实的。鸟、人和动物还没形成，除了目前闪烁在这些东西中的生命火焰之外，其他都是无关紧要的。它背后没有留下可伤心的东西。我所想的是，悲剧只是虚无的东西，或者是个影子。现在，真情实感流露出来，它们随着这股生命的白色火焰翩翩起舞。我以前从未感受过在有关塔和鸟的梦结束时所产生的那种幸福，如果我不把那种幸福作为心的内在世界和圣地留在身边，那是因为我是一个允许这种疯狂世界毁坏智慧的每一个绿色萌芽的脆弱而又愚蠢的人，然而，我还不是这样的人。梦已经经历了大量的琐事。（普里斯特利，1947）

用卡尔福雷德·杜克海姆的话来说，拥有这样一个梦，一个人就明显超越了物质世界。他跟美洲印第安人一样持神秘看法，相信每一个植物、动物、人都是灵魂的载体。他相信动物具有我们的如下知识：即由于纯粹世俗的世界中的灵魂是不朽的，每一个体灵魂所有的生命能量在其载体死亡后仍将存在。因此生命的循环可以沿着不衰的轨迹前进，所有的生物都脱离于他物而存在，依靠自己的生命而存在。因此野牛能与人达成这样的契约：每年返回到同样的地方让人捕猎，非常情愿地被屠杀和吃掉。世界上的每个个体的能量都加入生物循环的大链，然后又返回为自己利用。

研究这种梦将理解我们被我们不能控制的能量所驱动。这是宗教上的理解。这种能量被体验为“神圣的”，因为它们来自所有生命的生物学背景：我们不能创造它们，它们创造了我们。宗教仪式——不管它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是宗教意义上的还是分析学上的——都以一种玄妙的方式把这些能量引导

到了个人实现的渠道,像神话表明的那样,使个人意志屈服于集体意志。

在我的梦中,最令人激动的地方位于已知和未知交界的地带——因为它充满了可实现性,一个人从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最具创造性的策略是对这些事件敞开胸怀,绝不要强迫它们跟一些已经确立起来的教条一致,但是要让它们发展,看它们通向何方。跟在梦的分析中一样,它符合科学。科学家却不总是这样审视它。他们对理论的献身以及做实验的精力,促使他们为了得出中肯的推断而忽略对自己正研究的现象所用的神学方法。据此,他们可以宣称梦是神经化学过程的无意义的副产品。他们深受其害于一种歇斯底里的盲目,这种盲目同样困扰着坚持认为脑的研究跟其实用无关的分析家们。它导致无思想、无头脑的僵局的产生。可能性在于,所有跟实际神经科学不协调的梦的理论将销声匿迹,将在心理方面找到跟在化学的燃素理论方面一样多的实用功能。如果分析理论不能被客观资料证实,不能被有关原理的发现确证,不同分析学派的成员将会陷入如此境地:他们围绕一个乡村水泵进行着农民式的抱怨和争吵。

幸运的是,在对梦进行研究的科学的和分析的方法之间不存在内在冲突,在科学和灵魂之间同样不存在冲突。冲突只是在科学家变得趾高气扬,分析家们坚守陈旧的信仰时才会发生。心理就像宗教,必须符合当今的发现,而科学必须符合从过去沿袭下来的典型需要。如果伪基督教信仰体系统崩溃了,那并不是因为它们是“非科学的”,而是因为它们已经经历了4000年——它们已经扎根于苏美尔人的神话中。与今天的宇宙学不符的神话将消失——就像跟我们对大脑的神经病理理解不符的做梦心理会消失一样。

梦生态学

人已经被赋予了推理和创造的力量，于是他可以在自己已被给予的东西上添枝加叶。但直到现在他还不是创造者，而只是一个破坏者。

安东尼·切克霍夫(1980)

一个病人在梦中发现自己置身于充满人脸、聚苯乙烯、汉堡包盒子和肮脏塑料袋的后花园里。他怀着深深的荒凉感扫视眼前的景象。他肯定想自己远不值这些东西。细细琢磨这个梦，他觉得梦展示了自己生活的一片混乱。当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梦时，我们会看到梦也展示了我们共同在我们的星球上造成的混乱。他的生活之所以混乱，是因为

他头脑过于简单。跟对他的家庭、朋友、社会和他自己的关注程度相比，他更热中于自己的职业。我们的星球处于混乱，是因为我们跟病人一样也有那种隧道视觉。当然了，我们远不值这些东西。

在梦结束以后的丰富想像中，病人能找到走出花园的一扇门。门通向有小山、树木、河流和鸟儿的地方，当他在心的视觉中徜徉其中时，他开始觉得希望和快乐重新朝自己走来。

病人的问题的一部分是他的教育。雄心勃勃的父母曾鼓励他在学校好好学习科学，把他送进了技术学院，使他得以成为一名建筑师。他成功了。顾客会揣着佣金来求他盖一座建筑。这个病人会看到有待“解决”的一系列“问题”。结果他建造了一些高效率的建筑，但那些建筑就像二战结束以来使我们的城市变形的许多建筑一样，缺乏美的价值。在这方面，他所受的教育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突出典型。这种教育以右脑

功能的发挥为代价,强调对左脑功能的开发。这跟古代的教育观形成鲜明对照。古代的教育非常重视音乐、舞蹈、体育以及智力培养的艺术,它的目标是使整个人得到发展,无论是在肉体还是在精神方面;它超越了普罗米修斯和艾皮米修斯对人性提出的要求,塑造出了更大的智慧。

现在,已经播放 40 多年的电视系列节目《七岁而立》,跟踪报道了一群具有不同社会背景的人,这些人年龄从 7 岁到 14 岁,28 岁,35 岁等等。在西方的教育实践和西方的价值观开始对这些人施加狭隘和衰微的影响之前,他们的品质在 7 岁时是最好的,是最富有活力的——这很少有例外。展示这衰老的悲惨过程并不是节目制作者的明显意图,但对敏感的观众来说,事实已很明显。就像节目表明的,仍然能在操场上在教室里在所有的项目上焕发 7 岁时的朝气的 200 万岁的我,逐渐地枯萎了:一个人在被跟踪报道的那些人眼里瞥见了这个古老的幸存者的迷惑,他们的眼睛似乎充满了对失去的和可能的东西的宿命观。“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他们似乎问道,“我们在怎样生活?”好像他们被自己栖居的世界迷惑了,于是想知道为什么事情不是他们想像的那样。他们期望什么?他们可能在想为什么我们不再讲述神话,不再敲鼓吟诗,不再油漆狩猎,共享我们的梦,不再为上帝歌唱颂歌,吓跑把我们诱向毁灭的魔鬼?他们勇敢地为镜头排练使人高兴的言辞,但却同时有这样的感觉:一些东西出毛病了,它们是不可理解的,是令人悲哀的,到处充满了不好的兆头。

像基因一样,文化的幸存要求每一代必须把原有的智慧和新的知识结合起来。像它仍然是梦的功能一样,这是神话、仪式、宗教的功能。在创世的各种传说中拥有一席之地的神话给一个民族统一的隐喻。宗教向我们提供行为的准则,规定我们彼此之间怎么相处,怎样对待我们周围的生灵世界。当今世

界的问题在于,我们不光丢失了我们的神话,而且忘记了我们的行为方式。我们极易忽视我们只是我们的母亲和大自然的临时客人这一简单真理,我们就像被惯坏的孩子滥用她的好客。她为我们筑起了一个美丽的巢,我们却把它玷污了。但她的爱溺不是毫无止境的。她已经发出变得倔强的迹象,暗示我们已经受到了足够的优待,她正在考虑驱除我们的方式。如果我们希望继续呆下去,我们就必须改过自新。我们需要表示尊重和谦卑,而不是像流氓那样做事。这是神话给我们的启示。更多的自醒是关键,但它必须是想像上的自醒,必须跟做梦所产生的思维直觉和左脑知觉到的实际知识通融。

既然梦已经对科学和哲学思想的最重要发展作出了贡献,那么说梦有助于我们走出当前地球所处的困境就不无道理。我们的生态环境反映了我们的精神状况,在下一个世纪我们关于作为一个物种的我们的各种思想必须经历一次深刻的革命,这次革命将使以前的革命看起来像是组织一次微不足道的教区庆祝。迫切需要新型的战略——准确地说,这是梦所能提供的东西。

因此,研究梦不是自我陶醉的一种纵欲形式,而是一种具有文化和生态意义的精神活动:我们作为个体越是有心,宇宙中我们所占据的那一渺小部分就越有希望。在西丽雅·格林的杰出著作《清晰的梦》(1968)中,她指出,清晰的梦是人类心理学的“最后边疆”。在这里她是对的,因为在此领域进行耕耘能够使有着自己生活方式的我们变得神神鬼鬼,进入一个双重世界。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赖阿姆·胡德森(1985)的警告,他说梦是我们“最后的荒原”,需要我们用保护雨林、臭氧层和鲸鱼的热情来保护它。梦作为留给我们的惟一的具有精神活力的绿洲,属于我们最珍贵的资产,我们必须反对那些使我们赋予梦的价值减少的那些人。

通过科学和技术,我们已在物质世界取得了瞩目成就,但是我们意识的领域和品质的发展之门只是刚刚被开启。科学家将进一步阐释意识的神经学基础。但是,对我们和我们的地球仍将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对待我们所拥有的意识。在开发自然获取巨大成就方面,我们的梦将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附 录

《人类梦史》，其翻译由杨晋统稿，以下十五人译成：

蔡 晋	王 宝	韦 宇	饶彦均
高健民	戴雪文	颜 德	翟 俊
路 修	谢 育	蒋雅芳	陶之训
刘蓉华	高 望	郭 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梦史/(英)史蒂雯(Stevens, A.)著;杨晋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12

书名原文:Dreams and Dreaming

ISBN 7-5443-0320-9

I. 人… II. ①史… ②杨… III. 梦-精神分析 IV. B84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3733 号

Private Myths: Dreams and Dreaming

Copyright © Anthony Stevens 1995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1 by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30-2001-111 号

人类梦史

(英)史蒂文斯 著

杨晋 译

责任编辑 任建成

※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216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75

字数:246 千字

书号:ISBN 7-5443-0320-9/B·24

定价:24.00 元

神话是大众的梦 梦是私人的神话

我们已在物质世界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但是意识领域的发展之门只是刚刚开启。在
这本关于梦的启蒙之书，您将深深领略到
人类那不可知部分的隐秘与神奇。

ISBN 7-5443-0320-9



9 787544 303200 >

ISBN 7-5443-0320-9/B·21

定价：21.00 元